房龙经典读本

On Human

W.H.van Loon

房龙论人

肖毅 南友 译

海南 出版社

影响欧美的100本书之一

房龙论人

威廉·亨德里克·房龙　著
肖昶　商友　等译

海　南　出　版　社

房龙经典读本

On Human

W.H.van Loon

房龙论人

肖昶 商友 译

海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房龙论人/（美）房龙（Van Loon，W.H.）著；
肖昶，商友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1
书名原文：On Human
ISBN 7－80645－632－5

Ⅰ．房…　Ⅱ．①房…②肖…③商…
Ⅲ．历史人物－评传－世界　Ⅳ．K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3454 号

房龙论人

（美）房龙　著
肖昶　商友等译

责任编辑　张新奇　特约编辑　易　水

＊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
字数：331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书号：ISBN7－80645－632－5/K·32
定价：25．80 元

目　　录

东方圣人——孔子 / 1
西方圣哲——柏拉图 / 14
由舞女到皇后——拜占庭皇后西奥多拉 / 29
虔诚的圣徒——圣方济各 / 48
中世纪最完美的大师——但丁 / 55
有史以来最多才多艺的天才——达·芬奇 / 65
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宗匠——伊拉斯谟 / 79
神游物外的空想主义大师——托马斯·莫尔爵士 / 117
为人增添欢乐——《巨人传》的作者拉伯雷 / 127
我到底知道什么——米歇尔·德·蒙田 / 140
为国何惧捐躯——沉默者威廉 / 153
敢于做不可能实现的梦——《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 / 170
好女王贝丝——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 182

目　录

北极探险先驱——海姆斯凯尔克与巴伦支 / 199
人类心灵的挖掘机手——威廉·莎士比亚 / 210
我思，故我在——笛卡尔 / 217
描绘法兰西的画家——莫里哀 / 238
在历史上打下不朽的烙印——彼得大帝 / 250
苦行僧——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 / 267
音乐世家中的天才——塞巴斯蒂安·巴赫 / 275
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 / 302
命运多舛的音乐神童——莫扎特 / 315
制造恐怖、自尝恶果——罗伯斯庇尔 / 328
军事奇才政坛枭雄——拿破仑一世 / 360
乐圣——贝多芬 / 380
用心而不仅是用脑子写作的人——爱默生 / 393
举世无双的童话大师——“丑小鸭”安徒生 / 405
波兰文明的化身——肖邦 / 413
身后扬名的孤独才女——埃米莉·迪更生 / 423
雪野中的山峰——南森 / 430

东方圣人——

孔　子

Confucius

（公元前 551－前 479 年）

在遥远的东方，有一片我们（包括我自己）完全陌生的土地，那就是中国。我从未到过中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从未见到过中国人。我确实见过，我发现那些比较贫困的人们在他们的勤劳和保持愉快的心境方面很值得敬佩。我听说当他们学坏时，他们坏得也很潇洒。但我所熟悉的那些人通常都拥有某些忍耐和勤勉的品质，这使得他们比起他们的白色、棕色、黑色邻居们，尤其是白人们，要高人一等。至于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在各方面都远胜过我，这一点让我觉得很惭愧。

我最喜欢的中国人品质是他们那种真正的伊拉斯谟式的忍耐精神，那种酷似蒙田的令人愉快的思考风格，以及赋予他们所说或所写的一切一种愉快的拉伯雷式幽默感的那种机智（骂人话或其它）。最后，还有他们那种对事物内在含义的微妙感受。他们对于那些西方人往往误认为是诚实的笨拙举动从不感到内疚。我的完全熟悉中国的朋友以及中国的朋友一直不停地告诉我说这个说法有点太夸张了。他们告诉我，中国人也拥有一种非常低级的聪明，他们在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上往往是非常实用主义的。他

们对同胞遭受的苦难可以相当残酷和冷漠，他们外表的平静与他们微笑的双眼后面灵魂深处的安宁（我们常常对此表示怀疑）根本不相一致。

也许所有这一切都是真的。早期旅行者和我们自己文明的逃亡者留下的间接证据，使我一直相信存在着某个太平洋伊甸园。但当多年以后实际拜访我们星球上那块极其可爱的土地时，我亲眼所见的可悲事实却与此不完全一致。当我踏上塔希提和夏威夷的土地，看见文明给这些愚昧的当地人所带来的丑恶时，我迫使自己记住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这些可怜的生灵一直生活在白人捕鲸者、白人贸易商以及基督教传教士的救济之下，更不用说那些为了自己的掠夺目标而霸占这些岛屿作为军事哨所的白人航海家和欧洲国家的海军们了。因此，就中国人而言，在我有更好的认识之前，我将坚持我原来的观点，即普通的中国人（除非被白人和基督教环境宠坏了）受到一种生活哲学而非宗教体制的影响，这种哲学使得他们能够比我一直与之一起生活的其他种族的成员，更能从自身的世俗存在中汲取更多的满意和知足。

那么很自然，我觉得有必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人之所以成为过去、现在的中国人的原因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呢？他们具备了我们西方人不具备的哪些品质呢？寻求答案的唯一途径就是读许多书。在阐述中国谜团的每一卷书本中我迟早会碰到一个据说是对中国人之所以成其为中国人、并对他们在过去的2500年中一直这样做而负有主要责任的人，一位预言家，或哲学家（人们以各种名字称呼他）。

他的名字叫孔夫子，但当欧洲人最终听说了他的名字时（大约在他死后几千年），却将它拉丁化了，结果变成了Confucius，从此以后他便以此名著称。

孔夫子于公元前551年出生在一个古老而显赫的家庭。这让我们西方人看起来有点愚蠢！我们真是那么年轻吗？在耶稣基督

诞生前500年，那时我的祖国还不存在哪。尼布甲尼撒[1]刚刚从巴比伦的海岸上消失，耶路撒冷的第一座大庙堂仅仅在几年前被毁灭。梭伦[2]也刚刚去世，雅典卫城还要再等一个世纪才会被授予巴台农神殿。至于罗马，还只是一个在绝望中挣扎着反抗自己对手——伊达拉里亚人——的乡村小镇，再过400年以后它才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帝国的中心。

因此，当我们西方人还只是生活在泥房里、把脸涂成天蓝色的野人时，中国人已经学会用美丽的瓷盘吃饭，用精美的图片装饰房屋四壁了，而且绘画技艺之精湛是任何现代艺术家无法超越的；他们已经给予了东亚世界一位大智大慧的预言家，凭借着他的智慧，他向几亿人民传授了一种日常生活的哲学，那种哲学一直在过去2500年中影响着他们的子孙后代，并且至今仍如从前一样至关重要，一样可行。

很抱歉我只能提供给你们有关这位圣人的二手信息，因为汉语在我来说是一本合上的书，我已超过了学会它的年龄。

孔子20岁时开始了他作为政府官员的职业，他被任命为今天的山东省土地和公用田地管理人。这就意味着在我们的祖先仍然只是一个游牧民族，过着永远处于饥饿边缘的靠劳动糊口的生活时，中国政府已一度对计划经济发生了兴趣。

可是正规的市政服务职业似乎对这位年轻的孔子没有多大吸引力。不久以后他便辞职当了一名学校教师，他做出这一决定时

---

① 指尼布甲尼撒二世（公元前630？—前562年），新巴比伦国王，侵占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攻占并焚毁耶路撒冷，将大批犹太人掳到巴比伦。在位时期兴修了巴比伦塔和空中花园。

② 梭伦（公元前638？—前559年？），古雅典政治家、诗人，公元前594年当选为执政官后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解救贫困，修改宪法，制订了新法典。善写哀歌体诗，其诗作仅有片断存世。

孔子像。拓自西安碑林中一块 1734 年的石碑。

年仅22岁，当时他已结婚三载，有了一个儿子。子又生孙，孙又生子，一些中国朋友告诉我说这位圣人的直系子孙仍然存在的说法是真实可信的。因此，孔子家族一直维持了70余代，这本身就是一项纪录，因为我们没有哪一个意大利家族能追溯至古罗马时代，而一个能够寻根至1500年前的西欧家族就像英格兰偶尔出现晴暖天气一样稀罕。

在22岁的年龄，我们的主人公已在领导着自己的一座学校，但这是一座非常特别的学府，因为授课的内容不是通常的学科，而是专门致力于让学生们认识善与恶的存在，并教导他们如何培育道德，避免罪恶。入学的唯一条件（即便以我们今天的观点来看也很不寻常），是具备严肃的求知欲望和学以致用的刻苦精神。学校不收取学费，来自富有家庭的学生应为那些除了身上的衣服和盛米饭用的木碗以外一无所有的求学者负担基本生活费用。

这所学校引起广泛的注意，鲁国一所豪华宅邸的两个儿子被父母送到这位年轻导师那里聆听教诲。当他们的家人建议由他们的家庭教师陪他们同去时（有点像18世纪欧洲的情形），他接受了这一请求，并利用这一意外的机会完善了他自己在汉语语言和音乐方面的知识。据传说，他就这样结识了著名的老子——这位比他年长许多的道教创始人。

孔子时代的道教意味着什么？今天又意味着什么呢？我必须再次承认无知。我只能说它是一种教给人们真正的幸福只有通过一丝不苟地遵循道（法则）才能获得的人生哲学。在老子看来，道似乎意味着过去5000年中一代又一代父子相承的古代礼仪之集大成者。除了这种对过去的尊崇，道教还宣扬在思想和行为上保持尽可能的单纯。在这一点上，它与各个时代圣人们的结论相一致。

老子似乎给孔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从老子这方而讲，他似乎对这位来访者根本不感兴趣，或者说对他遇到的麻烦没有感

到丝毫的同情。然而他的确遇到了麻烦，而且还很多。在他离家在外时，他的家乡爆发了一场革命，当权的统治者被赶下了台。作为法制和秩序化身的孔子是不可能同意这种暴力行为的。当合法的王子被放逐时，他和他的弟子自愿追随他而拒绝篡权者的统治。

从此，孔夫子便开始了一种流浪的哲学家生涯。他一直认为在某个地方一定存在着这样一位聪明、有远见的领袖——他会真正需要一位有学识的人为之效劳。可是这样不同寻常的当权者在历史上一直是非常罕见的。关于一位伟大的统治者和一位智者相结合的最初例子是在大约2个世纪以前出现的，即在腓特烈大帝登上普鲁士王位之时，那位国王实际上做了柏拉图和孔子一直期望的事情。他派人请来了当时在世的最著名的哲学家，请他一同住在王宫里。但这一试验却远未获成功，最终的结局是腓特烈和伏尔泰痛苦地分手了。从那时起，政府更倾向于起用健康专家、畜牧专家和森森保护专家，我们从未听说过华盛顿政府派人去请过威廉·詹姆斯① 或乔治·桑塔雅那②，我很怀疑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首脑们是否知道有一位叫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人。

因此，除了几次特殊的情况，孔子从来没能够在任何地方呆上较长的时间。其中一次这样的情况是在他52岁的时候出现的，一位开明的王子派人请他去担任司寇（司法部长）。这位圣人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不久全国上下都知道了他的存在。可是在

① 威廉·詹姆斯（1842—1910年），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实用主义者，机能心理学创始人。

② 乔治·桑塔雅那（1863—1952年），哲学家、文学家、批判实在论代表之一，西班牙人，后移居美国。著有《理性的生活》、《存在的领域》、小说《最后的清教徒》等。

那之后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那些从前得益于政府事务混乱的人士（敲诈勒索者和一些政客，就像我们今天所称呼的那样）如今失掉了工作。于是他们马上联合起来反抗这位过于诚实的改革家。孔子没有坚持与这些人进行斗争，而是悄悄地辞官回乡了，并在那里平静地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15年。他在家乡进一步扩大了他弟子的数量，最终该数字超过了3000。用他自己的话说，其中大约80名弟子是具有卓越才能、能真正领会先生意图的。

孔子在73岁时去世，也就是将欧洲人从波斯人进攻中挽救出来的萨拉米斯海战① 结束后的第二年。据那些在他离开人世时陪伴在他身边的弟子讲，他十分从容地迎接了自己的末日，对未来没有丝毫的恐惧。他从未相信过来世，因为儒教从未发展成为一种宗教，它不需要以天堂或地狱来约束其追随者。这位年迈的绅士最终退出了生命的舞台，因为他厌倦了对那一直未能出现的邀请的等待。他现在被迫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没有哪位王子会请他任相（总理），给他一个显示应该如何凭智慧和诚实来管理国家的机会。在他进入长眠之前，他吟出了中国人一直极为喜爱的叙事短诗。这诗被人们保存了下来，读起来几乎与我在讲述柏拉图的小故事结尾处引用的四行诗一模一样：

“太山坏乎！
梁柱摧乎！
哲人萎乎！”

《旧约·传道书》的作者对此也很感兴趣，虽然他是以一种略微不同的形式来表达的：“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意义大致如此。

① 萨拉米斯海战是希波战争中的一次重要战役，战役以希腊人获胜结束。

韦伯斯特这样总结孔子学说："作为一个哲学体系，它是众多中国伦理、教育、政治、宗教的基础。孝、仁、义、礼、智、信是基本的品德。"这是一种非常高尚的行为规范，每一位有理性的人都会认同的。

基督教两千年来也一直在积极倡导这样的品德，但是这20个世纪中我们经历的却是暴力、残酷和大规模的杀戮、盗窃——是将朋友与敌人一并杀害的远征——是手持机动枪炮的人向弯弓搭箭的土著人发动的进攻，是虔诚的神父请求一直宣扬"互爱"的耶稣保佑勇士的业绩。

那么，像我刚才已经问过的，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这些贫困的中国洗衣工人在一种几年时间便会令其它任何人类毁灭的艰难条件下生存下来，又是什么使得他们能够忍受那些白人——他们由于自身的贫穷而不得不生活在那些人中间，为的是能够让他的孩子将来成为与他的所谓的基督教邻居的后代迥然不同的文明、礼貌的小市民——的呢？是的，究竟是什么在起作用？难道孔子赐予了这个世界某种哲学的指南针，凭借着它，他的每一位弟子都能够在无论何种天气下安全地驾驶着自己漏水的小舟穿越地图上的任何部分吗？或者说在孔子降临人世之前很久中国人的品格就已经完全"定型"了，这位圣人只不过是为了那些平时太忙于日常事务，而没有时间亲自研读古代哲人们留下的著作的同胞们的利益，将这些结晶加以具体化了呢？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上了。究竟16世纪荷兰人的宗教是伊拉斯谟的宗教呢，还是伊拉斯谟是16世纪荷兰人宗教感情的表白呢？是笛卡尔给了17世纪的法国人一种崭新的生活态度，还是他本人是已经存在了千百年的思想的最终产物呢？我不知道，恐怕我永远也无从知道。但是我怀疑是孔子的品格而非他的著作（正像他的弟子们著述的那样）给中国

人的品格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功劳完全在于孔子的《论语》与今天我们在许多小城报纸上见到的文字片段相似，其目的仅仅是在没有真正的新闻时填补编辑版面。大多数内容都相当普通，少量可达到已故的阿贝·马丁赠予《印第安纳波利斯新闻报》读者的哲言警句的高水平。以下是从孔夫子和金·哈伯德[1] 的文学遗产中随意摘取的两个例子。

那位中国圣人曾讲道："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而那位印第安纳哲学家则说道，既然贫穷没什么可耻的，那大家何不都来做穷人，"世界每天变得更好——只是每到晚上便变得糟糕"。

如果我决心仿效蒙田，拿出画笔在我孙子的教室中画出给他们以启迪的内容的话，我敢肯定我会把金和孔子都提供给他们。那会使孔子成为中国的阿贝·马丁，阿贝·马丁成为印第安纳的孔子。为什么不呢？因为正是他们的"家庭"感（从这一词的最好含义出发）才使得他们受到广大平凡、普通的人民群众的喜爱，使得他们成功地做到了许多比他们口才更佳的哲学家一直无法做到的事。这两个人都是乡下人，都非常熟悉那些依靠、利用、享受土地的人们，因此两个都是自然哲学家，因为没有哪一个能与自然有着密切接触，经常观察四时交替、潮起潮落，并且依靠阳光雨露生存的人会不成为一名田园圣人的，除非当地的巫医控制住了他，使他失去自我，成为上帝创造的所有生灵中最可恨的人——一名小镇狂热分子。

现在甚至连孔子最大的敌人——那些对他恨之入骨的统治者在他刚一去世便下令焚毁他的全部书籍——也未曾责备过他。他

[1] 即埃尔伯特·格林·哈伯德（1856—1915年），美国编辑、出版家，曾在纽约创办一家出版社，发行先锋派杂志《庸人》等，以刊出他所写的提倡坚韧不拔精神的《致加西亚信》著称。

极讨厌偏执和多管闲事。为了寻求最佳的生存方式和使他人生存的策略他殚精竭虑。他对于使他人生存的思想尤为感兴趣，为此，他坐在自己那简陋但整洁温馨的小屋里，拿着笔墨纸砚，问着自己这样的问题："我该怎样，以何种方式，教导人们以最低限度的痛苦和最大限度的满足来享受生活呢？"

其他哲学家和其它信仰的创始人也曾做过同样的事，但没有一个人获得过如此的成功，因为孔子是唯一一位一直将眼光牢牢盯在那块他非常熟悉的土地上的人。正是这块土地在培植了他的大白菜的同时也培育了他的思想。

认为儒家教条缺乏宗教品质的指责无疑是正确的。孔子不是超灵魂论者。他不否认存在一个世俗之外的世界，但他觉得那种为被保佑者提倡的天堂家园和来世生活之说证据模糊，依靠的完全是从未到过那里的人的传闻。

另一方面，孔子生活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可以触摸到的事实存在。没有人能否认它的存在，因为每个人都可以看见、听见或体验到它的存在。人们甚至可以坐在它的上面，触摸它，如果他们饥饿难忍，他们可以把它当饭吃，以此来使生命再痛苦地延续几天。孔子如是教诲：作为理性、智慧的人，人类应当能够善处逆境，因为只要具备些许理性和智慧，就可以成就许多事情。

他讲道，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一次旅途中，为等待一座桥被修复，或等待一架马车驶过来装运行李，一个人常常不得不去某个异常贫穷的小村子呆上几天。在这种情形下，一个智慧而有理性的人该怎么办呢？他会研究一下形势，清点一下财产，相应地做出计划。他不应当指望会在一个没人养得起牛的地方找到上等牛排。那么何以果腹？怎样用几块肉少得可怜的排骨做成一顿美餐呢？除了萝卜以外没有别的蔬菜。有什么办法可以将萝卜变成人可以消化的一道菜呢？客栈更是无处可寻。但某处可能

会有一座破落的庙宇，可以将它收拾得舒适一些暂度几日，等等、等等。通过不辞辛劳的搜寻，他甚至可能在村民中发现几个有趣或灵巧的人物，同他们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听他们讲述恐怖的野兽故事，或倾听他们演奏的笛曲——即使在这样偏僻的所在，也总是有一些怪老头们还记得一些其它地方早已消失的曲调。最好的莫过于交些朋友，或至少由于自己优雅的称呼和文明的举止而受到村人的尊重。

现在我们把该场景由内陆的一个小村落转移到位于某大河岸边或某大省市的海岸上的某一大城市。在那里，他要与之打交道的人物会略有不同，而打交道的方式应当完全相同。直到有可能建立起一种相当稳固的行为规范——这种规范无论何时何地、无论何种情况下都适用——使得最贫穷的苦力和最富有的商人和男士都有可能带着最大的满足和最少的痛苦度过他们在地球上的短暂时光，这也正是每一位有识之士都会很自然地努力追求的。

下面让我提供给你们有关这一思维规范的几个例证。这种思维规范是我从读过的有关孔子和儒教题材的厚厚一大摞书中抽取出来的：

礼貌是社会机制的土壤，因此，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即使在最痛苦的条件下，也要使自己表现得彬彬有礼。一切男人、女人和孩子在你面带微笑而不是皱着眉头走近他们时会乐意为你提供更多的服务的。因此，一定要保持微笑，即使在你肚子很疼，更想诅咒而不是表现得快乐时也要微笑。

一个社区中的年长者更容易控制一个城市或村庄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因为他们手中有钱，并且，除非他们是彻头彻尾的笨蛋，他们会在这个地球上长期的生存当中获得某种实际的智慧。因此，对年长者更要表现出尊重。这会使他们喜欢你，然后相应地你也会逐渐喜欢他们，这样便建立了一种很好的相互理解，对年轻人和年长者都有益。

如果一个家庭永远处于无休止的争吵中，儿子敢于顶撞父亲，或对母亲说她胡说八道，这样的家庭是没有什么前途的。因此，鼓励孩子们在父母面前保持礼貌和谦逊，让父母以理解和忍耐对待他们的儿女，这会使家庭内部生活和谐宁静，因此家庭便成了大家都喜爱的安居之所。

从未见过你的陌生人会从你的个人外表来判断你。你可能会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但这在第一眼时没人会注意到，但他会立即注意到你衣服领子上上周搅鸡蛋时溅上的污渍。因此，努力保持自身清洁。你的衣服可能会很旧很破，但至少你可以把它们涮洗干净。

在与其他的商人做生意时，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不老实，而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不会被发现，但终究你的邻居会发现你的劣迹，到那时你的商业生涯便会告终了。因此，在所有的交易中都要以诚待人。如果你有狡黠的本性，一定要控制住这种本能的冲动，因为诚实终究会带给你回报，你出来是为了谋生，对吧？

圣人常常化装成乞丐四处流浪，因此，善待乞丐，因为你也许遇到的正是一位圣人。

我可以再讲上几页这样的内容，但这些是想让你们对我对于孔子和他教义的想法有个大概的了解。我知道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许多语录都显得呆板了，似乎所有的箴言命运皆如此。有人告诉我说我对这位老绅士的宣判太宽宏了。他们说孔子从心底里是一位保守派，甚至是反革命派，他巧妙地为统治阶级提供了方便，后者也热心地赞同他关于年轻人应当服从长辈，奴仆应当服从主人的主张。我觉得这一反驳很有力。

但我们自己的宗教也恰同此理。罗马圣彼得处供拜的耶稣与我曾在一家破旧的拉普人教堂中见到的耶稣就完全不同。在那座拉普人教堂中，一群狗围满祭坛四周，没有人忍心把它们赶出去，因为外面的温度是零下 30 度。那种佛教命运也如此。这个

在所有信仰中最纯洁最高尚的宗教创始人在这个世界上走完了他自己预言的80个年头后投奔了我们大家未知的领域，在那之后的500年中，佛教在整个印度和中国依然盛行不衰。我想我甚至可以说，对于我们的大多数科学来说，尤其是医药科学，情形也依然如此。在一般弟子的手中应用的医学远远不同于那些希望减免他们同胞疾苦的新治疗方法的最初发明者的初衷。

所有那些有资格加以评论的人士悲哀地指出，事实上音乐和绘画也同样存在着表现模式越来越呆板固定，以至于逐渐失去了与真实生活的直接接触，变成了不得不扔到垃圾堆里的东西了。即使像拜克迈塞学究式的诗律也在快乐的纽伦堡少男少女们的嘲笑声中退出了历史舞台。

鉴于我刚刚提到过的各种原因，即使面对众多严厉的批评，我仍然是孔夫子的忠实崇拜者。因为他可以在不借助任何超自然力量的情况下，仅以少量的哄骗便能够提供给千百万人民一种切实可行的生活哲学，使他们可以不期望任何回报地在最糟糕的条件下尽最大的努力，在各种无法辩解的愤怒之下保持愉快的心境，在没有理由全力以赴时保持辛勤劳作，在有每一条理由都值得哭泣时保持微笑。

西方圣哲——

柏 拉 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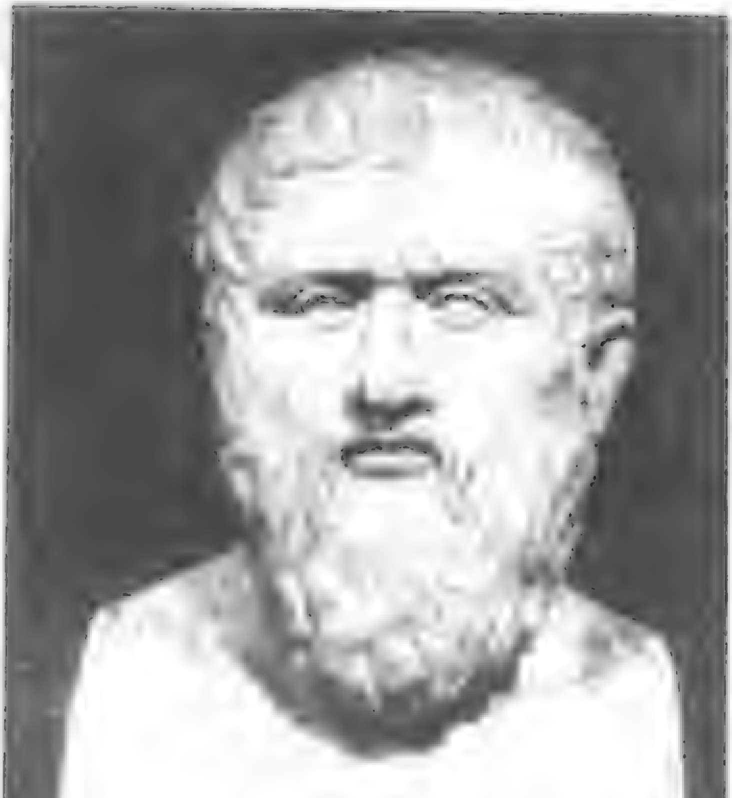
Plato

（公元前 428/427－前 348/347 年）

对于柏拉图，这位治国学说的创始人，我的兴趣总是起伏不定，以致于我从来没能确切地知道我的立场到底是什么，不知道当有人说“啊，是的！柏拉图！”时我该如何回答。有时我非常喜爱他、崇拜他，把他看作至今最重要的思想家，但间或他在我看来又只不过是一个聪明的语言编织家，一个碰巧与这个世界无任何联系的政治理论不太勇敢的倡导者。但得益于在费勒城度过的那些平静岁月，我可以更好地思考。于是我能够更好地了解柏拉图努力要证明什么。

应该记住一点，我们所了解的柏拉图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要比他刚去世后的那些个世纪中更受推崇。因为希腊已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了，希腊民族在自身无休止的争吵中，在试图在一个 90％的人口是奴隶的社会里建立某种可行的民主的努力中，慢慢走向了自绝之路。

在柏拉图完成他的实用政治手册时，这已对任何人都不再有什么实际用途了。在他死后不久，那位从北方过来的暴君吞掉了整个东方世界，希腊沦落为第七等省份，成为庞大的马其顿王国



柏拉图胸像（古罗马仿制品）

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几年之后，这个王国将从多瑙河畔一直伸展到印度河。因此，柏拉图只在一段真空中发挥了作用。雅典人统治古代世界的伯里克利[①] 时代的荣耀仍然让人记忆犹新，而随后的屈辱岁月也同样让人难以忘怀：来自斯巴达的野蛮人，那些一直相信黄油可以变成长矛的人，从容地摧毁了雅典人花费痛苦代价建立起来的王国，使这座曾由雅典娜掌管的城市沦为一片废墟——城墙不复存在、公用建筑坍塌，人口也因这场灾难而锐减。

虽然一方面毁掉这座具有长达4个世纪历史、曾是古代文明中心的城市的物质存在是可能的，另一方面，事实证明，要想熄灭雅典科学家和哲学家们的在爱琴海岸竖立起来的"实际观察的智慧"灯塔要困难得多。当雅典城作为独立的政治单元不复存在时，它却依然是旧世界最重要的教育中心。来自地中海沿岸、寻求最佳教育机会的聪明年轻人或迟或早都会找到通向这座位于爱琴海湾的城市的道路，即使在雅典不再作为一个国际力量和商业大都市发挥作用以后的若干世纪中，来自欧、亚、非三洲的如饥似渴的学生们也纷纷涌向这块阿提卡土地，在其中某座专业学府学习，为今后开始艰难的谋生做好准备。

现在让我提供给你几个日期，以便你在思想上对柏拉图的活动有一个更确切的概念。他出生在，或大约出生在公元前427年，即伯里克利去世的前两年。公元前404年，在一场长达近30年的战争，即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雅典向斯巴达投降。城墙塌陷，海军覆没，它在构成古希腊诸国中的首要地位也随之丧失了。公元前400年，色诺芬写出了近二千三百年间学习希腊史的

① 伯里克利（公元前495—前429年），古雅典政治家、民主派领导人，后成为雅典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其统治时期成为雅典文化和军事上的全盛时期。

小学生必读的、格调极为低沉的史书[①]。我提到这一点仅仅是想说明希腊从以前的高位上摔下来的反差究竟有多大。一万名希腊人被迫成为波斯人的雇佣军。而在100年前，可能恰恰是他们自己在雇佣别人。

同时，雅典迅速地经历了各式各样的政府，从短命的、不太幸运的寡头政治试验到更为灾难性的短期纯民主政治。在纯民主时期，雅典的圣名由于法院判处苏格拉底死刑而从此染上了污点。

事情发生在公元前399年。当然，苏格拉底是柏拉图的老师，可以把这一年当作柏拉图整个发展历程的一个里程碑。

柏拉图曾二次访问叙拉古。他是作为当时古老的迦太基政府首脑的政治顾问被邀请来的。当时的柏拉图似乎仍然生活在一种幻想当中，在某时某处，某位伟大的领袖会派人送给他这样一封信：

> 敬爱的教授先生：
>
> 人们都认为你是活着的人中最懂得政府的，我控制着这里的一切。我管理这座城市，每一个人都知道我是这里的老板。不会有哪位富有的商人因为买通了某位地方立法委员而能对我施加任何影响，因为立法是不可能被买到的，也不会有低贱的煽动者通过向地方工会肆意鼓动而得逞的，因为我不会允许他们仅仅凭一张嘴便收买住几百万人的心的。我努力使劳动者都能得到体面的工资，给予他公平的待遇，那样他就不再需要什么组织来迫使雇主对他保持公正。我们拥有步兵和海军，但如果发现有哪位官员同我们的任何一位前政客讲话，便立即对他施以绞刑。

---

① 指《远征记》或称《万人远征记》。

至于我们的妇女，他们与男人享有同等的权力。而在此之前，有聪明才智的妇女仅仅因为她们碰巧生为女人而得不到尊重，甚至连不如她们的男人都比不上。我们认识到了人口繁衍的必要性，但我们总是把母亲的作用想当然，好像这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就像雨，像阳光，像尊敬的男士每天有义务刮胡子一样。

就孩子们而言，当然希望你在这儿花费一些时间来研究一下我们的学校。不论从实际的还是理论的角度上，我们都想把它们办成可能的、最出色的生活培训学校。但在给予每一个孩子机会的同时，我们不想以牺牲更聪明的学生为代价去恩赐那些比较迟钝的学生。即便是我，这位本城的统治者（我想你会看到，从你上次来访至今，这个城市已有了极大的改善，因为我们已拆除了低级公共住宅，已把强盗们施以了绞刑）——即便是我也认识到所有的人生来都是平等的。唯一的难题在于他们的平等持续不超过几小时或几天。在那之后，就我来看，每个人都必须接受自己的命运，因为我不想比上帝更聪明。似乎上帝注定了我们当中那些最贫穷、最少恩宠的婴儿将来升至难以预料到的高位，而另一些来到这个世界时便具备了各种可能的优越条件的孩子却终生都只是个笨蛋，他们或死在绞刑架上，或死在收容所中。

因此，我希望你能改革我们的学校制度，使其能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能够给予我的每一位学生一个充分发挥他或她能力的机会，让他们从这个星球的定居生活中获得最大可能的满足，并保证他们在通往成功的路上尽量避免那些无用的努力，尽量避免那些仅仅是为了满足其自负而采取的无益行动。

还有许多其它问题，但我希望在你到达叙拉古时再与你讨论那些问题。可是我要先例举出其中几个——公共健康、

某种能阻止精神和肉体上不健全的人像兔子一样多产多生的制度，他们已造成我们的疯人院和收容所人员爆满，成为国家这艘大船几乎无法负载的重荷。但对于这些事情——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我要等你来了以后再详谈。同时，随时听候吩咐。

僭主狄奥尼西乌斯

这类的信可能确实存在过，因为像我告诉你们的那样，柏拉图曾三次访问叙拉古。但他也不得不像孔子一样忍受失望的痛楚。两个世纪以前，那位善良的聪明人曾前去寻找他自己的“智慧王子”。

从理论上讲，两位哲学家的计划都相当可行。可在实际实行过程中人类却固执地拒绝按这种上乘理论模式生活。不管这些哲学家的逻辑多么完美，生活仍然以自己的美妙方式进行着。柏拉图所敬爱的老师苏格拉底是全雅典最聪明的人，可是却被社会上最低贱的分子无情地迫害致死了，他的命运一直是柏拉图生活中的阴影。柏拉图本人并无太大的英雄气概，因此决定避免所有直接的行动而完全致力于培养几名政治科学的信徒。

他活到将近80岁，但他的后半生是作为一所私立学校的校长度过的，并从未涉足过当地政治。

这座高等学府位于雅典附近的一片小树林中，那片树林是为了纪念希腊英雄阿卡代马斯种植的。根据传说，这位英雄告诉了卡斯托耳和波吕克斯提修斯到底将海伦藏在了何处。除了进行学术知识传播之外，柏拉图挤时间写下了13封长信和35篇对话，他在其中探讨了生活中各方面的问题（包括政治和国家管理），每个问题都由于某种原因让他觉得适合与他的学生进行讨论。

这些“谈话”受到尊重的最好证明也许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事实上所有的谈话记录都被保存了下来。虽然古代文学的大部分正无可挽回地失掉了（包括早期基督教的一些圣书），而

柏拉图的作品却一直完好地留传下来了。即使在罗马沦陷后若干世纪的动荡岁月中，当新教派不仅谋杀老柏拉图哲学的杰出倡导者，而且还肆意焚烧他们所能找到的有关书籍时，也仍有相当数量的柏拉图忠实学者藏起了至少足够其子孙后代享用的无价之宝。

结果，我们都彻底熟悉了这一最伟大古代作家的思想。在过去的 2300 年中，我们没有一刻与柏拉图分开过，可他却没能对我们种族中哪怕仅几个比较聪明的灵魂产生影响。例如，我们可以在多数教堂的创始人的作品中找到柏拉图的痕迹。中世纪的学者尽管忠实于亚里士多德，却也很容易受到柏拉图的影响。大学启蒙运动大发展的 18 世纪，尽管在不断重复对普通人的爱却也完全是柏拉图主义的。今天，由于与柏拉图理想中的真正领袖相对立的人物（很抱歉，但我必须再次提到阿道夫·希特勒）的出现产生的冲突，这位雅典伟人的名字不知怎么被暴力和残忍的预言家给覆盖住了，而后者似乎完全控制了局面。但请注意我的话！在还有些许理性重返我们不幸星球的时刻，柏拉图会再次得到他应得的声誉的。

的确，他有时因为太学术化而让我们感到烦恼，让人觉得他仿佛生活在真空中，完全不了解人类种族。但这只是他的“品质缺陷”之一。而他的品质却是如此伟大以致于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忽视掉几个缺陷，因为还是这些品质才使得柏拉图的书在过去 2300 年中得以存活下来并保持清新的。荷马当然比他还要早，除了他还几乎没有什么作家（特别是哲学方面的）可能在一代人之间存在！而柏拉图在能够真正放松并且能够在几分钟内忘掉苏格拉底，是因为比教给他的学生少得多的事情被判处死刑的时候，他会让人听来好像在从华盛顿或其它某个现代首都写信，且信的内容完全好像是在今天而不是在公元前 370 年写的。

以他的《理想国》一书中的几段为例，那是在乌托邦作为政

治批评的一种形式被发明以前出现的一种真正的乌托邦。在刚刚痛苦地经历了眼见着热爱的雅典变成了一片废墟（完全由于自身的错误）之后，他让苏格拉底，也就是他的大多数对话的主人公，来讨论一下这一恶性循环——它几乎使得人类无法逃脱自身政治愚行的束缚。

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这位老凿石匠（苏格拉底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手艺）在雅典成为古代世界最富有的城市时，刚刚向当权的富豪阶级表示过赞美。“这些肩负使命的新人装作从未注意过那些他们已经毁掉的人，他们策划着将他们的刺激物——当然是指他们的钱了——注入到任何一个不能总是对此保持戒备状态的人体内。通过这种方法，他们每次都成功地收回了最初的投资，而同时，他们使本阶级以外的人都变成了懒汉和乞丐。他们会一直这样干下去，直到最终人们看到了自身的危险。他们的绝望给他们以勇气，于是，他们起义反抗压迫者，并胜利地宣布民主战胜了专制和富豪统治。

“在胜利带给他们的最初喜悦中，他们会杀掉许多反抗者，并放逐几个，然后慢慢安定下来，开始向幸存者显示该如何统治这个世界。但时隔不久，这些民主人士很快也变成了富豪和专制者过去的模样。他们利用数量上的优势在每次选举中赢得多数选票，然后他们便可以为所欲为了，因为无论他们颁布什么命令，总可以说成是‘合法的大多数人’的意见。因此，当他们将政府职位在他们自己人当中分配时，当他们通过不断提高救济使人们高兴时，他们的行为完全是合理合法的。

“当然，为了维持群众的好感，他们被迫做些暴君和寡头政治家们可摒弃的事情。他们必须讨好大众，结果所有的标准都因越来越多的庸俗而降低了身价。礼貌也变得粗俗，因为没有人可以得体地表示礼貌。很快形势便很明了了。正像疯狂地追逐财富必然最终毁掉寡头统治一样，过度的自由也终究会使民主垮掉。

之后便又出现了另一个衰落期，因为在这种状态下，无政府主义便会抬头，直到它的触角伸进所有的私人家庭，最终连动物也不放过，为父者习惯了沦落到儿子的地位，儿子则对父亲傲慢无礼，好像他们根本就怕他。教师也开始畏惧他的学生，学生则轻视他们的老师。从这个时候起，年轻者和年长者变得平等了，年轻人准备好了从语言到行动与年长者相竞争，而年长者则无益地模仿着年轻人。最终，所有的马和驴子开始以自由人的权利和尊严并驾齐驱，一切都突然沐浴在自由之中。

"结果如何呢?""这种所谓的自由的过度膨胀引起了相反的效果，因为无论对民族还是对个人，过度的自由似乎肯定要逐渐演变成奴隶制，最残酷的暴政一定会从最极端的自由中产生，因为一旦自由成为通行证，专制便为时不远了。富人因为害怕民主的盛行会剥夺掉他们的一分一文而开始处心积虑地琢磨着推翻敌人的方式方法，这时某位英明的领袖很容易攫取政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可以向穷人承诺一切。然后他又自己建立一支军队，先除掉他的反对者，再除去他的朋友中的那些危险分子。清除旧政权以后，他自己又变成了暴君——唯一的统治者。"

"在这种条件下"，正如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小心翼翼地指出的那样，"哲学家不再拥有宣扬节制中庸和相互理解的空间了。可怜的哲学家如今像处在一群野兽当中，如果他还聪明的话，他最好隐退，如果还有时间的话，他可以暂时躲避在某堵墙下等待着风暴过去。"

这便是柏拉图整个职业生涯的主旨。当风暴呼啸肆虐时，一位富于思考的人却对此无能为力。就让他暂时躲避灾难，等待人们或许还会听从理智的时刻的到来吧。他强调"或许"，因为他像孔子一样对那样的时刻能否到来并不十分清楚。但千万不要冲向城墙投入战斗。任何训练有素的斗士——一些可能并不太聪明，但却被训练成使用武器的身体强壮的粗人——比起那些终生

都在玩弄思想而非炮弹的人来战斗厮杀的本领还是强得多的。哲学家并不是因为怯懦才采取这一行动的，而是源于他对事情是否合适的感受，因为他意识到，做为一名人类灵魂的医生，他与医治肉体的医生不同，后者也只停留在战地的后方而非前沿。

在他以自己满意的方式解决了这些事情并发现他的思想发挥了作用（至少在理论上）后，柏拉图开始集中力量探讨人类的行为怎样才能遵循理性的法则，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才能根除对这样的发展构成危险的因素，以及如何像从劣种马、牛、猪、羊、蜜蜂、谷物中培育出优良品种那样（世人对此已再熟悉不过了），建立起一个完美的政权。

这真是一个非常高尚、非常值得称道的思想！各个时代的最伟大的思想家的灵魂在他们生命的某个时期都曾被这种思想占据过。其中一些人从庄严、神圣的角度接近它，这是典型的柏拉图方式。另一些人，像来自拿撒勒的木匠师傅，则试图通过将人类置于上帝的直接监督之下来解决这一难题。还有一些人，像伏尔泰和斯威夫特教长[①]，则把讽刺作为进攻的武器。托马斯·莫尔以为他可以通过将某种瓷器蛋——一种他称之为乌托邦的瓷器蛋——放进人类的窠臼中来解决问题。笛卡尔努力通过应用纯数学理论找到一种解决的方法。斯宾诺莎提出了道德新思路。卡尔·马克思将经济作为其特殊的研究领域。拉伯雷在他自己创造的世界中将一切事物都进行了丑化。还有介于中间的各种哲学家、圣贤和大师（真正的或者需要打些折扣的），他们或饿死于阁楼之中，或丧生于地窖之下。他们可能会赐予他们的同类一种超度的蓝图，他们一直在整个天国和地狱中寻觅着那个最重要问题的答

① 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年），英国作家，讽刺文学大师，曾任都柏林圣帕特里克大教堂主持牧师，主要作品有讽刺散文《一只澡盆的故事》，寓言小说《格列佛游记》等。

案，“我们怎么才能够拯救人类自身呢”？

但最终，他们的命运也同欧玛尔[①]这位帐篷制造者一样（一位最有趣、最振奋人心的真理寻求者），他在下面的四行诗句中总结了他终生的求索：

年轻时我曾孜孜不倦地上下求索，
学者和圣人，聆听着他们。
关于真理的伟大争论：可是永无止境，
于是从进来时的同一道门我又走了出去。

自从我对那些试图通过提供某种建立在严密原则基础上的行为规范而使人类彻底摆脱动物阶层，并为此而疯狂战斗的人们产生兴趣以来，我对于他们每个人受到自身政治和社会背景影响之深感到非常震惊。斯宾诺莎虽然是在一种严格的犹太主义氛围下长大的，却把荷兰共和国政府模式当作他理想的政权形式。伏尔泰曾让他小说《老实人》中的主角说出他自己的信念，“让我们耕耘我们自己的花园”，这显示出他是个好法国人。柏拉图在描绘他理想中的共和国时，基本上重复了伯里克利领导下的最高程度雅典联邦模式。当我们潜心研究柏拉图体制的核心所在时，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柏拉图相信，如果能够劝说每一位公民最大限度地发挥他自己的能力，就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快乐、繁荣、与四邻和平共处的国家。这样，国家就获得了公平、公正的基础，其它一切事务便可以稳固地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

他意识到这个概念有点太模糊，因此又给出了达到公民品德的四点具体要求，它们是：每一位公民必须具备一种公平感，必

① 欧玛尔·海亚姆（1048—1122年），波斯诗人、数学家、天文学家，曾参与修订穆斯林历法，著有关于代数学的论文，以四行诗闻名，郭沫若曾从英文转译其诗集《鲁拜集》。他的名“海亚姆”（意为“帐篷制造者”）可能源自其父亲的职业。

须虔诚、有理性，必须具备当时机出现时能够为维护国家的安全而勇往直前的勇气。一旦他具备了这四点品质，这位公民便不会再犯错误了。他会像伊曼纽尔·康德一样，头顶一片星空，手持一本绝命书，随时准备迎接各种世事变迁。

像所有其他古典哲学家一样，包括犹太人在内，柏拉图从未对经济生活方面显示出任何严肃兴趣。他的生理需要，就像希腊人、罗马人、犹太人、其他地中海人一样，几乎不存在；一座土坯房子足以为他挡风遮雨。他可以在舒展的橄榄树枝下教书，就像耶稣能够随便在哪个山坡上向同胞发表演说一样，天气似乎从来就没有冷得让他和他的学生感到有必要到有暖气的大厅里去；如所有其他希腊人一样，他的饭量小得很，因为他生活在温暖的气候中，不必像新英格兰大学生的讲师那样必须生炉火；衣服也无需花很多钱，但更重要的是，一支几乎数量无限而且极其廉价的劳动力大军的存在，包括那些一旦被买回来生活开支几乎不用一文的奴隶，使得这近千名希腊自由人得以完全致力于国务。

使得他们得以活着而不必担心经济状况的那种悠闲，在一种新的潮流盛行，他们的经济安全不再存在时，会出现怎样的结局呢？柏拉图似乎从来就没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在我看来，这似乎是他的最大弱点。即使在他自己的小世界当中（毕竟，从以后的情况发展来看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世界），在这样一个对构成希腊政权的几千名自由人比较容易进行教育的世界中，也是靠战争和暴力来维持秩序的。当大力宣扬人类平等的基督徒让这个世界不再存在奴隶制（即使要达到这一目标至少花上一千九百年）时，当其他几亿男人和女人觉得有必要实际参与政治事务时，情况会怎么样呢？

美国历史能对这一问题带来一些启示。只要我们仅仅是 13 个小殖民地（在这样的殖民地中实际上所有的人都可能相识），

那么就有可能出现一小群领袖人物在四项柏拉图品德的激励下担负起管理共和国的重任。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麦迪逊等都深受柏拉图哲学的影响。他们所有的人都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对国家的责任。从孩提时代起，他们的大脑中便深深刻下了这样的烙印：既然他们生来比同代人具有某些优势，人们也就期望他们比不如他们幸运的人更加竭尽全力，因此他们必须成为勇敢、公平、理智、虔诚——这里指这一常常被误用的词的最广义——的典范。简而言之，每个人不仅了解构成该国法律一部分的《人权法案》，而且也深知那种不成文的《义务法案》，那是他自己道德规范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为如果他们把家搬到小社区中生活，他们的邻居就有可能仔细地按公共舆论的尺度衡量他们，在他们觉得合适和必要时接纳或摒弃他们。

我认为这正是从公元前4世纪到大约100年前的所有柏拉图主义者的最大弱点。条件彻底地发生了变化，因此不再存在供比较的稳固基础。但另外还存在着一个不为大多数人所熟悉、常常完全不被发觉的柏拉图，正是这个柏拉图在研究了个体的人和观察他们对某些政治、社会刺激的反应后深入其根源的；其外，努力了解那些对他们产生深刻影响的无形力量，并最终将这些力量归结为一，即上帝。

我还在孩提时代时便受到了这样的教育：犹太人及他们以后的基督徒是唯一信仰单一上帝的民族，因此他们要比其它教义（包括古老的哲学体系中最高尚者）的追随者们优越。我接受了这一教诲，就像大多数孩子会接受教给他们的几乎一切事物一样。并不是因为他们觉得十分认同这种或那种观点，（凭他们的有限经历又怎么可能呢？）而是因为他们至少学到了这一聪明之举：“为什么要与那些从不理解任何事情的成年人争吵，那又有什么必要呢？”从那时起，我便一直（从未被任何宗教课题深深吸引过）小心地寻找着答案——这究竟是不是真的，是否真是耶

稣首先向我们提出唯一的天父理论的。

确实，希腊人和罗马人从未把他们自己的天帝看成父亲的角色，因为父亲对孩子往往犯下太多残酷的罪行，因此是不会胜任那一角色的。但他们早就过了仍然相信孩提时代听过的那些故事的年龄；故事讲述了智慧女神雅典娜如何从宙斯的大脑中全副武装地走了出来，牧人之神潘如何喜爱在路边的灌木丛中制造怪声以恐吓孤独的流浪者，所有的神灵如何在特洛伊战争中立场鲜明，并参加了战斗。没有了荷马之名赋予它的光环，这场战争只不过是有关一个男人偷了另一个男人的女人的极不光彩的一场争吵罢了。他们并不公开宣称他们的不信任。跟今天的我们差不了多少——我们对这些教义态度漠然，把它们看成幼稚的诅咒、变质或变形——我们只在自己的朋友当中表明自己对这些问题的观点。我们会因此而伤害那些至今以为这些教义仍意味着生死的极好、极善良的人们。但我们肯定不能仅凭几句争论就让他们改变看法的。因此，在柏拉图的理论中，人们不会碰到对他自己那个时代盛行的宗教迷信的公开攻击。他曾随意地提到过，但从未将它们扩大为一种问题。相反，他采取了聪明的策略：一方面，他不再去理会各类神灵，让那些看不见的生命就留在白雪覆盖的山顶好了；另一方面，他开始着手在一块遥远的高原——那是一块又高又远，几乎没有人肯穿越的高原——上竖立他自己的神灵。

当然肯去跨越的几个人一定是社会群落中有着最顽强灵魂的人，对于这些人来讲，如果可以向真理靠近一点儿，那么无论多大的努力都值得。其余的人可能会最终决定追随这些大无畏的开路先锋，但柏拉图并不十分有把握这一途径是否完全可行。

我们当代的研究者（从我遇到过的许多人来看）常把柏拉图称为“智力小人”，之后便把他当作与我们这种民主毫无干系的人不再予以考虑了。我无法完全赞同他们的观点。柏拉图是一位艺术家，因此也是一位贵族，对他来讲，最好的意义本身就是再

好不过的了，在生活的本质问题上他不会接受任何妥协。在这样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讲比次好已经再好不过的年代，柏拉图会忍受再生的阴暗，但属于他的时代终会再次来到。

[柏拉图（公元前428/427年—前348/347年），古希腊三大哲学家之一，与苏格拉底和亚里斯多德共同奠定西方文化的哲学基础。整个西方文化，从亚里斯多德到圣奥古斯丁，从帕斯卡尔到怀特海，都深受柏拉图的影响。主要著作为多篇对话，包括《智者篇》、《法律篇》、《国家篇》、《会饮篇》、《巴门尼德篇》、《蒂迈乌斯篇》等。——译者附注]

由舞女到皇后——

拜占庭皇后西奥多拉

Theodora

（约 500 - 548 年）

西奥多拉是中世纪最神秘的统治者——查士丁尼一世①的妻子。为她画像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想我应当先介绍一下她出生时的 6 世纪前半叶的情景。

罗马皇帝们的罗马帝国已经不复存在，罗马城经过六次的被征服、被掠夺，已经变成一片废墟。在废墟中的某个地方住着一个地方主教，渐渐地，这位主教自称是整个基督教的领袖。他的论据听来有些道理，依据传统，他是被耶稣指定在地球上建教堂的受人爱戴的使徒彼得的继承人。

根据同一传说（这一传说可能不是来自事实），彼得确实去过罗马，后来在那儿被处死，他的尸体被孤独地埋在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小木质建筑里，那个建筑就是古老的圣彼得教堂。尽管罗马只不过成了它自己先前的影子，但它仍被一大串荣耀包围着。罗马这个名字就象征着尊严和权力，这种荣耀一旦建立就很

① 查士丁尼一世（483—565 年），东罗马帝国皇帝，527—565 年在位，派人收复被蛮族占领的西罗马帝国失地，曾取得短暂成功。主持编纂罗马法典，对后世影响很大。——译者

难消失。

因此，很自然地，罗马的主教就会觉得他跟别的主教不同了。如果基督教会想生存下去的话，必须有个头，他所说的话要比所有的其他人说的话分量要重得多。罗马主教自然而然成为这一崇高职位的候选人。

只有拜占庭主教不同意这一观点，在许多人眼里，君士坦丁堡与罗马比起来确实是一座新兴的城市，但它刚好是那位唯一代表罗马权威的人的居住地，这一点对它很有利。

结果，两种对立野心的纷争引发了这两个强大主教之间的长时间的冲突。有一段时间，耶路撒冷主教也声称自己至高无上，因为他住在耶稣出生和去世的城市，他觉得他离基督教诞生的地方更近些。另外，还有数十个其他的主教，他们分布在法国、西班牙和叙利亚，都宣布拥戴罗马主教为首领，只是那个时候是民族大迁移的时代，他们的领地被蛮族人彻底掠夺掉，所以他们的声音可以忽略不计。

至于英国，除了名字没有什么可说的，只是作为一个世外桃源式的富庶的小岛，在将近400年里成了罗马官僚退休后享受退休金的理想场所。最后，还有个非洲，只是那时候沙漠沿着地中海南岸覆盖了1000英里，已和奥古斯都与提比略时代大不一样。当初它安置了数百万在欧洲大陆无家可归的人们。如今野狼在古老房屋的废墟上嚎叫，圣徒们已在神殿的屋顶上挠了数世纪的痒痒。的确，不管谁看了，这都是一幅非常伤感的落日黄昏画。但是有一件事我们必须记住，对于生活在15、16世纪的人来说，我们从遥远的地方看去，只看到这一悲剧的一半。

倘若你的埃米莉姑妈被一辆卡车碾过，当场死去的话，所有关心她的人都会极度悲痛，可是，如果她是花了30年的时间慢慢死去，而且在这30年里，你得至少一个礼拜请一次看护来看她，“亲爱的姑妈今天怎样了?”“我想不会太好!”在30年时间

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与[illegible]（左三）与侍从们的镶嵌画

查士丁尼一世镶嵌画像

里，看护也会厌倦这一工作，她会跟你说："可怜的人儿！她虽然一点也没好，可她还是勇敢地坚持下来了。"慢慢地，你对老太太那不幸的健康状况习惯了。因而，你不会再去在意她的结局是死还是活。

她真地死了（你可能开始怀疑）？那么你该把她埋葬，在她的坟头立一块墓碑，因为这是你应该做的，随后，你会很快忘记她，因为她对任何人来说早就不是真正可以怜悯的对象了。对于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一种制度来说，只要他（或它）失去了用处，都是同样的道理，他（它）已经变成一种负担、一种令人厌烦的人或事。

罗马帝国就像埃米莉姑妈，经历了漫长的死亡过程。正因为如此，极少有人认识到正在发生的一切到底是什么。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传来消息说，皇帝准备离开他在帕拉丁的皇宫，穿过意大利迁至拉文纳。在拉文纳他会安全些，因为附近的军官们保证将杀死任何企图进攻该城的人。罗马人听后耸耸肩，然后说，噢！是吗？因为他们听到的这类传闻太多了，不相信是真的。当他们不得不严肃对待并认识到皇帝确实已经走了的时候，他们仍然没受到任何触动，因为他们非常清楚自己对此无能为力。

这里，我接触到了历史上很有趣的一章。一个帝国，不管它是大是小、是白是黑，一旦走上下坡路，缓慢却不停地、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总在走下坡路，凭它自身的努力是否有可能得救吗？我要悲哀地说，回答是不。帝国就如家庭——我差点要说帝国就像人一样，一旦它们走上下坡路显然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们的最终命运。

直到今天，这也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观点。自从最近50年来，印刷出书变得越来越便宜，业余的、专业的历史学家们一直试图证明罗马可能会仍然存在——如果贫穷的被误导的罗马人愿意去支持坎帕尼亚的军官们（罗马沉沦理论），如果他的经济学

家们能够使他的臣民相信盛行的有关荒地的谬论（这是个有关荒废的农场和男女少年跑往郊外寻欢作乐的古老故事），或者如果地方官们对待早期的基督徒们厉害一些（可以读读布尔什维克的书），如果罗马执行另一种移民政策的话，等等，等等，这些脱离实际的似乎有理的“如果”有一长串。

我不同意这些观点。即使罗马皇帝有足够的智慧预见到将要发生的事，并且有能力进行必要的改革措施，罗马仍会毁灭。它无力改变它的命运，就在于它极力想证明它的强盛。罗马的命运只能如此，要么它根本不存在。

对于这种光荣的悲剧，那一时代的人又如何去了解呢？正如我已经告诉过你的，普通人只会忙于日常琐事，他会一如既往地平静生活，除非是大难临头，比如罗马被汪达尔人攻陷、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征服，到那个时候，他才会去注意。别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感觉。事实上，就在我们眼皮底下的我们自己的文明也在快速走向尽头，可我们却一无所知。

假设你约了可爱的拜占庭皇后西奥多拉出来吃饭，（这个时候你可以请她吃顿饭并送给她一件小礼物：“噢！亲爱的，你会给我一件小礼物的，不是吗？”）然后，你问她是不是没有想到这个世界是一团糟——罗马不复存在，革命蔓延至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任何人、任何事不再受到尊重——我确信她对你所说的话根本不会有清晰的认识。曾经在她周围的世界对她来说仅仅是她所认识的或者是她希望认识的一个世界，作为一个在竞技场里养熊的、整天打扫熊圈人的女儿——一个没有任何背景、仅凭她美貌和她强烈的普通感觉——从君士坦丁堡的街上慢慢爬到皇宫里的卧室的女孩来说，这个世界并不能称之为不好的世界。在某些地方，也许很古怪，但是它本来是不是并不古怪呢？是不是并不像古代的伟大哲学家所说的那样，生活就如木头在海浪里上下沉浮一样没有意义？或如断线的风筝一样没有目的？或如被雷电击倒

的孩子一样没有感觉？

自然，你不必跟别人说，她曾经提到过那些古代的哲学家，因为他们不再被允许教授他们的理论，人们也不再被允许去阅读他们写的书，如今已非常清楚为什么在长串的眼泪中有许多的邪恶和不幸。她从所谓的“新人”那里学到了这一点——所谓的“新人”就是那些流浪的、讲一个叫耶稣的犹太人故事的传教士，那位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他曾经像一个奴隶一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可他又从坟墓中爬出来升上了天，如今他在天堂里紧挨着他的父亲——上帝的旁边，显赫地坐在宝座上。新兴的预言家们推翻了古代哲学家们的一切说教，他们的布道说服她和别的君主相信，他们的理论才是通往救世的正确理论；而且当他们一再坚持认为这样的生活才是一切事物的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便促使她和其他君主相信古希腊的哲人们全都错了。

其实并不如此！我们的现实存在并不如此。事实上，这正如皇宫里的一个黑暗的接待休息室，在那里，可怜的觐见者被迫等上几天、甚至几年才能最终被允许进入皇帝的金殿。可是，当这荣耀的时候来临时，他们将因在黑暗地方的长久等待而得到充足的补偿。因为，到时他们将能注视伟大的国王，他坐上黄金做的宝座，那宝座制得非常精致，似乎能让在座的人觉得坐在上面君王要比他自己伟大 10 倍。

在金殿的两旁，站着国王的顾问、大臣、思想与军事助手以及他的卫士们，这些人穿着紫色的金光闪闪的锦缎，缀满了珍珠和宝石。他们一动也不动，因为他们受过多年的自我训练，能够数小时保持不动。他们站在那里，以证明他们的王室主人的权力、力量和荣耀，世界永不灭，阿门！

可怜的觐见者将跪下来听着对他们的宣判或接受对他们的嘉奖，经历这一阵可怕的不安之后，他们的眼睛因为注视这么一位伟大的国王而隐隐作痛，然后，他们将慢慢地退出这个可怕的所

在，把他们自己顺从地交给已经等在外面的王宫卫士们，卫士们可能给他们穿上宫服锦袍，或者把他们投进黑黑的地牢，在那里他们必须悔过他们的罪行，直到末日来临。

你那位漂亮的拜占庭伙伴会对你说，这样的安排要比旧式的方式好得多，这倒是真的，它可以在这地球上的短短几年内提供更多的乐事。可是，她却忽视了，如此，你的生命就如一支蜡烛一样很容易被吹灭。如今，一种新的东西被加进了现实的悲剧中去，希望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不管你的命运是如何的悲惨，不管你整天在漆黑的矿井里见不到一丝的阳光，不管你在皇家的军舰上被束缚了 30 年，不管你瞎着眼睛也要在碾磨厂推石磨，你现在获得了保证：最终会出现一个万能而仁慈的上帝，他会查看所有的案件，仔细阅读，然后他会主持正义，不管那些受雇迫害你、折磨你的人的高价律师提供的辩词。

前边那位跳舞的女孩是完全正确的。她出生后不久，地中海周围的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记住，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最后一个世纪里，有一半的人是奴隶，剩下一半人中，90%是穷人，只有余下的 10%是富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普通人来说，几乎不存在公正的机会。任何时候，公正只存在于那些手中握着宝剑或者能把钱放进官员口袋里的人的怜悯中。他可能由于被收买的证人的伪证而被送上绞刑架或者拉肢刑架。因为他根本无法为自己辩护。他可能会失去家庭，失去妻子和孩子，因为他要偿付从来没有借过的债。但是，在这新的坐落在天帝心中的法庭面前，所有人是平等的。不管是什么高官，还是什么特权阶级，都不能作为“优待”的充足理由。在那里，人的灵魂赤裸裸地站在它的缔造者面前；在那里，可怜的罪人带着渴求的眼神，看着金做的天平秤去秤他的命运。

在这些天平秤的一端，充当秘书长的记录女神将放进某个人的所有罪恶，在另一端将放进这个人的所有行过的善事和想过的

善念。这个时候，屋子里将会越来越安静，因为即使是孩子的一声呼吸都不可打扰天平秤找到平衡。此时，就在他们的命运即将被宣布的时候，那些最凶残的统治者、最强悍的王子、最狡猾的女人也都会畏缩害怕。因为最终他们被迫认识到，这是依据道德法律的普遍准则，这一法律不允许有机遇和意外，只忠于一句话，这句话可以由主人问，也可以由奴隶问："你真的听从我的命令了吗?"

这一切，对于生活在6世纪的拜占庭的人们来说，并不是个美丽的传说，他们认为这是真的，天堂与地狱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就如博斯普鲁斯海峡对面的山一样是可见而有形的。可是，不管是在这个世界，还是在另外那个世界，正是在这一严酷现实的背景中，西奥多拉，那位阿卡修斯的女儿，那位竞技场里养熊人的女儿，从君士坦丁堡的街上起步，走上金色的台阶，最后如她所希望的那样坐上了皇后的宝座。

但是，请不要试图去根据现代有追求的女性去评估这位不平常的名流。她根本就不是那种有理想追求的现代式的女性。这位长着又大又黑的眼睛的人儿，如石头一样顽固。她不懂"顾虑"这两个字的含义。她或许有过同情心，可她从不让同情心去打扰任何她想去做的事。她具有这个世界上男人们想要而且是最最想要的身体，她的顽固就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当中：她利用她身体的吸引力，就如神利用他们的圣灵一样，去超越分明是不可能的事。而且，对于拜占庭的人民来说，幸运的是，这个可爱的躯体配着一个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一样锋利而无情的脑袋。如此装备的小小的拜占庭女孩可以走得很远。西奥多拉确实做到了。

我们如今不清楚即将成为皇后的西奥多拉是何时出生的，有关她的生活和经历的信息来源大多不太可靠。这些信息没有说到她有许多敌人，她最主要的敌人便是那些被迫看着她受宠于查士丁尼皇帝的宫女们，这些宫女们可能并不厌倦相互询问："她是

怎么得到了我们没有得到的这一切?”

其次，她的敌人便是宫中的宦官，因为君士坦丁堡与其说是个欧洲城市，还不如说是个亚洲城市，统治阶层大多被太监们占据着。这些不幸的人儿自然会很恶毒，(但有谁去责备过他们?)特别是有关性的问题，他们更不会正确对待。西奥多拉一旦与皇帝结婚，便永远被一帮太监包围着(里面有仆人、士兵甚至将军)，她的名誉自然会受到损害。最后，有一个人(尽管不是太监)，不知何故，对他的宫中女主人非常憎恶。当然，这是由于他的言语流传了下来的缘故，而他那些有较少偏见的同事们的言语却没有传下来。

他的名字叫普罗科匹厄斯[①]，他作为查士丁尼手下的一名拜占庭高官，他能直接听到当时的一切丑闻。我们从未能找出他对西奥多拉女士如此憎恶以及他为何一提到她的名字又如此气愤的原因。今天，有些人为他辩护，有些人坚持认为他比传说中的他要好得多，值得引起我们的进一步注意。我从来不曾被他们的言论所说服。我还是将普罗科匹厄斯看作是写影射和暗示文字的专家，他带着如此强烈的情绪苦苦写出这些文字必定有他个人的原因。他告诉我们的有关皇后的事从表面上看几乎不可接受，需要经过仔细地研究、研究、再研究，即使如此也不可全信。不幸地是，他所记的都是西奥多拉皇后最最平常、最最烦琐的日常生活，我们还需核查一下我们是否喜欢这些东西。

据传说，西奥多拉比她丈夫大约小 20 岁，因此，她应该出生于 6 世纪初的某个时候。她出生的地点如今无人知道。她可能

① 普罗科匹厄斯(490? —562 年?)，拜占庭历史学家，著有关于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的历史，著作分《战争》(8 卷)、《建筑》(6 卷)和《秘史》三部分。

出生于君士坦丁堡，也可能出生于塞浦路斯岛，当时拜占庭帝国就跟今天的美国一样是个世界性的国家，邻居们很少相互问起对方的祖籍和宗教信仰。倘若他们如此做的话，他们会发现他们的皇帝根本没有一点罗马或希腊血统，其实他出生在现今的南斯拉夫，小时候由他叔叔查士丁尼一世带到了君士坦丁堡，查士丁尼一世则是一位来自小亚细亚某个地方的文盲农民。

这位尊贵的君主和他的大多数前辈一样，是作为阿那斯塔修斯[①]皇帝宫廷卫队指挥官后才坐上了皇帝的宝座；而阿那斯塔修斯是因为娶了芝诺[②]皇帝的遗孀阿利亚德尼才获得王位的；而芝诺皇帝则是因为上面提到的娶了阿利亚德尼公主后坐上王位的，当时她还是处女，是利奥一世皇帝的女儿；利奥一世也是一位色雷斯的农民，他服从他的士兵们的愿望坐上王位，成为马西安皇帝的继承者；而马西安皇帝登上王位则是因为娶了狄奥多西二世皇帝的妹妹和继承人[③]，等等，等等。

倘若你从上面的事例中得出结论，认为拜占庭统治者的家庭生活并不如在历史上稍后一段时间的维多利亚女王和他和蔼可亲而博学的丈夫那样平和美好的话，你就猜对了。你可能会同意我的观点，即任何一位年轻女人若想与我们所说的“王位”发生关系，就要冒生命的危险。西奥多拉一定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她从小在她父亲的熊中间长大，她觉得她能面对任何情况。当她睁大那双漂亮的黑眼睛的时候，她乐意去冒一些可能很不幸的风险（比如被捆在篮子里然后扔进博斯普鲁斯海峡），只要有机会有朝一日能获取王位——不管机会是如何的小。

---

① 阿那斯塔修斯（440—518年），拜占庭皇帝，491—518年在位。

② 芝诺，东罗马帝国皇帝，474—491年在位。

③ 利奥一世和马西安均为东罗马帝国皇帝，450—474年在位。狄奥多西二世在位年代为408—450年。

她完全是平民的女儿，不会不知道运气只是你从这个世界中得到90%的东西，但这又是什么呢？迄今她为自己做的事相当成功，没有理由说明好运气会停止对她微笑。她为了保持躯体与灵魂的一致，很长时间以来不得不充当一个在竞技场里演芭蕾的女孩。当时，有一个富裕的拜占庭官员，在他将被贬到北非一个很差的省去做总督的时候，注意到了她，他认为这个可爱的女孩将成为他孤独流放生涯中给他娱乐的最佳人选。

不雅的安排当即作出来了，西奥多拉乘船驶过地中海，作为这位总督的情人在彭塔波里斯定居下来。

也许那个时候跟现在差不多，利比亚沙漠中的一个小镇实在不是那种对一位年轻的时髦女人具有吸引力的地方。西奥多拉不久就厌倦了他的情人和那个地方，她逃到了亚历山大。在亚历山大，她希望能找到更多、更有趣的生活乐趣，但是她的希望还是落空了，因为她在那儿生了个儿子，成了一位未婚母亲。

有关这个孩子的事，我们是从间接的来源获得的。西奥多拉坐上皇后宝座不久，一位年轻人从“阿拉伯”的某个地方突然出现，当时的“阿拉伯”与“非洲”这个词是一样的模糊，因为可能是在地中海南岸或者印度洋东岸的任何一个地方。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急着叫皇后“妈妈”，并坚持要在感情、金钱以及政治职位方面获得某种承认。这样，就如他突然出现一样，他很快就消失了，而且是消失得无影无踪，好像他从来不曾存在过似的。

这个故事，没有被臭名昭著的普罗科匹厄斯当作丑闻，用来恶意攻击西奥多拉，事实上，这个故事比较符合西奥多拉的事实经历，在她成名的前后都比较符合。她和古代斯堪的那维亚传说中的主人公一样有着极强的报复心理，在她的经历中，任何时候所受的一切轻微伤害她都记得很清楚。她不够长命，来不及把她的敌人全部抓起来，而那些不小心被她的私家侦探抓住的人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她的丈夫，在这方面应该比她厉害（别的方面可不是），但他很少能铲除那些想害他的人。他那可爱的妻子因此看不起他，认为这是柔弱性格的表现。只是认识到他总归是皇帝，她只能偷偷地搞谋杀，当皇帝在花园里发现一名爱臣的喉咙已被割断，或者一名宫女被扔进海里喂鱼的时候，他会非常吃惊。但皇帝已被热恋完全冲昏了头脑，根本没有提出任何令人发窘的问题。因为她像其他女性控制她的男人一样完全控制了他。她死之后，他不再去娶别的女人，据我们所知，他甚至不再去看别的女人。这就是同一个查士丁尼，作为东罗马帝国的伟大的法制家将永远被世人记住，从某种程度上讲，他是中世纪时期最初 10 个世纪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照今天流行的话来说，这个小女人一定有什么特别之处！

至于皇帝与他那位唱歌跳舞女孩的结合，遇到了许多困难。查士丁尼的叔叔一家（他从那里获得了皇位），听到他们之间的消息后没说一声好。阿尤费米娅皇后，一个类似维多利亚女王的拜占庭女人，得知有这样一个人要进她的家门后，非常惊恐，唠叨着要求助基督教法庭，催促恢复那条差不多已被人遗忘的法律，这条法律规定禁止拜占庭统治者与任何一个和奴隶阶层有关联的人结婚。对于这对情人来说，幸运的是，老太太在她侄子宣布他的订婚消息后不久就去世了。这样，由查斯丁尼叔叔一个人来处理这件事了，可是他所能做的还不如他妻子。再说，他未来的侄媳妇是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当她用一双大而黑的眼睛看着这位老头的时候，他或许愿意把整座都城都给她，只要她开口要。

此后，一切进展顺利。倘若受到足够的压力，教会将会让步，元老院成员心领神会（拜占庭还保留着罗马帝国的政体），皇室顾问也是如此。好在当时有关禁止拜占庭皇帝与下层女人结婚的法律已被及时废除，查士丁尼和西奥多拉便结了婚，而且幸

福地在一起生活了将近25年。

注意到这两位皇室夫妇在性格上完全不同，在许多内外政策问题上也有各不相同的看法，这么长时间的婚姻纪录是很不一般的。不管怎样，从政治这个角度看，历史对于这位女人是非常宽厚的。许多现代的作家似乎都同意这么一种看法，即如果没有她，查士丁尼永远没有希望完成他所做的事。

也许，这位皇帝最大的优点在于他的尽心尽职和他处理许多棘手问题的能力。当查士丁尼看到罗马帝国的法律越来越复杂、繁多，即使是最博学的法官也会在这成千上万条法规和法令中迷路之后，他便着手整理这些法律、法规和法令，对其进行归类。在这方面，他获得了妻子的全力支持，不过她一点儿也不赞同他想向西扩展他的帝国疆界的想法。

西奥多拉的个人特殊兴趣是在东方。她喜欢奢华，花大笔大笔的钱去买珠宝，坚持把宫廷装饰得非常美丽，富于东方情趣——这一切更像是塞浦路斯式的，而不是希腊式的或者斯拉夫式的。所以，她对反叛行为的残酷惩罚，以及她所建立的私人特务机构都具有东方色彩。凭借她的私人特务机构，她能获知所有关于讲到她的言论，不管是在首都，还是在外省。如果有报告显示哪怕是只有极少的可能危害到皇室安全，就会有秘密使者迅速从皇宫中被派出去，监控整个马尔马拉海。这些使者们会很快地前往某个不知名的地方，数小时后，他们会同样神秘地回来。这就是皇后喜欢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然，尽管有种种反对她的言行的说法，但她的行为并没有使她变为一个魔鬼，以她的嗜好和经历是很容易成为一个魔鬼的。特别重要的是，她从不让她的感情随她的普通感觉一起放任自流，慢慢地，她对于查士丁尼来说越来越有价值，在他娶她为妻后也把她提升为帝国的核心领导之一，并使所有的官员不仅效忠于他本人，而且效忠于他的皇后。最终，在诸如革命和叛乱这

些无法意料的困难面前，皇帝的妻子，这位最最典型的女人，勇敢地站在他的身边，跟任何男人一样无畏地投入战斗。

比如，如果不是她的话，查士丁尼可能无法在532年的叛乱中获救。这是一次由一场竞技比赛引发的所谓“佘基起义”（拜占庭人对于体育运动与我们一样的严肃），起义者的目标是要求全面的政治自由。在其被镇压下去之前，总共造成3万多人死亡。当时，暴民们试图冲进皇宫，幸亏皇后及时、有力地组织起为数不多的士兵和卫士，打退了暴民对皇宫的进攻，朝廷得救了。

这件事发生后，西奥多拉似乎变得越来越不依赖于他的丈夫，而皇帝也让她去干她想做的任何事。他最后开始感谢这位成为他妻子的洋娃娃似的小女人，在保卫帝国战斗中，她比狄奥多西二世在15世纪中期建造的、据称是攻不破的城墙更有用。西奥多西斯二世建造的城墙原本希望不会重蹈旧城墙的命运，最后却被野蛮人征服了。

我有时候觉得，这位极不平常的女人，对于近年来在我们这个共和国里争取平等权力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国会女议员们来说，是最有宝贵用处的。可惜，不管怎样，在我们大洋的这边将永远不会见到她的身影，因为她永远不会通过移民局的检查，道德上的堕落将使她不得人内。

从佛罗伦萨出发，坐车3个多小时，直穿过亚平宁山脉，就到了拉文纳。这是一个沉闷的小城市，当你在拜伦大饭店吃完不好吃的实心面后，我建议你一定要出来走走，然后去寻找在那儿随处可见的精美的镶嵌工艺品。

如今，拉文纳距离亚得里亚海大约6英里。但二千年前，拉文纳是个像威尼斯一样的泻湖水城。而且当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还是农牧区的时候，拉文纳一度如威尼斯一样发展成为一个繁荣

的商业中心。

在奥古斯都统治时期，拉文纳成了一个海军基地，是海军亚得里亚海中队的司令部驻地，有一个能容纳250艘舰船的港口。不过，直到公元404年，拉文纳才成为一个城市，当时，罗马帝国皇帝霍诺里乌斯觉得旧都城不能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他便带着他的朝廷来到了这个设防严密的亚得里亚海边的港口，在这儿，一旦陆路被切断，还可以从海上逃走。

不久，发生了一起5世纪时期最有影响力的事件。公元476年，最后一位具有纯种罗马血统的罗马帝国皇帝——有着可笑名字的罗姆路斯·奥古斯塔拉斯（昵称），被他的外籍卫士，一个名叫奥多亚克[①]的条顿人首领推下了皇位。新的统治者对这位可怜、英俊而不堪一击的年轻人产生了怜悯，因此饶了他一条命，让他在一座别墅里度过余生。那座别墅位于那不勒斯湾岸边，是有名的发战争财的投机商、最出名的早期美食家卢库卢斯[②]几百年前建造的。数年后，奥多亚克同样地被一个名叫西奥多里克的外国人杀死，西奥多里克是东哥特人部落的首领，接受过基督教的洗礼，而且是个在君士坦丁堡受过教育的蛮族人。

西奥多里克把拉文纳作为其东哥特帝国的首都，并在那里大兴土木，建造他自己的坟墓，考虑到当时的条件，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以墓顶为例，整个墓顶是由一块直径为36英尺的整块石头建成的。他们是如何用原始的工具和滑轮将其搬上去的呢？对不起，我们真的不知道。公元539年，东哥特帝国被拜占

---

① 奥多亚克，意大利蛮族国王（476—493年），原为日耳曼武士，参加了罗马军团，476年被拥戴为王，西罗马帝国遂亡。后被东哥特人国王西奥多里克设宴诱杀。

② 卢库卢斯，全名利乌尼马斯·卢库卢斯（约公元前117—前56年），罗马将军，曾任财务官、行政长官，击退本都国王的入侵（公元前74—前66年），以宅第、宴饮奢华著称。

庭将军贝里萨留推翻了。拉文纳便成了东罗马帝国辖下的所有欧洲领地的首都。此时，不管是建筑方面，还是在其他艺术领域，拉文纳都留下拜占庭的印记，正如我们从罗马附近各省的遗迹中获得的有关罗马竞技场和罗马公共建筑的情况，要比从罗马城本身获的情况更多一样，由于十字军和土耳其人对君士坦丁堡一切美物的大肆破坏，我们在拉文纳和亚得里亚海两岸地区的一些小块中要比在君士坦丁堡更容易看到拜占庭艺术。

所以，拉文纳是值得一去的。条件是某个人要清楚他要寻找的东西。到了晚上，如果他喜欢的话，可以去听大街上草在生长的声音。不过，极少有那些富有纪念意义的景点。在我们喜欢的费勒有奶牛和猪叫的声音，也有小男孩、小女孩拿着一盆盆生面去面包房烤面包，可在拉文纳没有这类给人印象深刻的景点。在拉文纳，你身边被美丽景点的遗迹包围着，而这些美丽的景点已经永远消失，不可再现。在那里，你能看到一个叫但丁的忧伤的男人，在这个无聊的小省城里孤独地度过余生，一个人在附近松树林里徘徊、冥想，偶尔也去看看他唯一幸存的孩子——他那位修道院里的女儿；他还在圣弗朗西斯科教堂里仔细挑选了一块地作为他自己的坟墓所在地。

或者，你还可以去拜访拜伦勋爵的影子，拜伦一直追求着某些事业，这使他忘记了童年所受的痛苦。此时，他正在听他最后一位至爱——特雷莎·圭乔利伯爵夫人说话，伯爵夫人曾鼓励他奉献他的生命和前途，去帮助她的意大利人民从可恶的瑞士人那里获得自由。我们还不能忘记忠诚的艾尼塔·加里波第，她陪同丈夫一起在这里为了祖国的解放而战斗。自伊达拉里亚人和罗马人为了争夺亚得里亚海的控制权而展开战斗以来，这个地区湿热病蔓延，后来加里波第也病死在了这块土地上。

不过，聪明的参观者，在抽了奇安提雪茄，做了浪漫的白日梦之后，等到黄昏降临之前，他会去参观圣维大乐教堂。因为这

个教堂里镶嵌工艺品非常非常的古老，色彩有些变淡，需要落日阳光的照耀才能恢复生机。

圣维大乐教堂是由西奥多里克开始建造，由查士丁尼完工的。教堂建成后，被认为是建筑领域最精彩、最大胆的设计，这使得查理大帝① 照它的样子在亚琛建造了自己的教堂。按照现代的观点，从外表上看，它就和其它小镇上的教堂差不多，在美国中西部的任何一个稍好点的城镇都能看到类似的教堂。只是，参观它的人们从来不去看它的砖瓦。人们要看的是它里面的镶嵌工艺品，这些镶嵌工艺品在拉文纳作为一个城市和查士丁尼帝国西部省份的首都的时候就放在这里了，因此这些工艺品已有将近1000年的历史了。

镶嵌工艺品的制作工艺几乎已失传，就如猎鹰训练术和射箭术一样。好多人甚至很难看懂这些彩色玻璃表示的是什么东西，抱怨这些图案刺激他们的眼睛，就像格里高利音乐烦扰他们的耳朵一样，或如呆板、缺乏生气的某些东西不合他们的现代口味。如你不想和这类缺乏教育的人在一起的话，你可以贿赂教堂司事许诺给他们看一些值得他们看的东西　　“古罗马时代的裸体绘画”，将他们带走，然后，你就可以坐在一个安静的角落，欣赏两位陛下。

在圣坛的一边，你将看到查士丁尼皇帝，他周围围着公元547年就任拉文纳红衣主教的圣马克西姆以及他的侍从和卫兵。你会注意到皇帝的四周有个光环，这是他作为他前任的继承者拥有的权力，他的前任们在事业起步时同样被太阳神和他的光芒所笼罩。在这帮人的左边，你会看到成为查士丁尼的妻子，并与他

---

① 查理大帝，或译查理曼（742？—814年），法兰克国王、皇帝（768—814年在位），扩展疆土，建成庞大帝国，加强集权统治，鼓励学术，兴建文化设施，使其宫廷成为繁荣学术的中心。

共享命运和权力的那个女人

这位君士坦丁堡竞技场里的跳舞女孩，这位非洲和西亚6个城市里的高等妓女，同样穿着表示权力和神圣的服装。她站在一个小喷泉前边，也许艺术家将她放在那里是为了求得平衡，因为图案的左边没有别的人像。那儿隐约有一条黑暗的走廊，显然通往内宫。一名侍女正在把门帘拉在一边，显示了另外一部分建筑，提示皇后陛下将回到她自己的寝室。一名等待着的女侍占满了嵌板的右边，一名神情严肃的侍女站在皇后的后边，纤细的手中拿着酒杯。皇后那双布满丑闻的脚从她那身沉重的礼服里稍稍露出一点儿，她头戴皇冠，身上佩着的珠宝足够买到一打的国王。可是，不久你将慢慢地只会感觉到一种强烈印象。整幅图案将化为一双眼睛，一双西奥多拉皇后的眼睛。从这双眼睛中，你可以读到名为女人的神秘的历史篇章。

[西奥多拉（约500年—548年），拜占庭皇后，查士丁尼一世之妻。父为君士坦丁堡马戏团驯熊师。她很小就成为演员。查士丁尼爱其美貌聪明，先纳为情妇，后正式结婚。527年加冕为皇后。她权势很大，人们甚至认为是她而非皇帝在统治着拜占庭。西奥多拉是最早承认妇女权利的统治者之一，曾制订严格的法律禁止买卖少女，并修改离婚法使之对妇女有利。——译者附注]

虔诚的圣徒——

圣方济各

Francis of Assisi, Saint
(1181/1182－1226年)

弗兰西斯科（方济各）·贝尔纳于1181年或者1182年出生在阿西西。阿西西在翁布里亚，翁布里亚到处都是小山，坐落在罗马的北面，佛罗伦萨的东面。从地理上讲，它是意大利的地质干脉亚平宁半岛的一部分。

亚平宁山脉北起波河的山谷，南到意大利的最南端。

多山的地区——或者说起伏的山峦地带——似乎对人类诗意般的气质产生更为明显的影响。总会有一天，某位历史学家会根据地理位置的不同，给我们列出一个全世界的人才精英表。我想，这个表会显示出，起伏的山峦地带，就像我们居住的欧洲大陆、英格兰、德国的中部和南部以及意大利的北部，是人类产生诗情画意的理想的肥沃的土壤。

小方济各的父亲拥有一个服装店，是一个裁缝，可能是全城中最好的裁缝，所以他还是个重要的人物。方济各希望能继承他父亲的事业。命运对他来说是一帆风顺的。他不爱学习，尽管他能读，也能写。他不喜欢读书，更憎恨学校。所有这些都没有什

方济各会创始人（阿西西的）圣方济各
意大利13世纪绘画大师契马布埃绘

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只是证明了他是一个正常的处于 12 世纪、20 世纪或者是 2 万世纪的男孩。

阿西西不是一个大都市，但在 1181 年，已拥有 2000 多居民，使它有权利称自己为城市，而且它拥有城墙、塔楼和一个正规城市所必需拥有的其它设施，包括自己的外交政策，以至于它的邻居必需考虑到这一点。阿西西的外交政策，像其它所有的外交政策一样，不管国家的大小，都经常需要用武力的展示来支持。在方济各大病初愈时，爆发了一场战争。我想我可以找出战争发生的原因，但原因并不致于使双方以刀光相见。在中世纪，像这样的小城市甚至村庄之间的冲突就像我们现在的棒球比赛一样平常。作为一条规律，他们都没有被伤害，最终的结局是——一些人扭伤了脚，或者是肩骨脱臼。在极少情况下，选手中的某一位忘记了自己，使用了暴力，向对方的下巴猛击一拳。方济各并不在乎捂着受伤的鼻子回家，但他的病几乎耗尽了他所有的精力。从战场返回家用了他许多天的时间。作为本市的英雄他当然是很幸运的，但是他开始怀疑这并不是上帝让他扮演的角色。

突然“战争”停止了，年轻的志愿者赶回阿西西，阿西西举行了盛大的欢庆会，方济各急于赶回参加。在路上，他的朋友们希望他能忘记最近发生的不愉快，尊称他为国王，并派出火把队提前通知阿西西，但方济各悄悄地离开了。最后，当他再次出现时，他已变得精神恍惚，刚从遥远的、不知名的地方周游回来。老方济各·贝尔纳多已不在人世，方济各的弟弟取代了他的位置。作为贫困中的最贫困者，他饱经沧桑，直到 24 年后，最终因贫困交加，消失在贫困区的墓穴中。他的肉体早已不复存在，但他的精神却活在我们心中。他使我们衷心地欣赏他可笑的“天才的傻瓜”的智慧，而不是他的思想的教育意义。

在经历了许多世纪之后，要弄清楚方济各·贝纳尔多所追求的目标，他真正的信仰以及他的同代人对他的印象是十分困难

的。在历史中，很长时间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在我们当今的世界中，要扮演方济各这样的角色需要有超人的勇气。在我们大洋的这一侧有位梭罗与他比较相像，在托尔斯泰的最后的几年里，他也曾模仿，或者试图模仿方济各的贫困生活。梭罗缺乏方济各的最主要的性格。他，作为一位诚实的美国人，一直保持着工作的欲望。他不像他的堂弟那样追求工作，但在他的小木屋里必须保持整洁。甚至每年只要花费10美元就可以不消耗他自己的体力，但他宁愿自己累得满头大汗也要保住这10美元——没有人会因此攻击他曾经欠了杂货商的铅笔钱。至于托尔斯泰，他迟到的悲惨结局和奥地利国王每年举行的洗脚仪式一样重要。十几位维也纳人经过充分地沐浴之后，被带到陛下面前，通过这种谦卑的行为（用一块湿毛巾擦他们的脚），显示高尚的基督教徒的精神。

让我想想，我如何能把我对这位虔诚的圣徒的看法向你们表达清楚。

方济各不是一个像我们现在所说的那种社会服务人员，除了一个现代的福音传教士以外，他很平常，尽管他说教时的听众比其他任何人都多。虽然他也写过一些圣歌，但他对创作宗教宣传读物并不太感兴趣。他对新成立的布道学校并不热心。许多人崇拜他，并以某种组织的形式聚集在一起，但方济各并不适合这种工作，他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其他雄心勃勃、更有组织能力的人。

他也不是一个外交家，尽管他曾经做过别人做不到的事。他去过圣地，要求苏丹王通知那些惊讶的（同时也是迷惑不解的）异教徒，他已认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在没有太晚之前，他要改变他自己的信仰。于是，他让来访者给他进行了洗礼，成为基督教徒。

试想今天如果有人到德国城市贝希特斯加登告诉希特勒，他注定要被打入地狱，应该立即给德国人一个民主的宪法，并惩罚

违反者，试想一个现代人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手术，通过疼痛来乞求宽恕，谁能做得到？这正是方济各在生命的最后的日子里所做的。

我们总是有一些“高贵的”人在我们周围。我们经常在报纸（照片和所有其它的传播媒体）上看到他们。他们总是有一些新奇的迷信思想，他们保证说可以用吃草的方法来拯救世界，或者否认物质的存在，或者坚持通过某种精神上的活动可以杀死霍乱细菌，或者能治愈骨折了的腿。但是，为了弄清楚这些十分值得怀疑的论调和所有生物之间的区别，我们只需问问自己，方济各是使用了什么方法使如此多的人加入到他的阵营中。他会马上感觉到没有哪种通用的万能胶能把他们粘合在一起。对于方济各，尽管他逆来顺受，仍是位心理学专家。虽然他不一定意识到，可他是怎样了解他的同伴的呢？他是怎样洞察他们的心灵的呢？他为什么能点燃希望之火，只要生命不止，火焰就不熄灭的呢？

我怎么会清楚呢？因为经过这么多年，我的生活像普通人一样。不论是什么，在我身上只要是美的——内在的本质的美，而不是外表的美（我是一个相当漂亮的人，能演许多角色）——但是在我心中不论有什么，有朝一日，我能以他在地球上生活了许多年为借口向万能的上帝陈述——所有这些都是我从一个人那儿学来的，是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我。我绝对不会不信守诺言，说出这个人的名字。在其它的礼物中，他给了我能够在宗教改革中幸存的钥匙。那时他所有的同伴，当然圣尼古拉斯是个例外，在新教徒的手中都受尽了折磨。但是，圣尼古拉斯永远活在孩子们的记忆中。孩子们从来不会对革命感兴趣，这当然不包括孩子们利用革命来发明某种新的游戏。

今天，尽管我的这种观点可能是错误的，但我仍然认为方济各在新教徒中比在天主教徒中更受欢迎，至少我感觉新教徒更能理解他。我们把他作为中世纪精神的代表接受，这样，我们就可

以觉察到他有什么使我们感到憎恶——他无理智地接受疾病、污物以及所有其它的痛苦折磨。这些痛苦是很容易避免的，甚至仅仅用一块肥皂和基本的生活常识就能解决。我们不必怀疑他从阿尔维塔山回来之后，他的手和脚上是否真的有圣伤（指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后身上所留下的伤痕），或者一个人经过多年的斋戒和整夜的祈祷而精疲力尽能产生幻觉。我们把这些问题划归心理病理学范畴，然后忘记它。我们逐步认识到，讨论纯粹的信仰问题是无益的，也是愚蠢的，比如让我们的孩子争论他们最喜欢的神话故事是否真实。

最后，我们没有必要把超自然的神秘现象具体化。他本人的确存在，而且有他自己的生活，这对我们来说就足够了。

一个修会为什么以他的名字命名，这对我们来说并不是特别重要的（方济各会作为一个富有人类欲望和雄心的组织，不会在它的内在精神中长时间地保留真正的方济各教义）。今天它有了其它的教义，我们希望这个教义是有益的，如果它超出了正常的影响范围——一个精神上的范围——那么我们就要抵制它。只要它能保持在这个范围之内，我们应该尽力支持它，使它能够在穷人和那些失去了继承权的人中发挥它的作用。我们宣布要继承方济各会的精神遗产。我们想分享与这位奇怪的留着小胡子的人做朋友的乐趣。他长得并不是特别吸引人，而且在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内，身体状况很糟。我们希望能够在夏天美丽的夜晚经常和他交谈。当我们在田间漫步时，发现他独自坐在一棵孤零零的大树下，盯着大地沉思。以后，当我们的孩子问起这位看起来很奇怪，穿着凉鞋和蹩脚的棕色长袍的人时（他看着孩子们，露出了慈祥的微笑，笑得那么自然，那么充满感情。孩子们忘记了害羞，冲着他笑起来），我们会说："我亲爱的孩子们，那是一位你们一生都不应该忘记的人。是他采摘了鲜花献给了救世主，那时他也不比你们大。"然后向他们讲起他传给我们的所有美好的故事。

［方济各（1181/1182 年—1226 年），天主教方济各会和方济各女修会的创始人，意大利主保圣人。学习过拉丁文和法文，参加过阿西西对佩鲁贾的战争。1205 年末本拟参加教皇军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战争，但途中折返阿西西，放弃财产和家庭，到阿西西城外苏巴西奥山林过清贫生活、进行隐修。他虽非神职人员，但 1208 年起开始传教，并为其信徒拟订简单的生活守则；1209 年方济各的托钵修会获得教皇英诺森三世批准正式成立。1212 年方济各协助贵族妇女克拉雷成立方济各第二会即克拉雷安贫会。1219 年去埃及传教。1221 年左右成立方济各第三会，收容在俗男女信徒。天主教会中相传方济各身上带有耶稣受刑所留下的五处伤痕。1228 年，教皇格列高利九世追谥他为圣徒。——译者附注］

中世纪最完美的大师——

但　丁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年）

弗里茨是我的朋友。他很想了解一些但丁的情况，为此我给他写了下面几页简介：

亲爱的弗里茨：

我担心对现在较年轻的一代人来说，但丁已成为一件古董，人们对他的爱就像对盛装或碎肉玉米饼那样。他现在被远置于我们自身的时代之外，我们难以建立起与这位孤独的漫游者的任何直接联系。他因对所生活的世界表示失望，而以游历天堂、地狱来逃遁。

我开始越来越感到，像最近三个月那样经常寄给你有关所邀请客人的长长的普鲁塔克式文章，没有多少用处。在但丁方面，甚至有过，同时至今仍在许多大学里设有定期的但丁学讲座。这些讲座由正式教授主持，他们终生只做一件事，即解释这位佛罗伦萨伟大诗人或发掘他旧的洗衣单和杂货帐目。因而我不可能再补充多少新东西，同时，必须承认，虽然我喜欢回过锅的菜，但我不爱老生常谈，跟着别人学舌。

但丁死亡面模

这个人的名字但丁·阿里盖利很奇怪。德国人有一种讨笑的习惯，即谦恭地宣称任何有点作为的人（只要他们与其北欧高贵种族方案相合）为德意志人，他们试图证明但丁的名字源自条顿民族，最初是阿尔迪杰或类似的东西。但丁本人似乎丝毫意识到自己有德意志祖先。事实上，他承认他对自己的先祖几乎完全没有了解。在进行著名的下界之游时，他巧遇他的曾曾祖父之一，他有一个罗马化的名字卡齐亚吉达或类似之名。我记不得这位五大三粗的战士和十字军战士因犯了什么大罪或轻罪而被在地狱中受烤炙了，但他身在那里，与其后人有了一次令人高兴的简短交谈。但是，作为一位诗人而不是历史学家，但丁极可能精心杜撰了这一不同寻常的祖先。

下面我还想当即说明一点，以免我们混淆事实。但丁撰写《地狱篇》并不是为了增加我们对14世纪的历史知识。他希望藉此表现他个人对他在其政治生涯中接触到的许多人的看法。

他留给我们的喜剧通常被称为《神曲》，从字面上看它是神圣的，因为与这位神情抑郁的佛罗伦萨人相比，带着如此多的怨恨，如此多的憎恶，如此深的报复欲望写成的著作微乎其微。

对但丁的父亲我们所知甚少，只知道他结过两次婚，还有其他一些孩子，这些在但丁自己的生活中都没有起特别的作用，大都不为人所了解。但我们对但丁的背景有充分的材料证明他虽然不属于贵族，却出自殷实之户，其父亲和祖父在社会地位上和经济上都是社区中有根基的人物。但一论及他孩提时代和青年时代的详情，我们又再次处于黑暗状态。他的父亲有能力让他受到当时平民所能受到的最好的教育，而且这样做了。因而，这位未来阴间的哥伦布并非文学领域

白手起家的人（有些人曾这样宣称）。他在13世纪下半期的一座中世纪城市里学到了所能学到的一切（但丁出生于1265年），对经典著作十分熟悉。

我们所了解的这一时期但丁唯一的另外一个插曲，是他首次见到可爱的贝雅特丽齐·波提纳利时的激情：他一时发狂了。虽然他钟情于这位少女，但他看来从未与她约会，这并不令人惊奇，因为他们在故城街道上首次相见时两人都只有9岁。

这一爱情受挫故事与我们所有人非常年幼天真时都会有的那种折磨没有多大不同，但在但丁这一极其内省的作者心中，这种记忆的影响比对我们要巨大得多。因而我们在他所有的作品中一而再地遇到这位可爱的贝雅特丽齐。然而，与他从政的决定相比，她对他其后生活的影响连一半都没有。

你一定记得你在学校历史课上学到的东西，一定能认识到，当时在佛罗伦萨从政，不属于两个党派之一是不可能的，这两个党派近一个世纪中一直在为控制城市而战。年轻的但丁因而面临一个抉择，套用我们的话说，他要么成为一位共和党党员，要么成为一位民主党党员。

但丁刚出生时，佛罗伦萨所有显要家庭分属于吉贝林派和居尔夫派两个界限分明的阵营。由于我老是忘记谁属于居尔夫派，谁属于吉贝林派，我只好再翻书了解一下他们。居尔夫派（该词很好记，它来自德语中表示狼wolfs的词，是一显赫的萨克森家族）长期以来对抗霍亨斯陶芬王朝，其对手则支持德意志皇帝。在意大利，后者被叫作吉贝林派，它是意大利人称呼其最大的城堡之一韦卜林极的一个方式。德意志这两个王朝间最初的斗争逐渐蔓延到阿尔卑斯山脉以南，结果出现了就像德意志的居尔夫派与霍亨斯陶芬王朝派那样激烈对抗的两个政治派别，但形成的根基不同。在意大

利，居尔夫派是那些希望教皇成为意大利主要权力、不愿意以德意志皇帝为其领主的人，吉贝林派则支持德意志皇帝，视之为未来亚平宁半岛整体的独裁者。

这样解释可能有简单化之嫌，即吉贝林派通常是独裁者，居尔夫派则代表较为民主的因素。当然，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民主，但作为大批中产阶级的代表，在几乎完全失色一千年后，最终开始重新获得对政府的某些旧有影响。几乎用不着着重说明，富裕城市在感情上主要属于居尔夫派，乡村地区则是吉贝林派占上风。在佛罗伦萨这一工商业堡垒，但丁出生之前，居尔夫派曾短暂失势。然而，两派间的对立过于强大，难以完全消失；但丁步入政坛时，该城分为黑居尔夫派和白居尔夫派，或按他们的说法简称为黑派与白派。这些黑派与白派就像美国现代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那样彼此相斗。

但丁自30岁起成为佛罗伦萨市政府的成员，恰巧属于白居尔夫派。因而，当又一场完全出乎意料的地方动乱致使黑居尔夫派重新执掌权力后，他以及该派所有领导成员不得不离开故城，并受到警告：倘若他们胆敢再次踏上佛罗伦萨的土地，就将被处死。这就意味着600家支持皇帝胜过教皇的人突然被剥夺了他们的所有财产，变得一文不名。对他们中的许多人而言，这意味着末日来临。其他一些意志较为坚强的人在白派当政的邻城安顿下来，靠从事体力劳动或受雇于当时意大利很典型的血汗工厂养活自己。还有一些人成为职业流亡者，把时间用在密谋推翻故乡当政政府上，他们接受任何愚蠢地出资资助他们的人的钱财。

但丁是个例外。作为文人他必定已经享有相当高的声誉，因为他从不缺少至少可以支付日常所需的钱财。虽然如此，每周几元钱对一位政治难民来讲仍意味着日子难挨，而

但丁看来手头一直只有那点钱。由于他现在没有任何固定职业，他觉得他首先做点比其同行的多数意大利人所作所为更有意义的事，并了解一些有关其同志的事是个好主意。

首先，他前行到米兰，向新当选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致意，该帝国具有日耳曼人渊源，公元800年由查理大帝创立。他由米兰开始游历了整个北意大利。此后，他获得了大批支持吉贝林派或帝国事业的意大利王公的一时款待，移到了小城拉文纳，在当地独裁者圭多·达·波伦塔的保护下度过了余生。他在那里完成了其不朽诗作，于大赦年1321年9月14日去世。

在去世前几年，但丁曾获得机会回归故城佛罗伦萨。但鉴于他曾归属一个可恶的政治集团，作为惩罚，他应交纳巨额罚金，同时应在一所教堂里举行当众忏悔仪式。他在自己保留的一封信中拒绝这样做，读起来与托马斯·曼① 回复可恶的纳粹派波恩大学校长的高贵文件非常相像，这位校长收回了几年前授与曼这位德国最杰出作家的荣誉学位。这令我们羡慕但丁，偶尔甚至喜欢起他来，因为像这一不幸的流亡者那样对其出生城市有着那样狂热的爱的人很少。佛罗伦萨的画像日夜伴随着他，而你和我，亲爱的弗里茨，对我们小小的费勒也有着同样炽热的情感（上帝知道，这不是佛罗伦萨），能够完全理解他那种难以磨灭的忠诚态度。就我们而言，不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总希望将来有一天回归费勒。然而但丁知道他被判的是终生流放。但这爱是不由自主的，他不能做别的什么。荣誉比其他一切都重要。当他感到他没

① 托马斯·曼（1857—1955年），德国小说家，作品揭露社会的腐朽衰败，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布雷勃洛克一家》、《魔山》等，获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1933年，他因抨击纳粹政策被迫流亡国外，后加入美国籍。

有犯下罪过时，他可能不认为自己有罪感。因而他当机立断地拒绝请求原谅，即便这意味着他再也不能看到他钟爱的托斯卡纳的低丘，再也不能站在他首次见到亲爱的贝雅特丽齐的缓缓流逝的阿尔诺河畔那一地点。与其自贬身份，他宁愿在拉文纳松林中以高贵的孤独状态度日，不原谅人也不被人原谅地死去。

自然而然，这些苦难的流亡岁月注定对他整个人生观产生影响，它们是但丁的那种遍及各方面的精神阴郁产生的原因，这种阴郁状态往往使人感到读他的书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一种快乐。但它们也将赋予他所写的一切东西以一种明确无误的高贵情调，虽然他在领我们去见某些他打入地狱最深处的人时是位极不可靠的导游。

我认为这一点应比平时大加强调。《地狱篇》是但丁为自己生活所作的辩护。它证明他现在仍很年轻，在充满为国尽力的热情时从事的政治活动是正确的。假如威尔逊总统[①]有时间撰写他自己版本的地狱篇，人们难以奢望他会把洛奇[②]置于圣人中突出的位置。

因而，对但丁的《地狱篇》的描述，应当极为慎重。它是有史以来成见最深的政治论著之一，正是这使得该书如果不加大量注疏，今人越来越难以欣赏它。但丁的同代人当然了解书中的每一个暗示和影射。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他们的"专栏作家"，只不过比起现代多数同行走得更远一些。他不

① 伍德罗·威尔逊（1856—1924年），美国第28任总统（1913—1921年），民主党人，领导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倡议成立国际联盟并提出"十四点"和平纲领，获1919年诺贝尔和平奖。

② 亨利·卡博特·洛奇（1850—1924年），美国参议员，制订反托拉斯法案，支持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1919年任外交委员会主席，反对国际联盟盟约和凡尔赛条约，成为美国孤立主义倾向代表人物。

只建议他的某些敌人应当在地狱熊熊烈火中度过余生，他实际上把他们打入了地狱，让他们在那里受烈火的炙烤。

现在让我略微谈谈他的著作，因为在但丁一例中，书是主角，作者只属于第二位。他把其名作的开篇定在1300年复活节前星期五，虽然他真正开始写作的时间一直未能为人确定下来。我们也不知道他何时完成写作。至于他的另一作品《新生》(Vita Nuova)，他献给他永不忘怀的贝雅特丽齐，其《飨宴》(Convivio)是14世纪的一种知识著作——书中各卷虽具有毋庸置疑的优点，但从未真正成为基本部分。它们与阿尔弗雷德·丁尼生[1] 的历史戏享有同等地位。人们宁愿做六周的苦活，也不愿读其中的一卷。

下面我想看看（主要是出于自娱）我是否可以用尽可能少的文字，总括一下为但丁辩护的文字，并说明，虽然有许多相反的说法，在历经几百年后，我们仍有可能坚称，《神曲》仍是一部佳作，其作者将永远侧身于最重要的作家之林。

但丁和列奥纳多·达·芬奇一样是我心仪的伟人，他们代表了人类历史上两个极有趣的篇章——一个是中世纪的最后一章和终曲，一个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最早的篇章之一。

但丁是最后一位伟大的具有中世纪遗风的人，因为他是在一位普通人仍有可能成为一位活的百科全书、了解他那时期和所处时代所能了解的一切的时候进行写作的最后一人。因此，《神曲》不仅是《失乐园》（弥尔顿作）那样的宗教诗歌；此外，它还是

---

①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1809—1892年），英国桂冠诗人，重视诗的形式完美，音韵和谐，词藻华丽，主要诗作有《夏洛蒂小姐》、《尤利西斯》、组诗《悼念》、《国王叙事诗》等，1884年被封为男爵。

有关中世纪人所知所说所想所做一切的评语。确实，假如我们失去了有关中世纪的所有其他资料，仅仅靠但丁的一册著作，我们仍能据此切实可行地再现中世纪的整体生活。

现代人不再希望这样做。巴尔扎克在其《人间喜剧》中向我们展现了上一世纪上半叶居住在法国的那一类人。左拉则试图展现上一世纪下半期的情景。不过但丁比他们两人都要胜上一筹。他活动的空间当然不如刚刚提到的那两位法国人那么复杂，他生活在一个基本上简朴的时代。时间和距离都尚未被完全破坏，上帝仍像创世以来那样治理着天堂与人世。科学实际上并不存在，艺术处理的是相当粗陋的材料，因为音乐器具和现代复制方法，诸如油画、蚀刻版印刷和不褪色的墨水等，都要在很晚之后才出现。

要从一地到另一地，人们仍要步行。如果旅行要跨海越洋，人们只好求上帝保佑，凭猜测启航，没有任何把握能抵达目的地。另外，当时就连最简陋的舒适形式也完全缺乏。因而，王公和穷人实际上过着非常相似的生活。王公可能拥有上千匹马，但他一次只能使用一匹马，行进速度不会比只有一匹骡子的农民快太多；假如骡子乐意散步行进，它可能比王家或皇家牡马走得快多了。

但是，即使在那些有利的条件下，把整个文明以及整个文化循环浓缩成单卷著作，同时没有把该书变成枯燥的百科全书，而是使之成为一部充满活力、富于色彩的一流杰作，仍是一项了不起的杰作。

但丁死后不久，一场以文明再生自傲的运动文艺复兴以勃发的艺术飓风横扫全欧洲。在取得令人骄傲的初步胜利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看不起其直接先辈，同时对他们凝望的 13、14 世纪的建筑成就同样表示鄙弃，认为它们过于具有哥特风格，太具有蛮荒和粗鄙气息，对他们自己雅致的趣味毫无意义。

自那时以来我们学得乖了些。现在我们大都更推崇沙特尔大教堂而不是圣彼得大教堂，我们逐渐认识到，但丁用他自己漫长的、理不应当的流亡之苦建造的纸的丰碑远远高于中世纪人的所有其它作品。我知道它不是用砂浆和石头建成的。这位伟大的佛罗伦萨人是用纸和墨建立他那庞大的纪念物的，但是除此之外也添加了另一极其重要的成份——被称为天才的灵魂和神秘特性。

[但丁（1265年—1321年），意大利最伟大的诗人、散文作家、修辞学家和政治思想家；与莎士比亚、歌德并称为西欧文学上的三大天才巨匠。他出身于佛罗伦萨贵族家庭，早年攻读文法和修辞，并从事诗歌创作。他参与了佛罗伦萨的政治生活，站在主张民主的居尔夫派一边。在党争中失败后，他遭到放逐，漫游意大利各地，寻求庇护和友谊，以求学和诗歌自慰。以后他再也未能回归故土，1321年9月13日夜，因患疟疾客死于拉文纳。但丁主要的作品有《新生》（1293年），包括1283—1291年间所写的抒情诗31首，用散文连成一体，描述他早年对贝雅特丽齐的爱情。贝雅特丽齐不仅是但丁灵感的源泉，而且被神化为美的象征。1296年，他发表《佩特罗基的诗集》。1308—1318年，但丁完成了人类文学的经典之作《神曲》。全书分三部分：《地狱》、《炼狱》和《天国》，共14，233行，分为100个诗章。它描述但丁在维吉尔引导下遨游地狱和炼狱；到达炼狱之巅时，又得青年时情人贝雅特丽齐引导，得见天国的美景。《神曲》以其构思之宏伟、想像之丰富、人物描写之精湛、艺术之熟练以及富有感情的道德力量，堪称一部雄浑的诗歌杰作。诗歌用意大利本国语言写成，为意大利文学早期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它对于欧洲文学脱离其拉丁本源向表现新时代文化的方向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但丁的重要作品还有《论俗语》、《论飨宴》及《帝制论》。——译者附注]

有史以来最多才多艺的天才——

达·芬奇

Da Vinci，Leonardo

（1452－1519年）

现在我们谈的是一位与但丁截然不同的人。因为，如果说但丁作为中世纪一位完美无缺的儿子"了解"而从无怀疑，那么列奥纳多·达·芬奇则"进行猜测"，从未停止过问为什么。正如但丁是一位现已走向明确终点的时代精神的代表，列奥纳多是文艺复兴时期心智的一位完美的代表。

列奥纳多出生于1452年，逝世于1519年。我们假定他把前20年用在受教育上，那么他还有47年去做他一生中的工作。考虑到他不仅是各个时代最伟大的画家之一，而且作为建筑师、工程师、雕塑家、运动员、物理学和弹道学研究者、诗人、作曲家、乐师、哲学家、发明家也获得了非凡声誉，同时精通军事事务，他一生必定非常勤奋。

上文我刚刚说过，但丁是最后一位具有中世纪遗风的人，因为他仍能把那时代的所应可以得到的知识纳入单卷著作，达·芬奇的情况看来与这种说法产生了直接冲突。但是，如果说但丁是过去已知一切的"过梁"，列奥纳多则是先知，宣告将来将要展示出的一切。由于"预言"比"总结"要难得多，因而列奥纳多

达·芬奇自画像。该画约作于1512年
（[illegible]），用红色粉笔画成

更伟大一些。但对这样两位在如此不同的活动区域内取得卓越成就的伟人进行比较往往流于无益，因而我就此打住，不多加讨论。

列奥纳多是位私生子，他的父亲是佛罗伦萨一位律师，他的母亲可能是芬奇村人（但对她我们一无所知），列奥纳多的名字即因此而来。父亲对他必定很关心，因为儿子受到的是年轻贵族的教育，对艺术表现出明确的兴趣。他被送到安德烈·德尔·韦罗基奥[①] 那里学习手艺，后者当时仍很年轻，但业已以画家、雕塑家、工程师和银匠著称。

谈到列奥纳多，我又回到了“天才”这一引人入胜的话题。在本书中我们谈到了众多具有突出才干的男人和女子，但我很抱歉地承认，我对他们并没有深入的了解。但我开始怀疑，天才很像葡萄酒，某些地方比其它地方更适于出产天才，某些年份比其它年份出现的天才更多更伟大。不过我在这一方面不必太教条，因为世界上一个在其他方面荒凉无物的地区冷不丁会产生一种最优质的佳酿，而其它过去一直出产最佳收成的谷地突然且在没有明显的理由的情况下变得像澳大利亚中部沙漠那样不长作物，这类情况并不罕见。

精通葡萄种植这门高贵技艺的专家看来对一年与另一年的收成之间何以有那么大的差异有些研究。不幸的是，人类与葡萄不同，一直没有成为医学研究的课题，因而我们对人的了解远不如对葡萄园产物的了解多。在一个以普通个人为中心的世界上，由于特殊人物成为这种研究主题的机会微乎其微，因而看上去没有什么机会马上探究天才之谜。

与此同时，虽然我们自己掌握了一些资料，但它们只使问题

① 韦罗基奥（1435—1488年），意大利文艺复兴初期雕塑家、画家，多才多艺，代表作有《基督和圣托马斯》青铜群像、绘画《基督的洗礼》等。

《蒙娜丽莎》为达·芬奇的代表作之一。[illegible]
但[illegible]，《蒙娜丽莎》创造了一种神秘的特性，[illegible]
[illegible]
品一样，该画并未完工。

更复杂一些。比如，人们容易理解土地一直肥沃的尼罗河流域之类的地区注定会成为最早的文明中心之一。但像希腊这样一个岩石嶙峋、光秃秃的半岛何以突然崛起，成为一座放射出万丈光芒、至今仍在照亮我们的整个文化地貌的灯塔，依然是一未解之谜，因为世界上有许多其它多岩石的半岛，他们对人类进步的总过程没有作出任何贡献。

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为什么低地国家低平的草地成为一个高不可攀的绘画典范，而其它低平的地域，诸如丹麦，却从未能超出平庸的水平多少呢？我不知道答案何在。音乐又如何呢？帝制的维也纳无疑是一座严重受到各种检查限制的城市，当地拥有的能量必须找到被禁止涉足的政治以外的渲泄口。这样一来，音乐一直是一种理想的逃避手段。但是维也纳为什么能够在一个时期突然产生格鲁克[①]、海顿、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斯特劳斯以及其他许多音乐巨匠呢？这也依然是一个难解之谜。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其他民族受到了同样野蛮苛刻的压制，但他们的音乐创作并无显著发展。每当我讨论这一问题（一天多次），总有人告诉我维也纳之谜谜底在于这一事实，维也纳人是各种族人的大杂烩，这种混合始终盛产大的音乐才俊。很对，我答道，但答案如果在这里，那么为什么我们美国自己的拥有一百个民族的城市迄今仍未产生哪怕一位一流的作曲家呢？

更难以理喻的是，这种艺术的精神火焰一旦燃尽，无论任何人多么费力地鼓起当地热情都再也不能重燃。近来到现今意大利或希腊旅游过的人会记得（同时极为恐惧地记得）这些国家最近几百年间兴修的丑陋无比的建筑。米开朗琪罗和布拉曼特的国度

① 克里斯托夫·威·冯·格鲁克（1714—1787年），德国作曲家，曾任维也纳宫廷歌剧院指挥，倡导歌剧革新，主张音乐服从戏剧，对西方歌剧发展有很大影响，作品有歌剧《奥菲欧与欧律狄刻》、《阿尔西斯特》等。

变成了布利克街并喜爱它。到不知名的莫扎特墓朝拜的人在维也纳仍可听到音乐，但那是舶来的变种，因为维也纳本地的音乐天才随着约翰·施特劳斯而终结了。勃拉姆斯是位外国人，出生在汉堡，那里离维也纳的距离几乎与纽约一样远；马勒[1] 和布鲁克纳[2] 也是如此。人们曾作出各种努力以重现该泥泞的多瑙河畔城市作为真正的音乐中心的地位，但结果与通过挖掘通往北海的运河使布鲁日再次成为商业城市的尝试一样可悲地失败了。

这类例子还有许多。荷兰仍有人在绘画，但伦勃朗和弗美尔之类的画坛巨匠消失了；在歌德和海因利希·海涅[3] 的故土，人们现在读的是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我提到上面这些，只是因为这一主题令我着迷。我不期盼或希望找到一个答案，但这种自言自语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偶尔会沉溺于其中的一种消遣。

现在我们回过来看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早期的意大利。在但丁去世和列奥纳多诞生之间诸年，意大利半岛出现的天才几乎是难以置信的，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类型的天才，也是一种普遍类型的天才，这种天才就像在英国一家乡村旅舍吃到一顿美味佳肴那样罕见。

那是一个天佑的时代，博洛尼亚或帕多瓦或萨莱莫的某位不为人所了解的教授可能教授六七门不同学科，而且教得都相当

---

① 古斯塔夫·马勒（1860—1911年），奥地利犹太作曲家及指挥家，被认为是20世纪作曲技法的一位重要先驱，主要作品有《降E大调第八交响曲》（即《千人交响曲》）及采用德译中国诗人李白、王维等古诗作歌词的《大地之歌》等。

② 安敦·布鲁克纳（1824—1896年），奥地利作曲家和管风琴家，笃信天主教，曾在天主教堂中任管风琴师，作有大量宗教乐曲、管风琴曲及多部交响乐。

③ 海因利希·海涅（1797—1856年），德国诗人、政治家，以其爱情诗《歌集》著称，因抨击专制苛政而遭迫害，晚年瘫痪，主要作品有《时代诗歌》，长篇讽刺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等。

好。那是一个大画家被雇佣为大使并不负使节使命的时代，是作家可以身居政界显职的时代，是各国各城市统治者亲自尝试进行写作、弹奏音乐、绘画的时代，是就连教皇也不可小瞧的时代，因为他恰恰知晓好画与不好的画的区别。

进而言之，这是一个乐园，几乎所有有才能的男青年都有机会一展艺术才华。因为，虽然当时没有而今星罗棋布于各地的音乐和艺术学院，但求贤之心十分强烈，十分普遍，与今人寻找有前途的棒球或橄榄球苗子很相像。一旦有传言说在托斯卡纳或翁布里亚某一偏远的村落有一位崭露头角的画家，那么艺术探子就会迫不及待地去找他，其程度与今人追寻某位据说在得克萨斯或泽西非专业联赛中充当游击手或前卫的突出选手一样。

就连中世纪生活的怪物即社会背景这个东西也无足轻重了。合法性当然最好，但非婚生决非一个障碍因素。一切都可以用舒伯特幸福的话语来形容："他行吗?"或"这个家伙通这个吗?"如果他可以——如果他真地遍某些事——他就受到欢迎。不然就让他呆在原地，继续照看他的羊，围着其锅碗瓢盆转或继续从事复式簿记活动。

文艺复兴决不是有关人性完善主题的最新的术语。远非如此！15、16世纪的人像中世纪人一样仍对科学漠不关心。他们对那些令人严重关切、不解决它们就不能从事其他活动的社会问题不感兴趣，他们继续十分安宁地生活在一个散发出异臭的世界上。由于对哪怕最简陋的个人卫生也不感兴趣，那些身着美丽丝缎锦绣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夫人和先生们竟能容忍一个高得令我们咋舌（认为是完全不必要的人力损失）的死亡率。但那些优秀的人士，虽然在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许多事上远远落后于我们，但在其它某些方面远胜我们几筹，在这些方面我们没怎么注意，可以说是忽略。

在中世纪，宗教构成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教

会监督、管理他们自黎明到晚上上床休息所思所做的一切。文艺复兴时期宗教开始逐渐失去它昔日对人们想像力的约束，艺术正取而代之，在背弃思想世界几乎整整十个世纪后，新欧洲的男男女女由其漫长而美丽的有关来世得福的梦想中幡然醒悟，发现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同样是最令人高兴的体验。他们依然拥有在他们先辈之儿童似的人们身上非常典型的好奇心，大惊小怪地拿起他们的新玩具，并把它们变成其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就像仅仅数年之前十字架和玫瑰经在他们生活中具有的重要意义一样。

与列奥纳多同时代的佛罗伦萨人、米兰人、威尼斯人、帕多瓦人和锡耶纳人并没有因为当晚上演的碰巧是人们趋之若鹜的剧目，因为不去看演出就会碰到邻居高人一等的笑容而去上戏院。他们没有因为担心下次应邀到老板家做客时失去谈资而蜂拥到教堂去看新画揭幕。他们没有因为去剧场是件时髦的事而急切地盼望着一部新歌剧杀青，也没有因为怪里怪气的艺术家的到来能让他们上下周日的社会专栏而邀请艺术家参加他们的聚会。一些人可能这样做，但空前多的人积极参与所有这些艺术精神的表现形式，因为他们对此确实有兴趣，对此能够理解。正如现代美国城市的公民熟知他喜爱的拳击手的得分，他们能够背诵所有首屈一指的杰出作曲家的作品；正如休会碰到一群准备参加得克萨克基督徒队和南循道宗队之间一年一度的决战的职业教授对技术精益求精那样，他们能够鉴别作品的高下。

我看来不可避免地要从体育场借来一些东西进行比较。但这是免不了的，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体育取代了中世纪时期宗教的位置，取代了文艺复兴时期对艺术的爱、16世纪大发现的激情以及法国大革命开幕时对人性的爱。

但现在回过头来继续叙述事实，因为我肯定我现在已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背景知识，让你们可以理解像列奥纳多那样的经历在15世纪后半期不仅成为可能，而且被认为是非常自然的。

1472年，20岁的列奥纳多被认为熟练掌握了他学习的那门手艺，得以加入佛罗伦萨的画家行会。正如那一时代的所有其他学徒，他经常替老师作画，但即便在他那些最早的作品中，我们仍可见到伴随他终生的那一灾难性习惯——从不完全做完一件事的习惯——的证据。其原因不难猜到，列奥纳多主要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实验者。他受到一种永不知足的好奇心和追根溯源的强烈愿望的驱动，其它一切均无关紧要。一旦他感到自己循着正确的路线即将有新的发现，他就对旧的问题丧失了兴趣，转而注意新的东西；作为一位坚信自己是真正具有文艺复兴传统的人，他以整个人类领域一应事端为己任，而不是仅仅作画。他大胆地对艺术和科学的所有领域都进行研究。

我们通常以为列奥纳多是位长着一脸浓密的胡须的老人，因为他最为人所知的自画像（用红粉笔）是这副样子。他在年轻时容貌必定迥然不同。他的所有传记都说他最初之所以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仪表堂堂，因为他有着迷人的风度，另外，还因为他善解人意，在与自王后到家庭女仆的任何人交往时都落落大方。

我又一次可在16世纪和我们所在的时代之间找到一种相当有趣的相似之处。在现在，艺术家要想能支付起房租并偶或向模特提供黑麦火腿，首先必须向他潜在顾客中的女性发出呼吁。由于不再有任何明确的趣味标准（当150年前洛可可艺术完结后，最后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模式消失了），现代这些资助艺术的人极易坚持他们自己偏爱的东西必定是正确的。因为，虽然他们不知何者为优秀，他们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莫奈[1]对这种谈论曾作

---

[1] 克劳德·莫奈（1840—1926年），法国画家，印象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常在户外作画，探索光色与空气的表现效果，代表作有《睡莲》、《鲁昂大教堂》、《帆船》等。

出这样著名的答复："夫人，是的，就像奶牛一样。"

不幸得很，他们往往根本不知道自己喜爱什么，而就像雇佣一位管子工那样雇佣一位画家或作曲家，派人去叫为人大力推荐之辈，对其能力却并无亲自或第一手了解。如果是管子工，他们当然必须采取某种提防措施，因为水淹地窖可不是让人高兴的事。但一幅三流人像，只要调色均匀、镶上昂贵的画框或在当地报刊上登篇漂亮的捧场报道，却总可对付过去。由于心存羡慕的客人对肖像画优劣问题与其女东家一样无知，这一用帆布做成的废料的真正价值不怎么会为人识破，至少在画主生前不会。

在列奥纳多时代，定画的人是男子而非女性，因而艺术家不必单单为了找到各个主顾而屈尊参加社交活动。他可能像其现今后人那样乐于有免费午餐可食，但他不必在太太们的鸡尾酒会上一边饮酒，一边商谈售画事宜。

至于列奥纳多，他可以说再幸运不过了，因为他显然对世上女性这一半不感兴趣（或兴趣不大）。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男人中间，只是偶尔才为其妻作画或用女子充当他所画圣母玛丽亚的模特，但尽管如此，他仍受到足够的欢迎。一直有人雇佣他，直至生命的最后几天。我想，换在今日，他恐怕很难谋生。但是，虽然他出生在 15 世纪，他在去世时却成为一名相当富裕的人；倘若他的王公客户更能按时支付报酬，倘若他没有把他收入的相当大的部分用在自潜水艇到飞行器之没完没了的实验上，他死时本可成为一位极富裕的人。

不过请允许我回过头来再来谈谈史学家们都极为珍视的那些事实，对此多数艺术家完全漠不关心。下述文字介绍了 1472 年列奥纳多成为佛罗伦萨的一位画家师傅，至 1519 年他在巴黎附近小镇昂布瓦斯去世时的情况。

1483 年，洛伦佐·德·梅迪奇派他作为特使出使当时米兰的政治巨头卢多维科·斯福扎（他更以卢多维科·伊尔·莫罗或黑肤

色者路易之名为人所知)，洛伦佐是佛罗伦萨统治者，不仅热爱艺术，而且（极为重要）也了解艺术。这一使命的目的是赢取莫罗的好感。列奥纳多完全不辱使命，并在当地广得人心，以致当他即将回归佛罗伦萨时，那位米兰独裁者留他在自己的宫廷中又呆了其后16年的大部分时间。

在这一时期，列奥纳多创作了一些画作，但远比这要多的画，包括著名的《最后的晚餐》，都永远处在实验阶段。其余时间他在米兰大教堂创作，监管大公府第翻修工作，起草灌溉伦巴第平原和挖掘马雷姆运河的计划。在空余时间，他还筹划伊尔·莫罗世界著名的盛装游行，专为这些聚会撰写假面舞剧和寓言，外加创作了这种化装表演必不可少的大部分乐曲。

我差一点忘了，他还为城市防御工程绘制了草图，完成了一篇绘画论文，准备塑立一座高26英尺的弗朗切斯科·斯福扎大理石骑马塑像来美化米兰。很遗憾，这尊塑像未能完成，塑像原件被几位顽皮的士兵毁掉了，他们在暂时控制该城后用它作练习打靶的靶子。

除这些小玩意外，列奥纳多还抽出时间继续进行人体解剖研究，观察鸟类的飞行，建造一架飞行器（如果他有发动机，飞行器应该可以上天)，为市政府新址起草规划，招集一群醉醺醺的年迈干巴老太婆，在她们沉醉不醒之际观察其面相，在市场举办艺术讲座，教给米兰富有的年轻人骑马和跨越障碍术，与托斯卡奈利（哥伦布在其首次越洋航行中使用了他的世纪地图）一起研究数学，弹奏诗琴并为这种极其复杂的乐器作曲，并充当邻近地区政治巨头的建筑顾问和工程师，这些政治巨头应与伊尔·莫罗有相当友好的关系，这样在兴建自己的设防工事或灌溉工程时才能请到这位“全才”进行设计。

当他在米兰宫廷不太忙时，他的最著名的“插曲”之一产生在1502年，该年切萨尔·博尔吉亚延请他帮着解决意大利中部的

一些大的工程问题。人们会认为，列奥纳多当时埋首于蓝图之中，不会有时间干其它的事，但正是在次年——1503年——他开始创作扎诺比·德尔·焦孔达夫人像，这位夫人四百年来以《焦孔达》或《蒙娜丽莎》一画中的带着神秘微笑的女士广为人知。

最后，列奥纳多发现自己面临各种各样的订单，不得不保有两个备有各种装备的工作室，一个在佛罗伦萨，一个在米兰，后来他在罗马又有了一间工作室，他的旧恩主梅迪奇家族现在占居教皇宝座。

没日没夜地埋首于工作和实验的列奥纳多就这样达到了60多岁的高寿，当时人们的平均寿命不足40岁。他体格强壮，60余岁仍很健康，但新的一代人成长起来了，像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①]这样的年轻人开始据有他从前据有的显要地位。他聪明地认定退隐的时间到了，绘画和音乐不再像过去那样吸引他了，他开始越来越沉迷于科学研究之中。因而，当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向他提供王宫内一安静职位（他在那里实际上可随意行事）时，他欣然接受。这正是他所希望的体面地结束自己的一生的方式。

年轻而雄心勃勃的弗朗西斯信守诺言，他认为得到一位像列奥纳多那样的艺术家是一生最大的成就。他下令把昂布罗斯附近整个克鲁斯堡都置于这位大师的支配之下，并由国库中划出足够的资金作为这位受人尊敬的客人的收入。

列奥纳多从容地告别故国意大利，带着其工匠、陶工、铁匠随从和秘书、艺匠、仆从一起移入新居。现在，他终于可以（他这样希望）有暇把他在前40年前收集的、用只有他本人才能理解的密码记录下来的成箱成捆的笔记和科学观察结果付诸实施了。

① 拉斐尔（1483—1520年），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画家、建筑师，主要作品有梵蒂冈宫中的壁画《圣礼的辩论》、《雅典学园》、《西斯庭圣母》等。

但为时已晚，他的身体迅速失去了活力。经常为人提到的“左撇子”使我们怀疑他或者轻度中风，或者染上了作家痛性痉挛，这种奇怪的神经痛常发生在乐师、电报员、作家身上，而当它袭击腿部时，就结束了许多舞蹈者的舞蹈生涯。即便今天仍无治愈这种疾病的妙方。人们唯一可做的是学会用依然正常的那只手写作、绘画或演奏。从后来这一时期列奥纳多的绘画看，他显然不得不这样做。他不得不成为一位左撇子艺术家。

1519年春天，在受雇于法国国王两年半之后，列奥纳多感到自己在世上所余时日不多了。他的思想仍像以往一样活跃。在上一年春天，他已安排好与王位继承洗礼命名仪式相关的各种活动。秋天，他负责庆祝一位波旁亲王与一位梅迪奇公主结婚的款待活动。除这些活动外，他着手实施开凿连接卢瓦尔河和塞昂河运河的繁复的计划。他的学生们鼎力协助，以让他能从各种不必要的细节中脱身，全身心地投人主要问题之中。但当一个人度过十来个普通人的生活之后，其发动机必定迟早会显露出老化的迹象，无论采取何种措施都不可能恢复昔日的效能。

1519年复活节前夕，列奥纳多定下最后遗嘱，显露出在他身上独特的乃至成为谚语的慈善心灵。他完全预感到自己来日不多，但毫无畏惧；1519年5月一个美丽的夜晚，他平静地进人梦乡，从此再也没有醒来。

就像好好度过一个白天能欣然人睡，那么好好度过一生能够欣然长眠。

［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年—1519年5月2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画家、雕塑家、建筑师和工程师。他很早就显露出艺术才能，其一生主要分为下列各个时期：1482—1499年是其第一米兰时期，著名绘画《岩下圣母》（约1483—1490年）和《最后的晚餐》（1495—1497年）完成于这一时期；1490—

1495年开始艺术和科学写作，在绘画、建筑、机械学和人体解剖学等领域留下大量珍贵手稿；1500—1506年为另一时期，主要作品有素描《圣安娜》、壁画《安加利之战》、肖像画《蒙娜丽莎》等（这些画大都没有完工）；1506—1513年是第二米兰时期，继续画《圣安娜》与《丽达》，创作雕塑草图。65岁时他应邀到法国，1519年5月2日在法国安布瓦斯的克鲁庄园去世。达·芬奇一生中留存下来的绘画作品仅17幅，其中一些是未完工的草图，但它们受到历代艺术大师的推崇。他在科学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译者附注]

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宗匠——

伊拉斯谟

Erasmus, Desiderius

(约 1469 - 1536 年)

在我的心目中,占有最重要地位的哲人就是伊拉斯谟。这是极为自然的,因为首先,我呱呱落地的城市费勒正是他的故乡,而外在体质方面的某些相似总是使我不由自主地怀疑,在中世纪该小镇中,他和我必定有着共同的祖先。

六岁时我第一次接触到德西德里·伊拉斯谟。每天早晨八点半,我们承担各种杂役的老家人海因就板着面孔领我(倒不如说是拖着我)去学堂。因为学堂位于临河一所可怕的房子里,不太引人,而鹿特丹街道和码头上却到处都是一派迷人的景象、声音和气息。每天早晨我都恳求、哀求老海因在雕像前停留片刻,直到圣劳伦斯的钟敲响时,因为人们曾告诉我,伊拉斯谟一听到报时声音,就折上左手所持书的一页。每一天早晨老海因在经过这一迷人的地点时都会把我抓得更紧些,拉我走得更快些。他从未解释我在后来才了解的事——即这一故事中有个圈套,因为用铁而不是普通的血肉组成的伊拉斯谟是不可能听到钟响的。

这是我第一次与我的著名同乡有所接触的情形,他是一位曾

伊拉斯谟像，小汉斯·霍尔拜因作

经作出了值得在一个非常不醉心于尊崇本国名人的国度里享有一尊塑像的事儿的人——对此我在许多许多年后才觉察到。我怀疑我的大部分鹿特丹同城人对这一主题的了解会比我多得多。当他们居然想到伊拉斯谟时，他们模模糊糊地把他与宗教改革联系起来，后者在这些虔诚的人的眼中仍是一个现实存在。同时他们怀疑他与立在其雕像对面的所谓“千种恐惧住宅”有关联。在这一年代久远的建筑物中，在西班牙军队洗劫鹿特丹期间，就在新教徒纷纷遭到杀戮之时，许多男女在此找到了安全的隐身地，因为他们聪明地在门窗上涂抹上一只小观赏山羊的血。结果，菲利普国王的雇佣军注意到了这些血十字，断定房子的主人已经被“收拾”，一命呜呼了，就放过了躲在地窖和阁楼里瑟瑟发抖的可怜的人们，这些人在夜幕降临后终于得以逃生。

我记得我总是对那只小山羊深感不安，它不得不献出自己的鲜血，这样别人才可能活下去；我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即伊拉斯谟这位手持图书的铁汉子在我们争取自由的光荣斗争中与这一可怕的事件有关联。可能正是他本人切断了那只不幸的小山羊的喉管，虽然他看上去非常友善，有一个长而迷人的鼻子和一张露出笑纹的嘴，既不持剑、匕首，也不持有其他任何暴力工具。

第二次与我心目中的英雄发生关系是在约六年之后。我不知不觉地沿着这位老先生的足迹前行，在古达小城列举希腊文和拉丁文动词的词形变化（规则动词和不规则动词都有，但它们都非常使人迷惑和苦不堪言）；至于古达城，读过查尔斯·里德（化名特尔·古乌）撰写的《修道院与火炉》一书的人当更为熟悉。

这不是一个令人愉悦的经历。据认为向我们展现了古代世界的神秘和美丽的人们是相当无能的野蛮人。据认为，在背会一组语法，就某一模糊不清的句法或语法问题撰写一篇短而无味的论文以获得博士学位后，他们就可胜任自己的工作。但他们对风格或文学魅力完全没有感觉。就他们而言，荷马只不过以种种不规

范的词的配列和错误百出的重音演唱壮丽的歌谣来哄荷兰小孩。西塞罗[1]是唯一的达到他们学究式的期望标准的古代作家，这位不能振奋人心的社团律师一直被视为一个典范，我们应当尽心尽力地工作以便自己也能成为他们通常所说的“纯粹的拉丁文学者”。

天知道，早在11岁不成熟的年龄，我就已受到了成为我终生驱动力的那一情感的影响。我无法抑制地对我的同代人产生强烈的兴趣。我执拗地想弄清他们何以会那样行为做事，我以为我只要尽力了解清楚古人就能找到破解这一谜团的钥匙。为了这一目的，我试图掌握足以让我读懂古代作家著作的拉丁文和希腊文，但老师一味坚持要我背熟大量的语法，而对我不停地询问硬塞给我们的那些文献的真正含意大为憎恶。他们教学的目的，不在于让我们了解一些古代世界的真正精神，而只是让我们陷入含糊不清的变位不规则的动词中，看看我们是否知道在受到离格困扰的整个希腊文学中只出现过一次的某个单词。

上面谈到的我青年时代不当的教育给人造成的这些令人苦恼的痛苦，听起来与伊拉斯谟的那些痛苦如出一辙。阅读他在由一所学校和大学无望地转到另一所学校和大学，试图找到一位真正明智和启人心智的老师期间所撰写的信件，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唯一的不同在于：伊拉斯谟在指斥他的教授和对同代学者持冷淡态度方面比我所曾奢望的更加恶语相加。他称他们是“无知的乡巴佬”、“粗暴的家伙”、“毫无希望的笨蛋”、“低劣的农家小厮”和“缺少教养的笨拙之辈”，而我非常肯定，他们确实如此，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伊拉斯谟免于蒙受一个我们不

---

[1] 西塞罗（公元前106—43年），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和哲学家，任执政官时挫败喀提林阴谋，力图恢复共和政体，发表反对安东尼的演说，后被杀，著有《论法律》、《论国家》等。

得不默默承受的耻辱，因为当我年幼时老师总是正确的，因而提请家长注意此事没有用处。他的老师不抽烟，他们没有一手拿着语法书和记分册，一手拿着三根雪茄烟进入教室。在语法方面他们会问我们问题。在小记分册上他们会事无巨细地记下我们所有错误的回答，并在幸灾乐祸地看着我们处于无助的窘境时抽那三根雪茄烟。

我在此描绘的我在故国度过的童年岁月的情景并不令人愉快。但这几乎是小德西德里在斯特恩修道院学校上小学时生活方式的完全精确的翻版。一天，我在古达发现，离城不远仍有一个叫斯特恩的农庄，原来的修道院据说正位于此地。除原有墙壁的几段残迹外，建筑已经消失不见。另外，据我掌握的情况，还有一些伊拉斯谟时代的桌椅存留下来，它们都严重失修，破烂不堪。

我决心进行调查。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由我支配，按规定，我应用这段时间踢足球以“强身健体”。我对体育锻炼很不感兴趣，同时憎恶足球。因而我沿伊塞尔河大坝前行，感到自己很像是在进行一次探险。

这是5月初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白云高悬在天空，柳树叶在风中轻拂，鸟儿忙于衔草含泥筑巢，为它们新的一茬尖声嘶叫的后代建筑家园。一个多小时后我抵达了目的地，人们曾告诉我在那里必定能够找到一座门，上面写有斯特恩字样。

门就在那里，这是一个倾颓不堪的木栅栏的一部分。离门几百码远有一座农舍，显得破败失修，周围是一圈马厩，看上去似乎急需粉刷，所用油漆当不算小数。一位不修边幅、身着荷兰所有农业帮手常穿的用蓝劳动布做成的脏兮兮衣服的少女，正推着一辆装满新鲜的奶牛粪肥的手推车行进。看到我走来她就停了下来，放下手推车，粗声粗气地问我想干什么。我问她这是不是斯特恩，她说是，这里就是。我告诉她我听说房子里有些旧家具，

能不能让我看一看呢？

她问我为什么想看旧家具，我告诉她这里过去是一座著名的修道院，她说她从未听说过此事，有修道院是在什么时候？

“很早之前，”我答道，“在几百年之前。”

她摇了摇头，房子里没有旧家具，她也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一个修道院。她不是天主教徒，对修道院不感兴趣。那里是修士呆的地方，而她憎恨所有修士，因为对农村诚实的姑娘来说，他们不是好东西。她的祖母这样告诉她，因而肯定是正确的。

那时我尚年轻，非常腼腆，面对这种局面不知所措。我只能告诉她我很抱歉，或许我弄错了，希望她不要计较，我祝她下午愉快。她对这一淡淡的寒暄未作回复，而是重新推起手推车，继续推着粪肥朝大田方向走去。

一位男子由门里走出来大喊大叫，问她那个小男孩想干什么，她回声应道他问那里是否有某种旧家具。

房门内的男子吼叫道：“又一个傻瓜。”这显然是在说我。“下一次那些蠢货再问这里有无旧家具，我就把狗放开咬他们。”

我从不喜欢狗扑向人的情景，因而当我身后的门再次关上后我很高兴，踏上了返回古达的路程。

这一短短的个人回忆可以作为引人伊拉斯谟生平事迹的合适话题。

我不知道这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到底出生在哪一年，可能是1464年，但也可能是1465年或1467年。这一方面传至现今的唯一资料是他在自己的一封信中的一段不长的自传。他酷爱戏剧性地描述他不幸的出身，详述他非婚生地位给他后来整个一生所带来的困难艰辛。但他所知道的只是听到的东西，这显然很不充分。

关于他的父亲，我们也仅知个别细节。他的名字显然是罗杰·赫拉德，这样他的私生子就叫作赫里特·赫里特森，或赫拉

德，意为赫拉德之子。当他开始卖文为生时，根据他那一时代的惯例，他不得不把他的名字拉丁化。随后他沉溺于编造在文艺复兴时期有学问者中广为流行的那些文学谜语。他把他的荷兰名赫里特（Gerrit）与动词 geeren 或 begeeren（意为愿望）联系起来。在拉丁文中，表示"愿望"的是 desiderare，在希腊文中是 eraomai，其余的就简单了。他由 desiderare 和 eraomei 中提炼出奇怪的组合 Desiderare Erasmus，在正式场合，他把他呱呱落地、初见天日的城市名加了进去，最后，在他变得相当出名后，他被简单地称为 Erasmus Rotterdamus，或者只带一个 t 的 Roterodamus，虽然鹿特丹得名于带有两个 t 的鹿特河。

他对自己的出生地和我一样没有多少热爱之情。如果可能随意行事的话，他从不回归故里，他从未获得故乡人的任何认可，直至很晚以后，他们突然发现他的世界声誉可以转化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资财，可以用来给高贵的游客留下这些坚强的市民一直感受到的对文学和艺术的爱；他们是一群最实利主义的唯万能的银币是求的市民。

根据无可辩驳的次要证据，他的父亲曾是某种教士，但我们不知道他是何种教士，而在中世纪后半期，教士的种类不计其数。当时总的说来世俗两界严密地交织结合在一起，只有一场充分展开的革命（后来以宗教改革之名为人所知）才能把它们分开。

如果他的父亲是位属于修道会的神职人员（时常有人这样认为），那么有某些轻微的不正当的性行为是难以引起公众注意的，因为，虽然教会严格规定教士要过独身生活，但 15 世纪的许多教士都半正式地姘居。在那样一个时代，一位枢机主教（名字叫

亚历山大·博尔吉亚)[1] 以四位孩子的父亲著称，却仍当选为教皇；托钵僧修会最初曾做了许多工作以重建较纯粹形式的基督教，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蜕化成与其本意相去甚远的机构。圣方济各及其同辈改革家拥有种种高贵理想，并为此呕心沥血，力图把教会带回到年代较早、形式较简单的时代；他们的理想早就被视为完全不现实，在一个普通平民构成的世界上不可能实现而被摒弃了，这些平民只知道把面包涂上黄油，自己能吃上面包——另加少量肉肴和奶酪——即心满意足。

那些极为看重自己信仰的人反对这种现状，大声疾呼进行改革和净化，这是极为自然的事。假如他们能自主行事，那么教皇将不再是基督教世界最富有的王公，主教们将不得不吃干面包而不是靠领地的膏腴过活，乡间牧师将会把他们色迷迷地肆意盯在教区女性身上的目光收敛一些，同时教会的不计其数的食客、律师、监工、商人，甚至有犹太人，所有这些插手修道院农业产品的人，都将失去他们逐渐视为自己应得之物的那些轻而易举就可得到的贡纳。

但是所有这些迫切需要的改革直至伊拉斯谟本人已过壮年之后才出现。因而贫穷的古达（这里看来是伊拉斯谟父亲的出生地）的罗杰·赫拉德的“道德堕落”实际上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例外的只是这一非法结合的结果——德西德里·伊拉斯谟和他的哥哥彼得，对后者伊拉斯谟似乎有一种非常真挚的感情，两人在可塑性很强的童年时代受到了许多相同的磨难。

费勒是一个人们彼此都认识的荷兰小镇。在那一发展得过大

---

① 指教皇亚历山大六世（1431—1503 年），本名罗德里戈·博尔吉亚，出身于定居意大利的一西班牙贵族家庭，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腐化堕落教皇中的典型，1456 年任枢机主教，后以贿赂等手段当选教皇，在位计 11 年。推行有利于自己家族的政策，三子一女均权倾一时。

的村落中，住着一对彼此爱得很深的恋人，但由于不计其数的原因中的一个，他们不能成婚。这一理由在今人看来如同歌德的《浮士德》中的情节一样牵强，但在格伦迪太太[①]仍然得到教会完全支持的时代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随后我们看到两个尊贵的中产阶级家庭被各自的孩子做出的不名誉之事弄得苦不堪言，他们被人言可畏这一担心完全遮蔽了双眼，很快且完全彻底地忘掉了他们曾略有了解的共同的礼仪和善良。

这样下一步我们发现他们秘密地希望把两个不幸的孩子放在邻城古达的某些亲戚那里。在古达他们至少不在视线范围之内，不再成为他们鹿特丹尊贵的邻人施加白眼的一个原因。这些亲戚，不是愚笨透顶就是挥霍成性，也不会好好照管孩子。在那里他们被送进德汉特一所学堂学习，这样他们就可以掌握一定的文法能够进入某个修道院，从而可以轻易地为人忘却，不再成为羞耻、不名誉的一个永久原因。

但起作用的必定有其他影响，必定有某位叔伯舅父或姑姨可怜这两位被抛弃的无家可归者，因为我们追查到一些蛛丝马迹，表明有人作出了某些努力，让两位孩子至少受到在世界上这一遥远的边鄙之地、这一仍然远离欧洲文明中心的地区当时所能提供的扎实的教育。

在中世纪，人们习惯于说，任一特定社会中真正基督徒美德的高下与它离罗马的距离成正比。怎么可能不是这样呢？在15世纪，教皇制与300年后波兰王室的情形相同。不仅对实际当选的那个人而言，而且对他的所有亲戚朋友和跟随者而言，这都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投资。罗马人对此十分清楚且普遍认同，因而暴

---

① 格伦迪太太为英国剧作家托马斯·莫顿（1764—1838年）所作 Speed the Plough 一剧中的角色，她拘泥常规，爱管头管脚，以风化监督者自居。后人以“格伦迪太太”一词代指这类人物。

民抢劫当选为教皇、将登上圣彼得宝座的枢机主教的官第得到了认可。为什么要不允许呢？难道永恒之城的每位孩子不知道，新的当务之急现在是身处要职，通过把酬报丰厚的闲职授与自己的侄子、堂表兄弟，以及在某些臭名昭著的个案中，授给自己的孩子，以补偿自己的损失呢？

在今人听来这一切都令人难以置信，因为现今梵蒂冈的主人（即便说他现在拥有几座乡间别墅，有自己邮局和一家无线电台）过着一种与怀俄明州最遥远的村庄中的乡村教士同样节俭的生活。但在正确的大道重修之前的那些年代里，世界非常庞大，教皇职位腐败堕落至极的情况往阿尔卑斯山脉以北传播的速度不比其他消息快。因而北方蒙昧的居民继续虔诚、纯朴地笃信基督教，很久以来就在其较为世故的意大利主子眼中成为笑柄。然而，那一笑话十分谨慎地控制在永恒之城城墙内传播，因为忠诚的北方人实际上相信其救世主就诚实、慈善和贫穷主题所说的每一句话，他们是辛勤劳作的商人和艺匠，不仅愿意，而且实际上迫不及待地把其最大财力奉献在供养和维系其位于七丘之城即罗马的亲爱的神父上。纵容他们比开他们玩笑是明智得多的政策，因为他们可能突然产生怀疑并封紧他们鼓囊囊的皮钱袋。即便在他们如此偏激地宣称基督的言语比任何俗人的话都要重要，一旦两者发生冲突，他们打算站在基督而不是其尘世代表一边时，他们仍时常闭上谨慎的双眼，对此置若罔闻。

教会当局不宰杀下金蛋的鹅的愿望可能是北方基督徒得以进行许多成功的实验的原因。

在意大利，圣方济各的追随者也信奉共享所有财富的信条，他们将发现，即使在圣方济各在世时，这种信条在基督教大本营也远不能流行开来，同时甚至有被行刑者处死的危险。但在阿尔卑斯山脉之外，却有机会做许多事情，这些事情如果发生在离权威中心更近一些的地方，将会成为一件受到严重关注的事。这就

是为什么全新的半圣职人员的性质、具有可疑的共产主义烙印的组织不仅在低地国家广为流传，而且存在了近300年的原因。

这样说时，我认识到共产主义在教会机体中并不是新生事物。所有修会都以那些集体主义原则为基础，二、三世纪时这在较高贵的罗马人中引起了很大关注，当时Christian（基督徒）与communist（共产主义者）二者是相通的。但这些共享财富、共同受苦的实验相对说来是无害的，因为它们囿于隐修的高墙内一小片地域。众所周知，修士就是与世上其他人脱离关系的人。他发誓效忠。他是一位受到修会严格纪律约束的斗士，注定要听从他的顶头上司主教的支配。这一主教反过来又为他辖区内发生的一应事端向他的主管人负责，后者反过来又向教会之首教皇负责。这样一来，那些怪异的、不受欢迎的共同合作和实用基督教实验对既定的世界秩序构不成太大危害；基督教可能逐渐会受到由那些热切的但严重误入歧途的热心分子组成的小团体的挑战，后者把基督的有关富裕的年轻人进入天国的机会微乎其微的故事视为福音真理，认为是他们日常生活的指南。如果他们往前走得更远，拉特兰宫（后来是梵蒂冈）的长臂就会暗中伸到危险地点，那时就会对冒犯的机构的规则作出改变，或者对其指导委员会进行清洗。如果出现紧张状况，少数人会断头，一切都会朝着最有利于现存世界的方向恢复、好转。

然而，这些在14世纪最后20年在低地国家建立起来的新的共同生活兄弟会，将在伊拉斯谟的同代人的生活中发挥极其重大作用，在一个重要方面与普通的修会迥然相异。其成员没有发隐修誓言，因而他们依然保有私人公民身份，就其本身而言不直接受到教会法律的制约。

这些奇特的组织是由一位名叫海尔特·赫罗特的人创立的，他在世人中以赫拉德斯·马努斯一名著称。他是代芬特尔城人，该城位于低地国家东部。海尔特·赫罗特曾在巴黎大学学习，参

观过阿维尼翁教皇宫，神职前途一片光明，但他突然根本转变信仰。由于我们不知晓的原因，他背弃了尘世，在一修道院隐匿了三年。当他再度出现在人们中间时，他已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福音传道者——有史以来世上最受欢迎、最成功的福音传道者之一。

他是一位极为优秀的福音传道者。他有思想和常识，没有任何个人野心。在其隐修时期，他进行了大量艰苦的思考，现在他准备了一份计划，让普通公民过上真正基督徒生活，但依然是他所劳作、过其日常生活的社会的一员。这不仅是一个崇高的理想，而且现实可行。赫罗特的直接上司乌特勒支主教十分清楚这一点，他当即宣称这是异端。

中世纪的修辞与其音乐非常相像。它对我们不再具有吸引力，因为我们习惯的是更简单明了的东西。但当我们费力地阅读那位勇敢的加尔都西会修士赫罗特的这些布道文，我们仍然感觉到它们必定对那些既不受益于已故亲戚，也非社会上稀缺、报酬高昂的“劳工帮”成员的众多人产生的深远影响力，这些人夹在上两种人之间，因物价出人意料的飞涨而完全被毁灭，一直处在饥饿的边缘，几乎每天都可能失去其不大的农田，被抛到一个不再有自己的任何栖身之地的世界上去。

海尔特·赫罗特去世时坎普腾的托马斯① 尚是一个孩子，因而他只能从其他人那里了解到这位伟人成功的经历。不过，托马斯像赫罗特一样对尘世的成功完全不感兴趣，他给我们留下了有关那些聚会的详细描述：周围几英里的男子、妇女和孩童前来参加聚会，当其亲爱的布道师本人在某一远处的教堂露面时，他们

① 坎普腾的托马斯，生于 1379（?）年，死于 1471 年，是德意志天主教修士，在尼德兰奥古斯丁会隐修受神职，终身从事抄写手稿和辅导新修士工作，所著《效法基督》很有影响。

往往不吃不睡走上多日，以便赶到那里。一旦处在他的魔力之下，正如善良的托马斯所告诉我们的那样，他们就会追随他前往下一个布道点，这样他们就不会丢掉他以如此深刻和慰藉人心的修辞倾注到他们心灵中的一星一点的精神安慰。

自不必说，海尔特·赫罗特谴责的对象——富裕的主教、放高利贷者和当时小餐馆团体的成员（他们手指上带着环饰，脚趾上有钟状花冠）——对威胁他们自己的舒适和安全的游动聚会行为有着迥然不同的感受。不久就有流言传到罗马，说在北方某地出现了一位新的、非常危险的异端分子，这个人实际上把宗教与生命混合在一起，不仅应对他进行彻底调查，而且一旦发现他宣传与教会戒律不一致的思想就予以制止。

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宗教当局也深知这一点。赫罗特在直接指斥精神上不当行为时，极其巧妙地以教会的信条把自己装裹起来。教会古往今来一直偏爱采取一种合意的貌似有理的“路线”，而非乱糟糟的争吵和与一位得到许多人喜爱的人公开决裂。它不久就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既可把这位人们喜欢的福音传道者由当地弄走，又不引起他是否正统的争议。乌特勒支主教暗地里下了一道命令，禁止所有未经正式授权的教士在其教区范围内布道。海尔特·赫罗特上诉罗马，要求宣布这一法令作废——至少应对他特别开恩。

罗马教廷习惯于处理与永恒性有关的问题，从不急于回复信件。它知道根本不回信就是最有效用的回信。海尔特·赫罗特被允许闲着无事（但不得多言），直到他厌倦了等待，决定造访离佛兰德的滑铁卢村不远的格罗嫩代尔修道院，那里居住着一位叫扬·凡·勒伊斯布鲁克[①] 的人。你将发现，这是中世纪时期任何

---

① 勒伊斯布鲁克（1293—1381年），佛兰德奥秘神学家，著作有《爱上帝之人的国度》等，阐明他对三一论的见解，该书同时又是灵修指南。

地方都会见到的奇怪人物。

勒伊斯布鲁克是一位以佛兰德的虔诚和常识——布道与金钱混合在一起——为基础的完美的神秘论者。并非出生在1293年的任何人都置身于金钱之中，即使是像勒伊斯布鲁克这样活了近90岁的人。但是，尽管这位东方或地中海神秘论者非常易于发展成为一位索然无味的隐士，没日没夜地呆在柱子顶部或躲在洞穴中，但他的佛兰德对等人物却把《哥林多前书》第14章第40节中的一段话① 记在心中，同时即便在自己从世界上退隐时，他从不间断地坚称与他日常生活相关的一应事情都应做得得体、有序。因而，当就连像阿西西的圣方济各② 这样明智的人物也做出了自我贬低这类令人反感的行为时，低地国家几乎完全没有较令人恶心的圣徒。来自北方的思想较温和的人对此表示抗拒而不是为它们所吸引，他们从未能克服自己的憎恶心理，认为这是徒劳无益地浪费时间和精力。

修道院决非天堂，修士从修道院近邻地区的农民中征募；修道院往往被用来充当那些因体弱、懒惰或愚钝不堪而不能胜任田间劳动的人的避风港，但至少少数礼仪为人遵守。中世纪时代修会的那些残存——佛兰德和荷兰的贝格哈德男修会修士——向我们表明，除偶或一位堕落者外（我模模糊糊地记得斯希丹镇的一位圣女，她以在40多年中不洗或不更换衣服著称），不论他们多么彻底地沉溺于神秘推想之中，这些男男女女大都从未忘记他们对据认为按照上帝自己的形象创造的躯体负有某些义务。

那些北方神秘论者思想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每当看见伊格

① 这段话为："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文字据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新旧约全书》(1989年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②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1182—1226年），天主教方济各会和方济各女修会创始人，规定修士恪守"苦修"，麻衣赤足，频繁地宣传"清贫福音"。

纳修·罗耀拉[①] 的画像，我都心里打颤。他的双目和嘴透出一种残酷气息，对此我感到恐惧的程度几乎与看到阿道夫·希特勒面相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的嘲弄性轻蔑神情时一样。假如我生活在400年之前，我会像现在与元首作斗争一样义无反顾地反对罗耀拉。不要让我解释为何仅仅一张嘴或一双眼睛就令一位像我这样随和、爱好和平的人勃然产生这样一种不合理性的满腔仇恨。或许我无法告诉你缘由，这可能是因为那种构成我作为一名荷兰人出生权一部分的对个人自由压倒一切的情感。这可能是因为它让我在不知不觉中回想起一个国家在我的祖国的种种野蛮行为和严刑拷打（天知道它还在多少别的国家犯下了此类罪行），该国看上去要从把钢钉钉进困倦的公牛或狠抽一头站都站不起来、奄奄一息的驴子中获得个人满足。此外，这也可能是因为在我幼年时代，我被那些为了自己的信仰被关押、吊死、杀头、淹死或烧死的男男女女所留给人们的记忆所紧紧围住。

但我在谈论海尔特·赫罗特，不可把闲话扯得太远。这是海尔特·赫罗特造访他身处格罗恩代尔的朋友罗伊斯布鲁克后的所作所为。这是他所处社会和人极为典型的做法。他屈辱地服从主教和圣座的命令，回到了故城代芬特尔，在那里创建了一个奇怪的宗教团体，该团体后来以共同生活兄弟会一名为世人所知。

兄弟会的大本营设在赫罗特的终身好友佛罗伦修·拉代温专门捐赠的房屋中。随后他宣布，所有没有发誓过隐修生活、希望自现世退隐的人，通过移居这一共有房屋共同生活，都可以过上一种据说是基督死后前400年间基督教社会所采纳的生活方式。《福音书》的前四章是他试图组建这一由真正的基督徒组成的共同体的典范。虽然共同生活兄弟会的成员享有完全的人身自由，

① 伊格纳修·罗耀拉（1491—1556年），西班牙修士，原为军人，创立天主教耶稣会，首任该会总会长，制定会规，强调会士绝对服从会长，无条件听命于教皇。

只要自己愿意，随时可以离会去按自己从前的生活方式生活，但承诺，身为赫罗特所建组织的成员，他们应服从、慈善、谦恭、否定自我和虔诚，此外应抛弃一切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念头，并把他们在世间的所有物品及其在日后挣得的财物放到一个公共宝库中去。

在一个如此粗俗地崇尚物质的时代，这已足以构成一个惊人的出发点，但兄弟会走得更远，进行了实用民主制实验。他们遴选自己的首领、自己的主事人，这个人不一定是神职人员。然而，这并不证明他们想与天主教会脱离关系，因为共同生活兄弟会成员是教会最顺从、最效忠的子民，他们谨慎地确保在其每一个会所中至少应有两位教士和许多地位低微的神职人员。但他们希望在天国的志向和尘世需要之间谨慎地维持平衡，因为他们是从各种各样的普通人中招募来的。其中偶或有几个贵族和帮工，但他们更多地来自家道殷实的商人、艺匠和学者阶层，不时有几位贫穷的、寻求免费教育的学生。

这些善良的人以共同祈祷开始一天的生活，祈祷后每位成员都平静地从事他或她自己每日的职司，夜幕降临后很晚才回来，再次进行祈祷，吃上一顿极简单的便饭。如果他们想在仍开着商铺或办公的同时比他们现在更彻底地过上退隐生活，那么学会誊抄人的手艺或充当一位手稿插图作者，在室内进行工作，是一种选择。那些没有艺术天赋的人受训从事某些较低贱的行当，或受雇充当仆人，因为他们中的第一个人都必须参加某种实际劳动。海尔特·赫罗特已看到了行乞生活肯定无疑地会导致什么。在他的追随者中必定没有职业乞丐。共同生活兄弟会的集体活动中心必须完全自立，不然就无法存在下去。

现在我们殊难重建伊拉斯谟的这些同代人生活的氛围。至于教会，甚至对诚信者而言，它不再是现今生活的全部。但对中世纪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男男女女而言，它却是如此。他们拂晓

即起，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念祷词。其后他们匆匆去做弥撒，然后才去吃饭。他们的劳动日完全按照教堂的钟声进行。每一顿饭前都要进行简短的祈祷，求神保佑，他们每次入睡前都要再次表示对天主和宗教领袖的效忠。

但这并不是全部，甚至在他们出生之前，教会就控制了他们。为了确保他们最终得救，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能仍在母亲腹中时就举行洗礼。他们由教会主婚，因为没有一种可以使这种结合合法的世俗仪式。在他们与其尘世的家告别后，教会照管他们在世间的遗骸；它把他们交托给其先祖缘以产生的尘埃，承担着指引亡魂尽快地度过难以忍受的炼狱岁月的责任。

即便这样，教会的使命仍不算终结，教会提供了使其子民的生活变得有趣的一切东西。它赋予他们艺术、音乐、戏剧以及大部分文学。它教给他们中被认为聪明、足以掌握阅读、写作技艺的人以识文断字的能力。它控制着他们的道德规范，有时实际上承担着赋予他们一种基本的礼仪概念的任务；但由于多数教士自社会的较低阶层中招募，因而教会在这方面做得并不是非常成功。

简言之，所有生灵（野外动物除外，它们没有不死灵魂，从来就不是教会直接关心的对象）在其生命的每一刻实际上都使人联想到这一事实，即他不仅是诸如此类村落或诸如此类国家的一位公民，而且首先是广袤的超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该超国家通过神命可以对世俗凡人、芸芸众生声称为自己所有的一切——他的房子、牛马、妻子、孩子、生命与灵魂——提出要求。

否认这一权力几乎无异于否认万能的上帝本人，而这样做需要极大的勇气，我们现今时代找不到可以与此完全对等的东西。我知道，已往400年间，许多国家在与专制和压迫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大洋洲西部沿岸的少数殖民者宣布自己脱离大英帝国，成立了美利坚合众国。几十万名荷兰人成功地抵挡住了一位统治

着大半个世界的国王。100年前，意大利人摆脱了奥地利人的羁绊；500年前，瑞士人实现过同样的壮举。

然而，那些反叛者虽然毋庸置疑冒着极大风险，但他们知道自己只会受一定程度的皮肉之苦。他们可能会丧失家园、财物和动产，丧妻失子。但敌人所能施加的悲伤或痛苦最高不过是一死，它不能达到坟墓之外，而教会却拥有一种永久留置权，甚至能够影响人们身后的幸福。当时人们肯定认为有地狱存在，地狱中到处都是可怕的长着角、有着长长的黑尾巴、像猪鼻子散发出臭气熏天的蒸汽云团的魔鬼，它们都欣喜若狂地忙着把冥顽不化的犯罪者由盛着冒热泡的沥青的巨壶里捞起，再掷入盛着灼热的硫磺的同样庞大的锅中，这是一种横在人们面前的可怕的命运。

尽管面临这些可怕的威慑因素，他们仍胆敢反抗他们认为其教会中恶的东西，这就表明这些男男女女具有一种在今日世界上难以匹敌的勇气。不过，在这一恐惧和压迫的世界上，值任何人都难以完全说自己的灵魂或肉体属于自己之际，海尔特·赫罗特及其追随者着手建立了一个组织，该组织信守原始基督教的真正原则，就是对教会一种持续不断的谴责，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大约在伊拉斯谟出生之时，共同生活兄弟会运动达到了成功的顶点。非常自然，伊拉斯谟受到了它的影响，同时有确凿无疑的证据表明，这种影响在他后来所思所想的一切方面都有所体验。

有人说，在16世纪期间，低地国家人的宗教是伊拉斯谟的宗教。我倾向于回答伊拉斯谟的宗教是低地国家普通人的宗教。

此后不久，路德和加尔文都疾声呐喊，以致伊拉斯谟较温和的声音被掩盖了过去，不再为人所闻，只是偶或有人小心地倾听这种健全的理性之较纤弱的声音。幸运的是，他所说过的话没有完全为人遗忘，在世界由其现存的宗教、经济和宗教情感从狂怒中解放出来之后，人们可能会再次聆听海尔特·赫罗特的友善原

则。

我不知道伊拉斯谟是否曾写下他未来理想的表单（按照基普斯先生和所有希望有朝一日在现实世界获得成功的人的模式）文艺复兴早期的人不能像我们这样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他们对上帝而非自己更感兴趣，没有继续分析自己获救的机会，就像我们现代疑难症患者观察我们在吃早餐时食用的维生素那样。

但在极其无意识的情况下，伊拉斯谟终其一生都希冀扮演鹅毛笔绅士的角色，就像三百年后弗朗茨·李斯特[1] 试图成为键盘绅士那样。他一出世生活中就笼罩着一团乌云，作为一个私生子他不得不弥补自己从未犯过的罪孽，这一事实可能正是他的种种理想的驱动力。虽然我们的伦理学家只是偶尔才强调这一点。但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即多数在世上有所成就的人，能够作出成就的原因在于他们试图报复自己在其生活中的一段或另一段时间中受到上帝或人的对待。

拿破仑是一位穷困潦倒的科西嘉绅士贵族的儿子，他长相可笑，个子不高，在希里埃纳军校求学时一直是同学们开玩笑的对象，直到成为奥地利皇帝的女婿后才安定下来。罗伯斯庇尔有位一无用处的父亲，他长相无吸引人之处，有口臭，笨手笨脚，没有一位女士愿意多看他一眼。他直到消灭了在他年轻时耻笑他的衣冠楚楚、仪表堂堂的女士和先生们的社会后才安顿下来。阿道夫·希特勒是位五流的艺术家，极不具备吸引人的个性。他所有的老师都说他不可能有所成就，当他被迫住在维也纳的廉价旅馆、自一位乐善好施的奥地利犹太人开办的施粥所讨得一碗饭吃

[1] 李斯特（1811—1886年），匈牙利钢琴家、作曲家，首创交响诗体裁，革新钢琴演奏技巧，在和声上亦有创新，主要作品有交响诗10余首，交响曲《但丁》、《浮士德》，钢琴曲《匈牙利狂想曲》等。

时未得到人们的正确理解，但现在他正把整个世界放在火上以证明自己确实是位伟人。这样做即便说不是令别人满意，也是令他自己满意。

就这一主题我可以写一本书，将来某一天我可能着笔，书名就叫做《作为成功动力的自卑情节》。当然，这一自卑情节不只起一种作用。至于真正低贱的人，这将激起他们采取残酷、恶毒和不人道的行为。至于高尚的人，自卑情节可能导致对受苦受难者的种种慈善、友好和深深的同情感。在后一类人中，我首推伊拉斯谟。

当他年轻时，伊拉斯谟因同胞的自私自利、怀疑和盲从偏执而吃了许多苦头。他认为要让其他年轻人免受类似的罪，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是传布一种令人愉悦的福音，即宽容、克制和怜悯。就这样他成为他那时代主要的宣传家和专栏作家，把其40年活跃的岁月献给了这独一无二的目标。

当然，在此同时，他必须谋生。写书仍然是没有报酬的，一般说来，出书只会使作者比从前更穷。因而这位不幸的作者靠富裕王公和平民的善意相赠来维持日常生活。确实，伊拉斯谟的生涯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路易吉·皮兰德娄[①] 风格的题目《寻找十二位恩主的作者》来概括。从今人角度看，这是一种很失体面的谋求两种目的的方式。但伊拉斯谟（在这方面还有他的所有同时代人）却不这样认为。假如就此进行辩论，他们会这样回答：取悦某位具有高超的文化修养的王公或神甫比迎合施马茨夫人[②]及其朋友令人怀疑的口味还要不丢脸，后者“不知艺术为何物，

---

① 路易吉·皮兰德娄（1867—1936年），意大利小说家、戏剧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已故的帕斯卡尔》，剧作《六个寻找作者的剧中人》等，193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② 原文为 Mrs. Schmalz。schmalz 为一俚语，意为音乐或肥皂剧等中的夸大其事的感伤。

只知自己喜爱什么”。

伊拉斯谟天性是一个爱交际的人。然而，虽然与他自己的意愿非常不合，他还是被迫就任了圣职。这样做是因为他母亲在他们弟兄几个很小时就死于瘟疫，母亲的亲戚和遗嘱执行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脱身，免得承担令人不快的责任（这是两位没有特别的有价值财物的私生子），因而他们实际上是提着脖领把这两位可怜的幼童投进了修道院。这个修道院名叫斯泰恩，位于古达城附近。终其一生，伊拉斯谟都不会忘记这个冷酷无情、令人厌恶的地方。我曾在特尔古镇度过四年绝对说不上幸福的童年生活，对此深有同感。

但这些苦行誓约一旦发出，就具有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作用，它们使伊拉斯谟这位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不能与人类中女性那一半建立任何种类的正常友情。有证据表明，这是令他大为光火的一个原因。这不是由于他对床笫之欢感兴趣。但是，意识到自己这样一位善于辞令的人所具有的非凡力量，他乐于置身他的那个时代的正常的社交生活之中。不过，不久他就发现，他不得不穿上的奥古斯丁修会[①] 的修道服使他难于进入欢乐的聚会场所。结果，在他降生之前后 70 年的生活中，伊拉斯谟很少与我们有时很不明智地称为“较温柔的性别”的女性有个人的直接接触。

总之，伊拉斯谟在斯特恩修道院过得极不愉快，他四处寻找某位想要一个称职的拉丁文秘书的人。那样一个人在 1494 年找到了，那年他离开古达前往康布雷（在他看来是科尔特里克），

① 奥古斯丁修会，天主教内一修会名称。广义指遵循圣奥古斯丁所制订的隐修规章的各男女修会，但通常专指奥古斯丁会吏会和奥古斯丁隐修会。前者于 11 世纪首先倡导神职人员过完全的共同生活。后者是中世纪四大托钵修会之一，马丁·路德即属于该会。该会修士目前从事传教、教育和学术研究等活动。

成为该佛兰德南部城市主教的贴身秘书。

但康布雷主教是位极世俗的人，维持着他自己的一个微型宫廷。这里并不是一位寻求和平和宁静的学者的理想之地。因而这位年轻的秘书四处寻找另一份工作，当一位英国朋友向他提供机会到巴黎大学就读时，他欣然接受了。然而，他的资财微不足道，不得不列入一个学院的受救济学生之列。他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可怕的时间，几乎被饿死，衣服从不足以保暖，同时染上了触染病，这种病致使他在其余岁月里都过着悲惨生活。但他学到了自己想学的东西。他改善了自己的拉丁文风，受到了彻底的《圣经》训练，他感到，假如他想在文学领域扬名，整理许多圣书讹误充斥的文献（圣哲罗姆的《圣经》译本已问世1100多年了），是最好的方式。

然而，为了彻底担负起这一任务，伊拉斯谟首先必须学习希腊文。在此之后六年间，他一直忙于寻找一位称职的希腊文教师。

当时如此缺乏好的希腊文教师，初看起来完全令人惊奇，令人深感怪异，但这是十分自然的。究根溯源，希腊文教师是拜占庭难民，他们看见了墙上的字迹①，在通往西方的道路依然畅通时逃离君士坦丁堡。当伊拉斯谟出场时那一代自土耳其人暴力统治下逃离出来、希腊语对他们来讲是一种活生生的实用语言的人未及培养出足够数量的继承人就纷纷辞世了。因而，第一流的希腊文导师极为缺乏，寥寥几个有资格获得报酬丰厚的职位的人供不应求。富有的英国各大学能够提供比法国大学和意大利大学更

① Handwriting on the wall：直译为“墙上的字迹”。典出《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5章，指巴比伦国王伯沙撒的宫墙上出现的神秘字迹，预示巴比伦王国的分裂和灭亡。后人把该词用作“凶兆”之意。此处凶兆是指土耳其人进攻拜占庭帝国，后者摇摇欲坠。

高的薪俸。由于艺术以及学术总是倾向于追逐丰盈的饭盒而动，因而伊拉斯谟希望能够在英格兰得到他所寻觅的东西。

伊拉斯谟憎恨海洋，但除飘洋过海外别无他途。一当一位乐于施惠于人的英格兰恩主出面资助他到牛津就读，他马上穿越海峡，骑马到了英伦三岛那一名城。伊拉斯谟曾多次访问英格兰，这是第一次。逗留期间，他逐渐由一位普通学生上升为正教授，因为10来年后，这位前牛津学生应邀在剑桥任教，在那里他完成了他的在《新约》方面划时代性的工作。同时不管怎样，英格兰生活看来比他在自己国家或法国的生活还更适合他。实际上，他看来从未回归祖国，除非生了病。病经常发生，但即使那时，他仍抱怨英格兰野蛮的习俗和礼仪。

可是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这位对生活极其直言不讳、往往非常刻薄的评论家总的说来从未吃过官司。在滞留英格兰期间，他最为小心地避免自己卷入政治事务。不过，正是在这一时期粗率的哈尔国王[1]（历史上称作亨利八世）残杀他的妻子和大臣，掠夺修道院的财富（尽管教皇因其反路德宣教而授予他信仰捍卫者的称号），强取豪夺所有人的资财，唯有一贫如洗、不值得注意的臣民除外。

此时伊拉斯谟向人们表明自己不仅是大学问家，而且是位极其谨慎的人。他的在两个极端中追循安全道路的明显愿望，以及他不愿意公开出面反对教皇或路德，现在往往被引为反对他的理由，坚持走中间道路的自由主义者不仅易于遭到那些在豪华宅第中吃大鱼大肉的右翼人士的攻击，而且易于开罪在茅舍中每天吃白菜的左翼人士。他们谴责他为懦夫，指斥他缺少原则。伊拉斯

---

① 亨利八世（1491—1547年），英格兰历史上较为重要的国王，在位时间为1509—1547年。他不顾教会反对，强行与王后离婚，促使国会通过《至尊法案》，确立国王为英格兰国教教首。

谟答复这些指控说："确实如此，但我想活下去。我打算宣讲理性和相互容忍；当你们不再由于你们中任何一方都无法证实正误的理论而互相割断对方的喉管时，你们可能会来听我谈话，我将在那时向你们显示，你们可以彼此幸福相处，而不是永远把你的对手送上绞刑架或轮式绞车。"

他成功了吗？答案为是和否。总的说来，我认为他成功了，因为，虽然在路德公开否定教会的原则之后出现的激烈的战斗喧哗中他的声音很少为人听从，但世上较明智的人士对他讲的所有话语都密切注意。这是很可以肯定的——在其后四百年间，我们可以循这位精明、敏感的伊拉斯谟生活哲学的轨迹前进。我认为，现在愿意应聘阅读马丁·路德及其信仰者与敌人撰写的辩护与互相抨击的一行文字的人寥寥无几，但那位鹿特丹老学者的著作你可纯粹出于兴趣仔细阅读，花上几个小时与完全文明的人愉快相伴，该人认识到由于神学观点的不同而夺去一个人的生命，或当众把他开膛剖腹，是世间最糟糕不过的事。

如果你不信，我可举他的篇幅不长的《愚人颂》为例。他撰写该书于16世纪初，当时他正呆在其密友托马斯·莫尔爵士的家中。

在这一短篇杰作中（不足100页），伊拉斯谟做了伏尔泰几百年后在其名著《天真汉》中所做的事。他这样争辩说："既然人类坚持完全发疯——既然自教皇直至最低贱的乡村教士，自最富有的人到最悲惨的穷人，自身着绸缎的贵妇人到身穿绵布外衣的荡妇——既然整个世界一门心思地反对使用上帝赋予的头脑而坚持让它完全受自己的贪欲、自己空虚的心灵及无知的支配指引，那么少数几位真正有才智的人为何要用有理性的上帝的名义浪费如此多的时间精力，试图把人类改变成他们从不希望成为的东西呢？"

"让他们以自己的愚蠢为荣吧。"他大胆宣称。"不要剥夺给

予他们最大满足的东西——他们把自己变成蠹物的最高权力。”

这是伊拉斯谟唯一一次对教会致使欧洲陷入的无望状态进行直接抨击，教会无力从内部进行自我改革，致使欧洲陷入这种状态的还有同样无法从外部改革它的人。他在其整个余生中致力于自我设定的“一场理性革命”的任务，但他对殉难不感兴趣，因而他控制住自己不进行正面进攻，尽力腐蚀占领敌人城堡的卫兵。

在《愚人颂》一书中，整个社会的面纱被仔细剥开；愚人像一位验尸官，不露声色地站在一旁，不时发表一些评论，赞颂大众。中世纪各色人物都被搬进了书中，无人可以例外。闲荡的教士带着其伪善的嘴脸、虚夸的游说和无知的争辩，一起遭到鞭笞。就连教皇及其枢机主教、大主教，贫困潦倒的渔夫以及加利利的木匠也被列入清单，亮了好几次相。

伊拉斯谟塑造的“愚人”形象，是远比普通喜剧中的人物形象深刻。在此书及其所有著作里，伊拉斯谟宣扬了他的哲学，我们可称之为宽容哲学。

正是彼此宽容、互不侵犯的思想，坚持神圣教规的精神而不计较逗号、分号的区别，把宗教视为一种道德而非一种政府形式。这种学说在作者生前受到了多般责难，但在他身后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在其一生中，伊拉斯谟多次托庇于恩主或受雇于他人。在那一时代，没有他人资助，他这样一位修道士又能做些什么呢？然而，在他年轻时，一位女性雇主却让他倍尝人生滋味。

在装饰费勒古老的市政厅正面，至今仍在装饰市政厅（除非希特勒先生突发奇想作出改变）正面的雕像中，有一位叫作安娜·冯·博尔塞林的女人。这位夫人楚楚动人，从各方面说都是一位贵妇人。假如她不是爱上邪恶之人并嫁给他（无疑更为糟糕），

她本会侧身于历史伟人之林。她本有资格充当她那不幸同胞的庇护人（只要她仍有支付能力），但事实上后者尽管撰写一封封有说服力的请求性的书信，却从未真正取得可以称为“得到认可的地位”，直至他年事已高，享有如日中天之声名，不再在意这种或那种生活方式之时。

博尔塞林之父沃尔弗德曾是泽兰省最富有、势力最大的贵族。他是弗莱辛、费勒领主，拥有的庄园地产数几乎堪与米德尔堡的男修道院院长们相比肩，后者是整个荷兰南部最大的资本家。但沃尔弗德不善经营。为了与当时确立自己的地位的勃艮第公爵们一争高下，他一掷千金，沉溺于炫耀财富之中。当他辞世时，沃尔费德留给女儿一个精致的饰有各种必要纹章的盾牌，但决不像她认为的那样富有。

很幸运，她知道自己的处境。不到30岁时她成了寡妇，此时她决定明智行事，退隐到她在诺德贝弗兰岛上的地产上（位于费勒城对面），这样她就可以一门心思地教育孩子，在其混乱的私人财政中建立少许的秩序。

那时，低地国家远离文明中心。博尔塞林的安娜认识到，假如她想把其长子培养成一位名副其实的绅士，得以在勃艮第公爵的宫廷中取得名声，像文艺复兴时期的睿智之士那样光彩照人，她必须让他受到远在北海沿岸各小城愚钝的教师所提供的教育之上的教育。出于这种考虑，她向人打听有无可能延聘一位真正胜任的教师。她的一位好朋友推荐了一位叫作赫里特·赫里茨苏恩（在知识界开始则以德西德里·伊拉斯谟为人所知）的人，他实际上是鹿特丹本地人，但人们普遍认为他掌握了一种最典雅的拉丁文体，博学多识。

此外，这位年轻的德西德里·伊拉斯谟虽然地位卑贱，出身不明，却彬彬有礼，负有圣职。由于他刚刚获得自由，正在寻求适宜的职位，因而他无疑会乐于接受博尔塞林这样的贵族之家的

邀请。

安娜令人发出了延聘信函，并把一应事项（包括工资在内）都安排得极为妥当。这种工资，对贫穷的、一直生活拮据的伊拉斯谟而言，看上去必定像一位穷学者的祈祷得到了完善的回报。不幸，就在那里，安娜夫人爱上了一位仪表堂堂但一无用处的荷兰年轻贵族，并表现出嫁给他的意愿。

对她的许多亲戚来说，这桩婚事很不受人欢迎。出于某些原因，他们逐渐把她看作永久性的寡妇。盛怒之下，他们雇佣了那律师遍地时代的所有律师，采取措施迫害他们不幸的远亲，没完没了，毫不停顿，以致事态平息后，她和她的继承人差点全都毁灭。但当伊拉斯谟满怀希望地北上会晤呆在考特根城堡的未来的雇主时，这些不幸的发展仍未显露出来。伊拉斯谟幻想这位美貌、慷慨资助文学艺术活动的恩主不仅让他充当她的年幼的儿子的私人导师，而且还倾听他那不过分的建议，即让他拜访一下意大利的大学（当然由她出资），可以使他的服务更有价值，因为到此时他只是从巴黎和剑桥捡拾到零星半点的学问。

就这样，他愉快地攀鞍登上安娜·冯·博尔塞林好意送给他的马，在仆人的陪伴下（因为，没有人照顾他，他可能无法旅行），启程前往他的生身之地，寻求新的未来。

不久他就感到失望至极。他呈献给他的女施主的宏伟的拉丁文诗篇——在诗中他把他的安娜与女王狄多[1]之妹安娜、耶稣的祖母安娜、先知撒母耳之母安娜相比拟——完全是浪费时间、墨水、精力和羊皮纸，因为这位贵妇人看上去根本不知道那些与她同名的名人是何路神仙。与同代多数女性相比，她读写能力更高一些，但她无意于成为一位女才子。当这位大人文主义者告诉

---

① 狄多，迦太基的建国者和女王，拉丁史诗中说她坠入埃涅阿斯的情网，因埃涅阿斯与她分手而失望自杀。参见维吉尔的史诗《埃涅阿斯纪》。

她他打算把他的《阿达吉亚》献给她的次子阿道尔夫时，她仍然冷漠超然，只是问道："什么是阿达吉亚？"

这令伊拉斯谟大为震惊。他把这些《阿达吉亚》视为宏篇巨作，它们由800条希腊和拉丁谚语组成，这些谚语均是他呕心沥血汇集的，可以充当无害的小钉，在上面系上远非无害、极其辛辣的对当代事务的观察心得，这些观察使他成为我们现代的专栏作家群落的缔造者。

在他单纯的念头中，或者说作为一位被视为当代最有前途的年轻人文主义者的人，他自负地认为，在这样一部世人翘首以待（就像今人如饥似渴地盼望着让·西贝柳斯[①] 的第九交响曲问世那样）的著作的题献页上写他的次子阿道尔夫的名字，安娜·冯·博尔塞林定会感到极其荣幸。但希腊和拉丁谚语超出了安娜的知识范围，因而这种奇怪的关系在两人会面前维持在一种极不肯定、令人极为担心的状态中。会面后伊拉斯谟发现，他那富有的施主虽在名义上拥有良田万亩，但日常生活靠某些较忠实的农民的慷慨大方来维持。

因而，她不可能是伊拉斯谟终生梦寐以求的开明、慷慨的恩主，不可能是他幻想的善良的仙女，不会赠给他安特卫普或巴黎或罗马的某一著名银行的汇票，使他得以全身心投入到文学活动之中，而不必把大量精力浪费在费时、所得有限的没完没了的撰稿中，以换得衣食之需。

为伊拉斯谟作传的人对这一不幸事件大都没有认真注意。但在我看来，对一位接连遇到失望之事的人而言，这在他的生活中寓意良多。因为，正是在这一倒霉的对诺德贝弗兰的造访期间，

---

① 让·西贝柳斯（1865—1957年），芬兰著名作曲家，作品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艺术独创性，主要有交响诗《芬兰颂》、《图翁内拉的天鹅》、《塔皮奥拉》及交响序曲《卡勒利亚》等。

伊拉斯谟有了一次冒险经历。对这一经历，我们的一些同代公民熟谙在胸，他们是从其祖父那里听来的，他们的祖父是自他们的曾祖父那里听来的。由此一代一代上溯，直至15世纪末叶。

伊拉斯谟一向以重疑难症患者著称，他在书信中总在为自己的身体担忧，这在他那一方面是情有可原的。孩提时代他非常纤弱，在斯特恩修道院他一直填不饱肚子。此后，作为巴黎蒙塔古学院获得救济的学生，他患上了一种可怕的疾病，即胃溃疡，这种疾病使他在其余生一直受到折磨。

与此同时，他与多数过着沉思默想的案头工作生活的人相似，伊拉斯谟也有夸大这些与文艺复兴早期生活密不可分的不适的倾向。在写给朋友们的信件中，他总是在抱怨自己在自伦敦前往剑桥时因在小酒店潮湿的床上就寝而患上感冒或咳嗽，或者预测自己因感冒将患上什么病症，而感冒是由于自己从安特卫普前往布鲁塞尔时饮用佛兰德酸啤酒造成的，这致使他在近三周时间里萎靡不振。

在大驾光临陌生人之家时，他的通则是要确定主人不让他吃不当的饭食，不要让他在未彻底晒过的床上就寝，也不要让他在一间带有琢边的房子里看书。类似的怪癖伴随了这位老人文主义者的大半生。

同时代著名画家汉斯·霍尔拜因[①] 1523年为伊拉斯谟绘过一幅惟妙惟肖的画像。但伊拉斯谟本人对这幅画并不太满意，认为把他画得太老相，嘴部也不美，而更喜欢昆廷·马特西斯在他50岁刚出头时为他画的显得较为年轻的像。在其早年岁月，伊拉斯

---

① 汉斯·霍尔拜因（小霍尔拜因）生于1497年或1498年，是德国16世纪最重要的肖像画家和装饰艺术家之一，曾任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御前画师，代表作有木刻《死亡舞蹈》等，所创作肖像画在英国极为轰动。1543年他因患鼠疫在伦敦去世。

谟在绘画艺术方面显示出非凡的才华。但无论作为一位牧师还是杰出的拉丁文和希腊文学者，投身于一个其成员被登记人制作木鞋的匠人行会的行当，注定是不合宜的。这听起来怪异荒诞，但直到伊拉斯谟去世一个多世纪后，低地国家的画家们才获得了足够的社会尊重，最终得以组成一个自己的行会，并以使徒路加①的名字命名它。路加是位和蔼的医师，据说他把闲余时间用在绘圣母玛利亚像上。

因此伊拉斯谟丢掉了画笔，但是他对某种艺术自我表现一直怀着与过去一样强烈的兴趣，这从他在信件和手稿各处信手涂画的小玩意上可见一斑。如果有人不嫌麻烦把他们从原初文献中挑拣出来，可把它们组成一小卷书。这事如果成功，我敢肯定，我们的心理学家在精心研究这些小怪物，这些奇形怪状的无产者和侏儒般的魔鬼后，准能展现出至今从未遭到怀疑的伊拉斯谟生活哲学的某些方面。

伊拉斯谟最幸福快乐的时光是他与老友托马斯·莫尔爵士②呆在一起的那些日子。顺便说一句，英格兰是他最喜爱的国度，当然，他对那里小酒店里潮湿的床铺和各地端给他的粗劣的饭食（除个别私人住家外）抱怨不停。自此至今 400 年来，谁不这样吗？除上述两个方面外，他对这一令人愉悦的国度钟爱有加，那里的少女们习惯于亲吻经常光顾其父母之家的年龄较长的绅士。

在清教徒不幸降世之前的那些日子里，虽然统治英格兰的是一位好色的疯子③，虽然几乎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给人造成沉重

① 路加是《圣经》中的人物，相传为医生，曾随圣保罗到各地传教，为基督教的发展作出了不少贡献。《新约全书》中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为他所著。

② 托马斯·莫尔爵士，1478 年 2 月 7 日出生，英国人文主义者、作家和政治家，曾任下院议长、内阁大臣，名著《乌托邦》一书的作者，因对国王亨利八世离婚案及其宗教政策持有异议，而于 1535 年 7 月 6 日被处死。1935 年他被追谥为圣徒。

② 指亨利八世。

压力的绞台和吊架，但英格兰确实是一片乐土，那里有着真正的不受扰乱的快乐气氛，生活水平高，具有出人意料的高超思想，这显现在全国各个地区。

回过头再说伊拉斯谟。他想把自己变成鼓吹宽容的旗手，但由于他出生在一个既无报纸也无杂志的时代，他的宣传鼓动只能是极其原始的。

与所有真正的讽喻作家一样，伊拉斯谟是暗讽和隐喻术的大师。因而他出版了看上去很高雅的希腊谚语集和同样显得无害的几卷对话，但在每一本书中他都对当代事务作出简漫的评论；假如有关当局足够聪明，能够从字里行间看出其中的隐含意义，这无疑会使他与当局发生直接冲突。但正如一个世纪左右前那些奥地利警察未能从舒曼的《维也纳狂欢节》中听出遭禁的《马赛曲》的旋律一样，检查官们对这位著名教士所写的一切都予以放行，根本没有懂得那些看似清白的各种希腊常用谚语包含着炸药，一旦足够多的人掌握了这些真理片块并学会了如何使用它们进行爆炸性的活动，这些炸药是会把他们炸飞的。

即便在罗马，看来也没有人怀疑这位长鼻子、眼睛里闪着危险的火花的荷兰人，不只是一位碰巧写出优美的拉丁文体、在剔除《圣经》中多种杂质中做了极有价值工作的非常明智的奥古斯丁修会僧侣。因为，当伊拉斯谟最终劝诱一位异乎寻常地慷慨的恩主把他两个儿子托付给他，由他带着参观意大利大学，并带着他们去了圣城罗马时，他在那里获得了很大荣誉；如果他愿意接受这种荣誉的话，他本可以光临教皇宫第。这位恩主叫巴蒂斯塔·伯耶里奥，是国王亨利八世的御医。伊拉斯谟非常聪明，他宁愿自由自在，代之以去梵蒂冈，他去了威尼斯，到那里去看看著

名画家阿尔杜斯·马努修斯[1] 在其新印刷厂中在做什么，那位当代最伟大的出版商是否可能乐于接受他成为他的作者之一。

具有学识的马努修斯初出道时本极有希望成为一名著名作家，但发现同类学者在研读中受到可信、廉价文献缺乏的极大障碍，便转而充当出版印刷家，此时正出版那些以其严格校对和精美的设计享有很高声誉的图书。他非常愿意在其“书单”（用我们现在的说法）上加上伊拉斯谟的名字，并当即着手出版这位荷兰人的《阿达吉亚》，这是一部著名的希腊谚语集，另有许多有学识的阐释，在脚注中隐含着许多短小的佳言隽语。

这一威尼斯插曲很令人兴奋。艰苦劳作对伊拉斯谟算不了什么，因为他在构思撰写短语或向他人谈起他下一步的打算时感到的只是愉快。他没有任何需要自己直接操心的事。他的出版人照料他的日常所需，市政官们也不过问他，认为这样一位世界最著名的政论者和评论家逗留他们的城市，是向世人表明该城热爱学问的卓有成效的手段。当重写、重铸《阿达吉亚》工作就要宣告结束时，伊拉斯谟再次交了好运。一位新的（这一次是一位非常富裕的年轻恩主）请求允许他把自己置于伊拉斯谟的照料之下。年轻人名叫亚历山大·斯图亚特，与他老师一样也是私生子。但作为一位苏格兰国王——詹姆士四世——的非婚生子，和作为一位卑贱的荷兰教士与其同样卑微的女仆结合的多余的产物，也有着天壤之别。年轻的斯图亚特手头零花钱充足。此时他与其卓有才智的导师结伴而行，一起访问了锡耶纳大学，并从那里前往罗马。

---

① 阿尔杜斯·马努修斯（1450—1551 年），意大利印刷、出版业名流，曾创办阿尔定印刷所，刊印希腊和罗马古籍，如但丁的《神曲》及荷马、柏拉图等人的著作。

在都城罗马伊拉斯谟见到了老友芒乔伊勋爵[1]的一封信，请他回到英格兰去。踌躇再三，他接受了邀请。罗马提供给他一种比英格兰获利得多的生活，但所能给予的个人自由要少。伊拉斯谟证明自己声称的热爱自由不只是一句空话。他送别他的学生回苏格兰，随他走了一段舒适的行程，最终在剑桥落下脚来。

唉，英格兰已不再是从前的一片乐土，因为现在亨利八世开始了他的真正事业。但在欧洲大陆上事态同样糟糕，仅仅在12年后路德就将与教会决裂。宗教争执因缺乏理性的狂热而越来越激烈。不久——伊拉斯谟这样认为——争执就将由白热变得冷却下来，那时上帝帮助拒绝站在任何一边的贫穷学者。

伊拉斯谟并非没有掌有大权的朋友。他被邀请充当年轻皇帝查理五世——当时是位年仅16岁的孩子，正准备在低地国家同胞中有所作为——的太傅之一。让他充当太傅之一的请求，他认为是由他在代芬特尔上学的同班、某位来自乌特勒支的阿德里安·德德尔发出的，他在最近五年来一直是查理五世的私人导师，顺便说一下，此后不太久时间，他就将成为阿德里安六世[2]，是最后一位登上教皇宝座的外国人。

获得了这样一种要人的保护，伊拉斯谟有各种理由感到安全。不过，他对是否接受出现在他面前的任何确切的职位犹豫不决，更乐于继续过着自由作家的生活。在16世纪前半期他有望做到这一点的唯一场所，是瑞士的巴塞尔城。

巴塞尔这一小城有望位居那些捍卫个人自由的高贵城堡的前列。它4世纪时由瓦伦提安皇帝兴建，由一个小城镇迅速发展成

① 芒乔伊勋爵全名威廉·布朗特，为第四代芒乔伊男爵，死于1534年。英格兰政治家，以资助学术著称。正是他把伊拉斯谟带到了英伦三岛。

② 阿德里安六世（1459—1523年），历史上唯一的荷兰籍教皇，曾就读于卢万大学，1507年受聘为太傅，并获得重用。1517年任枢机主教，1522年选为教皇，即位后立意从整顿教廷入手整顿教会，因在位时期短促，未见有所建树。

为北欧和南欧之间的重要贸易中心，因为它正位于莱茵河不再是一条山间溪流而成为一条河流和西欧贸易主要动脉之一的地方。在它存世的前1000年，该城受到其主教的统治，但随着14世纪贸易的复兴，这些神职人员的权威大大衰落。保险箱中塞满了金钱的富有市民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不满于听任外人发号施令。他们把巴塞尔变成了新天道——那些不再想唯罗马的意志是瞻的力量——的一个堡垒。

最后，在1501年，主权城市巴塞尔加入了瑞士联盟，联盟是在欧洲腹地进行古老而奇异的实验，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世时间几乎比任何邻邦都长。一旦路德在威腾堡宫廷教堂提出挑战宣言，诚实的巴塞尔人就让其主教打铺盖卷并加入宗教改革运动。自那一时刻起，他们就准备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当时就像现在一样，一家印刷厂是进行任何革命运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当他们的一位巴伐利亚邻居和一位非常著名的出版商决定以巴塞尔为永久居留地时，巴塞尔人欣喜若狂。与图书的这一黄金时代的许多居领先地位的匠人一样，约翰·弗罗本[①]最初准备从事职业生涯，但与阿尔杜斯一样，他放弃了行文著书活动，转而从事印刷业。正是他在1516年把伊拉斯谟修订正误后的希腊文《新约全书》出版发行，该书恰巧为路德使用，当时他在瓦特堡过着自愿幽居的生活，把《圣经》译成德意志方言。

弗罗本不仅是位极其出色的印刷商，他也是第一流的商人。像艾丽斯那样，他问道："没有图片，一本书有什么用呢?"他劝说汉斯·霍尔拜因由其故土奥格斯堡迁移出来，在巴塞尔定居，他在那里可以向他提供插图作者这一永久职业。1521年，经过

① 约翰·弗罗本（1460—1527年），巴塞尔著名出版商，原籍德国巴伐利亚，印刷出版过许多学术名著，有拉丁文《圣经》，第一部希腊文《新约全书》等，推广罗马体活字，引进斜体及希腊字母铅字。

无休止的漫游后，开始感到年龄的压力（他只有55岁，但在16世纪一个人活到这个年纪已算非常年迈了）的伊拉斯谟决定在这一瑞士古城长久居住下来。同时，为了不浪费任何宝贵时间，他直接住在这位出版商的家中。除几年在邻城弗赖堡居住（这样做是出于健康考虑）外，他在巴塞尔一直呆到去世——1536年7月12日。

伊拉斯谟在这一时期所做的工作数量惊人。一个不停地受到疾病——想像中的和实际存在的——困扰的人何以能找到机会做这样多的事，对我们今人来说是一个谜。我们拥有各种节省时间的玩艺——打字机、口述记录机、复写纸、自来水笔、罗杰特的《字典》、涉及历史和科学各个领域的无穷尽的参考书——虽然如此，我们却成就甚微。但是当然，伊拉斯谟比我们享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他不必做一位社会活动家，他不必参加鸡尾酒会，他不必发表餐后演说，他不必为不知名作家的糟糕透顶的书进行吹嘘，他不必向妇女俱乐部发表演说。在晚年，他名声显赫，甚至对想来谒见他的人进行挑选。

因为世界没有忘记伊拉斯谟，他比过去更加成为公众注意的中心。每天抵达巴塞尔的信件都带来向这位有学问的博士的致意。教皇致函于他，皇帝们向他咨询，国王们也向他深深致意。作为文人共和国的无冕之王，伊拉斯谟受到了他忠诚臣民的膜拜。

这些信件中有许多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单纯。它们有一个目的，这一目的往往未加精心掩盖、并非不常见地用大胆的批评性话语表示出来。“你准备采取什么立场？”他的通信人会问，“你是一位路德分子，还是依然支持罗马教皇？”

然而，伊拉斯谟立场依然坚定，他拒绝站在任何一边。他坚持以为，真正具有智慧的人所能服务于人类大众的最佳方式是超脱于战斗之外。假如他愚蠢地卷入纷争，他可能不得不做一些后

来会令他汗颜的事情。马丁·路德博士敦促德意志王公用火和剑追杀反叛的农民——烧死他们，吊死他们，把他们切成碎片，用轮车绞刑处死他们，像对待害虫那样淹死他们及其孩子——而没有以一种令人愉悦的方式露面。可能这些希特勒式暴怒的迹象是路德性格中不可避免的方面，同时，为了使自己为其邻人了解，可能他不得不作出那种反应。但他爆发雷霆之怒为事实证明一无所用。它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它们只会导致可怕的暴力，一个世纪后，在三十年战争① 期间，暴力行动将严重影响德意志人的心态，致使条顿人从此之后就一直对欧洲的安全构成威胁。

爱好和平的伊拉斯谟是另一种类型的人，他被他周围发生的种种可怕的事情吓坏了，打算把他的晚年时光致力于一个至高无上的目标，即让他的同胞了解，单单理性学说就能免于遭受他们以惊人的速度狂奔而去的道德伦理和肉体自杀。就像一场雪崩，他的著作开始由弗罗根印刷厂倾泻而出。他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文学体裁。他与他那个时代所有最重要的人物进行不间断的书信联系。与他们讨论天堂与地狱间的一切问题，但讨论最多的是使世界免于再次爆发宗教暴力的共同努力。

人性的自由和尊严对伊拉斯谟来说比所有宗教辩论都要具有意义，这些辩论，不论是由路德的追随者还是由另一方所提出，都只有一个目的——使精神继续遭受奴役。他明确地预言，新教事业的胜利不过是以一本书的统治取代一个人——也就是说教皇——的统治，在此情况下，他感到人更为可取。人至少可以与人进行辩论，但无法与书进行辩论。因而，既然实际上一无所获，而且可能失去许多，为何要由一种体制转换成另一种呢？为什么不尝

① 三十年战争，指1618—1648年间在欧洲以德意志为主要战场的国际性战争。战争起因在于宗教、政治纷争和体制问题，要点在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与德意志诸侯争夺欧洲均势的斗争。先后卷入的还有西班牙、法国、瑞典、荷兰等。

试改革人及他们代表的体制，而是为20位小人物的出现铺平道路？这些小人物对真理各持己见，并在一个德意志小公国的规模上，各自试图去做教皇在整个文明世界规模上未能做到的事。

伊拉斯谟未能理解的是：一旦一位普通人像一匹出力过多的马那样不服管束，他就不再能听人讲理，而会径直前行，直到自己精疲力竭，或者因来自外界的暴力的压制才停下来。将来某一天，当我们对人类思想的内在运动有着比现今更多的了解时，我们可以学会应对局势，那时我们可能可以避免整个国家成为杀人狂。但这只能在我们以职业心理学家取代职业政客后才能实现。后者只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善于为自己谋划，完全不适于从事其他任何工作。这些小政客将誓死尝试避免这种改变。他们甚至将谴责对这一问题进行的严肃科学调查为意在颠覆“现存秩序”的危险的革命努力。由于就这一方面而言，16世纪上半叶非常类似于20世纪上半叶，伊拉斯谟在去世之前必定已认识到，虽然他为我们指明了应当遵循的道路，但存在着种种旨在阻止人们这样行事的强大力量。他的晚年不会非常幸福。在各个方面都出现了不安定。争吵和战斗出现了，只是由于一种妥协制度大战才免于爆发，但妥协不会令任何人满意，只是增加了普遍的猜疑和不信任感。不久就会爆发一个事件，因为一无例外，当所有人都进行武装时，大炮易于走火，第一声炮响就会导致万炮齐发，随后几乎不可避免要出现大屠杀。伊拉斯谟在那一时刻尚未到来就辞世而去，但去世时已经有了许多冲突、斗争。他，这位最爱好和平的人，必定心满意足地在这时了却一生，最后一次向这一世界道再见。

伊拉斯谟有一个安慰，在他的晚年，他至少获得了他在年轻时急切地寻求的经济安全。教皇保罗三世曾立他为他求过学的代芬特尔城一教区的名誉教长。这位写着一手优美的意大利文的教皇陛下，（难道他不是著名的历史悠久的法内斯家族的一员吗？）

希望通过其外交手腕而非暴力拯救教会，现在诉诸于那些依然效忠于其古老的母亲、其文学努力可以劝说游荡的子民回到笼子中去的所有知识分子。这位曾雇佣米开朗琪罗[①]绘制壁画装饰西斯廷教堂，资助并保护伊格纳修·罗耀拉及其新建的耶稣会的教皇，现在试图赢得伊拉斯谟的好感，办法是作为一份不折不扣的礼品赠给他3000杜卡托，这些钱是一位想出任枢机主教的人必须交纳的。

伊拉斯谟一如既往对这些动议深表感激，但一一婉拒了。他必须保持自由。在1535至1536年冬天，他一直呆在他的出版商的房子里。此后不久，他无力下床，1536年7月12日夜，他平静地闭上了双眼，长眠不醒。

就在他去世之前，他的思绪飞回到他童年时的场景。这位荷兰人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向世界赠送了像雨或爱清洁那样他的祖国典型的生活哲学，但这位从未用他在母亲膝下学语时所学的语言写过一行字的智者，突然想起年轻时熟悉的乡音。就在他呼吸停止之前，人们见到他面露笑容，这样说道："上帝乐意。"下一次他站在他"亲爱的上帝"面前，叙述他服侍他那么多年的情况。随后他可能发现自己在晚年一而再地抱怨仅仅浪费时间错了，因为他所讲的让人成为自己命运主人的话没有一句徒劳无益。

［伊拉斯谟（约1469年10月26/27日—1536年7月12日），荷兰人文主义学者，北方文艺复兴运动中的重要人物，首次编订附有拉丁文译文的希腊文版《新约全书》，著有名作《愚人颂》等。——译者附注］

---

① 米开朗琪罗（1475—1564年），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雕刻家、画家、建筑师和诗人，主要作品有雕像《大卫》、《摩西》，壁画《末日审判》，并建筑设计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圆顶等。

神游物外的空想主义大师——

托马斯·莫尔爵士

More, Thomas

(1478–1535年)

托马斯爵士生于1478年，1535年被斩首。早年，他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在此期间，他对文学研究产生了兴趣，不是因为它有什么深远的意义，而只是出于对“新学问”的热情，当时，文学的时髦犹如今天人们对于新经济学的热衷。大学毕业后，他开始从事律师工作，（你本不该跟法律沾边的，托马斯！）他的才华，很快引起了“明君”哈尔即亨利八世国王的注意。国王身边不能没有一个聪明能干的律师。

就这样，莫尔被卷进了宫廷生活，（小心点，托马斯！这种生活不会有好结果！）他被任命为宫廷大法官。（你的前任落得什么下场，我的好托马斯！你很清楚。他沦为阶下囚，刚要逃脱却还是死在刽子手的屠刀之下。小心点，托马斯！）

不久，亨利八世开始筹划他新的婚姻。他的大法官告诫他，如果不能提出更好的理由，他不能让来自阿拉贡的王后凯瑟琳离开王宫。国王从未喜欢过他的这位配偶，因为她没有能给他生下一个男性继承人（陛下，由于你的这种态度，你的妻子们注定要经受这样的困境，事实上，根本不该允许你们结婚）。此时的国

托马斯·莫尔肖像，小霍尔拜因作

工正疯狂地追求年轻貌美的安妮·博琳（可是，她并不盲从，也不易到手）。这一切，在那些认真严肃的臣下看来，都不能成为离婚的充分理由。（还是多小心吧，托马斯！你已干涉了一个个性坚决的年轻女人的婚姻计划，她发誓要杀了你！）

接着，就是对可怜的凯瑟琳的审判，她只有任人摆布。然后是安妮与亨利的秘密结婚。时间不长，安妮就有了一个女孩（小心，安妮，千万别生女孩！亨利想要男孩，你知道，他一旦想要什么，他就一定要得到）。

为避免更大的丑闻，国王必须与凯瑟琳离婚而且要尽快进行，结果是凯瑟琳很快出宫，安妮进宫。然而，好景不长，三年后，安妮同样陷入困境。她究竟有罪还是无罪，没有人知道。但当你比自己的丈夫小16岁，而他又是好色荒淫之徒，你偶尔向窗外投眸，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她与自己的兄弟过于友好的传闻当然是一派胡言。这种污秽的指控，只会产生在都铎王朝[1]那种肮脏的气氛中，那个时代，叔叔为了从皇家的餐桌上多捞点面包屑，也会判处侄子死刑。

不等这位命运多舛的女子走上法庭，（无论你如何评说这些年轻轻浮的英国女人，她们肯定知道怎样去死！）托马斯先生自己倒先丢了脑袋。

也许至今还会有人记得伊丽莎白·巴顿的案件，就像圣玛丽亚的情况一样，在法国革命末期，她对罗伯斯庇尔的堕落和死亡负有间接的责任。

不错，她的名字叫伊丽莎白·巴顿[2]，不过，不要把她和克

---

① 都铎王朝（1485—1603年），英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王朝。

② 伊丽莎白·巴顿（1506？—1534年），英格兰预言家。本为女仆，1525年左右据说神灵附身，能作预言，信者甚众。曾预言亨利八世与安妮·博琳结合不会有好下场。被捕后承认自己是伪造神的启示，终被处决。

拉拉·巴顿[①] 搞混了，后者始创了美国的红十字会，她是另一种类型的女人。伊丽莎白·巴顿是肯特郡人。这就是为什么在她最出名的时候她被称为“肯特圣女”或“肯特少女”，她的称呼使人联想到“奥尔良少女”，即圣女贞德[②]。(人们多么热衷于宫廷里所发生的一切!)

跟法国的玛丽亚一样，伊丽莎白出身极其卑微，干过各种各样的杂活，确切地说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女佣。在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管家工作期间，她病倒了，病好后，精神完全失常，耳朵里经常听到各种声音，有时还见到鬼。神情恍惚时，便预言未来，通常是大喊大叫地胡言乱语，就像法国著名的预言家犹太人诺斯特拉达穆斯[③] 的高调的四行诗节。很快，纯朴的乡民中，便有人私下传说她可能是真正的预言家，代表着上帝的声音。(顺便问一下，为什么上帝的声音说起来一律像无知的农民？为什么这些人极少会写自己的名字?) 卑微而温顺的乡民们（祝福他们的仁爱之心)，拥向坎特伯雷礼拜他们的卡姗德拉[④]。他们的行为在正直的城镇人中间引起了不满。

“无论做什么，不要出丑”，这一直是圣母教会的至理名言，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尤其是当有罪的一方是卑微的女佣，而其雇主碰巧是坎特伯雷的大主教。

接下来的节目就是伊丽莎白·巴顿进了女修道院，成了一名

① 克拉拉·巴顿（1821—1912年)，美国女慈善家，1881年创建美国红十字会，被称为“战地天使”。

② 圣女贞德（1412年1月6日—1431年5月30日)，法国历史上传奇人物，百年战争期间挺身而出，挽救了濒临失败的法军，收复了英格兰所占法国领土。后因被人出卖而为英军俘获并被烧死。1920年，天主教会追谥贞德为圣女。

③ 诺斯特拉达穆斯（1503—1566年)，法国占星家、医学家、预言家。1555年出版预言集《世纪连绵》，流传甚广。

④ 卡姗德拉，为希腊神话中人物。她是特洛伊国王之女，阿波罗神向她求爱，赋予她预言能力，后因所求不准又下令不准人信其预言。

修女。她会自此从舞台上消失吗？当然不会！她遇到了一位教会的管理人员，这个被派去调查她的案子的修道士相信了她，他的名字叫波金。他对她的“神圣使命”确信不疑。（为什么总有这样奇怪而无用的使命呢？他们为什么没有消灭癌症和消灭战争的使命呢？）很快，英国各地的朝圣者奔向坎特伯雷去参拜这位新圣徒。就像任何有知者都希望获得有关病态生理现象的第一手材料一样，大法官也对这件事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再一次注意脚下的步子，托马斯先生。关于可怜的伊丽莎白·巴顿的幻觉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她也许得的是某种宗教躁狂症。只是，根据得到的一点材料很难作出非常确切的诊断。你照样要多加小心，托马斯先生！这种案子容易变得一团糟！）

即使在修道院里，伊丽莎白也知道外面大千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一个邪恶的国王正以自己的意志反对教皇，教皇捍卫的是神圣的婚礼仪式，国王捍卫的则是他自己。“肯特圣女”打定主意，一个谦卑虔诚的教会之女，只有一件事情可做，她必须发出警告，如果让邪恶战胜正义，灾难将降临全国，如果国王一意孤行，他将不再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而必须像恶棍一样死去。国王决定严肃对待这个问题，御马（我指的是驮国王的马）奔向坎特伯雷，国王陛下亲自去找那个可怜的疯女人面谈。不用告诉她来者是谁，她认出了他，并预言，如果他坚持离婚，他必死

事情发生在1532年。不久，亨利不得不与安妮结婚，修女伊丽莎白在大喊大叫胡言乱语中确实疯了，国王却摆出一副高傲冷漠的神态。够了！够了！托马斯·克兰默[1]会仁慈地调查这件事吗？

克莱默随后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他乐意为国王效劳。只要

---

① 托马斯·克兰默（1489—1556年），英格兰国教会大主教，支持亨利八世推行宗教改革，促进英文版《圣经》的出版，主持出版《讲道集》和《公祷书》。

他做了这件事，他就要把这件事做彻底。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机会，可以借此除掉国内所有可能与这个“卑劣阴谋”有关的国王陛下的敌人。什么阴谋？谁知道？谁想知道？只是提及有反对民众爱戴的统治者的生活的阴谋，人们就会嚎叫着叫某人流血，流很多血，如果可能的话。此时此刻，人们深爱他们直率的国王哈尔，认为他是他们中的一员，因为他很快就要和一位鱼贩子的女儿同床共枕，就像娶一位皇家公主一样（甚至还要快）。因此，就让刽子手去折磨那位可恶的女巫直到她愿意承认盗走了威斯敏斯特教堂内的塔，就在泰伯恩刑场上举行一个盛大的仪式，就让群众观看所有王权之敌受绞刑，在完全咽气前砍下他们的头颅，再开膛挖心，再把尸体劈成四块，悬于城门上的铁条箱内，直至腐烂。嗬！1543 年，在狂风呼啸的 4 月的那一天，人们好梦成真！

现在让我们来核对一下这一段时间刽子手们的业绩。

公元 1534 年，伊丽莎白·巴顿等人退出舞台。

接着，无味的喜剧突然变成了庄严的悲剧。公元 1535 年托马斯·莫尔先生被控参与了反对国王新婚姻的“巴顿阴谋”（因为拒绝同意国王陛下最丑恶最可耻的几桩离婚案），而被押人伦敦塔，以谋反的罪名被斩首。

公元 1536 年来到了，国王开始对年轻的妻子实施报复。那年的 5 月 17 日，安妮·博琳所谓的情人们被处死，同月 19 日，安妮自己失去了她可爱的头颅。她的叔叔，诺福克郡公爵，宫廷的主持官，对她表示一番假慈悲之后，给国王陛下提出建议，对背叛了他的妻子，要么砍头，要么处以火刑。国王宽厚地宣称他赞成砍头，并非常慎重地派人去请加莱的刽子手穿越英吉利海峡来做这件事情。因为一朝为贵人，永远为贵人，不能允许英国人的手沾上一个与国王一起坐过皇家马车，为国王生下一个活着的女儿和两个死去的孩子的女人身上的血。

你会问为什么国王对安妮如此愤怒呢？那是因为她没能为丈夫生下一个男孩，也因为（如果法庭调查正确无误）她与情人们鬼混玷污了皇家的尊严，（更重要的是）国王那充血的双眼又盯上了一位待受恩宠的女候选人。这位女士是简·西摩，她27岁，原为侍奉阿拉贡的凯瑟琳的使女。长期的宫中生活教给她，为了万无一失，任何引起国王倾心的女人绝对要时刻（尤其在晚上）提醒她的国王：如果要得到她，必须明媒正娶。

亨利对此心领神会，在前王后被斩首的第11天，婚礼的钟声又敲响了，简·西摩当上了第三任亨利八世夫人，并占据其位直到第二年生下一子——爱德华六世，小皇子活到16岁。在骄傲地为亨利生下了一位继承人后的第12天，可怜的简死于伤寒。她在国王的妻子中，是唯一能引起国王哀思的人。我本来不必谈这些，托马斯爵士对此一无所知。他自己已于1535年7月7日被“合法”地暗杀了。他的头颅被置于伦敦桥上以警告那些企图干涉最高意志的人。根据大家的传言，他的女儿玛格丽特，一位才智极高、富有个性的女人，救出了他父亲的人头。她死后，父亲的人头与她葬在一起，她一直没有得到父亲的任何财产。这些财产被（啃！安妮·博琳，你妩媚动人，你的确是一个受恩赐的恶妇！）赐予安妮的女儿伊丽莎白（“私生女”，正如国会对她的称呼），伊丽莎白将享受这份财产直到寿终正寝。

“快乐的老英格兰”的幸福时光到此结束！

然而，尽管有这么多无耻行径，在谋杀、强奸、乱伦及各种类型的恶行的背景下，这里毕竟还有一个清洁的灵魂。在政治堕落到如此腐败的地步，以至于没有诚实的人愿意与之为伍的时候，莫尔在国家事务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并赢得了无论是在公众生活还是在私人生活方面绝对纯洁的好名声。

多年来，在切尔西的莫尔家，一直是伦敦知识分子和学者们

托马斯·莫尔想像中的乌托邦岛图

聚会的地方，在能干的第一任和第二任妻子及大女儿玛格丽特的支持下（玛格丽特嫁给了威廉·罗甫，他就是为我们写下托马斯先生第一本传记的作者），莫尔家的住宅成了英国最文明的地方。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为的是看一眼托马斯先生——一位在他半严肃的小作品《乌托邦》中对社会和政府进行辛辣讽刺的人。

这本书（1516年第一次在卢万印刷）讲述的是在“新世界”的一个小岛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莫尔描述了一位叫拉斐尔·海斯洛德的人的冒险经历，此人在去一个（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国家的五次航行中，有一次是作为阿莫里格·维斯普西的陪同。诚实的海斯洛德为他的主人（托马斯爵士）费力地描述了在快乐的乌托邦小岛上所看到的幸福生活，并与英国人的命运作了令人不快的比较：在英国穷人太穷，富人太富。他还告诉托马斯先生乌托邦人是怎样实现自己的目标的，他们规定人人都必须自食其力，每个人都有获得良好教育的机会，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必须由理应得到它的人去分享。

当代批评家指出这一切早已由柏拉图提出并研讨过。不错，在某种意义上确是如此，但是柏拉图太遥远，而托马斯以此影响了整个世界。也许，就是这一点首先吸引了伊拉斯谟。初次见面，这位《愚人颂》的作者与《乌托邦》的作者就结成了忠实的朋友，直到国王的屠刀把他们分开。

[托马斯·莫尔（1478年—1535年）英国人文主义者，出生于伦敦一法官家庭，曾在牛津大学攻读拉丁语和形式逻辑，后改学法律，1501年成为正式律师。亨利八世在位期间，他历任要职，1523年当选为下院议长，1529年成为内阁大臣。因在国王离婚案和教会政策上与国王意见不一而辞职。1534年被诬陷入狱，1535年被处死，1935年，他被追谥为圣徒。莫尔同荷兰人

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相交甚厚，一生著述甚众，包括《国王理查三世的历史》（未完成）、《致波美拉尼亚人书》、《关于异端的对话》、《驳斥廷得尔的回答》等。最有影响的作品是1516年出版的《乌托邦》，全书两卷，第一卷对欧洲尤其是英国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环境进行深刻的分析和愤怒控诉。第二卷描绘了想像中乌托邦岛上的社会状况，它一问世就产生了影响。——译者附注］

为人增添欢乐——

《巨人传》的作者拉伯雷

Rabelais, Francois

(约 1483 年 - 1553 年)

提到拉伯雷，你可能会耸起眉毛大声说道："拉伯雷！你该不会是指你要给我们带来那个曾写过关于一位巨人的可怕故事的人吧——让我想想看——他叫什么名字来着？高康大或类似的名字——很像大猿猴。请你别让他用那种充斥他全书的可怕语言来讲话。某些人可能会觉得那很有趣，可是我不认为为了追求好笑的效果就一定要使用污秽的语言，没有这个必要！"

不幸的是，这便是那位可怜的拉伯雷医生在过去 400 年中获得的大概的名声，现在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主要是一个为下流而沉湎于下流的人，他创造出巨人们、下流怪诞的人物，目的仅仅在于让他们来表现那些下流和怪诞的行为。在他的同代人眼中他可能是一个很有趣的作者，可是在当今的礼仪社会中人们无法再容忍他了。

这种严厉的谴责具有一定的正确性。高康大和庞大固埃以我们现代世界的观点看算不得礼貌之士。他们对那些在远离土地的环境中生活的人们而言是有点太粗俗了。至于泰勒默寺院，每个

拉伯雷像

人的行为都完全恪守自己喜欢的方式——不，这样的机构也不可能真正成为我们眼中的幸福之所。那些曾让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英国人笑得前仰后合的笑话（拉伯雷是16世纪后期在英国最受欢迎的大陆作家）——那些拉伯雷极为巧妙地驾驭的口头妙语——在当今那些熟悉弗洛伊德及其弟子的研究结果，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的人们当中已不再受到欢迎了。

我意识到了这一切，正如我刚才所说，我甚至苟同一二，可是不管怎样，拉伯雷仍然是我个人崇拜的文学偶像中占据显赫位置的一位。我并非是因为他的文学才能才把他置于这一荣誉的位置上的，我甚至怀疑他是否真正写出过好作品。我赞成那些认为他的作品不再有可读性的人的观点。他几乎与沃尔特·司各特或约翰·高尔斯华绥一样属于过去的年代了。

但要派一个人来追捕他，以我们当今戒备森严的社会侦探来追逐这位可怜的医生直到把他送交到地方法官的手中，这也没什么太大的必要。他对于我们年轻一代不再真正构成威胁了。年轻一代只知道他是一位写了一本关于有趣巨人的书的作者，书中的巨人们像切碎胡萝卜一样摧毁城堡，然后将它们向敌人扔去，就像扔卵石一样轻松，这与斯威夫特笔下的巨人很相似。而年纪更小者则只熟悉各种不同的空中超人和滑稽演员，与他们相比，高康大和他的密友可以称得上是具备很高道德声誉的绅士了。

那么我为什么宁愿放弃千百名其他更有可能的候选人而不惜笔墨谈论他呢？

因为一点，尽管他可能没有留给我们一本具有极高文学价值的作品，可是他在几乎同样困难的事情上做出了尝试。就像我们的朋友唐·米歇尔·德·塞万提斯一样，他坐下来，拿起笔和他的牛角墨水瓶，赋予几个纸上的人物以生命，这些人物不仅融合了人们所知道的一切语言，而且充满了生气和生活的乐趣，以致他们变得比事实上存在过的千百万人们更具有无限的真实性。

要想在这项雄心勃勃的事业上取得成功，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能力的。因为作者将自己摆在了与上帝公开竞争的位置上。正如《旧约》和《新约》所教导我们的，上帝并非由于缺少嫉妒心而受人称道，他只是在完全赞同他的人类竞争对手的努力时才会容忍这种竞争的存在。让我给你讲一个具体的例子。法国的国王亨利对今天的我们意味着什么呢？至多只不过是一个名字、一个日期，除非我们记住这位尊敬的陛下是因为传说他是美丽的普瓦蒂埃的戴安娜的情人，那个姑娘的雕像至今仍然摆放在卢浮宫中让我们看了感觉心情愉快。

而一谈起高康大或庞大固埃，我们会立即发现自己处于一块神秘的巨人土地的中心。在那块土地上，格兰古西耳国王正与他的邻居皮克罗科尔国王进行着激烈的战争。托钵修会修士约翰——他是一种什么样的修士呀！——故意而成功地推翻了所有墨守成规的教学规则，而我们在这处注视着泰勒默寺院矗立于一片神圣的辉煌中，它的高墙和纤细的角楼倒映在美丽的山地湖泊的碧波当中。

并不是说拉伯雷是唯一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的作家，我们已经提到了《堂吉诃德》的作者，然后还有与英格兰的安妮王后有关的著名事件。这位女士与其他任何一位曾经荣登皇帝宝座的人一样完全无足轻重。可是谈到安妮王后，她充其量也只不过会让普通的听众记起那些腿部修长的漂亮小桌子（并非是从这位陛下的桌子模仿而来的！）和摆放在奶奶客厅里的一些家什。可是一提到鲁滨逊·克鲁索这两个神奇的字眼，一座荒凉的小岛立即从平静的太平洋中升起；一位留着胡子、戴着高高帽子的有趣人物正在岸边的沙滩上焦虑地研究着奇怪的脚印；我们重新变得年轻，刚刚在隔壁的空地上搭起了一个小屋，我们等候着我们自己的“弗赖迪”（我们的弟弟用软木炭将脸庞涂黑后扮的）来告诉我们说他看见了一艘船正迅速地向我们的领地驶来，这意味着我

们必须准备好为保卫我们的财产而抵抗另一次海盗的进攻。

或者说，今天谁还对乔治一世或乔治二世有丝毫的兴趣呢，或者说，谁还会对沃波尔或皮特的政策感兴趣呢？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对“小人国”都是如此地熟悉，以致如果某位旅行者在新西兰的偏僻角落或在距埃里沃恩几百英里处突然发现了小人国部落最后的幸存者，我们都不会丝毫感到奇怪。那些幸存者也许正在他们的小房子里平静地生活着，吃着微型盘子里的食物，哺育着他们那些乘贝壳在不超过小澡盆大小的湖泊上航行的微小子孙。

然后——我几乎忘了他——还有但丁，他奉献给我们一个“地狱”（他自己当然也从未亲眼见过），它比我们曾经在《贝德克尔旅游指南》中读到过的有关任何真实国度的描述都更令人信服。

还有关于这一愉快话题的最后一点想法。我们在汉斯·克里斯琴·安徒生的童话故事中读到的男人、女人、狗和猫不是比我们每周日都要拜访的有血有肉的叔叔阿姨们更要真实吗？对于后者，我们除了记得莫里茨叔叔戴着假发套、埃米莉姨妈由于不断感冒而落下了红鼻头的毛病外，似乎别的就不再记得什么了。可是对于安徒生笔下战士制服上的纽扣数目谁又有疑问呢？

至于拉伯雷的生平，真的没有太多可讲。他出生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前两年。他迎着契农——法国图赖讷省的一个小城——的曙光降临人世。他的父亲要么是一位药剂师（很可能），要么是一位酒店老板（不太可能）。在他很小时他被说服进了一所圣方济各修道院，但他很快就开始怀疑那儿的异教学说，主要是由于他更喜欢学习法律而不是宗教。结果他并没有真正犯罪，不过无论如何他觉得最好还是告别他的圣方济各会友而加入本笃会。与圣方济各会相反的是，本笃会以学习知识为主，而前者主要进行布道并且对这个世界的智慧表示怀疑。

在经过5年的修道院生活后，拉伯雷开始感到他选择这一职业完全是一个错误，他永远也不会成为一名好教士。于是他试着做一名合格的世俗牧师，可是更加不成功。由于不得不维持生计，他又开始琢磨着做一名医生。于是进入蒙彼利埃大学求学，结果他最终找到了真正属于他的职业。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便被允许做关于伽伦和希波克拉底的报告，那两位医学圣人的著作（分别完成于一千二百和一千九百年前）是当代的医生们用来做出诊断和临床应用的绝对权威。

在意大利的某些地方几名有勇气的外科医生得出了这样大胆的结论，即医生要了解病人的一切就应当亲自观察和研究病人。可是由于教堂仍然固执地反对解剖人类的尸体，解剖学仍然处于婴幼儿时期。当一名医生走到病人的床前时，他从厚厚的伽伦或希波克拉底著作中寻找对应的症状，然后按照那些古代名士有些过时的处方给病人开药。从病人角度来讲——他往往会死去——这种治疗体系很不令人满意，但是这可以使医生避免在绞刑柱上被烧死，所以医生们自然愿意对最糟糕的状况置之不理。

1532年，拉伯雷离开了蒙波利埃，掌握了当时那种没完没了地应用药片和催泻剂的时代可能学到的医学知识。之后他在里昂定居下来，他在该市医院里被任命为实习医师，并被允许进行在当时被看作具有革命性的大胆尝试。他获得允许以人体作示范进行解剖学讲座。

拉伯雷从在里昂做实习医师时开始从事我们今天所谓的写作。正是从这些最初的尝试中诞生了高康大、庞大固埃和他们善良快活的同伴组成的巨人世界。他只在业余才从事写作——至少他这么说——可是很快得知他的文学野心的城市长者们有理由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感到一点儿也不高兴。他们认为让他们感到自豪的医院理应是医治患者之地，他们不能允许他在沉思遐想中在乡村中到处闲逛。这可是一件严肃的事，因为这位著名的拉伯

雷医生一反常规，养成了不辞而别的习惯。每当他厌倦了他的工人，他就会离开两至三周的时间，而当他再度出现时，往往是刚刚完成了另外几章内容，现在又准备好再经受一点医院的苦役了。

按常规来讲16世纪的医生并不富有，起初长官大人们常常感到狐疑，他们的医生在那些自许的假期中去哪儿呢？作为一名年青人他已赢得了当时颇有权势的家庭——迪贝莱家的好感。当迪贝莱家的一子当上了红衣主教时，拉伯雷还陪他去过几次罗马。这种受到高层人士恩宠的象征使他在里昂的长官们中间享有着良好的社会地位。因此他们没像对待其他普通医生那样对他施以罚款或草率地解雇他，相反，他们仅仅委任了一名替补医生，在他们正规的内科住院医师旷工时由这位替补医生代他出诊。从他们的实习医生的角度来讲，这几乎是最理想的安排，无疑这也让病人得到了最大的益处。

随着时间的推移，拉伯雷的手稿已堆积了庞大的一堆，它开始引起了宫廷和巴黎大学神学院的注意。巴黎大学神学院（一直忠实于自己做为反对思想冰库的名声）公开谴责他的书，并命令公众刽子手焚毁那些书，由此显示它对这一奇怪的医学教士的兴趣。这是向王宫发出的一个信号。当时以和蔼可亲、颇有成就的弗朗西斯一世为首的宫廷人士为表现他们对这位医生作品的欣赏而公开阅读它们，大声地发笑，并且向陛下最忠实的巴黎大学的神学家们发出了一种明白无误的暗示：请不要多管闲事，就让国王陛下最喜爱的作家继续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写下去好了。

国王为了进一步表示他的赞同，于1550年为拉伯雷医生取得了双份俸禄，这使得这位知名的作家可以全身心投入到他的文学创作中了，因为现在众所周知他既不在莫顿也不在圣克里斯托夫·德詹贝供职。他很满足于装好自己俸禄后快乐地生活，为什么不呢？当时的风俗便是那样，没有人会为那么一点贿赂而生气

的。

三年后，尊敬的牧师大人弗朗索瓦·拉伯雷去世了，我的故事也到此为止。就这些，没有别的什么了。但正如我们几位其他客人的情形一样，他们所成就的事业比他们本人更重要，就拉伯雷而言，他的书就是他的成就，或者更准确地说，书的主人公，那位神秘的巨人高康大就是他的成就。

那个名字并非是拉伯雷的杜撰。高康大这个名字在拉伯雷出生前就已存在了几百年，一直很受人欢迎。他的生涯从中世纪的保罗·班扬开始，可是他一直没有引起广大公众太大的注意，直到拉伯雷抓住了他，让他在他著名的讽刺作品中扮演了主角。据我所知，高康大尚未被拍进电影，依靠从好莱坞学识渊博的教员那里得到大多数文学和历史信息的年青一代可能对他的历险故事一无所知，因此，我在这里向你们概略介绍一下高康大的一生不会太不合适。

在第一卷中，一对巨人夫妇产下了一个巨大的婴儿，为庆贺他的诞生举办了一次庞大的宴席，席间消耗掉了大量食物和饮料。之后主人公开始上学了，这给了拉伯雷一次阐述他对当代教育方式的看法的机会。这位知名的医生丝毫不喜欢那些教师们的制度（那些人至今仍然控制着所有的教育机构），正如我50年前在家乡受教育时的那种感觉一样。他以极端的荒谬对此进行揭示。他首先描述了那种制度是什么样子，然后发问，在可以将孩子们放到对他们自身会更有利的文艺百花园中的时候（人文主义者已又一次使得这些文艺百花园向广大公众开放，而年轻一代却仍然由于各种神学院的禁令而被拒之门外），为什么非要迫使他们在乏味的知识化石林中度过漫长的岁月呢？

对教育领域进行关注之后，这位好医生又研究了世界各地都在从事的战争并认为它们毫无意义，他借助托钵修会修士约翰之口叙述了高康大的父亲和他的邻居皮克罗科尔国王之间的冲突，

他们相互讨伐，丧失了几十万人的性命，可是结果却是一切依然如故。

这次冲突以几乎什么问题都未解决的和平方式告终。高康大决定寻求一种将把他引入社会服务领域的迂回路线。很遗憾地说，他所选择的用来改善其同胞并使他们意识到相互责任的方法并不适合我们今天的模式。当然，建造一处宗教隐退地的想法并没有多大的新意。修道院已经存在了1200多年了。但是以高康大为创始人的泰勒默大寺院确实是一所独特的机构。因为在其它类似的机构中，你将在忏悔中度过一生，承担一些完全不合意的任务，而泰勒默寺院的规矩则坚持让你喜欢怎么干就怎么干。

在进行那种安排时，拉伯雷表现出了对人类真正品性缺乏理解的可悲的一面。我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有什么比终日不得不做我想做的事更为可怕的事了。但我想我理解那位好医生的大脑中真正的想法。拉伯雷生活在一个性情压抑的时代。作为一名医生，他意识到太多的道德束缚会给普通的正常人带来什么。因此他那坚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教堂实际上向16世纪那些终日生活在重负之下而急需几个月解脱一下的人们提供了一种有益于他们身心的疗养院。我们现代的精神病医生可以对此做一番研究。建于许多偏僻地区心脏地带的泰勒默寺院可以将几十万可怜的妇女从她们无法避免的命运中挽救出来，因此它成了纳税人心中的天赐之物，他们非自愿地向国家提供贡献的四分之一落到了那些掌管疯人院的专家的口袋中。

有关高康大的编年记事还有很多，但作这些摘要就可以了。它们可以向你们说明拉伯雷逃遁至幻想世界与但丁先生的逃避行为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但丁也构造了一个虚幻的世界，目的是向我们展示他对那个世界中人物的思考。但丁所要达到的目标很简单，每一个人都可以理解。他想了结与那些曾阻挠他实现政治

抱负的人的个人恩怨。可是直到今天，在历经四百多年的仔细研究之后，拉伯雷医生的朋友们仍然无法确定当他送他的主人公踏上那奇怪地旅程并创造出了一个庞大固埃的世界时，他究竟是想证明什么呢？

这正是我们一直想知道的，可一直没能找到十分肯定的答案，以将我们的好医生划归某一单独的程式。

韦伯斯特对庞大固埃主义的解释是"庞大固埃理论或行为，具有讽刺性或其它严肃目的插科打诨或粗野幽默"。假如我们不考虑"粗野幽默"这一理解，你和我，亲爱的弗里茨，都属于一个深深植根于中世纪的种族，这种所谓的粗野仍然构成我们本性的一部分。我们总是小心翼翼地在陌生人面前回避这种粗野，因为他们会不理解而且会很尴尬。但当我们与来自泽兰、荷兰或佛兰德省纯朴的人们单独在一起时，我们不仅可以非常非常拉伯雷式（是盎格鲁萨克逊意义上的），而且我们会发现自己在令四百年前的人们感到愉快的那些谑语、怪话、笑话、滑稽、怪癖、怪举、妙语组成的奇怪氛围中感到彻底的放松。对他们来讲，那种受到大肆谴责的拉伯雷式粗野一点儿也不过时，它充分发展了那种完全自然的文学功效。拉伯雷正是希望能以这种方式来让人们对他所要讲述的事情发生兴趣的。

事实上，从国王开始，那个年代的几乎每一位法国人都可以从他那本《宏伟而弥足珍贵的大事年表》中获得真正的乐趣。这本身就证明了作者选择这种特别的表现方式是正确的。

现在最后说一句，在我们这个人人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对同胞负有的社会义务的时代，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拉伯雷是否在书中暗含着某种我们今天所谓的"寓意"呢？我对此表示怀疑。我没有发现有什么可以证明他曾把自己看成一名改革家的，我可以肯定他一定会讨厌别人把他列为当代激进分子之列的。但尽管他装作他写作只为自我娱乐，他一定知道他的书比表面上看来含

义要深得多。

拉伯雷是个聪明人，并且很显然也是一个热心人。他生活在一个迷信而无知的世界中，在那里，人们不断地犯下最不可饶恕的残酷罪行，而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无疑，在前一个世纪，在上层阶级——那些花得起为发展优雅的生活方式而必需的那份悠闲的人们当中发生了一次启蒙运动。可是生活在底层的大众却一如既往地野蛮凶残，无可救药。他们依然如同他们豢养的牲畜一样过着肮脏邋遢的生活。他们从来就没能得到足够的食物，也不能相互犯下无法无天的可恶罪行，因为他们担心会因此而入地狱，而地狱在当时是教堂用以设法保持它在某些相当初级却非常必要的礼仪准则范围里的支配地位——至少部分时间里是这样——的手段。

拉伯雷想以一种大家都会理解他的方式来描述世界，于是他选择了这种创造一个荒诞的巨人世界的方式。伊拉斯谟（拉伯雷尊称他为师长）作为另一种人，在他的《愚人颂》中创造出了一些跳着欢快的捷格舞的小木偶。而托马斯·莫尔为了向同胞展示他对当前社会状况的看法，创作出了《乌托邦》，他在其中描述了他梦想中的属于所有善良的人们的最理想的极乐之国。塞万提斯则创造出了一个鲜活荒谬的爵士形象，他让他试图说服他的西班牙同胞都来自我鉴定一番并修正错误，从而不再让其余的世人抓住笑柄。我已经提到了斯威夫特教长和他的“小人”、“巨人”们，他通过他们来让自满的乔治王朝人意识到他们的缺点和短处。又过一百年后，塞缪尔·勃特勒[①] 从他在新西兰牧羊的灾难性探险中返回了家园，并带回了关于《埃瑞洪》——“不存在的

① 塞缪尔·勃特勒（1835—1902年），英国作家，攻击基督教教义，反对正统达尔文主义，主要作品有乌托邦游记小说《埃瑞洪》、《重游埃瑞洪》和死后出版的自传体小说《众生之路》。

国家”的消息，在那块土地上人们将一切治理得井井有条，以致于它可以为其他一切国家树立榜样，成为“无所不在之国”。

拉伯雷作为一名16世纪上半叶的法国人很自然地会利用那种他知道最适合他的读者的文学形式。毫无疑问，由于一直坚持到底，他最终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他那个时代最出色的社会代表。他装作过分地渴望生命，因为他从内心深处讨厌那个从每一个角落向他微笑的死亡形象。他扮演小丑，因为那样他可以藏起那真正存在于他敏感本性深处的无望的悲哀感。他扮演傻子，因为他知道那是唯一可以让他的邻居至少部分地接受他的智慧的方式。总而言之，为了达到他的最终目的，拉伯雷情愿让自己受到粗俗方面的谴责，而以此掩盖他对同胞深深的、永远的爱。

无论怎样，拉伯雷为世界各地的人们添加了无穷的欢乐，而且在为人类增加欢乐方面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可以媲美。他的作品有其严肃的一面，为实现宽容而呐喊。拉伯雷的著作嘲讽了对16世纪前半叶宗教恐怖统治负有责任的人。

拉伯雷是一名受过严格训练的神学家，他力避正面发表会给他带来麻烦的言论，但他的敌人并没有放过他。巴黎索邦神学院严辞痛斥他的作品，他的所有著作都被列入教廷禁书目录。但不管刽子手多么猖獗，《巨人传》一直深受大众欢迎。四个多世纪以来，它一直启迪着那些能在善意的笑声和戏谑的机智巧妙结合中获得欢乐的人。

准确衡量这样一个人的正面影响并不是件太容易的事。有人说他对社会具有破坏作用，或许如此。但他进行侵蚀破坏的那个时代恰恰需要由伊拉斯谟和拉伯雷这样的人率领一支侵蚀社会的队伍。

至于取代旧建筑的新建筑会与旧的一模一样——一样丑陋和不舒适，这是谁也预料不到的事。再说，那是后几代人的事。他们才是应受指斥的人。

[拉伯雷（约 1483 年—1553 年），法国作家，初习法律，约于 1521 年受神职，后学医，1523 年任里昂天主教医院医师。这两种职业使他有机会接触并熟练掌握希腊语和拉丁语。他主要以其《巨人传》为人所知。拉伯雷的作品对后世作家如伏尔泰、巴尔扎克、夏多勃里昂等人有巨大影响。——译者附注]

我到底知道什么——

米歇尔·德·蒙田

Montaigne, Michel Eyquem de

(1533 – 1592 年)

无论我走到哪里，米歇尔·德·蒙田的《随笔集》总是陪伴在我身边。并不是因为我要像我们的祖先拜读《圣经·旧约》那样早晚必须阅读它。我不必面对 16 世纪的荷兰船长遇到的困难——他打算去征服一个比他的祖国大 50 倍的热带王国，而却只能依靠几十万名曾是罪犯的士兵凭借火枪和刀剑来抗击土著人。我的苦难与此不同，当整个世界似乎都出了故障时（如今这种情况发生得越来越频繁），将老蒙田放在床边，在遁入梦境之前与他进行半个小时的交流，这样还是让人颇感安慰的。

我的一生非常幸运，因为我遇到了几位性情平和、令人愉快的朋友，他们可以让你彻底摆脱自我，让你忘掉当天所有苦恼。可是能够发挥这种作用的书简直是凤毛麟角。我曾试着把这样的书名都列出来，结果我只想出了六七个可以配得上那一殊荣的名字。可是想想，自从老约翰·古斯弗莱上即人们通称的谷登堡[①] 在贫

① 谷登堡，全名约翰·根斯弗西赖希·祖尔·拉登，生于 1398 年，死于 1468 年，德国金匠，在西方首次使用活字印刷术，包括铸字盒、冲压字模、浇铸铜合金活字、印刷以及印刷油墨，排行过《42 行圣经》等书。

穷中默默无闻地死去，已经出版过的书已有千百万了！

现在蒙田是唯一从不让我失望的人，因此我尊敬他，崇拜他。我不得不承认，有时我会漏过他的几句经典引文，因为我的拉丁语和希腊语学得非常糟糕，即使在苦读了七年的荷马和维吉尔的作品后它们对我来说仍然像画谜一样难解，而我只有碰运气的份，缺乏真正的理解。

蒙田似乎从吮吸母亲的乳汁时起便一道吸收了那两部经典之作的营养。他引用荷马和奥维德的作品就像我引用歌德或冯德尔[①]的一样信手拈来。从法语跳到罗马人或雅典人的语言，然后再回到母语法语，这对他来讲根本不算什么。而对我来讲，他非常巧妙地引用的那些普鲁塔克和西塞罗佳句，意味着要在大脑中努力搜索一番那些已忘却过半的词语和已完全忘记的语法规则。因此，我通常尽可能快地略过这位法国人放任自己嗜好的那些书页。可是这常常会构成快速阅读者的陷阱（正如每一位诚实的书评作者会承认的那样），内容的大部分留在那里，就像一条庞大的山地溪流穿过一片充满无穷魅力的美丽土地向大海奔流而去。就让我在这条大河的岸边呆上半个小时，我和整个世界便会一切安然无恙。因此，我在此时此地对米歇尔·德·蒙田的记忆力表示无比敬意，并且心怀感激地称自己为他最卑微的学生。

我的好老师出生在1533年2月，因此他是那些冬天出生的、在世界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婴儿中的一个，因为这些生于冬天的婴儿的母亲怀胎于春天——自造物之初便成为各种哺乳动物（包括人类）自然交配的季节。

蒙田姓艾科姆，可是自从该家族在法国南部获得了离波尔多

① 约斯特·范·登·冯德尔（1587—1679），荷兰诗人和戏剧作家，出身寒微，主要靠自学成才，代表作有《逾越节》、《阿姆斯特尔的海斯雷布赫特》、《晨星》、《流放中的亚当》、《诺亚》等。

城不远的蒙田城堡后，他们便放弃了那个姓氏。米歇尔的父亲，皮埃尔·艾科姆·德·蒙田曾从业于贸易，他的祖父也是。那些不喜欢米歇尔的人（他如今显得太聪明了，不会没有一些特定的敌人的）常常暗示说他家之所以改换姓名，是因为他们想使大众忘记这个如今十分显赫的家庭那十分荣耀的早期阶段。这一指责有点道理。一个相当不错的家族想返回铠撒时代和垂佩盾形纹章的愿望是很正常的，与那些随便挥霍钱财的富人选择愚蠢方式相比，这也是一种相当无害的嗜好。但是既然蒙田，甚至在他的［］中，没有显示出智力方面和政治方面的任何劣利，那么我们可以把这种流言视为他那不怎么开明的邻人的妒忌。

今天，他们也许会从另一略有不同的角度来攻击他。他们会在对他的母亲的祖先进行一番探究之后互相会意地举望，然后说："明白了吧？我们正是这样对你们说的！"因为她的母亲是地地道道的犹太血统，那么这自然可以说明她的儿子为什么那么聪明，为什么比百分之百纯法国血统的普通人更加世界主义。

这听起来似乎很熟悉，不是么？这的确听起来让人痛心地熟悉。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恐怕能做的不多，直到我们改变整个教育体制，直到我们能够根治我们的下一代的那种认定存在着一个上帝选定的民族的信仰顽症，当然那种信仰一如超种族说一样荒唐。

是的，蒙田的母亲无疑是犹太人。她属于那个多个世纪以来一直在西班牙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的强大的洛佩斯家族。在狂热宗教徒费迪南和伊莎贝拉统治时期，洛佩斯家族被迫接受了洗礼。溅在他们前额的几滴圣水可能在信仰方面对他们产生了奇迹般的作用。可是它们无法熄灭一直在这个不同寻常的家庭中熊熊燃烧的天才火焰。如果一定要把蒙田看成是混种联姻的典型产物，那么我只能遗憾地说我的父母和我所有的祖先都只有一半的荷兰血统。

蒙田的父亲似乎也是一位具有非凡才能和脾气古怪的人，是他的智慧和常识才使他没发展成一个怪人，他的教育理论十分新颖独特。米歇尔成为他的继承人以后——因为他的两个哥哥都相继夭折了——他的父亲决心给予他唯一幸存的儿子一次成才的机会。由于他认为与大地直接接触对每一个孩子的身体健康至关重要，所以老蒙田把襁褓中的米歇尔送给了附近村庄的一位农民妇女抚养，并且坚持要求把他的孩子同那些他未来侍从的孩子们绝对平等地对待。在经历了简朴生活的磨练之后，小米歇尔被带回了父亲的城堡。可是在这里侍候他的仆人们只讲拉丁语，（鬼知道蒙田爸爸是哪儿找到他们的！）而每天早晨他都被美妙的音乐声唤醒。

这些都大大促进了这个孩子智力的发展，在他仅仅 6 岁时，米歇尔就可以去公共学校读书了，在欧洲这种学校总是指私立的——目的是与教会学校区别开。13 岁时米歇尔从私立学校进入了大学课堂，他在大学学习法律，21 岁时他已是一名波尔多市府成员了。

只有具有独立收入和相当程度政治关系的年轻绅士，才有可能事业如此有成。同样，这些幸运的条件也使米歇尔得以能够常常光顾巴黎的王宫，这也说明了他为什么会到王家军队中服役。否则的话，有关我们客人前 30 年的生活就没什么可谈的了。

蒙田是个很有教养的年轻人（在当时的法国这种人很多），他出席各种社交集会（像千万其他礼貌的法国年轻人当时所做的那样）。但当他吃过了所有该吃的晚宴（尽管还比较有节制），喝光了所有该喝的酒，（也比较节制！）与所有可以与之上床的迷人女郎做过爱之后（很遗憾，这次可不是那么有节制了），他还做了当时其他礼貌的法国年轻人从未想过要做的事。他不仅承认现在的生活方式对他已极大地失去了吸引力，那只是一种无益的能量浪费，而且他还宣称他打算在一生的剩余时光中从事某项有用

的事业，从而使自己不仅仅满足于政治闲职和对自己地产的管理。

蒙田派给自己的有用任务就是要写一本书，一本描述了人类有史以来，一个第一次以“绝对的诚实”讲述自我和自我对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事的反应的人的书。再让我重复一下——以“绝对的诚实”。

蒙田于1577年开始创作他的《随笔集》，他一直到死（1592年）都在为这一著作而忙碌着，他仍然偶尔进行一点旅行，大多数时候都是为了他的健康或为了某一官方使命。他在生命的最后15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快乐而满足地栖居于他那著名的砖塔里，每当他不得不离开他的一方静土时，他都会竖起指头算计着还差几天就又可以回到那个可以成其为他自己的地方了，那个他可以将全部时间投入到描写真实的米歇尔·德·蒙田，而不是他留给朋友和邻居印象中的那个蒙田的地方。

其他许多人曾试图步他的后尘，可是没有一个人像这位法国鲱鱼商的儿子，一个受了洗礼的西班牙犹太人那样获得过如此辉煌的成功。

蒙田在他的前半生与一个人保持着伟大的友谊，他挚爱的这位伙伴的名字是埃蒂安纳·德拉波第。很可能是德拉波第的死深深地触动了他，使他下决心从一切世俗事务中退出来。

这一推测（虽然我没有十分确凿的证据）可以从以下这一事实得到证明：即在开始撰写他的自传以前，（因为那些随笔除了被称作一个特别诚实者的自传外还能被叫作什么呢?）蒙田花了相当长的时间编辑整理他亡友的遗作——他的亡友在意外而不合时宜地故去之前已获得了作为一名诗人的荣誉。

在这次真挚的友爱结束以后，蒙田拿出一张白纸写下了他那著名的第一句话，“亲爱的读者，这是一本以不折不扣的诚实态

度写下的书。”我想可以公平地说，当他完成作品的最末一章时，他已经非常忠实地履行了该诺言。他的随笔确实是一个人内心感情的最诚实的昭示。并且纯粹出于幸运，蒙田本人碰巧可以贡献出这样一本书要获得成功所必需的众多营养成分中最重要的部分。他不仅仅有个性，而且他本人还是一个知名人士。毫无疑问，这两点特征的幸运组合赋予了他的作品一种新鲜感，正是这种新鲜感才使他的书得以在过去四百年中一直畅销不衰。

据说我的朋友斯蒂芬·邦斯尔，尽管他比其他任何人旅行得都多，他的足迹所至之多超乎寻常，尽管如此，在他每次踏上新的旅程时——即使仅仅从华盛顿到乔治敦——他都会觉得这将是一次完全崭新、非常愉快的探险经历。蒙田很赞同邦斯尔对待生活的乐观态度。他每天早晨起床后先去做大弥撒（他非常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宗教职责），然后吃早点，之后从他那高高的城堡窗户向外望一会儿。在过了那么多年以后，他应当对窗外的景致早已谙熟于心了，可是每一次他都好像以前从未见过一样感到兴奋异常，因此他每次摄入眼底的事物便成为他冥思中短文的主题。

这种常存于他心中的新奇感，无疑说明了他各章的题目为什么会那样富有愉快而奇妙的变化。“论悲哀”是一篇有关“哲学可以让人学会如何快乐地死去”主题的论文名字。在考虑了当一名书呆子的不幸结局之后，他探讨了读许多好书的渴望心理。食人者能够吸引他的注意力，男人女人的服装也同样吸引他。在解释了关于“睡眠的艺术”和“词藻的自负”两章内容后，他会突然问自己怎么可能“同时对着同样的事物又哭又笑”。

喝醉酒受到了辛辣的批评，而禁酒也同样被大加批判。友谊和忠诚像在宫廷上举行仪式一样小心翼翼地被加以研究，有这样一种事实：在某人可能是美味鱼子酱的东西，在另一个人看来可能只不过是一盘过咸的鱼子罢了。

这种随意的写作方式很自然地将蒙田的读者分成了两大敌对阵营，那些认为我们应当随意地享受生活的人，那些认为旅行意味着要探寻每一可能的弯路而不是在最短的时间里径直到达目的地的人，这样的人会喜欢蒙田的，他们会发现蒙田是他们最佳的旅行伙伴。而一些想马上将事情办完以节省时间（我可以问一下究竟为什么吗?）的少男少女们会称他为无可救药的个人主义者，会拒绝与他发生任何联系。

他们对自己的感觉直言不讳。"我们要等到《雷蒙德·德·萨布得的自由》（这不是蒙田试图解释自己生活哲学的那章吗?）缩略成三页时，"他们会这样对你说，"才会从我们的某本文摘杂志上（假设我们没有更好的途径）读一读它，可是在进行这项工作以前，那位老法国人的作品对我们来说简直太罗索了，他的话太多，他是那种可以为一杯酒而浪费整个下午的让人讨厌的法国人，他们会讨论某位在蒙特帕娜斯的小阁楼中饿死的长头发诗人的最新作品中的某一行诗的含义而白白浪费一个下午。"

文学在某些方面很像宗教，你或者喜欢某种观点而无条件地接受它，或者你不喜欢该观点因而也没必要谈起它，蒙田派人士会依旧热爱他们的老师，而反蒙田派人士会依然讨厌他，当两派人士相遇时，如果还聪明的话，他们可以谈谈鸡蛋的价格，或者第二年逃税者的机会，或者其它无关紧要的话题。但他们会把《随笔集》和它的作者放在一边的。

如我刚才所说，从外表上看，蒙田恪守了他那时代的人所认同的行为规范。但无论如何也算不得一位革命者，他认为没有理由进行正面的攻击。如果大多数人认为应该尊重国王，遵守教堂清规，那么他完全乐意接受他们的意见，他也不想使人们注意自己，在其他人都在教堂时自己去打猎，或者当街上的群众为某位皇家成员的来访而欢呼时自己大声宣扬叛乱。

但是，这些并不妨碍他在诸如宗教、政府事务、构成幸福家庭生活的基础等这类问题有着自己明确的观点 。人们甚至可能会怀疑他在心底里究竟是不是教会的好儿子，或者说他是不是他所认识的这个世界——包括皇室——的真正崇拜者，因为真正的信徒总是不加争辩地相信和接受，而蒙田却在他所写的一切作品中不停地问自己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究竟真正懂得什么呢?”

笛卡尔也许会建议蒙田只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东西，可是当时笛卡尔尚未出现，蒙田则完全缺乏“科学的态度”——如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那样。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世界最伟大的人类灵魂反应分析专家，因为他可以在他那单独的实验室里，以维萨里似的完全超然态度，仔细地分析研究他自己以及他邻居们的冲动，只是他的解剖刀从未能像维萨里那样深入。

可是尽管那位著名的佛兰德解剖学家得出许多明确的结论，蒙田却在将要触及他自己所提问题的最终答案时停滞不前了，他那种从“我真正懂得什么”的怀疑角度看待世界的天生的、无法治愈的习惯阻碍了他在任何问题上采取明确的态度，阻碍了他将世间万物明确划分为黑白两极。他更喜欢中间色，由此证明他从本质上是苏格拉底至威廉·詹姆斯时代所有好哲学家的一脉相承的兄弟。在他们生涯的某一点上他们也肯定逐渐意识到了永久的怀疑定会成为灵魂自由的代价；真理一旦被接受且上升到教条的高度就会被用来摧毁它以前的朋友，从而使它自己成为一个暴君，比它刚刚帮助摧毁的暴君更为残酷无情。

这些预言家所讲的怀疑有其神圣的一面，它不是指问那种无益而表面化的问题，就像那些过于聪明的孩子提出的让他们的主日学校老师为难的问题，“请问，琼斯小姐，上帝是什么?”而它是一种很谦恭的怀疑，在它所怀疑它的对象面前充满了敬畏，但它确是一种怀疑，一种观点的摇摆。一种在没能完全有把握地掌

握了最终证据之前害怕得出明确结论的恐惧——担心在远方山外某处，爱嫉妒的上帝仍然藏匿了一些终极真理的碎片，打算将它们完全保留给自己，因为凡夫俗子们不配拥有它们。

正如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样，怀疑主义是一种宣称除科学外没有其他绝对的知识，声称任何事实或真理都不可能只建立在哲学基础上的哲学。因此它宣扬中止审判的福音。

对此我知之不多（我是一名艺术家而非历史学家或哲学家），但在我看来似乎那些曾在历史上扮演过某种角色的怀疑主义者是一群很不错的人，从总的方面来讲，他们以努力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文明一些时比其他任何灵魂领袖们都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从毕达哥拉斯到康德时代，他们一直以他们的中庸和容忍，以愿意听取争议双方的意见而不愿对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作严厉的批判而受人瞩目。

而在这一点上米歇尔·德·蒙田与其他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按生活本来的样子接受它，他声称，在他看来既不存在彻头彻尾的善，也不在存在彻头彻尾的恶，因为一切都依人们看待日常生活中问题的方式而定。拿伏尔泰来讲，由于后来开始相信理智会最终为我们的大多数困难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案，从而修正了他最初的怀疑主义。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蒙田越来越变成了禁欲主义者，他尽力超越于痛苦和欢乐之上，却一直未获得太大的成功。作为法国肥沃土壤的产物，他的各种反应极为健康，因而他无法像罗马皇帝马可·奥勒利乌斯或奴隶出身的爱比克泰德在1，400年前试图做到的那样完全与普通的人经历和感情绝缘。

蒙田有时对爱比克泰德的思想非常感兴趣，后者教导说快乐是这个世界的唯一的好东西，因此也是我们一切努力的终极目标所在，可是蒙田的性格中已存在着一种强大的忧郁症结（他自己

称之为“牢骚”而非“抱怨”)，他无法从一种极力强调“幸福”为人类努力的最终目标的哲学中获得满足。

但是，我现在做一件也许从来就不该做的事。可以对普通的作曲家或哲学家给出一个概念，可是却无法对贝多芬或蒙田进行这种尝试，因为他们太复杂、太多面化而无法将他们总结成简单的几行内容。可是不管怎样，我应该在蒙田身上来做一尝试。

大体上说，我承认蒙田是我们所遇到的过去时代的人物中最和谐的一位。由于这种和谐，他可以为我这样缺乏精神平衡、要么立于高山之巅、要么跌入地下深窖的人带来极大的益处。

这种品格（协调所有关键器官的能力）将永远使蒙田远离我们心中喜爱的英雄形象。他的鉴别天才，他对搭配良好的中间色的喜爱——这些将把他与那些坚持非白即黑极端观点的大多数同胞永远分开。可在我们当前的体制下这是不可避免的。

进步一直是少数人而非多数人的事情。那些领袖人物意识到了这一点，也接受了他们的命运。他们知道他们注定要在极端孤独中度过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可是如果他们想成就他们已经开始的事业，这种孤独便是不可避免的了。哀叹命运是没有用的。他们的回报来自于这样一种认识，即他们是在为人类共同的利益而不是在为自己而奋斗。

1565年，蒙田与一位波尔多政府同事的女儿——弗朗索瓦·德拉莎塞恩结了婚。这显然是一种事先安排好的法式联姻，这种婚姻方式（虽然我们这些北美人极不赞成）却似乎比我们的幻觉式的短暂罗曼蒂克更能为持久婚姻提供坚实的基础。他的妻子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她安全地度过了危险的襁褓期，她的父亲以16世纪下半叶最好的教学方法来教育她。

这位母亲和女儿是仅有的两位在他生命中扮演过角色的女人，只有另外一名女性除外，对她我一会儿再谈。

蒙田在皇宫一直极受尊重，他以前的加斯科涅邻居、纳瓦拉的亨利总是试图说服他返回巴黎。米歇尔不止一次地拒绝国王陛下的盛情邀请，就像斯宾诺沙无数次拒绝另一位权势更大的君王法国路易十四一样。两个人对自己获得的荣耀都深怀感激之情，可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是他们的个人自由。因此，他们不会允许自己被束缚在一个他们将不得不为自己的日常生计而对别人感恩戴德的位置上。

明智的亨利不会因为子民的拒绝而生气，而从蒙田方面来讲他通过间或访问一下巴黎来表示他的忠心，然后他向他的统治者表示敬意，可是当他能够以此消融冒犯后，他便会立即返回他的象牙塔。

正是在这种对巴黎进行的间或拜访中蒙田结识了16、17世纪最著名的女才子之一——玛丽·德贾斯德吉尔内。蒙田似乎对这位博学多才的女子印象非常深刻，由于他的年龄足以做她的父亲，他便把她收养作义女。在他一生中的剩余日子里蒙田一直与她保持着通信。蒙田去世后不久，这位女士在母亲的陪同下不辞辛劳地赶到波尔多，向蒙田夫人表示对她那将让人永远怀念的丈夫的去世深切哀悼。

这位名人的遗孀不仅盛情地接待了这位德贾斯德吉尔内小姐，而且还送给了她一些她丈夫的注释作品，既有手稿也有打印好的。然后这位忠实的义女（她在怀念她的义父方面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开始着手于奉献给世人一个完善的《随笔集》的工作，她对其中的引语进行了精确的翻译，使这本名著可以为大众了解、接受。

就像我刚才所指出的，蒙田永远不会受到普通读者的欢迎。他发明的随笔形式是所有真正鉴赏家的文学宠物，可是当向一位出版商提起“随笔”一词时，他会马上脸色变得苍白，从兜里掏出手表后声称他只有五分钟的时间去赶火车了，然后你便再也见

不到他了，除非有人通知他说你已经离开了那座城市返回了康涅狄格。不要责怪这位可怜的家伙。随笔对所有与之相关的人来讲仅仅意味着苦役和麻烦。既然还有那么多读者乐于购买、书商们大肆宣传得好似唐尼布鲁克集市上的四叶红花草一样稀少的其他文学形式，为什么要故意给自己找赔钱的买卖呢?

[米歇尔·德·蒙田（1533 年 2 月 28 日—1592 年 9 月 13 日），法国思想家、作家，怀疑论者，不仅怀疑自己，而且怀疑人类，在 16 世纪末的法国宗教战争中主张宽容。他自幼受过良好教育，并在图卢兹大学攻读法律。曾在波尔多法院任职多年。父亲去世后继承爵位，两度出任波尔多市长。主要作品为《随笔集》。——译者附注]

为国何惧捐躯——

沉默者威廉

William I the Silent

(1533－1584年)

奥兰治的威廉不仅仅是费勒侯爵，而且是一位亲王。他不仅建立了荷兰国家，而且用自己的生命确保了它的独立。

那天是1555年10月25日，地点为布鲁塞尔。1000多人聚在金羊毛厅，向其统治者道别。他们是来自17个省、前来参加荷兰议会会议的代表，这些省将组成叫作荷兰的国家。

这些郡、公国和主教领地曾多次易手。巴伐利亚王室一度在它们的事务中起很大的作用——这一作用致使一位特别的公主、巴伐利亚的雅克琳有机会作为一位意志坚强的女性脱颖而出；假如她不是对性爱如此感兴趣，她本可以上升到事业顶点的。与苏格兰的玛丽一样，她嫁给了一连串软弱而仪表堂堂的年轻男子，最后沦为囚徒，悲伤地度过了余生。她被关押在一个城堡中，城堡在旧荷兰省平坦的草地中仍孤零零地突兀而起。

随后是勃艮第家族，在其统治时期，低地国家南半部成为整个欧陆最富庶的制造业中心，把英格兰羊毛加工成成衣，而当时土气的英格兰人尚不知制作方法。

沉默者威廉（威廉一世）像

布鲁日、根特和伊普尔积聚起大量财富，中欧崛起的各王朝为了占有它们而刀兵相向。但由于这些共同体一直处在没有纪律的帮工领袖的统治之下，处在战争、敌对不止的状态，因而无力保持独立地位，被并入南方沿途更有效的王室之中。

最后，勃艮第大胆查理的女儿玛丽嫁给了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她的父亲在与文艺复兴早期那位天字第一号恶棍即法国的路易十一世的冲突中丧生。就这样奥地利王室成为尼德兰的继承人。

马克西米利安和玛丽的孙子——那位下颌突出的著名的查理[①]（突出的下颌逐渐将成为所有真正奥地利王公的标识）——因而生来就是佛兰德人，因为他是在根特呱呱落地的。在去世之前，他已成为一个广袤无比、比今日大英帝国还要庞大的帝国的主人。平心而论，查理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但那种情况是他力所不能及的。一个人想治理好分布在由麦哲伦海峡到波罗的海地区内 100 个不同的民族，殊为困难。如果他在同时不解决宗教冲突，其中 1 亿臣民要么坚决站在教皇一边，要么追随马丁·路德，那就更加难办了，查理从根子上是伊拉斯谟的学生，过于明智，以致关心不过来。

“一场瘟疫降临你们两家了！”这是他生活的前 20 年的想法。即使在他不得不迁居西班牙后，他在对待他非常了解的这些低地国家的人时仍试图遵守节制原则。但所有这些在他不再实际理政、由其子菲利普[②]管理国家之后都结束了。就像其父亲主要是位佛兰德人一样，菲利普主要是西班牙人，自他继承其父充当低地国家统治者起，真正的困难就开始了。

在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秘鲁和拉普拉塔河沿岸平原、

---

① 即神圣罗马帝国查理五世（1500—1558 年；1519—1558 年在位）。

② 即菲利普二世（1527—1598 年），西班牙国王（1556—1598 年在位）。

菲利普能够充分地扮演"朕，国王"的角色，随自己的意愿发布命令，令到即行。但在尼德兰，国王最新敕令刚刚贴在墙上，就被人撕下来，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国王陛下的漫画。

最后，我高兴的说，荷兰人的固执将战胜哈布斯堡的顽固不化，但在查理最后一次充满柔情地向尼德兰人告别的悲哀日子里，这一切尚隐而未露。只是在尼德兰人中，查理才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日子。

布鲁塞尔的大厅中挤满了陛下在低地国家辖地内最高贵、最优秀的人物。稍等片刻，查理本人就出现了。正如他常常称自己的那样，他年老体衰。他重重地靠在一位男侍的肩上。人们认识这位年轻人，而且非常了解他。他们低声说他是国王的亲近——与他自己那位阴郁、绷着脸的儿子相比，老查理更喜欢这位显得很精明的外人。他们希望那位叫威廉的年轻人能够执掌反对"外国人统治"的领导权，一旦老查理（上帝保佑他）的王位由菲利普继承，后一局面肯定就会出现。他们不敢肯定威廉会不会应承，但祈祷那一情况的到来。

这位年轻秘书叫威廉，是拿骚—迪伦堡伯爵与其妻斯托尔堡女伯爵朱莉安娜的五个儿子中的一个。朱莉安娜女伯爵看来是位才女——中世纪后期如阿比盖尔·亚当斯[①] 那种人。因为她生了一群在16世纪后半期的事务中起至关重要作用的儿子。其中长子威廉注定要成为那些历史人物之一，他由于这一或另一原因，虽然活动范围相当有限，却能够在其环境中彻底打上自己的印记，跻身于"流芳千古的人物"之列。

想确切指出导致那种成功的一种简单的非凡个性，在任何时

① 阿比盖尔·亚当斯（1744—1818年），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1797—1801年在任）之妻，其子约翰·昆西·亚当斯为美国第六任总统（1825—1829年）。阿比盖尔本人是位多产的书信作家，其作品生动、细致地描绘了美国早期的生活。

候都是非常困难的。威廉在军事统帅方面没有天赋，他从未赢得任何一场战斗的胜利，往往冒着被掳获或杀死的危险。他也没有受到某种特殊使命的狂热信念的感染，这种使命曾使许多平庸之辈达到荣誉的顶点。他生活在一个宗教信条观点方面产生严重分裂的时代，他的几个兄弟成为新信条的热心的甚至偏执的追随者。但威廉总是谨慎地使自己小心地超脱这种争执。他被培养成了一位新教徒。当他有机会承袭一位死后无嗣的法国远亲丰厚的财产时，他举行了重皈天主教的仪式，只有在举行这种外在仪式后才可被承认是奥兰治公国之首。不过，几年后，我们发现他成为完全由狂暴的新教徒组成的尼德兰反叛力量的最高统帅。

威廉从未假称自己是一场重大改变信仰事件的经受者，并看见了光明。他只是不再去做弥撒，再一次以完全平和的态度聆听那些取代了其路德宗同行的加尔文宗牧师的布道。路德宗对多数荷兰人来说有些过于平和，不太合他们阴郁的口味。在他生活的最后时刻，当他奄奄一息地躺在他在德尔斐特的居所的台阶上时，威廉想到了可照料他的人，但呆在他近旁的人都没有听到他低声说出的一个要求，即由一位教士或牧师照料他。

威廉虽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但有着异乎寻常的敏捷的头脑。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但他从未下功夫去拿博士学位，恕我直言，他为何要去攻取呢？他期待着成为他父亲——富人威廉的地产继承人。此外，当他依然很年轻时，他突然从亲戚奥兰治亲王的地产上获得非常多的贡纳收入；作为北欧最富有的年轻人之一，他可以期盼的前途是一种世人对他没有多少期望，只希望他在继承父业后成为一位相当公正、不太苛严的统治者。

但是，威廉远比同代富有的年轻人要聪明和勤奋，他没有百无聊赖地虚度时光，而是把时间用在学习国务和外交技能上，这有朝一日可以让他在国际政治领域内起领导人的作用。查理五世在布鲁塞尔的宫廷向他提供了发展这种特殊才智的良机，他学会

了如何以一位击剑手的灵巧使用自己的大脑，即使在应召用一把短小的双刃剑迎战一位身着盔甲、挥舞战斧的对手时仍能把握住自己。

当他在尼德兰人与西班牙王的冲突中支持反叛的尼德兰人事业时，这使他处于有利地位。在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整个欧洲注视着这一据认为注定失败的事业的领导人与欧洲最强大的君主之间的决斗。当后者降低身份以暗杀手段赢得较量时，许许多多人都同意，亲王肯定取得了胜利，后人完全同意这一断言。

这位年轻的德意志人为何决定离开他在德意志的产业，为何移居尼德兰呢？变化完全是出于现实考虑。他的父亲老富人威廉，把很大一笔钱投资于低地国家地产上。查理皇帝怀疑他父亲的路德宗倾向（他母亲很久以前就风尘仆仆回到了威腾堡），相当开通地暗示说，如果该家的长子作为青年侍从在布鲁塞尔接受教育，这些财产遇到的被充公的风险要小。就这样，这位漂亮、和蔼可亲的年轻人被送到了布鲁塞尔，在那里他学会了在实际政治领域所能学会的一切东西，在那里他广交朋友，花钱如流水，幸运地靠结婚获得了更多的钱财。如果他活到今天，他与其妻子的名字会每天出现在所有大型日报的社会栏里，呜咽痛苦的姐妹们会为这位亲爱的亲王最近为了款待来自米兰宫廷的大使、有名的普林西普·代格利·乌格布基所花的巨额金钱营造的豪华氛围感到心颤，周日增刊会刊登这对夫妻在布雷达附近的地产上饲养的奇妙的小灵狗的照片。

这位时髦的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在几年之内会发展成为一个几乎绝望的事业的严肃而极其称职的领导人，这表明在他身上有着比外表显示出来的多得多的东西。事实上，他的一些同时代人已经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他作为廷臣和政治舞台的领班所具有的超凡才干。布鲁塞尔的总督宫是密谋的温床，到时为止有太多的外国食客，令当地派别很不高兴。荷兰人和佛兰德人都想为自己的

孩子获得所有报酬丰厚的职位，愤愤不平地看到他们本省内肥腴的主教和高报酬的政府职位落在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或法国人手中。

另一方面，由于他在低地国家拥有的财产，威廉被认为是一位荷兰人，由于他智力远高于一般人，他比其他大多数贵族优雅和善于经商（那些贵族很少超出乡间贵族的平庸的文化水平），他的同事非常乐于让他照料自己的利益。与此同时，他们可以继续平静地住在其城堡中，终日游猎，彻夜饮酒，以纵狗斗熊打赌，为了个别年轻的女继承人以最不合礼仪的方式争斗，因为让他们一位蠢笨的儿子与她结婚，可以至少部分地减轻他们相当重的债务、抵押负担。

这就是查理五世皇帝让位时的时局。宫廷中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追寻财富者很快发现，阻碍他们计划（因为他们也想要这些女继承人和职位）实现的最大力量是这一有着翩翩风度但紧闭双唇的德意志年轻人，他们不无讥讽地给他起了个外号"沉默者"——这个人不多讲一句废话，默默工作，但总是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实际上，威廉根本不是一位沉默寡言者，他是一位爱交际的人，他喜爱置身于同胞之间。他能与任何人在任何地点进行任何类型的谈话，他具有让所有与他接触的人感到安逸的罕见本领。他甚至知道如何对付在一场大的精神和宗教危机中必定会浮上水面的怒目而视的狂热分子。但他也知道在最对自己有利时缄口不言，而且他会像一家现代商行的主要经理那样远远躲开。

年迈的皇帝当时靠在这位年轻人的肩膀上向他钟爱的尼德兰议会告别，他请议员们原谅他蹒跚而行读咨文的方式，他说："先生们，如果一位像我这样年老体弱并承受你们爱戴之情的人掉下几滴眼泪，请不必大惊小怪。"致使他如此悲伤地喃喃说出

这些几乎没有人能理解的话的原因，可能在于他因风湿病而产生的骨痛和他对其可爱的佛兰德和荷兰臣民的爱，也可能是由于他因在著名的非洲战役中染病而失去了牙齿。但结果是在场的每一位人都对他们可怜的旧主深感同情，祝愿他健康。

查理在世上又存活了3年，以享受他在战场上或在办公桌前度过40年而为自己确切无疑地挣得的休息权利。但在那一时期末他不得不亲自过问他从前领地上的事务。因为在菲利普统治下那里当即出现混乱，西班牙后来再也未能从混乱中拯救自己，其帝国终致崩溃。

查理刚刚退到他在南方的孤独的隐居地，大决斗就开始了。一方是具有独裁专权思想的菲利普，一方是在行动和思想上都坚持个人自由的威廉。最后，决斗导致公开决裂，残酷无情的阿尔瓦公爵率领一支远征军经法国北上，自认为用不了几月就能粉碎这群由黄油生产商和奶酪商组成的胆敢反抗其合法主人的乌合之众。

在公开战斗中，这些有经验的西班牙老兵轻而易举地打败了自己的对手，但当反叛者撤到海上并打开闸坝让水淹没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向不共戴天的敌人投降时，黄油开始悄悄溜过阿尔瓦大公及其外国雇佣军的坚硬的手指。

最后阿尔瓦不得不承认失败，像菲利普所有最忠诚的仆人一样，阿尔瓦不得不靠借贷来维持军队（菲利普从不向任何有可能自己解决问题的人支付报偿），结果使自己债台高筑，被迫在午夜逃离布鲁塞尔，不然在上午他就会被狂怒的债权人抓住，把他拖到一个民事法庭中审讯，因为在这一令他们讨厌的商人和艺匠土地上，民事法庭在战争进行之际仍然发挥作用。

在遭到第一次失败后，菲利普尝试一种新的策略。这一次他派去了一位和平和节制的使者。至少外表上如此，因为菲利普在内心并未改变过“真理信仰”之敌的态度。反叛者的所有新建议

都被恭敬有礼地听取了，随后是同样的冷冰冰的沉默。"能否把可憎的外国人召回？菲利普国王能否通过正常的既定的法庭渠道对待其荷兰臣民，并限制对一位习惯于思想自由的不情愿的人强制进行严密审讯?"

对于这两点中的前一点，身在远处的马德里（发往他那里的信件总是在半年后才能抵达）的国王假称愿意达成妥协，但他坚持说，异端分子必须一劳永逸地清除出去。假如尼德兰人不愿意或不能自愿回到教会的怀抱中来，国王就准备让宗教法庭放手行事。

低地国家居民认识到了自己的经济实力，以蓄意破坏交纳所有国王税收作为回答；没有钱，摄政者就无法雇到士兵。不久局势就变得十分严重，除非带着一位武装卫兵，不然西班牙人就有生命危险。所有这些精明的有组织的反抗，正如菲利普及其妹妹所知，仅仅是由一个人造成的，也就是那位小小的德意志王公，他在没有获得任何支援的情况下，在各个方面击败了最信奉天主教的国王陛下。

菲利普像一位典型的西班牙人一样，随后想出了另一消灭他执拗的敌人的有效方法。亲王的头颅被标价悬赏，许多人梦想得到这笔数目不菲的悬赏。因为人们知道这一次菲利普准备给保付支票。对荷兰人的事业来说幸运的是，暗杀者要么在找到机会扣动扳机前就被抓获，要么做事笨手笨脚，虽然击伤了亲王，却未能致命。奥兰治亲王痊愈了，最后，他甚至能够向既定的秩序发起一次影响巨大的反击，整个世界都将感受到他向王家权威发起攻击的反冲力。

在 1579 年，亲王的弟弟约翰（奥兰治－拿骚一系的创建者，现今王族即源出于此）就已劝信奉新教的各省结成某种防御同盟，该同盟后来被称为乌得勒支联盟。两年后，又一重大步骤确定了。1581 年 7 月 26 日，来自联合省的代表在海牙举行集会，

签署了一份在尼德兰疆界外不太为人所知的文件，但该文件在某一方面甚至比《大宪章》[1] 还要重要，因为它认可了某些明确的政府原则，该原则在200年后将被收入我们美国人自己的《独立宣言》之中。

下面是这一著名的《誓绝法》的少量节录。该法当即被译成几乎所有欧洲语言，在欧洲大陆各地广为传播。这样世人都可以知道，在非理性的狂热之际，联合尼德兰人并未采取行动，而是在这一极为严重的"人民诉其合法君主"案件中最小心翼翼地权衡正反所有因素。

这一神圣的《誓绝法》所隐含的总原则概括在其导言中：

> 众所周知，一位统治者应上帝之召治理其臣民，就像牧民应召照料羊群一样；同时，自时间一开始就适用的是，人民并非为其王公的利益而存在，而是王公为了保护和促进人民的利益而存在。

起草这一具有挑战意义的文件的可能是某位叫马尼克斯·冯·辛特·奥尔德贡德的泽兰贵族，他的产业位于离费勒城不远的地方。奥尔德贡德作为《拿骚的威廉》一歌的作者而获得永久声誉，这首歌后来成为共和国的战歌，尼德兰王国成立后成为王国国歌。他还不时充当威廉的捉刀人，这一职位对他极为合适，因为他的古典知识丰富，对他所处时代的总的政治体制极为熟悉。

在这一《誓绝法》中，辛特·奥尔德贡德深入发掘了古代历史，并通过许多雄辩的例子证明，自时间开始，人民就有消除威胁到其自由公民的自然权利和任何种类暴政的自由。这是现实政治领域内一种新的声音，或者不如说是一种几乎为人们遗忘的声

① 《大宪章》，指1215年英国大封建领主迫使英王约翰签署的保障部分公民政治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文件。

音，因为即使在中世纪时期，欧洲人一直对不仅属于他们自己，而且属于他们的妻子、子女、孙子以及直到时间结束前他们未来的所有后代的“不可分割的自然权利”有所意识。

辛特·奥尔德贡德的独立宣言在经过这几百年后仍令读者心血沸腾，我敢肯定，托马斯·杰斐逊[1] 在他最雄辩的时刻也不可能超出奥尔德贡德一筹。1743 年，波士顿的萨姆·亚当斯申请哈佛硕士学位时提交的论文题为：“假如自治体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方而保存自己，反抗最高执法官是否合法”。我一直怀疑，他对《誓绝法》这一文件熟悉到什么程度，我倒认为他了解它。另外看来可以肯定，托马斯·杰斐逊和其他与我们自己的《独立宣言》有关的多数人，都读过《誓绝法》。它在今日美国如此鲜为人知，在我们谨慎地强调《大宪章》的重要性时很少提及，其原因何在，似乎有些令人费解，但 1581 年的荷兰《誓绝法》作为近 200 年后我们《独立宣言》的“原材料”，非常值得注意。

起草人对以前 30 年发生的大事作了简短的历史回顾，并郑重地宣布，鉴于他的许多有违不同省份宪法特权的敕令，西班牙国王现在在法律上放弃了君临尼德兰人民的权利，因而这些臣民现在不再受从前的臣服誓言的制约。

就这样他们取得了令世人瞠目的成就。因为在这里，在现代史上神意第一次指定的一个人——一位承蒙天恩的君主——被头朝下地打翻在地，像一位不称职、不诚实的仆人那样被打发回家。就连他的铺盖卷也未交还给他，因为这些富裕省份的税收现在直接归属荷兰议会。他们作为人民的代表，把这些收入用于雇佣那些陆军、装备那些海军上，打算依靠他们在地球的各个角落

---

① 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 年），美国第三任总统（1801—1809 年在位），《独立宣言》起草者，美国独立后任首任国务卿，民主共和党创建者。

袭击自己过去臣服的领主，借助他们消灭他的王朝，直至王族的最后一名成员欣然在我们现今的纽约找到汽车销售员职业为止。

此时菲利普失败了，威廉则通过他灵敏的政治感，通过他对自己能引导同胞做什么事及最好让他们不受干扰的本能感觉，获得了胜利。他作为争取独立力量的普遍公认的领袖的地位现在已根深蒂固，是所空缺职位的当然人选。唉，不同省份政治领导人间委琐的妒忌心理（一群从不长进的东西!）以及那一时期人们极为典型的对“合法权威”内在的尊重，仍使议会犹豫不决，迫使他们再度寻找一位王家血统的统治者。他们试了试法国国王的兄弟，但他证明完全靠不住，几乎把国家出卖给敌人。直到最后，议会打算从某些在位王族中寻找一位真正亲王，但这些努力均以失望告终，因为他们往往把尼德兰视为一个可爱的财源。绝望之后，他们决定做件明智的事，请奥兰治的威廉任尼德兰联合省的合法统治者。

唉，在这最后一步采取之前，自时间开始就一直是所有人类关系中起决定因素的年迈的命运女神，参预了事态的进程，并通过其最不受欢迎的干预完全破坏了正常发展的前景，这种正常发展将会给予这一国家一个完全确定的政府形式，使它不至于受自私自利的派别和野心勃勃的官员的制约。

现在，亲王多年来一直生活在死亡的威胁之下。西班牙国王颁布敕令，宣布他为公敌，这一敕令并不是无人遵守。敕令颁布不到一个月，某些狂热分子就着手进行小型的个人谋杀。所有这些追求名誉和财富的人都未能取得成功，直至1582年，威廉前往安特卫普，以作进一步努力，把北方和南方各省联合在一起。

一位出身于巴斯克的贫穷而智力有缺陷的神职人员受一位破产的西班牙商人和一位绝望的狂热分子的雇佣，向亲王开了一

枪。子弹由右耳进入，由下颌左侧穿出，初看上去这必定是致命的，在西班牙，一些王室成员举行仪式，欢庆这位“真正基督教信仰的大敌和破坏者”之死。

那一时期的医学科学不知道如何治疗这样一种复杂的伤病，只是不停地把一块绒布塞入伤口以止住血液。一连几个星期，刚刚从产子中恢复过来的亲王之妻，波旁的夏洛特，坐在丈夫旁边，拒绝让其他任何人进行照料。她救了亲王的性命，但在病人能够参加庆祝自己康复的感恩仪式当日，她本人却不幸因心力衰竭而死。

作为一大群孩子的父亲，亲王需要一位女人充当家庭主妇，夏洛特死后，他选中的是一位能力出众、极其高贵的人，此即路易丝·德·科利涅，她是法国豪侠的海军上将[①]的女儿，这位上将作为法国新教领袖，成为圣巴托罗缪节惨案[②]中第一批受难者之一。

经历过这一次差一点丧生的事件后，亲王认定最好离开安特卫普，迁移到代尔夫特。代尔夫特虽然狭小，却是荷兰省内设防最密的城镇。它不仅易于防守，同时陌生人到城里来易于引起注意，那时可以严密讯问他为何到这里来，看看他是否有权呆在那里。

这时到了1584年7月初，最近几天来，人们看到一位陌生人在被改造成亲王及其全家住所的原修道院附近闲逛。他当然受到盘问和严格调查，但他提出了一个完全可以接受的为何到这里来的理由。他说自己叫巴尔塔扎尔·热拉尔，是位法国人，在其

---

① 指伽斯帕尔·德·科利涅（1519—1572年），法国海军上将、胡格诺派领袖，对国王查理九世有很大影响，但遭王太后凯瑟琳暗算，死于圣巴托罗缪节惨案中。

② 圣巴托罗缪节惨案，为人类历史上一大惨案，发生于1572年圣巴托罗缪节（8月24日），这天法国天主教徒在王太后凯瑟琳指使下由巴黎首先发难，到处屠杀基督教新教胡格诺教徒。据估计，仅巴黎一地死者即达3000人。

故城反加尔文教大屠杀中全家丧生，仅余他一人。

这一模糊不清的故事是他从特利尔的一位耶稣会教士学到并背熟的，后者在复活节不仅聆听他的告罪，而且在此同时赦免了他不久以后犯下的罪孽。在其精神导师眼中，这不是犯罪，而是一个极其高尚的行为，理应受到所有诚实的基督徒的赞美。

热拉尔先生必定是位出色的演说家，因为亲王的宫廷宣道师考了他有关加尔文宗信仰的问题，带回的全是令人高兴的消息，确信这位外表不体面的来访者真的是教皇派暴行不幸的受害者。至于他为何住在代尔夫特，他汇报说他是应亲王自己在巴黎的代表的邀请而来的，说他向亲王带来的有关他的好友安茹公爵最新近况的消息会让亲王陛下高兴的。安茹公爵近来染上了结核病，这种病在他母亲一方的人中即美第奇家族成员中极为流行。

这个故事在各个方面都严丝合缝，没有破绽。荷兰官员完全被这位所谓的使者骗住了，竟允许他造访卧室中的亲王，让他当面向亲王叙述有关安茹的最新消息的所有细节。实际上，他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但别人也都不了解，谁能指出他是骗子呢？

7月8日，这位年轻人又一次被发现走过亲王住所的过道。人们问他这么早地到这儿来干什么，他说他到亲王打算去举行晨祷的教堂去。由于教堂恰巧位于穿过亲王住所的教堂对面，这一解释被接受了，无人作进一步深究。但某位好奇心强的人问他为什么不经由前门穿行？他回答说他决不敢这么做，看看他穿的衣裳！衣裳破烂不堪，他连在公众前露面都感到害羞，更何况在亲王面前呢？

人们向威廉汇报了这一切。他一向宽厚为怀，就送给这位法国难民足够的钱，让他给自己去买返回法国的全套用品。可怜的难民深表谢意，当即用那位慈善家给的钱从一位卫兵手中买了两把手枪，随后他请某人去求亲王发放一个安全通行证，这样他在回归故国时就不必遇到荷兰官员的麻烦。这一请求送到了亲王的

秘书那里，亲王承诺在次日即7月9日下午签发通行证。

在指定的时间，凶手再次来到了亲王门前，亲王的妻子在经过大厅时注意到他，被那人的表情吓坏了。她说："那是一位卑鄙至极的人，我不信任他。"亲王走过去安慰她："他只是一位可怜的法国难民，是位因自己的信仰吃了许多苦头的诚实的加尔文教徒。"

当日亲王有位客人，名叫冯·厄伊伦博赫，他是弗里斯兰吕伐登市市长。另外，他碰巧是画家伦勃朗未来的女婿。在吃午饭期间，两人讨论了弗里斯兰的政治局势，随后准备回到住所去。就在那一时刻，等待已久的刺杀者由隐居处跳了出来。他同时扣动了两支手枪的扳机，一粒子弹穿过了亲王的肺部，另一粒子弹刺穿了亲王的腹部。

威廉倒在了地板上，他认识到这一次敌人成功了。他面朝上躺在其马夫的双臂上，把自己的灵魂交托给他，喃喃说出其最后的祈祷："噢，主，可怜我的灵魂和这些穷人吧。"此外他又说出几个字，当他妻子问他是否为基督而死时，他喘着气说"是"，此后一切便结束了。

菲利普国王达到了直接目的，他的敌手死了，但最终胜利仍归属他的对手。在此后300年间，威廉创建的国家将成为世界上其他所有地区因其信仰受到迫害的所有人的避难场所。他们中有些人是幻想家和狂热分子，但其他许多人是务实的人物。当他们驻足荷兰土壤时，他们带来的不仅有所穿衣物，还有他们得以在其出生国家升腾的知识和经验。他们热切地进入了他们新祖国的生活，是最早创建那些大型外贸公司的人之一，这些公司最终将西班牙旗子从所有海洋上拔掉，把西班牙降为一个五等国家。

把基督教从其最凶恶的敌人中解救出来，酬报实际已经支付了。我很高兴地说，这不属于刺客本人，他当即被拘押。那时人

们发现热拉尔先生是一位办事非常有条理的人，因为人们发现他小心地准备了两个猪气囊，这些气囊将在他游过运河时助他一臂之力，这样他就可以安然抵达对岸，他在对岸藏着一匹马，也是用亲王给的钱买的。

在经过细致的审讯（在审讯中荷兰当局尽力去弄清谁是热拉尔的共犯）后，刺客被以当时人所能采取的最残酷手段处死了，在这一次他们远远超出了以往历次，我不向你们谈论细节了。这是威廉本人所不能容忍的，但他不能在那里再讲仁慈的话语了。

热拉尔受到的处置往往被那些试图证明加尔文宗信徒并不比其对手要好的人枚举出来进行严厉批评，但它并不比近四分之三世纪英格兰弑君法官们出于肯定更少的正当理由做出的事儿要糟。与威廉不同，查理一世被处死实属理所应当，确实，他自登基之日起就为此努力，在一个方面，声名狼藉的法国国王比其英国受难同行要幸运多了。他们的头颅被留在断头台上，直到鸟儿啄走双目，其余的部分腐烂。而这位刺杀威廉的法国恐怖主义的头颅当即被当地某些狂热的天主教徒盗走，小心谨慎地运到科隆，很长一段时期内在那里被尊为珍贵文物。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场把刺客擢升到圣徒地位的运动开始了。然而，经过一段不长的时间后，较明智的天主教徒开始认识到，支持这一不值一提的人物对自己的事业没有多少好处，忘掉他倒对自己的目的更为有利。

我已经告诉你们，付给受雇杀人者的酬金支付了。它属于杀人犯的母亲和他的兄弟。他们的贵族特许状存在了两个多世纪，它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才被免除。罗伯斯庇尔及其战友在让人流点血方面并不是十分审慎，但他们是有区别的，至于尼德兰后来的事态发展，从未有一个人像亲王那样受到如此普遍的尊崇，同时，他一去世，旧有的各省的敌对情绪在此猛烈地爆发出来，虽然荷兰共和国的所有官方文件都强调这一事实，即“我们力量唯

-之所系是联合"，但随即被赋予治国大权的商人们彼此之间妒忌心重，无法克服他们的恶意而全心全意地为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就这样，尼德兰联合省好景不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退化成为一个争执不休的社会，各掌权派别纷纷为自己攫取所能攫取的一切，而把共同的福祉抛在一边由魔鬼照料。在这种场合，魔鬼从未远离，总是蠢蠢欲动，随时准备推波助澜。

[威廉一世（沉默者）（1533 年 4 月 24 日—1584 年 7 月 10 日），荷兰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英雄，欧洲最富有的贵族之一。生于德意志拿骚的迪伦堡，在路德教的环境下长大。他得皇帝查理五世宠幸，后者力图把他培养成天主教徒。当荷兰人举行反西班牙武装起义后，他站在斗争队伍的最前列，为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而战。尼德兰北部诸省于 1579 年宣布独立后，威廉当选为世袭执政。1584 年，他受枪击重伤而亡。——译者附注]

敢于做不可能实现的梦——

《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

Cervantes, Miguel de

（1547－1616 年）

法兰西学院曾拒绝向莫里哀敞开大门，100 年后，瑞典学院派也无视卡尔·米切尔·贝尔曼①的存在，只因他乐于与一些衣衫褴褛、放荡不羁但能使人振奋而且有天赋的醉汉们在一起，是他们帮助他写出了不朽的音乐作品。而舒伯特② 当时也从未被奥地利皇室看作是难得的音乐家。伦勃朗死时也未能还清债务。莫扎特由于过度劳累得了肺结核。柏林评论界一致认为帕德莱夫斯基不会弹奏钢琴。当凡·高在他的故乡展出他的作品时，荷兰的自由民却把口水吐在了他的画上。当焦塞普·威尔地③ 申请进入米兰音乐学院时，教授们认为他毫无天赋而被拒之门外。有数不

---

① 卡尔·米切尔·贝尔曼（1740—1795 年），18 世纪瑞典杰出的诗人、音乐家，创作过脍炙人口的饮酒歌和仿《圣经》作品以及组歌《弗列德曼诗体书信》、《弗列德曼之歌》等。其歌曲在斯堪的纳维亚至今仍然流行。——译者

② 弗兰茨·舒伯特（1797—1828 年），奥地利作曲家，以歌曲创作为主，一生留下艺术歌曲 600 余首，主要作品有《魔王》、声乐套曲《美丽的磨坊女》、《冬之旅》等。

③ 焦塞普·威尔地（1813—1901 年），意大利作曲家，作歌剧 30 余部，其中《弄臣》、《茶花女》、《游吟诗人》是其三部名作。后期歌剧《阿依达》、《奥赛罗》在意大利歌剧史上具有创新意义。

東方提斯傳

清的短视和愚蠢的行为，可这一切与我下面介绍给你们的主人公塞万提斯离题太远了。

要做到绝对公平是不太容易的，同时，我也承认，我从来没有过，现在也不了解西班牙人，将来也不会了解他们。我到过世界的许多地方，也在许多奇怪的土地上生活过。我了解许多国家和民族的语言，这使得我能了解许多偏远民族的思想进程，有许多民族，我只是通过邮票的形式了解的，但是有两个民族完全在我的理解能力之外——那就是西班牙和爱尔兰。

我过去常常怀疑，尽管我主张宽容和自由，可是在内心中，我可能仍然还是个加尔文宗的教徒。是约翰·加尔文的精神使我不能公平地对待那些由罗马天主教会控制的国家。但事情不完全是这样，因为在1914年大战之前，我曾经在巴伐利亚度过了最开心、最幸福的五年时光。那时，一个女人，如果没有她的精神医生证明她经常去教堂做弥撒的话，她是不可能在官方的建筑区中找到一个打扫房间的活的。

于是，我自己对自己说："是这些骄傲的贵族中的阿伯拉血统，使我把他们看成欧洲的外国人。"但是在爱尔兰人中没有阿拉伯血统，因而这也不是真正的原因。最后，我开始考虑宗教对把西班牙人和爱尔兰人塑造成现在这种样子到底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无疑，宗教对西班牙人和爱尔兰人的精神、文化和道德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为什么它没能在西欧和北欧保持那么强大的地位呢？而其他国家与西班牙和爱尔兰有着同样的条件，同样的机遇。我终究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我最终把它划入我的"没有解决也是不可能解决的难题"之中，不再考虑它。

我认为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有许多盲点，最好的办法是承认有这些盲点，然后尽量减少它对我们的不利影响。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沉醉于个人的癖好，而不顾及其他许多亟待我们解决的问题，

而且许多问题经过我们个人的努力，可以使我们生活得更好呢？

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这个名字很动听，我想这个名字可能对西班牙人来说有某种意义，但我已经放弃推敲名字的意义，有时它会导致彻底的失望。比如，有史以来最著名的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的作者俄国人托尔斯泰[1]，这是多么典型的俄国人的名字！多么浪漫！

这位长着浓眉大眼的莫斯科贵族双脚沾满了泥，穿着破旧的农民上衣。只有一个真正的具有贵族派头的人才能具有这样感情洋溢的民主。后来，我开始学俄语，我遇到的第一个形容词是"肥胖的"（TOISTOI，读音与托尔斯泰相同），所以，这位《安娜·卡列尼娜》的作者的名字，除了"老肥"之外，没有其他更深层的意思。

几年后，我对法国普罗旺斯语言着了迷，并深深地喜欢上这块土地。古罗马灭亡之后，这里的文化开始消亡。于是我决定开始学习这个由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先生[2]发展的别致的语言。直到有一天，吉米问我，"还忙着弗雷德·诺思温德（意为"北风"）呢？"魔力被破除了。弗雷德·诺斯温德像是一个药店的名字，或者是一个加油站的名字，决不像一位领导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的领袖的名字，上帝饶恕我们吧！

所以我放弃了研究名字的意义，尽管我有许多西班牙朋友，也有足够的机会，但是我还是放弃了推敲"塞万提斯"和"萨维

---

①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年），俄国作家，主要作品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其作品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对世界文学有巨大影响。

② 弗雷德里克·米斯特拉尔（1830—1914年），法国诗人，菲利伯派文学运动领袖，毕生致力于恢复普罗旺斯语言和文学，代表作为长诗《弥洛依》、《罗讷河之诗》等。190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米斯特拉尔"一词意为密司脱拉风，是地中海北岸的一种干冷北风或西北风，故而下文有"弗雷德·北风"之说

德拉”的意思。但是，我通过赫尔曼·凯斯腾的小说对他已颇有了解。他过着一种多么怪诞的生活，在世界上自约伯以来再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受到无情的不公平的命运给他带来的冤枉和痛苦。

在很年轻的时候，塞万提斯在著名的奥地利唐胡安手下服役，唐胡安1571年出兵要消灭在地中海东面的土耳其人。按照他的计划，异教徒都要被消灭，但是在战争中，塞万提斯至少中了三枪，伤势很重，造成左手永久残废。作为一位乐观主义者，他只是说失去了左手，是为了让他更好地使用右手，并继续作为菲利普国王的一名士兵参加战斗。同时，由于他具有实践的头脑，而且他为上帝和国家主权做出了牺牲，他得到了提升，薪水也增加了，而且以后可以终身保有职位。

塞万提斯带着唐胡安总司令的推荐信，离开了舰队，启程返回西班牙。离马赛不远，他的船被阿尔及尔海军抓获，所有的水手和乘客都被当作奴隶出售。

多亏了总司令亲笔签名的推荐信，狡猾的阿尔及尔人认为携带这封推荐信的人一定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当他们给他定赎金的时候，就给他增加了一倍。为了不失去发财的机会，他们小心看管着这些犯人，以防止他们逃跑，并剥夺了他们所有的人身自由。塞万提斯不以为然。他具有能言善辩的口才，很容易地说服了下一个站岗的黑人，帮助他逃跑，并给他指出了通向大海的路。在最后时刻，这位黑人想到了放跑犯人的惩罚（他们被活剥了皮），在通往大海的路上抛弃了他。

塞万提斯被很容易地抓回来，这次他被投入一个黑暗地牢中，并被告知只有当赎金交齐后，才能被释放了。最终，赎金终于交来了，他的父母卖掉了家里的所有财产，仅仅凑足了300元。阿尔及尔人大怒，“什么?! 300元就要赎回一个携带由唐胡

安签名的推荐信的西班牙贵族，这简直是侮辱。”他们释放了塞万提斯的弟弟，继续扣留塞万提斯，只有在另外几千元的赎金送到后，才可能被释放。

塞万提斯知道他的父母不可能再帮助他了，于是他决定自己帮助自己。他又一次逃跑，又一次被抓回来。但是，这次他要被打2000棍。事实上，20棍就足以置他于死地，但是，惩罚一直没有执行。是阿尔及尔总督哈桑帕夏敬慕他的智慧和坚韧不拔的勇气，保护了他。交易毕竟是交易。3000元的赎金对这位西班牙人来说像一个便士一样，他穿着破衣烂衫，带着铁镣，走起来昂首阔步，土耳其人很少能拥有他的气质。

老塞万提斯夫妇——还有他们最好的亲戚——开始了毫无希望的筹集赎金的工作，那3000元对他们来说像几百万元一样困难。修道士又一次开始在阿尔及尔和巴伦西亚之间斡旋，进行讨价还价。

无休止的等待对塞万提斯来说是不能忍受的。于是他又劝说他的狱友，准备偷一艘快艇投奔自由。如果其中的一位多明我会的传教士不背叛他的话，逃跑计划就可能成功了。这位传教士已被保证将获得自由。塞万提斯的第三次逃跑按照摩尔人的法律将意味着死刑的惩罚。但是，哈桑帕夏仍然很喜欢他，塞万提斯又一次被饶恕。

最终，经过坚持不懈的贩马交易，甲方（他的西班牙亲戚）和乙方（阿尔及尔的人贩子）达成协议，就在被公开拍卖之前，塞万提斯被释放了，他于1580年11月又回到了祖国。这是他9年后又一次踏上西班牙的土地。任何缺乏乐观主义的人都会说，“够了，够了，我可能生来就不会福星高照。我会到一个十分偏僻、远离人群的地方找一个工作，然后在那儿度过自己的一生。”但这不是塞万提斯。他又开始了更加危险的赴北非港口的旅途。他在16世纪下半叶成为西班牙的一个雇佣文人。

塞万提斯此次也只是从一种形式的奴隶转变成另一种形式的奴隶。在阿尔及尔，气候宜人。在马德里，那时与现在一样，沉闷多风。只要你离开了马德里，也就没有必要更换其他的地方了。他的新职业的第一次尝试是没有任何恶意的。他写了一部田园小说《伽拉苔亚》。这部书还算成功，他甚至还赚了几百元。这很不幸，他像我们今天的格林威治小村的年轻人一样，出售自己的文章。他结了婚，但很快又离了婚。有一句俗话是“两个人可以生活得像一个人一样”，但他没有发现这种说法的正确性。在通常情况下，两个人变成三个人，然后又变成四个人，五个人。对父亲来说，生活意味着无休止的辛劳；对母亲来说，意味着饥饿、痛苦和单调乏味。

首先是他妻子的嫁妆帮他度过了难关。1棵果树、5棵藤、4箱蜜蜂、45只母鸡、1只公鸡和1只对养家糊口没有多大作用的大酒杯。这些东西至多可供他们生活45天。但是，即使是这样，六周后，他似乎厌烦了炖煮鸡，看来只能做汤了。塞万提斯用尽他的智慧，不分昼夜地工作，以养家糊口，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像所有在官僚主义国家长大的人一样，塞万提斯认为，只要他能找到一个公职——不论是什么工作，所有的担心都不复存在。为了找到这么一个工作，他必须让国王知道他。也许——他认为——如果他能告诉陛下他曾经为国家当过兵，并且在保卫国家和上帝的战斗中失去了左手，国王肯定会同情他。他感到由于成功的机率太小，他会要求得到一个马厩，而不是一匹马。于是，他试图谋得在西半球出现的四个职位之一：危地马拉总督、新格林纳达的经营珠宝工作、卡塔赫纳的审计员或在拉巴斯类似的工作。

塞万提斯得到的回答是建议他不要期望太高，也不要走得太远。一个“离家近的”为征服英格兰和低地国家的舰队筹集小麦

的工作很适合他。后来，由于塞万提斯抢劫了农民，而被教会驱逐出去。当公共会计查他的帐簿时，发现里面一团混乱，因此建议立即开除他。

这次悲惨的遭遇使他陷入极度贫穷之中，他不得不借钱为自己买了一条裤子。塞万提斯又一次想到用文学来糊口，他把他自己卖给了一个答应每六部戏给他 50 元的出版商。出版商的条件是他的作品像西班牙其他作品那样受人喜欢。在 16 世纪，似乎每个人都能写出一打剧本。因而，这一订单并非小数。

塞万提斯在萨拉戈萨举行的文学比赛中得到了一等奖。一等奖还包括三个银勺子，勺子没有多大用处，除非你有东西需要搅拌。他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同时，在与宗教权威缔和后，他又一次被允许在皇家海军中服役。但是，他是个生来就倒霉的人，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恶运的纠缠。他把从政府借来的几千里亚尔委托给一个准备返回马德里的商人。这个商人答应他一到马德里就尽快把钱交到皇家金库。可是，这位商人却带着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塞万提斯被迫从朋友那里借钱，否则将在监狱中度过他的后半生。

从这些情况来看，塞万提斯似乎并不具有成为好的记帐人的条件。由于这次不幸的经历，他又一次大胆地做起了生意，又一次赔了他最后的一分钱，又一次被投入欠债者的监狱。从此以后，他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他的名字作为作者出现在手抄本的小说上，这本书很流行，讲述了一个奇情异想的西班牙骑士堂吉诃德·德·拉·曼萨的神奇冒险经历。

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这本著名的滑稽剧并没有使作者感到高兴。洛佩·德韦加，这位“人类戏剧的制造工厂”，在一生中写了 2000 多部喜剧和悲剧，告诉他的一个朋友说，他读了《堂吉诃德》的一部分，认为是他看到的最低劣的作品。这可能是出于恶意和怨恨，应该受到反对和唾弃，因为洛佩·德韦加似乎听到

堂吉诃德与其仆人桑丘·潘扎 多米埃画

了在这本尚未完成的书中有讽刺他的内容。为了对西班牙民众的公平，我必须马上告诉你们，当塞万提斯的这本书最终印刷之后，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在它上市的两周内，在里斯本至少有三位出版商弄到了这本书，并日夜赶印他们的非法印本。

这对作者来说可能是一件好事，但从经济角度来说，并不是一件有利的事。于是，塞万提斯诉诸法律，得到了对里斯本出版商实行的强制令，并成为当时的英雄。最后他似乎应该开始走上成名之路。当这本书全部出版之后，在西班牙只要是识字的人都对这本书大加赞扬，并且告诉了那些不识字的人，使不识字的人也同样感到高兴。

这可能会使19世纪的我们感到惊讶。他作为西班牙朴实的贵族，赢得了我的好感，因为他是16世纪西班牙伟人的讽刺艺术大师，但塞万提斯的同代人并不用这样的眼光看他。他们把他当作真正的西班牙美德的代表，他们敬仰他对最理想的骑士风度的无私贡献。这种骑士风度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仅存在于欧洲大陆某些偏远的地方，因为在那些地方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于是，他们渴望知道最后的结局，他们对那些荒唐的情节感到高兴，而没有注意到它对他们北方的比利牛斯山脉的邻居所造成的影响。他们认为对这位不朽的西班牙人的赞扬只不过是他的讣告而已：这里躺着一个西班牙人的灵魂，愿他安息吧！

塞万提斯在今天可能成为金钱和名誉的富翁，但事实上他的成功给他带来的是更大的不幸。在他的著作征服世界之后不久，他就被迫抵御他新的也是最危险的敌人——对他作品的剽窃，剽窃者具有非凡的技巧。他们非常仔细地按照原版的堂吉诃德的形象编造了一系列的堂吉诃德的冒险故事。要区分哪一个是真的堂吉诃德，哪一个是假的堂吉诃德是十分困难的。

在随后的三个多世纪里，即使是最有能力的学者也没能查出

谁应该为这次骗局负责。剽窃者用的是假名费尔南斯·德·阿韦利亚内达。但这对我们并无任何帮助。曾几何时，几乎所有的西班牙作家，从洛佩·德维加（他又一次和塞万提斯和解）到布兰科·德帕茨（一位足智多谋而阴险的宿敌），都涉嫌参与了掠夺应该属于塞万提斯的名誉。

阿韦利亚内达的书是1614年在塔拉戈纳上市的，并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塞万提斯对这样不公平的竞争伤心得无法用语言表达，并担心影响该书续集的发行，于是他比以前更加注重他自己的风格，以表明他是原版《堂吉诃德》真正的作者。按照现代的说法，他力图使他的作品超出“庸俗小说”的范畴，而写出真正的高质量的“杰作”。

但是所有的努力都已为时太晚，终生的烦恼和阿尔及尔数年的监禁生活，还有永无休止的与贫困的斗争开始困扰着他。他已69岁高龄，一生中所做的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1616年4月初，他一病卧床不起，不名分文，居住在镇中一个最贫困的角落里。但他仍然是一个斗士，一个西班牙绅士。几乎和莫里哀一样，塞万提斯继续他的创作，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几名方济各会的第三修道会修士主持了他简单的葬礼。他的遗体被埋在马德里的一个教堂中——一说埋在一座信仰三位一体说的女修道院中。他的墓地始终没有被发现。在他唯一的孩子，一个私生的女儿，于1652年死后，除了他书中的几位不朽的人物以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我们想起塞万提斯。但这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啊！

［塞万提斯（1547年—1616年），西班牙杰出的小说家、剧作家、诗人。其名著《堂吉诃德》是译本种类仅次于《圣经》的近代最多的作品。其父为一位游方外科医生。塞万提斯因家贫而无机会上大学，但通过刻苦自学而最终成为当时西班牙人中读书最多、求知欲最强者之一。曾参加与土耳其人的勒班陀海战。退

役返国时被掳至阿尔及尔，开始长达5年的奴隶生活。1580年返回后因不得志而转向戏剧写作，1582—1587年间共创作了20—30部他自认为优秀的剧本，但仅《阿尔及尔的交易》、《努曼西亚》两剧保留至今。1605年1月在马德里正式出版，全名为《奇情异想的绅士堂吉诃德·德·拉·曼萨》。作品问世后立即获得成功，成为当时最流行的小说。至20世纪，它所蕴藏的深刻哲理才完全为人所领会。作者所得报酬不多，生活依然艰辛。此后塞万提斯又创作了多部作品，如《训诫小说》、《巴纳斯游记》等。——译者附注]

好女王贝丝——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Elizabeth I

（1533－1603年）

她，后人动情地称其为"好女王贝丝"，其实是亨利八世与安妮·博琳并不希望要的女儿——因为她应该是个男孩而不是女孩。当时，在英国人中，希望有个男王位继承人的热望确实是如此强大和广泛，以至于现在我们错了，在谈论一个女人创建了大英帝国的时候，一些小说家们总要偏激地认为我们根据这些有学问的或者并不见得有学问的学者们的说法，看着王子平安降生的接生婆收受了一大笔贿赂，参与了历史上一次最不平常的欺骗行动，而且从来没有人能揭开伊丽莎白原本确实是个男孩这样一个秘密。

伊丽莎白出生时，没有人确切知道亨利是什么时候娶了他渴望得到的安妮，可能是1522年1月下旬举行的婚礼。不过直到同年5月才公开宣布他们结婚了，接着9月份小孩就出世了。那些指望安妮·博琳不怎么样的人（包括大部分英国国民和她自己的大多数亲戚），无疑以这个有点过早出世的孩子作为可靠素材来散布一些绯闻。但是这并不能解释为什么要用一个女孩去替换一个男孩，而且当时大家都知道孩子的父母都祈求要个男孩。这

英國女王維多利亞一世像　圖中之毯係由印度地圖之[illegible]

仅仅使问题稍稍复杂一些，天知道呢，即使没有提到这一额外的秘密和迷惑，放荡的亨利国王的生活本身已够复杂的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段连我自己都看不清楚的历史。我指的是亨利八世的婚事。因此，我只好一页一页地翻开普鲁兹博士写的比较可信的历史简编，尽量忠实原文，一直讲到伊丽莎白坐上王位为止。但是即使有这一保证，我也不能绝对保证完美无缺。

当伊丽莎白出生时，她已经有了一个16岁大的同父异母的姐姐，这是亨利和他第一位妻子阿拉贡的凯瑟琳结婚后的成果。当伊丽莎白还在襁褓中的时候，她母亲就以乱伦罪而被砍了头，而且在她狂怒的丈夫的眼里，仅仅不贞还够不上杀她的头。同时，安妮的女儿被宣布是个私生女，她可能确实是私生女，也可能不是，我们可不知道。在法庭外司法成员杰克·凯契徒然地挥着宝剑和斧子的时候，亨利却能哄骗他的红衣主教和法律顾问作出这些阴险的法律决定，过了这么多个世纪后，我们已经很难再去弄清楚其中的原因了。

伊丽莎白4岁时一定听说了她的同父异母的弟弟爱德华的出世，爱德华是亨利第三个妻子简·西摩生的。西摩比她的两个前任更不幸，在她儿子出生仅12天时，得了产褥热病而死去。此后，伊丽莎白没能如他父亲希望的那样再有更多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不过，不管怎么样，她有了另外三个继母。

首先是来自莱维斯的安妮（让我严格按记录写），她是个丰满的红脸德意志公主，据说是宗教信仰自由的维护者，当时正和教皇公开对立，支持德国的新教领导人。她根本不像微型画上画的那样，当时，欧洲在大陆上这场宗教争斗的鼓吹者们把她送到亨利这里，而亨利又马上将她送回到她来的地方。因为作为公主可以在三天后马上回去，当然不会像仓库里存着的商品那样慢了。

接下来一位是凯瑟琳·霍华德（第五任）。她是在1540年伊

丽莎白7岁时和亨利结婚的。二年后，伊丽莎白的这位新继母遭到了与安妮·博琳同样的命运，她由于在与亨利婚前和婚后的“道德败坏”行为而被杀了头。在她这一案件里，语气好像很确凿。凯瑟琳·霍华德显然有几个旧情人，一个是他侄子，另一个是位音乐家，第三个——对不起，我忘了他是以何为生的。至于亨利与她结婚前为何没有经过更仔细的考虑，我们不太清楚。可能是他极想获得具有很大影响力的霍华德家族的支持，以摆脱某些困境。可是，婚礼刚举行后不久，国王的忠诚朋友克兰默大主教就开始进行私下调查。他先是向新王后的旧仆人打听，不久他通过贿赂一位客厅女仆获得了他想得到的一切情况。带着这些刚获得的消息，他跑到了国王那里，国王陛下听后立即发怒，处死了他的新王后，这至少影响了他的婚姻幸福。

他妻子的一个旧情人被关进了监狱，由于经不住严刑拷打，供认了一切。王后受到了同样威胁，承认这位年轻人所说的都是真的，但她发誓自从与国王结婚后她是清白的。

这并没有对她有所帮助，1542年2月13日，她的脑袋落了地。当时，伊丽莎白9岁。

一年后，亨利娶了凯瑟琳·帕尔（普鲁兹将她列为第六任），国王终于找到了相配的人。这位曾经结过二次婚的女人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事，最后，她成了亨利国王六个妻子中没被杀戮的两个中的一个。

我喜欢凯瑟琳·帕尔，她是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得到了想要的东西的女人。亨利一死，她就嫁给了她的第四任丈夫，爱德华六世母亲、亨利第三任妻子的兄弟，一个喜欢冒险的名叫托马斯·西摩的绅士。她结婚后的狂喜没有维持多久（其实倘若她已经知道那英俊的丈夫正在追求她那位迷人的继女——伊丽莎白——的话，她绝不会如此兴奋）。不过，这倒让凯瑟琳有机会完成了她唯一的一部文学作品，一本题为《对犯罪者伤心》或者

《罪犯的抱怨》的书。我不想把它推荐给大家作为床头读物或者别的什么读物。这是本非常乏味的书，不过，这本书给我们显示了凯瑟琳·帕尔作为一名基督徒，非常严肃地尽了她的宗教责任。

在别的方面也是一样，这位好女人相当重视小主人的教育问题。当她成为王室主人后，她对王室子女非常和蔼、仁慈，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在他们年轻时候差不多第一次被当作人看待。玛丽年纪大了，没法坐下来接受合适的进一步教育，而伊丽莎白和小皇帝爱德华不再像犯人那样了，他们被送到哈特菲尔德堡，在那儿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而且还可以在公园和花园里自由活动。

只是，伊丽莎白还是被当作一名私生女，要不是因为玛丽身体不好，爱德华病弱不堪、活不多久的话，伊丽莎白（不管她是否合法）才不会成为填补王位空缺的唯一人选。伊丽莎白当时15岁，她显得生气勃勃。她并不太漂亮，但是身材很好，而且很聪明。除了这些优点外，她像孔雀一样自负，像都铎家族的人那样傲慢与专横。照理，她应该对她的新的地位心满意足，除了有时有点不太自在，因为她得提防她的继母与恩人凯瑟琳·帕尔的最后一任丈夫的追求。

这位年轻的绅士在追求妻子前任丈夫的女儿时，并不单单出于爱情冒险，爱情冒险无疑是非常好的好事，但它被排在第二位。还有别的考虑，托马斯为他的将来作了小小的计算后，马上就有了主意。假如她妻子死了，假如爱德华死了，假如玛丽死了——那么，他只需与伊丽莎白结婚，就能成为英国的国王！这是如此的简单！

要是托马斯·西摩考虑得更周到些、做事更谨慎些的话，这个极妙的小计划也许会成功。但是当他妻子死后不久，他给自己惹了很大的麻烦。作为英国海军的头领，他放纵自己组建了一支私人的私掠船队。作为16世纪后半叶时期的海军舰队司令，做

些私掠行为不算什么严重的事，但是，自己的私掠船队却与政府的官方私掠船队产生了直接竞争。因此，跟现在社会一样，英国法院对这一事件进行了严密调查，最后托马斯·西摩丢了脑袋。

托马斯死后，伊丽莎白差不多过了四年的快乐日子，在这期间，她的朋友和亲戚当中，没有人再来打扰她，也没有听到没完没了的无聊问话："下一位该是谁？"所以她能自得其乐。她那位和蔼的同父异母兄弟爱德华还在王位上，而他那位不太和气的同父异母姐姐玛丽正坐在她的卧室里祈祷，泰晤士河两岸一切都显得很宁静。可是，在这"尽情欢乐"的外表下面，一些绝不快乐的事正在发生。

托马斯·西摩先生（我前面提到的那位）有一个受他监护的孩子，这是个诚实而善良的孩子，不是那种你在电影里常见到的受监护人。她的名字叫简·格雷，当她才是个9岁的小女孩时就被允许来和凯瑟琳·帕尔生活在一起。凯瑟琳死后，她照理应该回到她的父母身边，但她拒绝回自己的家，而且根本无法动摇她的决心，她的这一行为我们无可指责，从很小的时候起，她父母（她母亲是皇室成员）一直虐待她。注意到女儿的早成，他们转而想把她培养成为一个少年奇才，他们向她那纯洁的脑子里灌输拉丁语、希腊语、阿拉伯语、希伯莱语和闪族语，这使她那小小的脑袋差点爆裂。到了帕尔家里后，她被允许成为符合她年龄的孩子，她喜欢去乐园玩，更喜欢去亲爱的凯瑟琳阿姨那儿玩，还有凯瑟琳阿姨的丈夫曾许诺有一天她会嫁给年轻的爱德华国王，成为一个头戴王冠的真正王后。这个可爱的计划确定时，两个孩子都才11岁，小小的简女士当然不得不耐心等待，这倒使她有空多学几门语言。

是爱德华打碎了她的梦想。他的身体一点儿也没有好转，人们甚至越来越怀疑他能否长大成人。因此，经过爱德华的同意（爱德华作为男人，一点儿也不像他的父亲），简小姐悄悄地嫁给

了诺森伯兰郡大公的四公子，诺森伯兰郡大公当时是王位后面的有实力的人物。

然而，简发现自己刚跳出油锅，又进了火坑。诺森伯兰大公一家是一群坏蛋。简不久就对他们恨之入骨（可能是有点小孩子式的憎恨），其中她最恨的便是她的丈夫。她试着重新去学古老的东方语言，以便从中获得安慰，她当时受教于约翰·诺克斯[1]的对手，有名的严厉而博学的阿尔迈博士。

啊！语法书证明只不过是欢乐家庭生活的一种并不怎么样的替代物。简女士得了一场重病（非常不幸），不久她恢复了健康。同时，诺森伯兰大公一伙正在大忙之中。由于他们是新教的坚定支持者，担心亨利和阿拉贡家的凯瑟琳（普鲁兹列其为第一任皇后）的女儿玛丽将继承简·西摩（普鲁兹列其为第三任皇后）的儿子爱德华的王位，这将出现一场维护天主教的激烈行动。因此，诺森伯兰大公决定让爱德华签署一份文件，写明一旦他退位，即由简·格蕾继承他的王位。

1553 年 7 月 6 日，爱德华去世，死时还不到 16 岁。同样年龄的简·格蕾被宣布成为女王。当她得知自己已登上王位时，她震惊得晕了过去。随后，她接受了她的这个新称谓，当然是出于对她父母和亲戚的尊从和压力，对于强加在她身上的高位她其实一点儿也不热衷。

9 天后，亨利和阿拉贡家的凯瑟琳生的女儿玛丽的军队开进了伦敦。小女人简·格蕾被抓了起来，并被送进了伦敦塔。数月后，小女人简·格蕾的脑袋被残酷地砍离了她那可爱的双肩。简·格蕾的故事对她的同时代人来说一定非常的可怕，当这一切发生

① 约翰·诺克斯（1514? —1572 年），苏格兰宗教改革家和史学家，创立苏格兰长老会（1560），与他人合著的《苏格兰教会信仰声明》被定为苏格兰国教纲领，著《苏格兰宗教改革史》。

时，伊丽莎白公主已经 20 岁。

这一悲剧一定使她感到了自己命运的强烈预兆。她的同父异母姐姐玛丽成了女王，可是玛丽是个年老的女人，而且是个狂热的天主教徒，而伊丽莎白却是接近新教的人。因此，玛丽不得不面对她那位不太合法的妹妹，她认识到，一旦她无意中死了，伊丽莎白就会成了她的继承人。为了阻止这一事件的发生，她与查理五世的儿子、令人讨厌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结了婚。菲利普曾经发誓只要给他六年时间，在他统治的地盘上将不会有一个活着的异教徒，并且要使他的敌人改变信仰。

勇敢的英国人害怕西班牙的宗教法庭在他们中间成功建立，勇敢的英国人暗暗捏紧了拳头。不久，有流言说计划宣布由伊丽莎白接替她姐姐出任帝国统治者，而且流言越传越广，伦敦塔里的刽子手们充满希望地认为要收入大涨了。

此时，伊丽莎白已经非常精通掩饰之道，这对她非常有用，她不得不假装服从和热爱君主，其实只要有机会她就会把她姐姐送上绞刑架。此外，她还学会了捉迷藏。西班牙国王菲利普的谋臣们再次试图说服他们的国王陛下为了他自己和他妻子的安全，他最好立即将那位顽强、坚定的英国公主除掉，伊丽莎白通过她的耳目一旦获得消息就有效地隐蔽起来。

菲利普认识到只要他想做就能办到，因为他妻子玛丽已经深深爱上了他，只要他要什么，她都会给他。1554 年 3 月份，事情终于发展到了伊丽莎白以某种“监护”形式被送进了伦敦塔。可是，英国人还是排着队去看这个都铎王朝式的人被砍头的场面。因为他们已习惯了看皇族人员的鲜血，即使这位特别的公主已经在法律上被认定是个私生女。

这时，作为新教支持中心的议会，立即挺身站出来为他们的公主辩护。而且，他们已经根本不想去听伊丽莎白已被排除作为王位继承人这样的话。当有消息说玛丽即将宣布由他的西班牙丈

夫作为英国王位继承人时，议员们就更不想去听不利于伊丽莎白的话了。这个预想中的事件不久便证明是个没有成为现实的故事，但是总有一天现实可能真的到来，这样英国的新教事业将会消失殆尽。未来看上去确实很暗淡，因为女王不仅在忙着从未实现的计划，而且，她还利用她的业余时间（除了给她亲爱的菲利普写信求他从西班牙睡到她身边来），把那些天主教支持者集结到她的身边来。而且，由于玛丽残酷镇压新教教徒，很快获得了“血腥玛丽”的称号。

伊丽莎白被囚禁在伦敦塔中2个月后，玛丽谨慎地放出声来说伊丽莎白还有“希望”。这就为伊丽莎白的朋友们坚持要求女王采取一项仁慈行动找到了极好的借口。玛丽宽厚地同意了她那可爱的妹妹去哈特菲尔德堡，让她在那里继续学习拉丁语、希腊语以及别的与治国之道无关的知识。

伊丽莎白自然想获得公众的支持，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就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人们可能会忘了她。因此她开始为自己编了一个有关可怜的英国公主的感人神话，这位公主的血管里没有一点外国血液，她还是个与天主教誓不两立的新教徒，她能和英国卖鱼场里的妇女一样说一口纯真的英语，她喜欢所有的英国式体育运动，（她的家庭教师阿希姆博士不是写了本有关射箭的极好的教科书了吗?）她能和英国海军的水兵一样大杯大杯地喝英国的淡啤酒，可是具有这些优秀品质的这位公主却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因为那些袭击了那不幸的祖国、发誓要将英国变成天主教一块圣地的外国冒险者已经控制了她。

其实，这里边人们并不知道，他们那位美丽的英国公主显示了一手漂亮的意大利式的手腕，这是她从一个名叫巴尔达萨·卡

斯蒂廖内[①] 的很有名气的米兰国际法专家那里学来的。这位国际法专家为王子们写了一本名为《侍臣论》的行为指导书，书中列出了王子以及其谋臣们希望完善自己的几项原则，以便他们掌握依照既定计划、凭着自己的思想和方法去获得统治权、又不会被砍头的复杂艺术。

英国人现在只对一件事感兴趣，那就是他们如何才能摆脱天主教徒玛丽的统治、保留一个对新教信仰者安全的帝国。人们很容易忘记过去，普通的英国人开始怀念起好国王亨利统治的时代了，亨利曾是个杰出的直言不讳的男人，就是在婚姻方面稍微有点随便，更换妻子太快了点。而今是她的女儿（上帝保佑她！）要像两个世纪前那样去迎接一个非英国人血统的王位继承人的挑战。这位可爱的年轻女人——一个完完全全的英国人，正生活在断头台的阴影下。而她的姐姐、嗜血的玛丽，这个只有半个英国人血统的（而且还嫁给了一个西班牙人）却在将他的清教徒臣民大批送往塔尔蓬监狱，并且在威胁着她自己亲人的生命。

这样一种状况是令人无法容忍的，情况在迅速恶化。糟糕的是一切正在慢慢变成现实，某一天天主教政权一旦重新确立，亨利国王时代的帝国将从基督教徒手里重新回到过去那帮可恶的主教和修道士手里。正当此时，仁慈的上苍应答了所有有诚心的清教徒们的祈求。1558 年 11 月 17 日，玛丽死了，伊丽莎白在大众欢呼声中继承了王位。

这位新女王继位时 25 岁，她将在今后 45 年内统治英国。她终于安全了，她自己也这么想。但是另外一个玛丽——一个比她的同名者更危险的人物——如今正从地平线上升起，将把伊丽莎白统治的最初 29 年搅和得与任何过去时代一样的不安宁与危险。

---

① 巴尔达萨·卡斯蒂廖内（1478—1529 年），意大利外交家、侍臣，所著《侍臣论》用对话体描述文艺复兴时期理想贵族和侍臣的礼仪，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这位玛丽是苏格兰女王，她父亲是苏格兰国王詹姆士五世，母亲是法国吉斯家族的女公爵。他们俩人于 1539 年举行了神圣的婚礼，1542 年生下了他们的女儿，随着这个孩子的诞生，世界掀开了罕见的麻烦的一页。

我只能给你描述一下这一有名事件的大概。苏格兰的玛丽与她的英国表姐伊丽莎白正好相反，当人们正看着这位漂亮的法兰西—苏格兰公主的蓝眼睛的时候，她丢了脑袋（常常是在毫无痛苦、不说一句话的时候丢了脑袋），却从来没有人指责英国的伊丽莎白。也许是真的，对她来说，天性被艺术地掩盖了，据记载，当刽子手们提取她的脑袋给那些目击处死她的人看的时候，发现她那出名的金色头发并不是她自己的，而是头假发，这使他们非常失望。不管如何，我倒愿意相信，她在肮脏的牢房里呆了多年后得了病，才不得不借助于这点小小的美容手段来帮助。在她坐牢以前，她那迷人的魅力一定是可信的，一定是属于她自己的，否则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痴情人为她而争吵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反复地被我们最杰出的剧作家和小说家描写，我这里就不去一一列举他们了。我就从 1565 年说起，那年玛丽经过像任何一位现代雷诺女主人的异想天开之后，终于与达恩利勋爵亨利·斯图亚特结了婚。他当时想当苏格兰国王。据说他是个倾向天主教信仰的人，这在玛丽看来或许是一大可取之处，但对他妻子的臣民来说就不太受欢迎了。他的优柔寡断、他的粗俗、他的浪费习惯很快使得玛丽讨厌他了。作为女人，玛丽从与她的意大利情人戴维·里齐奥相处中找到了安慰。

这位年轻人起初到苏格兰来时是萨瓦公爵派往苏格兰一个使团的成员。任务快完成时，他留了下来，在一个为王家演出的四重唱组里唱男低音。就在那个时候，他认识了达恩利一家。这个聪明的、非常清醒的年轻意大利人很快就觉察到了这对女王夫妇的不合，觉察到了玛丽正需要有个人去依靠。而他正是她所需要

的人。不过据可靠材料表明，非常奇怪的是，他在试图接近这位王室情人位置过程中是非常小心的。里齐奥照例应该在皇床后面成为一个有权力的人物，可他是个喜欢炫耀的人，他那喜欢穿着华丽的习惯很快给他惹来了麻烦。因为在苏格兰，任何形式的奢侈、浪费现象就如同在一头公牛面前抖红布一样。没过几个月，这位意大利人的漂亮打扮（与别人形成鲜明对照），使得他在本地显贵当中很不受欢迎，同时，他身上的丝绸缎子和他帽子上的精美羽毛遭到了社会低层民众的极大忿恨。他用甜美的芭蕾与情歌去扰乱女王思维的能力也遭到了每个人的疑心。

要让女王去怀疑一个她极其欣赏的人，这可比做世上任何一件事都难。如果把这个讨厌的傲慢的人清除掉的话，爱丁堡的许多人都会受益。他们便跑到了达恩利那里给他说些暗讽的不愉快的悄悄话，达恩利那好冲动的脑子立马起火了。就在他自己的屋檐下，让一个意大利芭蕾歌演唱者给他戴了顶绿帽子，这使他那苏格兰人的自尊心无法容忍。1566 年 3 月 9 日的晚上，达恩利的一帮朋友闯入皇宫，冲进女王的寝室，将里齐奥剁成碎片，然后把他的尸体扔出了窗外。

玛丽保持了她的平静。她当时已经怀上了孩子，因此当时她除了保持沉默没有别的办法。到了 6 月，她的儿子出世了。他被命名为詹姆士，长大后将成为苏格兰的詹姆士六世和英国的詹姆士一世。

对于这个孩子的合法性几乎没有任何可怀疑的，因为他长大后和他父亲一样有点口齿不清、手脚不灵活。

这位父亲，此时正在度过他在地球上的最后时光（尽管他不知道)。第二年的 1 月上旬，他病了。那时和他接触的每一个人(包括新教教徒和天主教徒）都非常讨厌他，相反地，玛丽却获得了短时间的好名声。她决定把她丈夫送到乡下去，在那里他或许能恢复健康，而且还使她的眼前清静些。基克费尔德的一座乡

下庄园被选中作为他休养的地方。

2月9日那天，玛丽去看望病人，当天晚上回到爱丁堡。几个小时过后，那所房子被藏在地下室里的几桶火药炸上了天。第二天，人们在达恩利房外的灌木丛里发现了他和贴身仆人的尸体。显然，他们在爆炸中幸免于难，并设法逃了出来。但是，预谋的人估计到了这点，他们躲在周围的树林里，杀死了主仆两人。

苏格兰人突然担心起来。不到一年的时间在王室里发生了两起谋杀，即使在这个凶杀并不见怪甚至还被认作是政治游戏的一部分的国家里，情况看起来也不妙了。

不久，流言在周围传开了。人们传说玛丽此时准备嫁给鲍斯威尔伯爵，此人据说是谋杀达恩利的主使。苏格兰教会最终有了确凿的理由斥责这个法兰西无耻放荡的女人是真正的祸首，并要求采取行动，来拯救苏格兰的灭亡。为了平息他们的愤怒，玛丽与她的杰米在新教教堂举行了婚礼。但这为时太晚了，因为民众已经了解到这个高贵的伯爵曾有过几个妻子，并且他是否与他的最后一位妻子在法律上解除了关系依然十分可疑。

这一举动终于使苏格兰女王失去了粗犷的苏格兰人的支持，整个苏格兰起来反对她。玛丽女王不得不送鲍斯威尔离开苏格兰。而她本人被带到洛赫莱文，那是个位于湖中心岛上的城堡，因而它被视作是囚禁玛丽的理想之地。

然而，玛丽这个女人懂得如何利用她那双充满魔力的眼睛。她迷人的双眼使其中一名看守把自己锁了起来，而玛丽却大步走出了前门。

玛丽现在重获自由，但不明白为什么苏格兰人再也不能接受她。她匆忙聚集了一些忠诚的王室旧亲信，勇猛地朝她的敌人宣战。她被打败了，由于无法从海上逃离苏格兰，她躲到了英国，请求表亲伊丽莎白给予庇护。

伊丽莎白同意了玛丽的请求，显示出其本性所能给予的最大的宽容（当事情符合她的目的时，她可以表现得很大度），她高兴地接纳了这位亲爱的表亲，并乐意保护她来对付她以前的臣民。而后玛丽受到了监禁，一呆就是19年，成了伊丽莎白女王的一块心病，越来越使女王感到烦恼和不安。因为在英格兰天主教从未消亡过。天主教徒的活动仅仅是转入了地下，就如同似乎被扑灭的森林之火，当人们转身离去后又会死灰复燃。

当伊丽莎白刚继承了“血腥玛丽”女王的英格兰王位，那些信奉天主教的大家族就已从公众的生活中消失了。他们仍然怀着共同的理想，但找不到合适的理由使之成为发生冲突的原因。因为伊丽莎白是一个通达的女人。她并不反对诚实的天主教徒，只要他们不干涉别人的信仰，不在公开场合称她为王室的私生女或企图谋害她。现在，随着苏格兰女王玛丽的到来，少数派天主教徒感到有了可以聚集在一起的理由。玛丽在欧洲大陆有许多朋友，所有天主教统治者都支持她，皇帝站在她的一边，教皇和法兰西国王又毫无疑问地热爱她。至此，盼望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天主教徒急不可待地卷入了一场长达19年的争斗之中。整个欧洲都为之关注，却始终不清楚谁终将获胜。

桌子一边坐着伊丽莎白，棕红色的假发和搽着脂粉的双颊。另一边优雅的苏格兰女王玛丽用良策悄悄耳语，聪明地指点着那些谨慎的顾问们。所有欧洲的统治者围成大圈站着，打着各自的算盘，四处插手，为这场争斗最后的结果暗中下赌。

一开始看起来玛丽似乎会获胜。但她玩的是女人的把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伊丽莎白的作风变得越来越男性化。玛丽，如我所述，不仅是个贵妇，而且还是一个不肯悔改的骗子。伊丽莎白明白这一点。玛丽发出的每一封信都被截取，仔细检查，重新缄封后再送出去，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旦发现玛丽又在谋划暗害她表亲的生命时，对玛丽的看管会进一步严密，并明白无误

地暗示这种行为最终会给她带来什么样的命运。玛丽随后谦卑地向其表亲的一再仁慈表示感谢。然而就在第二天，她又会策划更加诡秘的阴谋把英格兰从那个拒绝信仰天主教且掌握其命运的该死的处女手中夺过来。

时间就在无休止的阴谋中流逝。今天，我认为基督教社会以外的人民和一些不妥协的爱尔兰人也同意这样的看法，即最终伊丽莎白已别无选择，只有除掉对手，这是个可以确保绝对有效的唯一的办法。

1586年，一个新的谋害伊丽莎白的阴谋被揭露了。玛丽从前的一位侍从安东尼·巴宾顿从中串联，安排了一切。玛丽完全卷入其中。她受到了审判，并被判处死刑。伊丽莎白因在过去的30年中太多的人被她送上断头台而不愿再引起不快回忆。她拒绝在死亡执行书上签字，并声称如果她砍掉苏格兰国王詹姆士母亲的头，那么会在她和这位可能的继承人之间引发事端。

那段日子英格兰处在恐慌之中。有关西班牙正在组建一支由几百艘海船组成的庞大舰队，要以天主教的名义来征服英格兰的谣言使每个人紧张不安。民众想要除掉这个苏格兰祸根，正是她勾结他们的敌人，企图在某个宁静的夜晚，把所有新教徒谋杀在他们的睡梦中。伊丽莎白却仍在犹豫。处死一名王亲与处死区区臣民不同。如艾塞克斯，他满以为可以凭借他与伊丽莎白女王所传闻的亲近和恩宠，可以把自己当作女王宫庭的情人而趾高气扬，最后招来杀身之祸，被女王送上了断头台。

还是玛丽的儿子詹姆士解决了问题。只要苏格兰国王詹姆士稍稍暗示他想保全其母亲的生命，伊丽莎白就可从她不得不作出最困难的决定中解脱起来。但不善言辞的斯图亚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想要的是英格兰的王位，他告诉伊丽莎白，如果她能保证他继承英格兰王位，他本人将设法化解地母亲过早“崩驾”所带来的悲痛，对作出判决者不记恩怨。

斯图亚特用这封希望化解自己的悲痛的不光彩的信，在其母亲死亡执行书上签了字。1587年2月8日，清晨的钟声响过8下，一名粗笨的刽子手从玛丽美丽的双肩砍下了她的头颅。伊丽莎白注定要在她的余生中记住那一刻：什鲁斯伯里伯爵出现在女王的密室里，禀告女王陛下，一切都过去了，她的对手将再也不会扰乱英格兰王国的平静了。

我想，我现在应该告诉你关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伟大的征服——奠定伟大帝国的基石是怎样总是与她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但你在学校里已经学过这些，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存在于这两位不同寻常的女人身上的心智——它们决定了斗争的胜负，而不是在这两个最著名的女人之间所发生的所有的斗争史实。

实际上，玛丽在各个方面都优于伊丽莎白，玛丽美丽动人，受过更好的教育，浑身充满了魅力，这是伊丽莎白明显所缺乏的。伊丽莎白认识到了这点，但我不认为这种个人的怨恨和嫉妒与她最终决定把玛丽送上断头台的决定有多大关系。

当伊丽莎白签署玛丽的死亡执行书时，她已54岁了。她的生活一直是艰辛的，她学会了怎样控制自己的感情——也许她从未有过特别的感情。即使玛丽拥有她的情人，即使玛丽能用目光使一名看守从此沦为她忠实的奴仆，但玛丽记住，这个相貌平庸、衣着考究的老处女具有她从未企望过的东西——对她的国家至深至诚的感情。这种感情影响她作出的每一个决定，并支配着她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玛丽竭力寻求一种生涯。

伊丽莎白志在奠定一个国家。

最终，两位女人都如愿以偿，而整个世界第一次目睹到那个奇迹般的国家——大英帝国。

［伊丽莎白一世（1533年9月7日—1603年5月24日），英格兰历代最伟大的君主之一。1558至1603年在位。亨利八世之女，1558年11月7日即位。任期内实行宗教和解，恢复英格兰国教，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1588年），奖励工商业，着力发展英国对外贸易，促进了文化艺术的繁荣。在她统治时期，出现了莎士比亚、培根、克里斯托弗·马洛、埃德蒙·斯宾塞及其他许多著名作家。伊丽莎白一世终生未嫁，而把全身心投入国家稳定和发展上，深受臣民爱戴。——译者附注］

北极探险先驱——

海姆斯凯尔克与巴伦支

Heemskerck, Jacob（1567—1607年）　　Barents, Willem（约1550—1597年）

现在我们是在阿姆斯特丹，时间是1596年11月初。这个城市最后站到了奥兰治亲王的一边，并加入了反对西班牙国王的起义行动。全城都在忙忙碌碌做生意，因为现在大家可以再一次自由地做买卖，不管是在哪里，还是和谁做交易，只要你愿意。这是那些北海地区精明的渔民最得意的时候。可以从许多牡蛎中发现珍珠，而过去这些牡蛎一直被看作是天主教国王陛下——那个给人们极坏印象的、总是板着脸的菲利普二世——的专有财产。

当然，我们接受的物品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墨丘利神[①]是最靠不住的一个神，总是用一种无法预料的状态来颠摇抖动他的秤。今天他要使六个人破产，这六个人以前一直被人们看成是证券交易所的台柱。明天他会把上百万美元扔进一些在夜间潜逃躲债的投机商人的怀抱，这些人平时连一个煮粥的锅也没有。光是在去年，一个本来最有前途的企业——人们认为那是绝对保险的——却落得一个悲惨破产的结局。确实，大部分的钱并

① 墨丘利神，是罗马神话中的一个神祇，众神的信使，司商业、手工技艺、智巧、辩才、旅行以至欺诈和盗窃的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赫尔墨斯神。

非从私人腰包里拿出来，而是阿姆斯特丹市政本身提供的，但到头来情况仍然一样，市民们不得不付出附加税来补救地方长官的亏损。然而，没有人抱怨。因为真要是探险成功的话（因为当时一些最有学问的地理学家预言必然成功），那么荷兰联合王国就会有一条自己的通往中国和东印度群岛的航路，荷兰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

在那时候，通往东印度群岛的航路仍然操纵在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手中，无人能与他们竞争。但如果荷兰人能发现一条从大西洋经过亚洲北部到太平洋的新路线，那么低地国家的商人就不必再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去买香料和丝绸了。他们将不需中间商，而是直接到产地做买卖，那意味着可获得三倍到四倍的纯利润。

因此有两艘船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想试一试经过切柳斯金角去东北方的一条路线。从荷兰一直到把俄国大陆与新地岛分开的那个海峡（指“喀拉海峡”），这一段航线人们还是比较熟悉的。那个海峡对于阿姆斯特丹的父老来说具有巨大的魅力。因为海峡就是一个狭隘的通道，连接着两个海洋。只要你用几门炮在海峡口设立了要塞，你就可以封锁海峡，不让局外人进入，从而就控制了一块属于你自己所有的可爱的小垄断地区。

把垄断控制作为获取商业利润的唯一可靠途径，这种中世纪的理想像幽灵一样闪现在这些16世纪商人的头脑里，所以他们把这两艘船装备了各种不同口径的大炮，并满怀希望地把贸易货物交给他们的船长来管理，这些货物对于信奉异教的中国人来说可能是有吸引力的。当这些深入极北海域的船只失事时，带去的军械大炮也都全部丧失了。但那些老水手们有一种典型的使命感和忠诚感，尽管船只失事了，他们却带着托交给他们的全部货物乘坐没有甲板的船回来了。他们也许会丢了性命，但生意归生意，信任归信任。

被选定进行这次冒险的这两艘船都不大，也不适合远洋航行。但谁又愿意用新船去干这种冒险的勾当呢？其中较小的一艘船由扬·科内利松·德赖普船长指挥，另一艘船则由雅各布·范·海姆斯凯尔克指挥。

这位雅各布·范·海姆斯凯尔克是具有实践能力的人。他出生于一个优秀家族，而在1595年，出生好家族的人是很少到海上去的。人们认为做那种事不高尚，海姆斯凯尔克却是例外。他受过良好教育，在当时还是一个很好的科学家，而且他已经有了一些在北冰洋航行的经验了。

但真正的探险英雄是一位名叫威廉·巴伦支的人，生于荷兰省北部北海中的一个叫特塞尔的岛上。他起初当过船舱服务员，所以是经历了艰难的生活磨炼而上来的。他以前两次去过北方，对西伯利亚沿海情况知道得比其他人多，所以阿姆斯特丹市长聘用了他。

我想像他是一个矮胖粗壮的人，蓄有一脸修剪得很整齐的瓦形水手胡须。他的动作总是不慌不忙，镇定自若。他是个虔诚的信神的老船长，性格上有着强烈的保守顽固色彩。这种保守特色最明显地表现在他对太阳回归路线的估算是极其错误的。几个世纪以来，这一错误使科学评论家对于著名的1596年航行情况的判断产生了极大混乱。像老威廉·巴伦支这样一位细心的数学家怎么会在计算中出这么大的差错？后来他们才明白，威廉·巴伦支是在“旧历法”下成长起来的，而不愿意接受“新历法”，那时新历法刚刚开始被大部分具有现代思想的航海家所接受，作为唯一准确可靠的时间表。

然而，当他的船在喀拉海的冰块中失事毁坏之后，正是他的固执脾气显示了巨大的价值。如果没有一个像他这样水平的领导人来指引那些船员脱离灾难的话，那就很难令人相信那些船员中还能有人生还，来叙述他们冒险的经历。所以，让我们为老威廉

的坚强精神祝福吧，因为他把自己的残骸留在了俄罗斯的荒凉海滩上，而让其他人安全地返抵家园，那是人们对遇难的探险队长所能表示的最高的敬意了。

还有一位高级船员需要提一提。那就是医生（当时人们称他为理发师兼外科医生），叫赫里特·德费勒。他是一位万能博士，而且具有乐观的精神，他被称为这次向冰冻的北极进军的官方书记员，这是他应得的荣誉。他强迫每个队员至少必须注意个人卫生，而且每天必须做体操，尽管他们大伙儿宁可坐在自己小木屋的火炉前度过整个冬季。当可怕的坏血病开始出现的时候，是他告诉大家吃苔藓（地衣）。又是德费勒（他作为某种音乐家，本人吹笛子）组织那些业余戏剧演出，使全队 17 人在不得不关进小木屋里度过整个冬季并抱怨无所事事的情况下保持了旺盛的士气。

没有遇到任何困难，这两艘船就到达了北冰洋。一到了那里，德赖普与巴伦支对于下一步的航线就出现了分歧。巴伦支主张往“正东北”方向走，而德赖普认为应该往“东北偏西”方向走。当两个荷兰船长在某一方而顶着牛时，对他们二人来说，只有一件事可做，那就是各自按照自己的最好的判断去找出路。两位船长于是分道扬镳，德赖普向北航行，而巴伦支则继续朝东走。巴伦支朝着这个方向又航行了几个星期，使他发现了斯匹次卑尔根群岛，这是一片怪石嶙峋的荒山野地。从斯匹次卑尔根出发，巴伦支和海姆斯凯尔克再次向东航行，直到他们抵达新地岛的海岸。然后他们向北，绕过毛里求斯角，当他们看到喀拉海不冰封的海面时，他们觉得幸运极了。根据阿姆斯特丹制图者告诉他们的情况，从这里出发，到切柳斯金角，只有很短一段航程，而且很容易走，切柳斯金角是亚洲大陆伸至最北部的尖端，从那里往正南方向走他们就可到中国了。

但一到了喀拉海，他们的麻烦就来了。那时正值 8 月中旬，

北极的冬季即将到来。有一天早晨他们醒来时发现船身已与海面的冰层牢牢结在一起了。在使用甘油炸药的年代之前（1896 年用了炸药使“弗拉姆”号得以自由），那是无法在冰封的海面上挖掘出一条通道，让船只前进到最近的不冰封海域的。海姆斯凯尔克和巴伦支研究了形势，得出的结论是他们已陷入了困境。他们必须准备在北极地区过冬，到明年春季才能试试运气。

这是白人第一次被迫面对着漫长的北极之夜的各种艰难困苦。我想，整个航行中最愉快的就在于领队的两个人之间的完全合作。稍年轻的一位名义上是队长的海姆斯凯尔克，得体地、大方地承认比他年纪稍大的下属巴伦支有更出色的智慧和经验。他们之间从未有摩擦，有的只是那样和谐的相互理解，以致在随后航行中遇到的种种情况下，威廉·巴伦支成了实际上的探险队长(而德费勒写的书在好几个世纪中保持了国际上最畅销书的地位)。

他们现在不得不准备好六个月的越冬生活。他们意识到必须彻底抛弃这艘船。因为冰的压力越来越大，必然会把船身挤碎的。因而要利用木料来建造一所房子，足以容纳 16 个人起居。船上的木匠在铺好了地板后就撒手离开了人世，好在 16 世纪时每个水手或多或少都会做一点木匠活，用起斧子或刀来，与专业木工不相上下，所以建造房子的工作继续下去。

那艘船本来就停泊在新地岛东北海岸的一个小海湾里避风，那个地方也正是造房子的最佳所在，于是就在那里造了一所房子，而且从那以后这所房子一直留在那里。那里木料的供应很充足，不仅可以从船上拆下木板，而且从西伯利亚北部海岸向西流过来的洋流（正是这股洋流，三百年后南森利用它把“弗拉姆”号推进到北极极地）把大批枯树带到了新地岛东海岸。把这些树木从海岸拖到内陆来，是件很辛苦的工作，而且由于两名船员病

得无法干体力活，其余的人只好什么都干。

建造屋顶是最困难的。水手们想出办法造了一个平面框架，然后用一张船帆钉在框架上，上面再铺上一层沙子压住。然后老天爷帮了忙，下了雪，把沙子盖住。雪又结成冰，这样，这个屋顶就稳妥了，直到来年春天的雨水把它溶化掉。

他们没有石块垒烟囱，但大部分船员都记得小时候在农村庄园里的情形：火在地面中央燃烧，烟上升，通过屋顶中央的一个洞排出。他们懂得气流的道理，为了使屋顶中央的洞有更大的通风吸力，他们用一个旧的大桶作为烟囱顶管。但他们对通风的知识知道得实在有限。有一次在1月份一场大雪暴中，一位自作聪明的小伙子想出了一个主意要使屋内温度升高一点，就把烟囱口用垫子堵塞死，而且烧的又是船中宝贵的煤，而不是平时烧的漂来的浮木，想使火力更旺些，结果整个探险队几乎窒息而死。幸好，外科医生德费勒——他总是尽职尽责的——及时醒来，神智还清楚，立即把门踢开。从那以后，他们就再也不敢任性做那种傻事，而宁可躺在床铺上冻得打颤。

然而，他们常常被叫醒起来。他们的独出心裁的理发师用一个旧的啤酒桶做了一个蒸气容器，并要求每个人每周至少用一次。睡在床铺上的船员都靠房子的南墙排列着。巴伦支的健康状况不佳，专为他提供了一张特制的床，放在火炉边上，他的床右边是餐桌，餐桌上还放着一个沙漏（计时器）。除了沙漏，他们还有一只正常的钟，这表明这些船员的思想已经相当现代化了。在1596年，很少有几艘船出海是带着钟的。因为那时人们认为，出海航行一是靠上帝，二是靠推测，作一点补充的推测没有什么坏处，此外，可怜的探险钟不久就完蛋了。它怎能不完蛋呢？在半天时间里它的内部结构经受着烧烤，而在另外半天的时间里那些机件冻得僵硬，而且那个时期制造出来的钟没有一个能经受得住这样粗暴的对待。当他们的钟不再能嘀嗒作响的时候，他们就

只好靠沙漏来告诉他们日期和星期，并且还要有一个人守着，当沙子全漏到下面时再把沙漏倒转过来。

整个屋子由一盏吊在天花板中央的简单油灯照明着，盛满水的一个大锅放在火堆上方。这样屋内有了一定量的湿度，而且可以向每个人提供热水作汤喝，当室内一切安置就绪时，这个居所被正式命名为“安全庇护所”，船员们都搬了进来。

然后，漫长的围困就开始了。

12月份连接不断地发生雪暴。不久，屋外堆积的雪已经达到屋顶那么高了，船员们如果想要从外面运送一些新鲜柴禾进屋，就必须从烟囱处挖一条隧道通到外面。

一些狐狸被屋内烹饪的香味所引诱（这些香味是通过屋顶上作为烟囱口的大桶传送出去的），老远跑来，在屋顶上蹦来跳去。一开始，船员们对于狐狸的骚扰十分烦恼。但不久他们就发觉这是一个最好的捕狐机会，用不着他们跑出去老远去安放捕兽夹子。不到一星期，他们已经获得了大量的狐狸皮了。他们用狐狸皮不仅做衣服、帽子，而且还做鞋袜。他们从荷兰带来的鞋子已经毫无用处。由于这些鞋子老是被雪水浸湿，所以经常要放在火堆边烤干，以致鞋底都裂开了大口子。然而，水手们很聪明，善于用刀子。他们从漂来的树木中雕刻出木头鞋底，然后缝上狐狸皮作鞋帮，结果在整个漫长的冬季，没有一个人的脚指再挨过冻——这简直是北极探险队的一项新纪录，尤其是三百年前创下的纪录。

他们受的苦难在元旦那天达到了高峰，因为可怕的狂风在岛上已经吹了整整一个星期，谁也无法走出屋外去拿树木，“安全庇护所”的居民们就只好烧掉他们自制的家具来取暖。

元月6日是东方三博士[①]节，雪暴已经平静下来，但船员

---

① 东方三博士事见《圣经》，指由东方来朝见初生耶稣的三贤人。

们的情绪相当低落。船上多才多艺的理发师觉得，这时搞一次小型联欢会倒是个好主意。船上大副被选为“新地岛之王”，然后准备了一次特别的宴会，并且在荷兰国内庆祝三博士节的各项活动，他们也一个不漏地举行了。宴会的菜谱，读者如感兴趣，可以告诉你们包括薄煎饼以及泡在热葡萄酒里的饼干。

就这样，漫长的冬季过去了，有一天在远处地平线上再次出现一线光芒，“囚犯”们知道，他们“拘留期”的最苦难的日子就要结束了，他们可以开始到两艘船上工作了，以便海面一旦开冻，就可乘船回到安乐世界。

露天工作对他们的健康大有裨益，因为在漫长的冬季岁月中他们很少走出屋外来。在1月份，又死了一名水手。他是葬在新地岛的最后一人。3月初，冰块终于开始化裂，但他们不得不等到6月才真正扬帆启航，挥泪告别了长时间作为他们家的那个坚固的小木屋。屋门要锁好封好，以防止熊和狐狸闯入。在锁门之前，威廉·巴伦支写了三封信，叙述了他们的冒险经历，其中一封信存放在牛角制的大药桶里，并吊在烟囱中。三个世纪后人们发现了它，保存得依然十分完好。

6月13日清晨，威廉·巴伦支和另一名虚弱得不能走路的水手一起被运送到船上。他们的航路是先向“正北”，直到他们抵达岛的北端。从那里他们驶向“西南偏南”，他们终于来到西伯利亚的北岸。从那一点出发，他们沿着海岸线走，希望能到达白海的海口。巴伦支尽管病得不轻，现在被迫在一条无甲板的船上生活和睡眠，但从未停止过进行必要的航海观测。他把他们发现的一些地“角”细心地也很准确地标在地图上，因为其中许多地方今天来看是要用荷兰名字命名的，他们在哪里发现，就应标在哪里。过了10多天，那个患病的水手死了。然后，有一天早晨老威廉·巴伦支的灵魂也向上帝去报到了。他的身体静悄悄地进入长眠状态了。

终于他们到达了一个地方，那里必定是白海的海口。他们自造的小船漏得很厉害。乘坐小船的人都坐在齐腰深的水里。小船的桅杆已经折断，破烂的船帆满是窟窿。他们每次想登岸，就立即遭到成群结队饥饿的北极熊的袭击。因此，他们无法生火做顿热饭。他们都已处于精疲力尽的边缘。7 月初又有一名水手死了，似乎是肺炎。一个离奇的细节——即使在这从死神边挣扎逃避的绝望时刻，船员们依然带着那些他们原先打算同中国人做生意的货物，并在夏季第一个晴朗日子里，按照海姆斯凯尔克的命令，把这些货物都开包、晾干，以便在尽可能好的状态下再把它们带回阿姆斯特丹。显然，他们还从来没有想过要用这些额外的行李来掉换他们自己穿旧的衣服。

他们仍然必须经历另外一些令人不安的冒险。由于他们的行李中有着一些包着铁皮的沉重箱子，所以他们的罗盘就出了故障，而他们又没有可靠的地图，他们只知道回到文明世界的大概的航行方向，但搞不到再精确一些的资料。几天后，他们都患上了坏血病，但在一个小岛上他们发现了大量的坏血病草，这就使他们很快恢复了健康。

终于他们遇到了第一艘俄罗斯渔船。其余的航程就比较容易了，尽管有一次他们不得不划船一口气行走了 30 个小时。到了 8 月份，他们抵达科拉半岛。在那里，一场突然降临的大雾把两条船分开了。有好几天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也不知他们的伙伴是否还活着。不过，在两条船尚未遭受严重损害的情况下，雾就散了。于是他们一同来到第一个俄罗斯居民点。在那里他们受到了最友善的接待，并且两个多月来第一次吃到了一顿丰盛的饭菜。

现在，正当他们在撒摩耶人村庄里休养生息、恢复元气时，最出人意料地与德赖普船长又会合了。德赖普船长曾在北冰洋来来回回搜索他们，但毫无结果，最后他被风刮到白海，他和他的

船员就在这里过的冬天。德赖普船长把他原来的同伴带回到自己的船上，并于10月6日告别了好客的俄罗斯主人，并给主人留下了两条漏船作为纪念。23天以后，他们都回到了家园。

由于家乡的人们早以为他们全都完蛋了，所以他们的突然回来引起了巨大的骚动。究竟这些船员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不知道。一般的水手常会过一种隐姓埋名的生活。一旦没有人再愿意请他们喝几杯啤酒以便听他们讲述像马那么大的北极熊和像教堂塔尖那么高的冰山之类的有趣故事时，他们可能又回到海上去了。毕竟一个人总得要生活啊。就此又回到海洋大浪上去，生死听天由命了。要不是有一位有事业心的出版商劝说德费勒先生把他们的冒险和受苦受难的情况写出来，那么这整个值得纪念的航行故事恐怕就和许多其它类似的远征情况一样湮没无闻了，因为那些远征中没有一个像理发师这样又能耍笔杆子、又会操作外科解剖刀和剃刀的人参加。

关于雅各布·范·海姆斯凯尔克，还要多说一句话，他如此英勇地率领他的队员们经历了种种磨难，并又安全地引导他们回到了出发的港口。他后来作为一艘军舰的舰长，继续为他的祖国服务。1607年，在直布罗陀外海与西班牙人的一次交战中，他被子弹击中心脏而殉职。

[雅各布·范·海姆斯凯尔克（1567年3月13日—1607年4月25日），荷兰探险家、海军上将，曾在巴伦支海域航行，寻找从北极到印度的航线，并在北冰洋安全度过冬天。后出任海军上将、舰队总司令。1607年在直布罗陀附近小城指挥对西班牙舰队的海战中阵亡。——译者附注]

[威廉·巴伦支（约1550年—1597年），荷兰航海家，曾寻找过从欧洲到亚洲的西北航路，巴伦支海即以其姓命名。在1594和1595年的航行中，曾环绕北欧到达新地岛附近。在第三次航

行（1596年）中，发现了斯匹茨卑尔根（今斯瓦尔巴）。——译者附注］

人类心灵的挖掘机手——

威廉·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年)

喜剧和悲剧自古罗马帝国灭亡以来在西方一直为人瞧不起。莎士比亚横空出世后,由于他的天才,这两种戏剧形式的地位才大大提高,并赢得不受宗教偏见的所有人的赞美、关心和爱护。

威廉·莎士比亚,1564年生于沃里克郡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准确的出生日期不详,但受洗礼的日子是4月26日。其父亲似乎做过手套工匠,而现在亦有人认为是个屠夫和羊毛商人。不管他以何为生计,当时在他自己的那个小社区的人看来还享有一定的地位,因为他是当时刚刚获准成立的斯特拉特福市最早的议员之一,并且受到人们的敬重而被选入市政府。我们得到的关于他最重要和最可靠的一份材料是由于他在所住的街区堆积马粪而被处置的一张罚款单。这可以证明这样一个假设,他最初是一位自耕农,直到他积攒了丰厚的财产后才迁到了城里,并渴望在社会中争得一点地位。

在今人看来这一理想愚蠢至极,但在16世纪初,这相当于每位移民梦想着在一有能力支付第一期分期付款时就驾驶上一辆帕卡德汽车。

莎士比亚像

我们对莎士比亚的早年岁月了解甚少，只知道他在家排行老三，在当地一所文法学校读过书。他本可以继续上学，但不幸的是，他的父亲面对新的陌生环境毫无发展，逐渐丧失了所有的财产，并且无法胜任任何官职。

年轻的莎士比亚不得不自己挣钱养活自己。他的父亲重操屠夫旧业，他便成为父亲的帮手。据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他于这一行并不成功。因为莎士比亚有个习惯，就是一边在为他父亲杀猪，一边却为使邻居家的孩子们高兴而朗诵诗歌，并且还沉湎于高谈阔论，却没有把精力放在手边的活计上。

不过我们确实知道，在此境遇下，当莎士比亚仅仅能维持生计之时，他却匆匆成了婚。这究竟是一场被逼迫的婚姻（许多其同时代的人这样断言），还是真正的两情相悦，将永远无法证实。事实是婚礼举行时，新郎只有 18 岁，而新娘哈撒韦已经 25 或者 26 岁了。1582 年，当他们决定建立圣洁的婚姻时，新娘已经有孕在身了。这也似乎证实了当时小城中一些传言的可信度。因此，当 1583 年 5 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后，在斯特拉特福城一些人中间便流传着他们的这段绯闻。于是，莎士比亚认为明智的决定就是搬到一个人们对他不太熟识的城市，以便不再因这件不幸的事而倍受关注。

人们普遍认为莎士比亚当时是位血气方刚的青年，所受教育也超出了其所处阶层的水平，并显露出了某些“反叛”的倾向，对权势也少了一份外在的尊重，这也许成了促使他决定离开封闭的故乡去寻找机遇的一个因素。但是有关他接下来 8 年经历的史料甚少。据传，他先后做过药剂师、染色工、士兵、公共书记员以及印刷工。后来，随着他经常涉足戏剧而名声鹊起。我这样叙述并不是说他一举成名，远非如此。因为在莎士比亚所生活的年代，一位作家远非像现在如此受人爱戴，且其行踪时常引起公众的普遍关注。因此，研究莎士比亚生平的专家虽然经过多年的详

尽考证，我们今天对有关莎士比亚职业的大部分问题还是无从得知。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人虽然也承认当时他的存在，但对他的尊重却远不如对与其稍后的剧作家本·琼森。在他们的眼中，莎士比亚仅是又一位演员—经纪人—剧作家式的人物（这种人在当时的伦敦已司空见惯），与当时被当局视为流浪者而走街串巷的滑稽演员相差无几。

的确，如果我们邀请1599年（在这一年，莎士比亚加入环球剧院）伦敦所有著名的人物，并要求他们回答这些人物之中谁最有可能流传3个世纪，莎士比亚的名字肯定会排到最后一位。在莎士比亚即将离开伦敦之时，却因加入国王陛下亲自资助的国王大臣剧团而时来运转。不久，伦敦人便彻底了解了这位身材短小、来自偏僻的乡村、但才华横溢的作家的真正价值。莎士比亚在他37部剧作中所展露出的才华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把人性的所有特点都掷到了我们的脚下并且说："看吧，我的朋友们，我知道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实，但不要因为你们不喜欢而对我恼怒。人类不是按照我的规格创造的。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把它们真实的样子展示给你们，其他一切均非我的责任。"

几百年来，不朽的莎士比亚一直是学术界考证和研究的对象，并自然而然地被与太阳、月亮和闪烁的繁星之下的任何之物进行比较。对待同行我略微不那么严肃（我们艺术家在那些方面彼此理解）。在我看来，亲爱的弗里茨，假设你驻足观察一下那些操纵蒸汽挖土机的师傅，你会发现他们与不朽的莎翁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一般说来，他们对自己个人的外表极不关心。他们不停地抽着廉价香烟，但在操纵那庞大的怪物时驾轻就熟，潇洒自若，恰如牛仔若无其事地驾驭乱蹦乱跳的野马一般。实际上，他们如此成功地克服了操纵推土机的困难，以致旁观者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噢，那有什么！谁都能做到。"那就让他试试吧。他在医院里会有充足的时间反省自己的愚蠢行为。

不过，比较不能到此为止。仅仅观察挖掘机好手一会时间，你就会同意我的说法，即在他与不朽的莎士比亚之间存在着非常相似之处。看看他是如何完成装运的吧。他拉紧控制杆，将从土中和泥水中挖掘出的奇异堆积物倾倒在路边和码头上，或他当时施工所在的任何地方。这就是他们的杰作，也是他们的价值所在。

莎士比亚就是这样一个“蒸汽挖掘机手”，他所挖掘的对象是人类，而不是大地。像此时正在弗拉辛附近挖掘新运河的蒸汽挖掘机手那样，他对他发掘的物质的道德价值并不怎么关心。他的铁铲可能破土进入久被遗忘的神祇的坟墓，他埋在你我首次在这一可爱的岛屿上立足之前六七百年他的小修道院花园的僻静处。或者他的铁勺卷起的只是一些臭名昭著的惯犯的头颅，他们因杀了几人被吊死，后来被扔进附近的沟渠中任由鱼儿和滑不唧溜的鳗鱼的吞噬。莎士比亚带到地面上的东西是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他使之重见天日的某些岩石可能包含少量黄金。再一次，它们可能只不过是些石化的泥。他应当不安！他的工作就是发掘出碰巧在那儿的不管什么东西。任何人都不能指责他不务正业。因而，为何不再点上一支烟，朝他生前遮身度日的小舱层的窗外吐口唾沫，瞧一下表，看看他在他能称之为日的一天里能再继续发掘多长时间，回家吃晚饭，喝杯啤溜，看看晚报呢？

如果你用心读一读莎士比亚作为一位剧作家所“挖掘”出来的东西，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上帝机福我们所有的人！从他那把文学“大铲子”里倒出来的人的种类是多么的奇异：纯洁的圣徒和十恶的罪人，高尚的英雄和卑鄙的无赖，贞洁的烈妇和冷酷的荡妇，前者无私博大地自我牺牲，而后者却无恶不作，另外还有聪明的贤人和笨拙的傻瓜，迂腐的学究和随心所欲的作家，饥寒交迫的流浪汉和自命不凡的受宠者。上帝与魔鬼为了某位哈姆雷特或某位理查德王的灵魂进行争斗。

后来的剧作家虽也竭尽所能，但却无一能与这位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屠夫的儿子相提并论。因为迟早他们会陷入自己的疑惑和冥想之中。之后他们开始觉醒，不久便又陷入迷茫。但莎士比亚却从不说教，也没有从他所创造的人物的行为中指出任何明确的劝诫。但是即使是最没有思想的旁观者也能分清美德和罪恶，分清哪条道路通向死亡，哪条道路通向永生。

有史以来所有真正的伟人都曾受到过责难并承受过巨大的孤寂之情。这也是他们“远离”众生所付出的代价。在我至今所发现的所有的人之中，均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公平的安排，没有任何怨言和遗憾，莎士比亚也不例外。他所生活的年代，恰巧是戏剧舞台人才辈出，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年代，因此即使是富有想像力的作家最不同凡响的剧作在别人掩映之下也可能显得苍白。

一个刚刚经历过无敌舰队入侵和灭绝恐慌的国家，不可能对哈姆雷特倾听他父亲哀怨时所处的悲凄的境遇表达太多的同情。《暴风雨》中所展示的奇异的历险又有何意义，当时在伦敦任何一个酒馆里都有许多老水手，只要你给他一品托啤酒，他就会给你讲一箩筐航海者的奇谈趣事，准比《暴风雨》中普罗斯彼罗大公、他的女儿米兰达以及那不勒斯王国国王的故事更刺激。另外，李尔王所遭受的痛苦又怎能与亨利国王统治下无辜受害者所遭受的劫难相提并论呢？

莎士比亚作品的读者队伍是为生计而疲于奔波的一代人，没有多余的时间来细心观察现实生活中人物百态。即使这样，他在当时并非完全默默无闻，但他作为一位不可思议、聪明的剧作家和诗人的才能得到了其后一代人的赞赏和承认，这一代人是甘心享受其祖先在颠沛流离和争斗中积累起财富的一代人。几百年来，尽管有无数勤勉但却平庸的评论家试图把莎翁归入呆板的伊丽莎白文学教科书，但莎翁对我们现代人的感染力如此强烈，因此便成为无数位用其想像之镜向我们展示其美好梦想作家中声名

最为显赫、才思最为敏捷的一位。

莎士比亚在“百老汇”（我们今天会这样比喻）生活了大约18年后，他再次产生了一种要回到更加体面的环境中生活的愿望。莎士比亚当时并不十分富足，但他和安妮细心节省着每一个便士，并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能步入上层社会太太和绅士们的行列，而不是整日与一些滑稽的丑角和江湖骗子为伍。于是他们回到了故乡斯特拉特福城，安妮细心照料着她的花园和她心爱的桑树。（难道她又有了新的嗜好，准备养蚕以贴补家中的开支？）同时，莎士比亚为他在伦敦的朋友写一些应时的剧本，直到1613年环球剧院被一场大火夷为平地，当时正在排演一场关于亨利八世的话剧，许多虔诚的人认为那是神灵的报应。此后不久，或许是1616年春天或夏天的早些时候，莎士比亚最后一次登台，并悄悄地退出了戏剧舞台的生涯。

对于莎士比亚的晚期生活，我们仍然知之甚少。可我们还需要知道什么呢？难道这位天才给我们留下的财富还不足够吗？难道我们还需要知道1616年3月25日草拟那份著名遗嘱公证人的祖母结婚前姓什么吗？

［莎士比亚（1564年—1616年），被公认为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作家，在世界文学中占有独特地位。他在16、17世纪之交为英国一个剧团写的剧本，至今仍在众多国家上演，受到人们广泛欢迎。他文才横溢，创造的喜、怒、哀、乐场面使人印象鲜明，历久难忘。在其不算太长的一生中，莎士比亚创作了大量悲、喜剧作品等，包括悲剧《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和《麦克白》等，喜剧《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无事生非》、《第十二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历史剧《亨利六世》、《理查三世》、《亨利五世》、《亨利四世》等。——译者附注］

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

Descartes，Rene

（1596－1650年）

1596年，小勒内出生在法国图赖讷省的一个小村庄里。他的祖父是一位内科医生，并同一位内科医生的女儿结了婚。因此，小勒内自年幼时起就自然而然地喜欢上了医学。但他的父亲若阿基姆·笛卡尔却更喜欢律师职业，并且按照古代法国人的传统，同一位高级法官的女儿结了婚。妻子过世后，老笛卡尔再婚，并移居布列塔尼，在那儿，小勒内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

到了布列塔尼后，老笛卡尔在一家律师事务所谋到了一个职位，突然之间，就使他成了低层贵族中的一员。这在法兰西这个君主国度里是件很平常的事，但对小勒内却有着深远的意义。他从未忘记过他得益于此的一切。没有人能像笛卡尔这样如此勤奋、如此诚实，但又不带任何个人色彩地向他的同胞们传授真理。笛卡尔像我认识的某些博士，他们用终生的时间去研究，并常常发现后来被证明是对他们同胞有最大利益的东西。除了有人提起他们所起的作用就是充当人类中的乐善好施者外，其它没有什么能激怒他们。因为真正使他们感兴趣的并不是人类。使他们恼怒的是某种细菌的行为，他们一心要抓住它，并把它彻底消

灭。他们劳动的受益人是人类，而对这些他们全然不放在心上。

他们没有任何的装腔作势。他们试图避开所有的人类感情，而且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完全真诚的，也许正是这一点才使他们成为优秀的研究人员。他们在病房里待不了五分钟，而一进研究室，他们就换了副模样。勒内·笛卡尔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除了有一点例外，即他比其他的科学家更加笃信宗教。至于其它方面，他在对待同事的态度上是很随便、不拘礼节的。他宁愿追求自己孤独的生活方式。他是很差劲的交际家，或者说他根本就不善于交际也许更加合适。在低地国家生活的 20 多年时间里，他尽量避免学习荷兰语，以使他不必同可能会来邀请他抽袋烟的邻居谈这谈那而浪费他宝贵的时间。一个人居住在异国他乡，但又不愿意学当地的语言，在人们看来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这样能使笛卡尔同社会隔离开来，而这种环境正是笛卡尔完成他在自定的任务所需要的。在作为一名学生、一名战士结束就业前一年的漫游旅行（中世纪欧洲风俗）后，笛卡尔准备去解决人类生存的奥秘这一难题。

首先，就业前一年的漫游生活使他由祖国法兰西来到尼德兰。当时，在尼德兰争取自由的斗争已渐渐地转变成一场军棋游戏，在那半年的时间里，双方都住在营房里过冬，但天气一转暖，足以到户外享受生活时，他们就开始包围对方的城市。在 17 世纪，这样的攻打纯属暴力。他们为什么要去杀死欧人，并冒着被敌人杀死的风险？而当时人们完全可以用不太危险的方法来赢得胜利。那时，你可以通过详细地制定一个进攻计划，之后就可以告诉对方："我尊敬的'朋友'，明天，只要我点爆我的炸弹，你就会失去三个堡垒、五个射击踏垛、四个牵引环、九个多面堡和两个棱堡，而你最多只能摧毁我们两英里壕沟。"如果你可敬的"朋友"是位有见识的人的话，他就会拿出铅笔和纸，然后仔细地计算一番，如果得出结论你是对的，他就会把他的宝剑

笛卡尔肖像，弗朗斯·哈尔斯绘。

呈上，并回答："先生，你赢了，而我输了，现在让我们去喝酒吧。"这并不是说要那样去打仗，你就必须同时是一个一流的工程师和一流的数学家。也许是巧合，继沉默者威廉担任新成立的荷兰共和国领袖之后，威廉的两个儿子在解决这类难题方面是无人能比的，这一事实很快传遍了整个欧洲。想成为职业军人的有雄心壮志的年轻人从四面八方赶到荷兰，去听著名的战略艺术老师讲的课。

1618年，勒内·笛卡尔来到了布雷达，并成了拿骚的莫里斯①的学生，后者那时正在布拉班特，为在荷兰南部作进一步的斗争进行准备。那是多么荒谬的时代啊！除了激烈的宗教斗争，整个欧洲还是沉浸在文明统一之中，而这种文明统一产生于中世纪有关政治和宗教超级帝国这一概念。又过了一个半世纪后，极端夸张的民族主义观念使欧洲大陆各国分裂成一个个相互对立的小国，每个国家都在发展和邻国相互对立的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但笛卡尔出生的时候，不管出生地是在斯德哥尔摩还是在那不勒斯，在维也纳还是在马德里，在伦敦还是在阿姆斯特丹都没有什么差别。你不仅是一个瑞典人或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或奥地利人或荷兰人，而且事实上你是地球村的合格的一员，因为你出身于相当高贵的家庭，接受了较好的教育，能讲拉丁语以使你的同胞们能理解你，注意到自己的习惯、风俗和偏见，并愿意让他人共享。

当然，这完全不是民主的安排，但它已存在了这么长时间，已被完全地接受，并成为社会的秩序，以致没有人冒犯它，没有人感觉到需要另一种体制。比如一个俱乐部的大门对任何人都敞

① 拿骚的莫里斯（1567—1625年），荷兰共和国军队的缔造者，沉默者威廉的次子，1618年成为奥兰治亲王，担任过多种职务。他曾率军击退西班牙人，扩展并保卫荷兰共和国的疆界，但未能重新统一整个尼德兰。

开，而丝毫不管俱乐部已有成员对新来者极度不欢迎这一事实。

笛卡尔出生在法国的一个天主教家庭，而他却在当时为荷兰陆军头儿的德国新教徒手下服役。他一到司令部，就发现他已成为一个由军队学员组成的国际公司中的一员，他们从欧洲的每一个角落聚集到一起来学习第一手的战略学。为了打发乏味的值勤时间，这些年轻人十分热衷于数学竞赛，最佳答案的提供者还可获得奖励。

有一天，年轻的笛卡尔想解答一个贴在教堂门上的一个题目，而这道题碰巧是用荷兰语写的，他就请求一位陌生人为他把题译成法语或拉丁语。但那位陌生人拒绝了，因为他自己也是数学家，而且这道题已难倒了陆军里面最聪明的人，因而他非常怀疑这位年轻人是否能看出这题的一点头绪来。第二天一早，笛卡尔把答案带给了那位陌生人。后来两人成了忠实的朋友，这位法国的军校学员去了多德雷赫特，同这位新结识的荷兰人一起度过了一段时间。这位陌生人竟是该市拉丁语学校的校长，还是当地很有名望的数学家。

和我们今天打仗的方法比较一下的话，我们肯定能从 17 世纪的战士那儿学到一两点有用的东西。

笛卡尔从荷兰前往德国参加那场拉开了那次伟大的三十年战争序幕的战斗。在拜访了奥地利和波希米亚后，他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前往意大利。他一直有一种奇异的、神秘的、灵性的感受——一种幻想——总觉得他应该去洛雷托村[1] 朝圣，并感谢圣玛利亚在他 23 岁那年，当他还在德国南部乌尔姆市学习数学的

① 洛雷托，意大利著名圣地，以其圣母堂著称。据传说，原建于巴勒斯坦耶稣故乡拿撒勒的圣母堂，在受土耳其军威胁期间由天使迁到泰尔萨托，后迁至现址。圣母堂用石砌成，堂内壁龛中有木制圣母圣婴像，堂周围有高大的大理石围墙。主要宗教节日是 9 月 8 日的圣母诞生日。

时候就让他同宗教联系在一起。

在多瑙河畔这个古老的镇上看到的一切使笛卡尔对唯理智论和在巴罗克时代典型的宗教信仰两者的奇妙结合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的头脑中充满了20世纪的数学公式，但他们的思想还深深地扎根在中世纪信仰的土壤中。总的来说，他们是绝对朴实的，而朴实到令今天的人们感到震惊，但同时他们还沉浸于信仰之中，这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同样是不可理解的。

记住！笛卡尔试图以理智的倡导者——对所有事物都有清楚的、直接的理解——希望把所有创造的秘密都转化为数学公式的身份让世人所了解。记住！正是这无畏的、压抑不住的理智自由的斗士，他们能够吞下洛雷托的故事，能吞下鱼钩、鱼线和浮子。圣母玛丽亚的房子原先坐落在拿撒勒，由于害怕撒拉森人[①]会攻占拿撒勒，并摧毁这神圣的建筑——在天使传报[②]时期这是圣母的家园，在13世纪末被搬到了洛雷托——亚得里亚海边、安科纳以东几英里的一个小村庄。几位天使用肉体将它拉起，并安全地将它由巴勒斯坦移到意大利——这不会有错。为了确保移到洛雷托的确是原先的建筑，达尔马提亚州州长派特使前往拿撒勒调查那座房子是否还在老地方。他们回来报告说房子已经不在了。自那以后，谁还敢怀疑这一奇迹的可靠性。当然著名的数学家勒内·笛卡尔也不例外。尽管从他所从事的行当，他应该知道这必须是异常强壮的天使才能将如此大的建筑（全是用长28英尺、宽12.5英尺、厚13.5英尺的石头砌成）从巴勒斯坦搬到意大利，并且只用了两个小时。

---

① 本指古希腊后期及罗马帝国时代叙利亚和阿拉伯沙漠之间诸游牧部落中的一员，后在十字军东征时期专指穆斯林。

② 天使专报（Annunciation），指天使加百列向马利亚传报耶稣将通过马利亚成胎而降生。事见《新约圣经》。圣母领报节是3月25日。

刚才我提到乌尔姆，笛卡尔曾在那儿同一位也热衷于数学的朋友一起学习。可能是他同那位同样沉溺于神秘数学的朋友的亲密关系使笛卡尔得了严重的忧郁症。也可能是由于多瑙河边这座古堡垒的阴暗。还可能是由于他意识到他正在发现一个将彻底改变科学基础的东西而受到烦扰。因为他认为他用来研究分析几何学的方法可能适用于所有其它的数学分支，而对他来说，数学意味着创造的一切。只要在这个课题上再有一点希望，他就能作为理智这一新世界的创世人。但他祈求的一点希望在他的三个梦中，与科学没有丝毫的关系。

在第一个梦中，他梦见自己孤单地走在一条乡村小路上，山洪暴发，他成了跛子，被迫到教堂去避雨。第二个梦连着第一个，他听见可怕的雷声，他的身体放出火花。在第三个梦中，他偶然翻开了德西穆斯·马格努斯·奥索尼乌斯[①] 的一卷书，该作者叙述了顺莫塞尔河而上迷人的、田园诗般的旅行。一打开书，映入眼帘的第一行字就是："我现在应选择什么样的生活呢？"

当奥索尼乌斯写下这些话时，它们可能什么任何寓意几乎都有，但它肯定与不朽的灵魂无关，因为这一4世纪罗马诗人远非一位基督徒，他曾污辱皈依该教的邻人们，献给他们一首取着《十字架上的丘比特》这样极端无礼的名称的颂诗。当然，笛卡尔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但即使他知道，考虑到他被这行文字吸引时的心境，也不会有多少不同。他刚刚20来岁。到那时为止，虽然他是许多学科分支忠诚的研究者，但他实际上未取得任何具有长久价值的东西。他所面临的问题是：他应走什么样的生活之路呢？

---

① 德西穆斯·马格努斯·奥索尼乌斯（约310—约395年），拉丁诗人兼修辞学家，生于高卢，主要因写高卢的地方风光而引人注意。虽为基督徒，但主要以异教徒传统方式写作。

笛卡尔希望能在洛雷托找到答案，而且他确实找到了。这位修养良好的年轻的法国贵族，一心想过戎马生涯或继承父业当律师，而浪费了许多大好时光，而现在却成了生活新哲学——一种思想体系的伟大的改革运动者，在这里任何东西都不侥幸，创造物被降为几个数学公式。

笛卡尔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要达到这一目标，他必须离开他的同胞。划时代的思想很少产生在吵吵闹闹的鸡尾酒会或其它的社会运动，他们需要寂静和孤独。笛卡尔研究了一下地图，在17世纪的前半期，哪里才能找到理想的安静的学习环境呢？他想到了意大利，但他是北方人。他讨厌炎热的下午和沉闷的晚上，他肯定这样的气候一定会要了他的命。他只有唯一的选择——北海边的低地国家。他安排好了故乡的一切，包括他不太丰厚但还可依靠的收入（即使是哲学家也必须吃饭），告别了故乡。1629年春天，他来到了那里，直到1650年他离开人间的前几个月，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

可能除了贝多芬外，再也没有人像勒内·笛卡尔这样经常地更换住处。他不是因为和不诚实的女房东或令人不愉快的邻居争吵。他不是疑心很重的人，一般来说，他同邻居们相处十分融洽。实际上，他很快就发现即使他一点也不懂这里的语言，他也总能很好地同当地的人们相处。善良的邻居坚持要来拜访这位孤独的陌生人，然后邀请他回访、喝酒，那当然是非常快乐和友善的，但这干扰了他的工作。在他后半生，笛卡尔是如此地“沉溺于对知识的渴求”之中，他不愿把时间浪费在日常生活的礼节上。

首先，笛卡尔去了弗拉讷克，这是弗里斯兰省的一个小镇。在那儿，弗里斯兰固执的加尔文宗信徒已建立了他们自己的一所大学，以保护他们的年轻人不被在莱顿、牛津和乌得勒支等大学里公开讲授的自由学说所侵蚀，并保证他们在健康的加尔文教条

的范围内生活。如果那些固执的头脑发现他们优秀的牧师也产生了动摇，并保护着笛卡尔主义的发明者的话，他们由此而产生的震惊不会次于田纳西大学的信仰者发现一位名叫达尔文的年轻人在他们大学的一个系里讲授自然科学的情景。尽管笛卡尔是在弗拉讷克完成他的不正统的作品《作为思想指导的原则》，但他还是非常小心地保持着他的思想不受外界影响，并从不表明他正在研究的课题，因此他从未受干扰。

在完成这部小作品后，笛卡尔穿过须得海来到阿姆斯特丹。他并不像我们会去找出版商，因为这部书一直到他过世后半个世纪才出版，而是使自己投身到大城市那能享受到彻底孤独的环境中。

笛卡尔在现存一封信中描述了他的新居。一个世纪后有位法国人这样向荷兰人抱怨道："你们的城市使我想起了古埃及——大理石的宫殿都像是为奶牛建的。"而笛卡尔比这位法国人讲的好话更多一些。在笛卡尔的信中找不到任何一点法国人特有的机智的踪迹。他只是感激那些好客的人们，因为他承认为了给他一个和平、安静的环境写作，荷兰人必须辛勤地工作。他们拥有一支相当规模的陆军和海军，当他钓鱼或思考问题——十分适合他的主动和被动生活时保护他。

在阿姆斯特丹住了五年之后，笛卡尔突然离开首都前往代芬特尔——伊拉斯谟上学的小镇——生活。在那儿，笛卡尔把"实用哲学"和他的数学研究结合起来。因为在代芬特尔，他做了父亲，但不幸的是，那孩子在五岁时就死了。但即使没有这不幸的事件，笛卡尔也会找到令他忙碌和感兴趣的事情。1633年是值得所有科学界人士牢记的一年，这是伽利略和宗教法庭冲突的那年。

早在16年以前，宗教法庭就认为有必要警告知识界人士不要对极端可疑的波兰人尼古拉斯·哥白尼的著作太感兴趣，他在

约 70 年前写了一篇专题论文，认为太阳可能是宇宙的中心，而地球则不是。这当然和《创世纪》是相对抗的。自那时起（哥白尼不敢发表他的理论，直到他知道将不久于人世时才正式发表）世人都接受了这一理论，就像在哥伦布时代所有明智的人不再相信地球是扁的一样。尽管这样，坚信事实是一回事，敢于公开表明又是另一回事。伽利略现在就因一个新的、甚至是危险的科学学说而陷人困境。他的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同行们会出来勇敢地站在他一边，公然同教会对抗吗？

只有很少很少的几个这么做了，而且很遗憾，笛卡尔不在其中，尽管他处于很理想的境况扮演新思想的倡导者。他在经济上是独立的，而且只要他待在荷兰，就没有人能碰他。有案可查，没有一个祈求留在该国的难民被提交给教皇、帝王或宗教法庭。外来人员不能参与当地的政治。只要他们明白这一简单的规约，他们就是安全的。事实上，他们也明白这一点。

但是，当笛卡尔被迫作出选择，决定他是宣布支持还是反对当时处于宗教法庭"保护性拘留"（用现今的说法）的伽利略时，他没有明确表态，并且，他从此表明思想时比以前更加谨慎，以保证他写的东西没有可能被解释为和《创世纪》第一章内容有直接的对抗。

这好像和如此伟大的人物不相配，但是他这样做也许有他的理由。他在生活上有目标，一个比他自己更伟大、甚至比其它一切事物都要伟大的目标。他要把他所知道的全部写进名为《世界》的书中，而且按原计划，他准备接受哥白尼的理论，作为既定的事实和他发展天文学理论的基础。但笛卡尔始终没有按原先的构想完成这本书，所以我们也不可能知道他最终是真有勇气同教会对抗呢，还是会做出某种让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想写这样一本书，并把他对有关目前争论最激烈的问题的最终看法都写进去。对这个问题我们最好还是讲到这里为止。

同时，他又开始遇到老麻烦。在他周围有那么多的人无法让他安静地工作，他只好再一次背起简单的行囊。这次，他移居到了乌得勒支，他的一个学生在乌得勒支大学任教授。

到了那儿，他发现新教徒在搜寻邪说方面和天主教徒相比绝不逊色多少。这并不是说他在人身自由上遭受到了直接的干扰。不管加尔文宗的牧师们是如何刻薄地激怒这位外来者，不停地问他这是什么意思，那又是什么意思。不过当地的行政官员们总会保卫他，保护他的权利。尽管这样，笛卡尔讨厌冲突，他又偷偷地移居到莱顿（17 世纪的哈佛），众所周知，那里的气氛是十分自由的，他肯定在那儿会有个好环境的。

就在 1636 年到 1641 年他住在莱顿期间，他发表了《方法论》的第一部分，而他后来在形而上学领域里的研究都是以《方法论》作为基础的。

你到过雷恩斯布尔格或恩德盖斯特吗？我曾到过那儿，它们是位于莱顿附近的小村庄。尽管他们在荷兰历史上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但它们看起来和荷兰南部的其它大部分村庄没什么两样，而且很少有人知道它们的名字。在中世纪，它们是荷兰最富裕的地方。在宗教改革运动中，他们受到压制，村庄和属于教会的土地全部被荷兰当局接管。当局通过一个委员会来管理他们新获得的这片土地，就像华盛顿市受国会指定的一个委员会管理一样，这两个村庄受海牙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从地方政治方面来讲，这是难以忍受的，但这对正在寻找一片安静地方的笛卡尔来说真是天赐的好地方。在那儿，他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生活和写作，并且不必向那些根本就不知道有学问的人在谈论什么而且从未读完《申命记》第三章的人作解释。

雷恩斯布尔格和恩德盖斯特以前是小村庄，现在也没有多大变化。但它们将和笛卡尔、斯宾诺莎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永远留

在人们的记忆中。我亲爱的弗里茨，我们的祖先并不十分相信民主、平等和博爱。但一旦自由来到现实中时，他们就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斯宾诺莎和笛卡尔有权按他们乐意的方式去讲去想去写，如果牧师们也能记住这一点的话，那将使那些贵族阶层的人们大为欢悦，并可免去教士们的许多麻烦。

从笛卡尔的信中可以知道，他在荷兰省的这个地方度过的几年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岁月。天空中彩云变幻无穷，草地上安静、舒适，使他可以静静地思考。还可以去河边钓鱼，去思考生存的奥秘。当他想去看望朋友的时候，可坐上船去阿姆斯特丹、莱顿、哈勒姆或者去海牙，同朋友们一起度过几个小时，当天晚上就可回到家睡到自己的床上。当遭到附近城市的牧师的攻击时，笛卡尔就暂时撤回，他知道雷恩斯布尔格是他的避风港，而且海牙的达官贵族们是不会出卖他的。当时，“敌人”不只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而且已变得非常活跃，最后他们甚至公开反对这个危险的罗马天主教徒。他们害怕笛卡尔在申明他是自己教区的一个忠实仆人的同时，可能会（如果有关他作品的传闻是正确的话）对已建立起来的教会的秩序造成混乱，他甚至可能会比跟随讨厌的米歇尔·塞尔维特[①] 的12个异教徒造成的损失更加巨大。塞尔维特在科学的幌子下，攻击宗教。尽管真理胜利了，但这位知识渊博的先生还是被活活地烧死了，而命令不是别人，正是约翰·加尔文下的。

当我还十分年轻的时候，我常想当他从不公开发表讲话，从不用书的形式发表他的思想并且几乎过着隐居的生活，而那些邪

---

① 米歇尔·塞尔维特（1511—1553年）、西班牙神学家、医师，支持宗教改革运动，第一个发现人体血液循环系统，因发表《论三位一体的谬误》而以异端罪名被加尔文下令火刑处死。

说的搜寻者们究竟是如何击败如此富有活力的新生事物的呢？后来，我有机会懂得这一道理。你不会介意我讲一段自己的经历吧。

在美国那个直到发生世界大战才苏醒过来的乱扣“赤色分子”帽子的时代，我也遇到了很大的麻烦。因我涉嫌“激进”——这是后来向我解释的，我受到了调查，房间挨搜查，邮件被偷拆，箱子被联邦调查局的人打开，我遭受了各种各样的不便和烦扰。作为一个彻底的非政界的小人物，并对经济（不管是实用的还是理论的）没有丝毫的兴趣，我始终弄不明白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在我身上，直到有一天我找到了答案，解开了这令人费解的谜。

20年前我还在哈佛的时候，在年轻时想成为语言学家这一雄心壮志的激励下，我开始学习俄语。这俄语课程使我遭受了巨大的麻烦。因为在1918年，“俄语”完全等同于布尔什维主义。后来，政府的秘密特工人员发现我在一个书架上还保存着一本俄语词典。这不是十分可疑的吗？我不是常公开吹牛同许多外国人熟悉吗？如果我不是计划要利用它们来学习当时正在五六个欧洲国家正在逐渐形成的危险的革命主义的话，为什么不嫌麻烦地去学习这些东西？

你可能说：“荒谬！”这当然是十分荒谬的。但是没有比那个白痴更加荒唐的了。他给最高法院写了封信，说听到我在向一位女士行礼时喀嚓一声立正。问题：为什么在向女士行礼时喀嚓一声立正？答：这完全是下意识的行为，是在德国和奥地利呆了5年的结果。

“啊！你们看！他不是承认他已在德国和奥地利住了5年吗？那么你为什么在德国和奥地利住了5年？”

“因为我想到美国的一所大学任教，而在35年前除非你有德国的哲学博士学位，否则是找不到工作的。”

“也许是这样，但这听起来还是不同寻常。他有一本俄语词典，并在一所德国大学里生活了5年，我们最好对他严密监视。”

就这样，由于我的喀嚓一声立正和我想成为伟大的语言学家的幼稚的抱负，很长一段时间，我像危险的罪犯一样遭到追捕，尽管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始终如一的讨厌罪恶的德意志人。在我看来，我和我的审问官的唯一区别在于这——因为我不嫌麻烦地去学习他们的语言，去理解他们古怪的心理特征，因而我能更加机智地同德国人作斗争。而那些自认为是共和国救星的人只能从流行杂志上的间谍故事中获取一点知识。

在这方面，恐怕自笛卡尔时代以来未发生多大的变化。这位法国人坚持走自己的路，十分礼貌但又非常固执地拒绝同任何邻居交往，固执己见，不接受任何拜访但又源源不断地收到各种各样有名望的人物的来信——不，他不可能永远是他自称的那样。对他只能用阴险的、周密计划的阴谋才行。公开攻击他是十分危险的，很明显，他受十分有影响力的名流贵族的保护。他曾在海牙奥兰治亲王法庭受审，但据说一会儿后，竟在指导波希米亚国王腓特烈五世的孩子们。腓特烈五世是在丢掉了在德国和波希米亚的财产后来到荷兰找到了避难地。

因此，笛卡尔已牢固地站稳了脚跟，用含沙射影的通常方法是无法干掉他的，对他进攻必须作周密的计划。1639年，一位名叫富提乌斯（本名吉斯伯特·富特）的人做到了，他是乌得勒支大学的校长，他用间接方法发起进攻。一位同伴的去世给了他机会。在悼词中，他提到死者为一生中有勒内·笛卡尔先生这样伟大的朋友而感到骄傲。当然，人已死了，无法再去批判他，但在他的同事中可能与这位外来的天主教徒有联系的人还有活着的。这位天主教徒称他已把所学的所有东西都写进了《方法论》中，而这本书并未为他指明通向真理的道理，相反使他的头脑中充满疑问，因此，他觉得已不得不去提出通向智慧的全新的途径

——这条途径可以教会学生不要相信从别人的书中读到的任何东西，而只相信完全凭自己的感觉所能发现的一切。笛卡尔先生强烈主张的观点简单地说就是“眼见为实”，他坚持所有知识必须通过自己的调查和亲手实验得来，从而导致了怀疑论。

这一观点违背了当时人们接受的生活哲学。在那个时候，人们依旧信守着以下两句话所代表的古老的幼儿园的戒律：

“爸爸，为什么 $2\times2=4$?”

“因为是爸爸这样说的。”

所有长有耳朵能听见别人说话的人都能明白这位知识渊博的教授的话的意思。笛卡尔先生作为基督教的敌人而受到公开的指责。

我十分高兴地告诉大家，那些搜寻邪说的人们干掉他们敌人的企图再一次失败了。他们要求笛卡尔出席一个宗教会议，以审问他的学说。他拒绝了，并因此而受到无端指责。海牙当局向乌得勒支校方施加压力，他们放风称笛卡尔先生是他们的十分伟大的朋友，不得再对他有任何的冒犯。

从此之后，这位法国人就得以自由自在地思考和写作，并且得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他自己制定的任务中去。他试图查明天地之间、生死之间的所有难题实际上是否都能归纳为一些基于原因的明确的法则，这些法则又是通过亲自调查发现的，而不是建立在一些古代预言家和五六本古书的权威上的。

在笛卡尔住在荷兰的 20 年间，他三次短暂地拜访了他的祖国。第一次回去主要是为了一笔小财产，因为一个优秀的哲学家也需要基本生活保障。正如爱默生稍后所说的，“思想家不应该去挖洞。”最后一次，他去巴黎，希望到一所地方大学谋个职位。

但他到达巴黎的时候，被枢机主教黎塞留[1]和他的继承者枢机主教马扎然[2]激烈的“中央集权”化措施激怒的法国贵族正开始卷入一场内战。

作为一个完全的、彻底的爱好和平的人（尽管曾当过士兵），笛卡尔没有等战争开始就匆匆地回到荷兰。经过这次冒险后，他开始越来越感到不安。尽管对他怀疑论学说的所有进攻都失败了，但他生活在这些荷兰邻居之间不再觉得轻松。尽管没有人打扰他，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肉体上，但他还是意识到他这段非同寻常的生活即将结束。1649 年，瑞典王后为他提供了一个非常诱人的机会。她邀请这位杰出的笛卡尔先生到她的王宫去教女王陛下数学。他决定接受。

这并不是第一次有人请他离开荷兰，到斯德哥尔摩去，但在此之前，他都拒绝了。众所周知，伟大的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3]的女儿十分果断，富有男子气概，并且十分聪明，但据说她十分怪癖（这一说法是正确的）。尽管这样，她还是一位十分真诚的王后。17 世纪中期，王家的尊严是不会被一位据说是在宗教领域里持有很不一般观点的哲学家轻易改变的。

1649 年 9 月，勒内·笛卡尔最后看了一眼荷兰海岸，乘上女王陛下特意派去接这位著名哲学家的船，经过一段不平静的航程，安全抵达瑞典，并来到宫邸。他很快就明白了一切并不是像

---

① 黎塞留（1585—1642 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三的国会秘书兼御前会议主席，枢机主教，擅权巩固专制统治，剥夺胡格诺特权，镇压贵族叛乱和农民起义，对外扩展法国势力。

② 马扎然（1602—1661 年），法国首相，枢机主教，原籍意大利，受宠于摄政王安娜，镇压投石党运动，巩固专制王权，加强了法国在欧洲的地位。

③ 指古斯塔夫斯二世（1594—1632 年），瑞典国王（1611—1632 年在位），改革财政、司法和军事，发展工业，对外与俄国、波兰、丹麦等国争霸，但在三十年战争中受伤去世。

他所想像的那样。克里斯蒂娜女王并不想把著名的笛卡尔作为一个十分严肃的科学界人士藏起来，而笛卡尔十分反感把他作为一个聪明的怪物到处展览。

除了这一点以外，女王陛下还有一个十分怪异的习惯。笛卡尔像几世纪后的柏辽兹① 一样，是属于那种把床作为办公室的法国人，把书房、餐厅和起居室结合起来，并尽可能多地在枕头间度过时间。而女王陛下则十分不同，她继承了她父亲早起的习惯，不可思议地要求她的私人哲学家在凌晨5点起床至她7点钟的俭朴的早餐前上数学课。

而且，这位伟大的克里斯蒂娜还有另外一个甚至令人可怕的怪癖。她是个新鲜空气狂，并特别喜欢零下温度。试想一位一直抱怨荷兰潮湿的房间的法国人，从每年的10月初一直到第二年的3月底都要点炉子取暖的法国人，试想这位可怜的法国人被迫在早上5点钟，在斯德哥尔摩或乌普萨拉的某个阴暗的王宫的某个没有炉子的房间里，对一位十分不吸引人的瑞典女士讲笛卡尔哲学——而且是在1月份。

不用我来告诉你这一切如何结束。笛卡尔得了感冒，伴随着出现发烧，随后又引起了双侧肺炎。在病了10天后，1650年2月11日，勒内·笛卡尔离开了人间，享年仅54岁。

现在，既然你喜欢总体印象超过客观事实，那么我就来大体上讲一下笛卡尔对世界——包括你和我的影响。但我又有点犹豫，因为我自己的生活哲学对我来说就像是我的手表对我一样。对于到底是什么使他们往前走，我一点主意都没有。但我又非常

① 路易·埃克托·柏辽兹（1803—1869年），法国作曲家、指挥家和音乐评论家，一生致力于标题音乐创作，其专著《配器法》对后世有很大影响。代表作有《幻想交响曲》、《哈罗德在意大利》等。

明白他们告诉了我什么。我充分意识到像伊曼纽尔·康德[①]和巴鲁克·斯宾诺莎[②]这样的人对我的思维方式产生的影响。但当我读上几行像《纯粹理性批判》这样的书或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我就迷茫了。当然，这并不完全是我的错。这些书的作者有充分的理由使他们的作品模糊朦胧，不让他们的敌人轻易地理解，并且他们做得非常成功。

在中世纪，敢于用笛卡尔的直接、亲身观察的方法来研究自然的鲁莽的作家，常把剥制的鳄鱼皮从房顶挂下来，在墙上挂着甲鱼标本，用它们把自己包围起来。在寒冷的冬夜，当他知道他的房屋在他的邻居的监视之下时，他会在火炉上撒上一把铜屑，这会使烟囱里冒出奇怪的火光，受惊的监视者就会匆忙溜走。他们会边跑边喊：屋里的人和魔鬼住在一起，最好离他远点！这样，他就可以回到他的研究分析和数学研究上去了，并至少可保持一年的时间不受打扰。直到有一天宗教法庭听说在他的家门口发生了这样的怪现象。拇指夹很容易就能使他坦白法官想知道的一切——那就是结局。

在17世纪，世界向前进步了一点，有意隐匿思想这一原始的方法已没有必要，但朦胧的风格把文中危险的部分隐匿起来，还是十分有益的，如果作者想在自己的床上安静地结束一生的话。因此，据我所知，就连汉语语法也比17、18世纪通常的哲学专题论文要好懂。

尽管如此，我还是能对理智的急先锋们想证实的一切有个相当清楚的概念，因此，我也理解为什么笛卡尔会如此成功，同

① 康德（1724—1804年），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创始人，主张自在之物不可知，人类知识是有限度的，著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等。

② 斯宾诺莎（1632—1677年），荷兰哲学家，唯理论的代表之一，认为只有凭理性认识才能得到可靠的知识，著有《神学政治论》、《伦理学》等。

时，他的学说为什么会在那些固执的人中引起如此大的恐慌。那些固执的人坚信世界已发展到再也没有什么值得讨论、值得怀疑和值得进一步证明的程度了。

静止的宇宙观同人类竞争一样的古老，我敢肯定洞穴人早已习惯于杀死那些对居住在潮湿和通风的洞穴中持怀疑态度，并且坚持认为用泥和芦苇搭成的棚屋不仅能抵抗雨淋日晒，更能为孩子和老人提供一个更为健康和舒适的生活环境的人。

你可能已注意到我有点走题，接下来我就直接来谈笛卡尔主义（整个笛卡尔哲学系统）到底对我产生了什么影响。

首先，它教会了我尊重人类的理性为一切进步的开始和结束，而这种进步是可以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取得的，只要我们有勇气去清除我们过去的垃圾，清理我们的头脑，并且一切都重新开始，让我们用我们亲眼所见和所观察到的东西来指导我们。这并不是说我没有意识到某种力量的存在，由于缺乏合适的字来称呼它，我就叫它“超自然力”。当我们在这个星球上度过我们短暂的一生的时候，我们应该停止依赖他们来指导只和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肉体和情感的健康和我们的日常行为相关的东西。

笛卡尔对数学的钟情同200年后的日本画家葛饰北斋① 对画的沉醉程度不相上下。对葛饰北斋，我能充分理解和欣赏他在哪怕仅仅是一条线中所投入的热情。而要理解笛卡尔对数学的迷恋，对我来说却并不容易，因为对数学，我真是一窍不通。但他崇拜数学和公式的理由多少也使我明白一点。因为在17世纪，由于其“论证的确定性和推理的明显性”，数学成为当时唯一一

① 葛饰北斋（1760—1849年），日本著名浮世绘画家，本名中岛时太郎。初期作品多为演员和妇女肖像版画，后转为历史和风景题材，尤其是市俗和妇女肖像版画。1797年后采用葛饰北斋名，标志着其作品黄金时代的开始，他的作品改变了浮世绘画艺术的方向，对19世纪后期西方艺术影响很大。代表作有《东海道五十三》、《富岳三十六景》等。

门可信赖的科学。

因此，笛卡尔决定把“数学方法”或“推理方法”（或其它我们想称呼的）应用到每一个领域，而正是这才致使笛卡尔主义未能成为可行的生活哲学。当笛卡尔迈出这一步的时候，人类急需一个能把头脑置于心脏之前，令人类智慧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发挥应有作用的一种体系，但最终，他的观点导致了现代试验的冷酷无情的一面，那儿不再有人类情感的空间。而这时，人类不再是人类，而已成为机器的一个零件。

你知道我最不喜欢笛卡尔的是什么——我认为这是他的最大弱点——吗？是他的懦弱。他从未养过狗或猫，更不用提孩子（因为他从未对他短命的女儿有任何的兴趣），或养只鸟来陪伴他。假如在他独自漫游的时候，他能捡条温和可亲的杂种狗养在他的屋里，并成为他日常的伙伴，那么他就不会得出“无灵魂”的低级动物这种荒谬的观点，他就会懂得每一种动物都有灵魂，都需要我们人类的爱护。

我们称之为灵魂的东西，是以无限多的数量存在的，我并不认为有关海胆（一种海浮动物）或者一种有毒的常青藤的文章会十分有趣。然而，只要哪里有生气、有活力，哪里就有灵魂——从意识到存在，并带有自身的需求欲望和热情。就像上帝创造的任何生命都要呼吸一样，狗、猫和鱼全不是什么机械的东西，不像钟表准确地给人们报时，但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这一点，笛卡尔从未怀疑过。如果他这么做了，他就不会想出在我看来有点荒谬的准则——“吾思，故我在”。由于当时对此没有引起严重的争论，这在解释生存之谜上实在不比叔本华同样隐密的“吾愿，故吾在”高明多少。理所当然，思想和心愿是生存的证据。那么为什么不再进一步，就说思想是我思想能力的证据，而和我的存在没有任何关系呢？

当夜读斯宾诺莎、笛卡尔、康德、尼采的书时，我问的唯一

问题是这个人在我一生中能给我什么帮助，使我对我及邻居有最大的用处，而和我的良心发生最小的冲突。

我愿十分恭敬地感谢笛卡尔，感谢他为人类作出的巨大贡献，他坚持——至少在客观世界——唯见是实。我略去了主观世界，因为那超出了我研究和感兴趣的范围。

当然，我也意识到，有许多人把笛卡尔作为他们唯一的导师（就像有人把斯宾诺莎作为他们唯一的老师一样），并且耐心地跟随他到极端的程度。尽管这样，我担心我们中只有极少数的人能最终到达，因为在那大雪封顶的山峰间是十分孤独的，而且空气稀薄，令人窒息。寂寞让人害怕，只要在那冰冷的高原上走错一步，就会终身遗憾。亲爱的弗里茨，你和我，作为生活在平原上的人，我们只能偶尔拜访一下笛卡尔主义这座高山，我们可能决定偶尔去瑞典山区换换空气，就匆匆回到故土，心情愉快，精力充沛，然后重新开始那死气沉沉的生活，非常高兴我们又回到了熟悉的环境。

［勒内·笛卡尔（1596 年 3 月 31 日—1650 年 1 月 11 日），法国数学家和哲学家，是将哲学思想从传统的经院哲学束缚中解放出来的第一人。黑格尔称他为近代哲学之父。他是一位彻底的二元论者，认为“我思，故我在”，并由此引出一切哲学命题。其主要著作有《方法谈》（1637 年）、《哲学原理》（1644 年）等。——译者附注］

描绘法兰西的画家——

莫 里 哀

Moliere（本名：Jean - Baptiste Poquelin）

（1622 - 1673 年）

戏剧在西方真正成为时尚，主要是三位法国戏剧巨匠的功劳，其中，以莫里哀最为伟大。莫里哀的伟大，主要在于他在维护戏剧演员尊严方面所做的工作。

莫里哀本名让·巴蒂斯特·波克兰。他生于莎士比亚死后6年，即1622年，其父亲是位巴黎商人，并得到了皇家室内陈设师的头衔，这是非常值得荣耀的一份差事。俗人还能奢望得到比这更大的荣誉吗？假如生活在17世纪的法国并恰巧是位室内陈设师，那么他要么成为一位皇家室内陈设师，要么羞愧地低下头，甚或自杀，就像可怜的瓦特尔，他在做御膳时因鱼未及时运到而不得不给其主人上无鱼菜肴时就是这样。

年轻的让·巴蒂斯特是在一座称为"猴房"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当时猴子是男性喜剧演员的象征，因此他对戏剧的喜爱是在耳濡目染中形成的。但他的父亲不赞成他准备把当演员作为终生职业的狂热想法，希望莫里哀能像他一样成为一名室内陈设师，以继承他的事业。为皇家修理脚凳，清除衣柜里的蛀虫，工作既稳定又光彩！任何法国人有了这份工作，还会再企求什么呢？

左：莫里哀戏剧作品《塔尔丢夫》的插图
右：《资产阶级[illegible]

可的确就有这么一位，他就是我们的小让·巴蒂斯特。他继承了其母亲玛丽耶·克蕾塞机敏的头脑和对文艺的渴求，她的父亲也是室内陈设师行会中的一员。莫里哀没有兴趣摆弄顶针和剪刀。在很早的孩提时代，他就只有一个愿望，他必须成为一名演员。

现在我们正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让·巴蒂斯特是在哪儿以及如何学习戏剧的呢?

他所达到的一切是通过他父亲的一位朋友得到的，此人也是一位室内陈设师，同时也是一位教徒，当时在当地的一家戏院拥有一个个人包厢，其余的你自己就能猜到了。通过父亲有影响力的朋友的帮助，莫里哀得以进入一所使其同伴羡慕的学校。这是一所教会办的一流学校，对初级戏剧表演非常重视。

在克莱蒙学院学习期间，年轻的莫里哀不但系统地接触了古典文学，而且学习了表演艺术。根据他对父亲性格的了解，莫里哀认识到说服父亲同意一位皇家室内陈设师的儿子去选择演员这样一份低贱的职业是不可能的，他需要换个方式以达到这个目的。经过与朋友们商量过后，莫里哀向其父亲提议去学法律。在那个爱打官司的年代，律师这个职业可以使你走遍天下。莫里哀的父亲欣然表示同意。1641 年，莫里哀通过了一系列的考试，但其命运也发生了转变。他遇到了一位芳龄 24 岁、名叫马德琳·贝雅尔的女演员。在此之前，她已是一位名叫孔德·德·莫德纳的情妇，据说与之有过一个孩子。这种女人显然无法被受人尊重的、严肃的皇家生活圈子所接受。于是，莫里哀的父亲匆忙把他打发到了纳博讷。这样做非常容易，因为在 1642 年路易十三国王因健康状况需要搬到南方的纳博讷，而此时必定有一位室内陈设师随同前往。莫里哀刚刚抵达纳博讷便又返回了巴黎，放弃了世袭皇家室内陈设师的各种权利，把其所有积蓄都花到了他心爱的马德琳身上，并与她一起创办了盛名剧团。这个剧团后来赢得

了法兰西喜剧不朽的声誉，其演员为维护法文口语高度的纯洁做出了不朽的努力，从而使法语成为整个文明社会交流的工具。

最初剧团并不成功，不久便因债务缠身而不得不解散。由于剧团的大部分投入是由老波克兰支付的，由此可见他对其儿子的选择必定多少开始认同了。但莫里哀和马德琳所面临的问题是，在他们最初的尝试失败后，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就在这时，莫里哀作出了一项重要的决定，他要把巴黎的剧院办到普通的法国民众中去。一些一流的演员从未尝试过走这条“路”，因为他们怀疑剧院能在那种偏僻、绝少有机会享受到娱乐的小镇生存下来。或许生活不会太奢侈，但足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于是，莫里哀和马德琳以及他们的演员开始去征服那些穷乡僻壤。这种巡回演出几乎持续了12年，但最终他们取得了他们自己都不敢想像的成功。

这在今天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在17世纪中叶却变成了现实。除了诸多不同之外，巴黎当时尚不能把整个法国吸引到自己周围。当时的一些省会城市依然是当地重要的文化中心。巴黎也许会嘲讽它们，但它们却非常认真严肃，有自己的贵族阶层，这些贵族住在曾祖父为他们修建的城堡中。他们的城堡在投石党运动中被毁掉，长期的宗教争斗把他们赶进了城市。他们也意识到缺乏当时宫廷生活中那份高雅，但他们安慰自己说，缺乏狂热是表明他们严格遵守十诫以及基督教的各种纪念日和斋戒日。他们严格教育后代并试图使他们成为教皇、国家和国王的栋梁之才。

这些好心的人们省吃俭用，但对于建立他们自己的文学院、宗教社团以及艺术学院却慷慨解囊。他们至少每年一次在当地的剧院安排流浪艺人做巡回演出。他们认识到教会对不断兴起的任何与戏剧有关的事物都抱有敌意，教会视之为邪教和革命学说的代言伤。但是由于主教在很大程度上仰赖当地侯爵、伯爵和男爵

的支持，因此为其利益着想最好的办法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总之，他们绝少公开干预当地每年一周的正规演出。

当这些诚实的小城居民发现除了原先那些三四流的演员（几乎没有一个能把台词念准确）外，他们现在能有幸接触这样一位讨人喜欢、彬彬有礼而且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并且他所带来的戏中的主角竟然是个女的，另外他的演员也比以前那些所谓的悲剧演员要强得多。因此，小城的居民兴高采烈，对莫里哀率领的巡回剧团的热情始终不减。

最初，莫里哀对于做演员深感满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尝试着写点小东西。这一写就一发不可收拾！整个世界为之一新并为之期盼："这是一个新的声音，一种新的进取。这里而有活生生的生活。我们喜欢，再多写一些吧。"

当然，这种情景是每位剧作家所企盼的：公众不断渴求你的作品。同其他人一样，莫里哀也在考虑这种热度能保持多久，直到有一天，善变的观众转过身去说道："哼，这种东西我们已经听过了！他是黔驴技穷了。我们到街对面看看那位新来的家伙有点什么新东西吧。"但奇迹在莫里哀身上出现了，公众对他的作品情有独钟，一往情深。

但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潘洛斯（伏尔泰《老实人》中的哲学家）式的空谈家和执拗之流感到不满和忿恨。因为莫里哀这位无名的文字匠在一出出戏剧中将他们的面具揭掉，虽然没有攻击任何人，也没有提任何人的名字，但已把他们的恶行揭露无遗，而且任何人都会一目了然所指是谁。同时，恰如一位聪明的诗人所写："一位小人荣誉受损，怒火天下无敌。"

但塔尔图菲先生出现在舞台上时，上述愤怒与教士的雷霆之怒不可同日而语。塔尔图菲是位可鄙的宗教狂热分子，他先是诈骗其恩主奥尔贡，随后试图勾引奥尔贡之妻埃尔维拉。

1664年，莫里哀已回到巴黎，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同

时还得到了路易十四国王的庇护，这位国王实际上在其《逼婚记》中扮演了一个角色，该剧作曲为吕里。正因如此，莫里哀认为自己可随意行事，但这正是他的错误所在。《塔尔图菲》（后改名为《骗子》）遭到了教会的激烈反对，并被禁演。

莫里哀向国王求助，国王邀请了教皇的使者来到凡尔赛，并让莫里哀把剧本读给他听。使者向教皇陛下报告说，该剧的主题描写没有任何越轨之处。但巴黎的宗教界人士却不同意这种裁定。即使国王也不愿公开惹起他们的不悦，莫里哀主动将剧中最使人不快的几章做了删减，并公开上演《塔尔图菲》。但不幸的是，国王正率领部队在佛兰德作战，所以无法到场。第二天，巴黎地方长官在巴黎主教的压力下，勒令该剧停演。莫里哀派了剧团的两名人员前往国王的驻扎区，国王答应一旦他回到巴黎，一切都会好转起来。

巴黎的大主教于是从另一个角度发起攻击。虽然他无法继续阻止该剧的上演，但他可以利用他的权势去阻止那些期望去观看该剧的人。主教公开声明说，任何人如果观看、阅读此剧，或参加该剧的演出，都将被驱逐出教会。虽然被革除教籍已不像中世纪那样可怕（那时被逐出教门就等于变成了一具活着的僵尸），但巴黎人——特别是妇女——依然无法挣脱他们精神“领头人”的羁绊，不会为了在剧院呆上一个晚上而甘冒这样的危险。

国王陛下也承认对于教会这种做法无能为力，于是建议莫里哀最好写些别的作品，并且忘掉这段不愉快的经历。莫里哀作为国王陛下一向忠实听话的仆人，撤掉了这部作品，并创作出了许多部别的喜剧作品。18 个月后《塔尔图菲》再次上演，结果有人有足够的兴趣掀起一场谴责运动。

但与一些愚蠢对手间无休止的争论使莫里哀的身体受到了极大摧残。他患了消化系统的疾病，现在看来就是胃溃疡，而这种病的起因就是缘于太多的焦虑。医生给他开的药方就是喝牛奶，

莫里哀的创作继续我行我素，直到生命的后期。这是一场艰难的斗争，最后他已消耗殆尽了。

如果现在来这样假设：莫里哀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家中有位可爱的太太，那么在他饱经无休止的争斗——三代人过后，伏尔泰称这种争斗为“铲除邪恶”，而任由其读者断定哪一制度为“邪恶”——之后，他回到家中可找到一份安宁和温馨。但不幸的是，莫里哀虽然有个家，但并未得到一位好太太。莫里哀所娶的女人确实是位美人，也是他剧团中最好的女演员，但她一直是莫里哀痛苦的根源，这并不是说她做了什么，而是因为她没有令人满意的出生证明书。

只是近年以来，我们才能了解到关于该事件的如下事实，并且学术界也似乎认可了这种说法。莫里哀娶的是他前情人的妹妹阿芒德·贝雅尔，而不是她的女儿。但我们确实不知为什么贝雅尔老夫人对她最小的这个女儿的出生有必要如此神秘。当莫里哀步入中年且事业有成，计划娶这位年轻的女孩为妻时，他所有的对手都纷纷跳了出来，那种对莫里哀攻击的程度也足以让我们今天的社会版专栏作家欢欣鼓舞。

150年后，在法国档案馆中找到以下的记载，并且证实了阿芒德·贝雅尔是贝雅尔老夫人的女儿而不是她的孙女，流言蜚语者杜撰了一切。所幸的是，国王并没有被一些伪善的纷扰所左右。做为一个仁道的君主，至少是对私人朋友所做的一种姿态，国王陛下成为了莫里哀和妻子第一个孩子的教父，以冲淡外界对他所喜欢的这位演员的攻击。由于得到皇室的认可，人们或许还会继续窃窃私语，但每有国王的人在附近，人们便不敢再说三道四。

很遗憾，莫里哀的这桩婚姻结果并不美满，看起来主要是由于双方年龄的差异，但两人“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我们今天或许可以这样解释。莫里哀死后，正是阿芒德勇敢地去晋见国

王并抱怨说，由于大主教的命令，她的丈夫如同一只狗一样被草草埋掉。如果她对莫里哀生前没有一丝爱慕的话，她是不会冒此风险的。

我有一个习惯，即当我写我真正喜欢的人时，我会忘掉一切，并且几天废寝忘食（或者稍有寝食），以便使我更好地描写他们。但我确实喜欢这位法国老人。其实我并不是个戏迷，宁愿去读《创世记》，也不愿坐在戏院里观看那些毫无新意的悲剧或喜剧。但莫里哀对我的吸引力如此之强烈，已经成为我心目中的英雄。但我也时常感到疑惑，他除了作为一名剧作家和剧院经理外，再没有值得引人注目的地方。但所有与他同时代的人（别有用心的人除外）似乎都承认他不仅是一位对生活敢于直言，而且是善于表达其鲜明态度的人，因此远胜于那些打着改革旗帜挥舞棍棒的人。正是由于他的这种素养，才使得他在戏剧界的影响犹如两个世纪后李斯特在音乐上取得的建树一样辉煌。

在莫里哀开始写作、表演和管理剧团之前，西欧的喜剧和悲剧演员的地位一如古罗马时代一样，被官方划入流浪艺人之列，其所受待遇与普通的流浪吉普赛艺人相差无几。但当一位演员与国王同桌进餐（即使是对宫廷中的达官显贵也是难得的荣誉）后，一切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如果我们能与李斯特聚会，我们会询问他是如何成功地使那些皇家资助者在出席每一场音乐会时都保持体面的风度。他的做法就是与他们建立起了感情和精神的纽带，而这也使他成为了当时社会名流中的一员。同样，莫里哀的个性也深深地影响当时的环境。犹如众多的胃病患者一样，人们认为这也可能导致他产生忧郁、疑虑并对灵魂问题产生深深的疑问，但他肌体上的不适并未影响他的幽默感。他依然彬彬有礼并且考虑细微。即使在他遭受剧烈痛苦的时候，他的文思依然如溪水不停地奔向山涧。由于

他把斯多噶哲学（崇尚恬淡寡欲）和伊壁鸠鲁学说（享乐主义）巧妙地协调起来，他在任何阶层都生活得游刃有余。意识到自身存在的弱点，他对于邻居们的一些小毛病也相当忍让。他还是教会一名忠实的信徒，小心地履行着宗教义务。同时，如同路易十四（也包括国王）年代大部分有知识的法国人一样，他多少也信奉一些笛卡尔的学说，推崇把其精神说教建立在数学确定性之上（请注意：一旦能安排开，我们将尽快请笛卡尔来做客）。

在后来的200年中，对于宇宙和造物中的这一态度，将使法国成为思想学术界无可争辩的"开路人"。但在阿尔卑斯山山脉的另一侧却未受到过足够的重视，一个半世纪以来，那里一直被一股坚韧不屈的教权主义所笼罩。

基督教代言人的暗探以不懈的热情去探听和揭露即使是处在萌芽状态的异端邪教。当然，正面的攻击并不可怕。那些崇尚罗马教皇为最高权威的爵爷们会挺身而出为教皇抵御直接的威胁。但是怀疑的毒药却可能藏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或许是一幅画，一首曲子，一出赏心悦目的戏剧，或者一出芭蕾剧和滑稽剧。因而时刻保持警惕的裁判所成员应汇报哪怕是根据正确的思想方法推导出的最无害的结论。甚至国王也似乎相信"怀疑是一切智慧的开始"这样一个信条时，这一机会变得显而易见了。莫里哀此时也成为号召摆脱对超自然恐惧运动的带头人。压制并劝阻这位室内陈设师的儿子保持沉默的企图，不但一直持续到他辞别人世，甚至持续到盖棺以后。

1673年2月，莫里哀与世长辞，他死时的方式一如他典型的生活方式。那年他仅51岁，但人生道路上的坎坷已使他心力交瘁，这包括与愚钝牧师间荒唐的争论以及两个儿子和马德琳·贝雅尔的过早去世。马德琳与他一同开始戏剧事业，在莫里哀心中，比现为其妻子的她的妹妹要重要得多。

莫里哀刚刚完成了一部戏中主人公臆想自己生病的喜剧写

作，便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最后一站。虽然剧烈的疼痛已使他既不能站也不能坐，但这位可怜的作家决心自己饰演这个角色。

“我还能做些什么呢?”他告诉劝他卧床休息的朋友，“如果我不出演，就不会有这出戏的上演。如果没有演出，50多位靠今天晚上演出收入维持生存的剧团人员，就得让他们的家人挨饿。我不能对不起这些善良忠实的伙伴，我不能辜负他们对我的信任。”

在第二幕演出结束时，莫里哀突然感到一阵痉挛并引起惊厥。他试图大笑几声以掩盖疼痛以便能坚持到最后。随后他的朋友把他抬回到家，莫里哀即与世长辞了。他死得如此突然，连他的妻子当时也未能赶到他的身边。

第二天早上便碰到了如何埋葬的问题。当莫里哀意识到他即将走完人生之路时，他曾派人去请牧师。作为基督教的一位好教徒，他希望能得到宽恕。但是教区牧师却拒绝为一位演员做忏悔。一年前，马德琳·贝雅尔却逃脱了相同的厄运，因为她在死前正式宣布放弃演员职业。死神突然光顾，莫里哀来不及把这写入他自己的角色中；同时，公正地说，他是否会作出这种道德懦弱的举动，也是一个问题。然而，对于莫里哀尸体的处理已不是什么秘密。巴黎大主教（此人以其作风放荡而臭名昭著）拒绝将这位流浪演员的尸体埋入神圣的墓地，并且拒绝以基督教通常的礼仪掩埋这位基督教徒。莫里哀狂怒的妻子转向路易国王求助，国王对这位曾经给他的国家带来声誉，但其地位卑贱的演员存有一种真挚的个人情感。他传令给大主教说，他不能容忍这样去缅怀一位老朋友。于是，大主教提出了一个听起来很不错的折衷方案。作为特殊照顾，可以由两位牧师参加葬礼，但必须在日落之后举行，且不举行特别的仪式。不然莫里哀或许会与罪犯和自杀者埋在了一起。

对于莫里哀是否埋入圣地的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关于莫里哀的墓穴与没有领圣体的圣约瑟夫墓地在一起的说法也值得怀疑，并同样不能确定。我们只能去推测，结果今天没有人真正了解这位法国最伟大的作家到底埋葬何处。

另外一个更为有趣的事实清楚地表明17世纪官方对演员的轻视。莫里哀从未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成员。有一天，如果你看到一本书，而促使你购买的原因是因为该书的作者是一位法国文学院的成员，请记住，我亲爱的弗里茨，这些体面的老顽固们曾经拒绝与我们这位皇家室内陈设师的儿子为伍。但在他们同时代的人中，唯有他至今依然活在我们心中。正是他以其辛辣的嘲笑向世人表明那些自以为是的学究是人类最危险的敌人，从而令整个文明世界大笑不已。

[莫里哀（1622年1月15日—1673年2月17日）是17世纪最伟大的剧作家，他运用喜剧形式创造了新的喜剧风格。主要作品有《太太学堂》、《塔尔图菲》（后改名《骗子》）、《吝啬鬼》、《贵人迷》、《司卡潘的诡计》、《女学者》、《没病找病》等，同时他亲自上台演出。其作品有强烈的戏剧感，往往不是以故事情节而是以生动有力的台词引人入胜。伏尔泰尊称他为“描绘法兰西的画家”。——译者附注]

在历史上打下不朽的烙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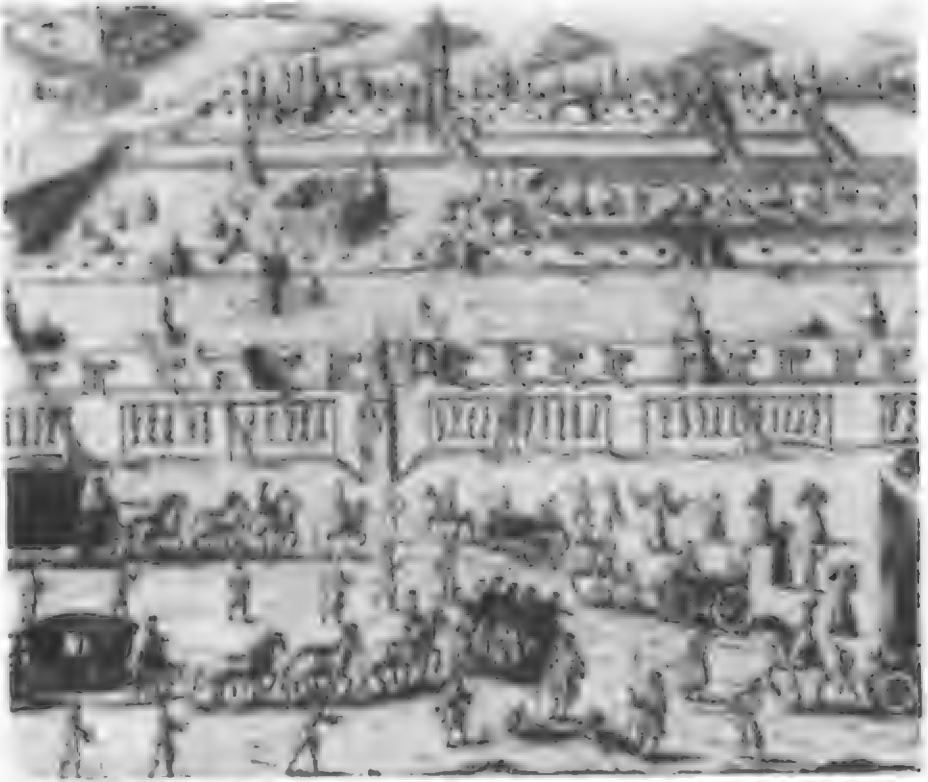
彼得大帝

Peter the Great

(1672 – 1725年)

请拿出你的地图集翻到东北欧那一页：一块辽阔的平原从北冰洋一直向黑海延伸，众多的河流穿越其上，它们大都发源于平原中部的低山区，向北或向南部奔流。与平原西北部相邻的是现在称作芬兰的湖泊森林区，芬兰西部是如拉布拉多一样寒冷荒凉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仅仅由于美国赐予欧洲的最大礼物——墨西哥暖流还能带来些许暖意。墨西哥湾暖流使得斯堪的纳维亚的港湾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是不冻的，但广阔的东部平原却没有一个通向海洋的口岸，虽然大海一年中有6个月不为冰层覆盖。

这片辽阔的土地在冰河时期完全为厚厚的冰雪掩盖着。最终冰雪向北极退去，土地逐渐变得适合人类生存。日耳曼人的部落虽反复穿越这片土地，直到最终在西欧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定居下来。芬兰人，一支与匈牙利人有着较远血缘关系的鞑靼人部落，不知怎么找到了通向成为今天的荷兰这块土地的道路。斯拉夫人最终也占据了乌拉尔山和中欧各山脉之间的东部大平原，即今天的俄罗斯。斯拉夫人也因此注定要成为一个内陆民族，像我们当代一位历史学家恰如其分地称呼的那样，一个“陆地动物”



民族。他们仍然过着游牧生活，这也无关紧要。即使在他们定居下来成为农民以后，他们的组织性也极差，数量上也无足轻重，文明极为落后，以致于他们从未觉得有必要建立与外界进行直接联络的路线。

但在公元9世纪俄国人开始遭受西部邻邦的进攻。这时他们才最终意识到要结束已在他们的王国内盛行了无数世纪的混乱状态，建立起某种秩序很有必要。

他们不再是异教徒了。从君士坦丁堡沿着穿过平原的河流而来的基督教传教士教给了他们一些文明的基本知识。偶尔也会有一两个精力充沛的部落首领开始为自己封侯封王了。但所有这些君王、幼君之间永远不停地争斗，结果这对于仍然生活在几乎史前状态的贫穷和苦难之下的农民来说无疑是一种灾难。

于是俄国人向已开始统治整个西欧的西部海盗勇士传话说，“我们这里有几百万人，却不知道如何管理自己，请来帮我们吧。”

斯堪的纳维亚人不需要人再告诉第二遍。这可是送上门的好处无法计量的便宜买卖。他们于是迅速东行，建立了一个秩序井然的俄罗斯国家。作为鲁里克人——鲁里克据说是第一个到达俄国的瑞典首领——的后裔，他们统治俄国长达700年之久。之后他们都死去了（7个世纪的漫长时间足以使任何王朝灭亡），他们的位置由新的统治者——斯拉夫人——代替了。也许从13世纪俄罗斯被来自乌拉尔山脉后面大平原的小个子黄种人征服起，他们的血管里流淌的就有鞑靼人血液了。但他们觉得自己才是真正的俄罗斯人，唯一的俄罗斯人。对内陆的俄罗斯帝国的统治已满足不了他们膨胀的野心了。他们必须寻找出海口。他们的北部是永久的冰封，南部又有土耳其人挡着，这样唯一的出口剩下波罗的海了。在此我们不得不联系到彼得·伊万诺维奇——彼得大帝一名更为我们熟悉。

正如他的名字所揭示的那样，彼得是沙皇亚历克赛·米哈伊洛维奇的儿子，因此是曾在 1613 年掌握对莫斯科统治的罗曼诺夫家族的成员。亚历克赛·米哈伊洛维奇曾经结过两次婚，彼得是他第二位妻子那塔利娅·纳雷什金娜所生的，当时在他之前已有了一个男孩，但这个男孩是如此懦弱无望（而且他一只眼睛还有眼疾，使他几乎成了半个瞎子），即使在当时还不至于过分吹毛求疵的俄国人也觉得永远不能让他执掌大权。

国家的长者聚在一起商量，决定让彼得取而代之，一些一心希望通过拥立白痴为王而从中受益的军队还为此发动了叛乱。结果最后双方达成了妥协，相互承认伊凡和彼得同时为王。

由于认为两个孩子尚小，不能直接参与政府领导，所以决定在他们成年前让他们的姐姐索菲娅（彼得同父异母的姐姐）摄政。索菲娅是个天赋很强的女人，很有能力，但她在思想上是非常非常俄国化的。17 世纪的俄国人仍然生活在一种中世纪的无知龌龊、自满的状态中。如果莫斯科仍然是一个小小的斯拉夫国家这也就无关紧要了，可是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东罗马帝国拜占庭文化传统的遗产转移到了莫斯科，因此莫斯科成了一种文明的中心——这种文明在世界其它部分恐怕找不到第二个，它是披着薄薄一层基督教面纱的亚洲式专政。拜占庭老君王们的严格礼仪从君士坦丁堡的帝宫移植到了克里姆林宫，但其余的几年没有什么改变。生活在村社里的农民依旧在合作共产的基石上耕种他们的土地，所有的田地都是共有的，就像当初清教徒在大西洋西岸刚刚定居下来时那样。

这一事实常被撰写俄国过去 25 年历史的人所忽视，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事实上并没有带来任何新意。他们只是回到了彼得以前的时代，回到俄国人仍然为俄国人而不必被迫模仿法国人、英国人或德国人的时代。在西方人看来，他们似乎已找到了未来之光，而事实上他们却是在走回头路，要把俄国带回到他们最初成

其为民族的时代，也许这正是他们实验成功的原因所在。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实际上只是在继续走彼得留下的路。

在我们思考几乎一夜之间便崛起的沙皇彼得政权时，有一点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他并不是白手起家的。他所继承的莫斯科大公国已经是个相当有规模的王国了。

1480年，伊凡三世完全摆脱了最后一批鞑靼人的入侵。两代以后，另一位伊凡已征服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不久以后俄罗斯又开始征服西伯利亚了。这项赫拉克勒斯的任务[1]进行得如此神速，以致于到了17世纪中叶时，俄国人已到达太平洋海岸，并且在新世界里寻找更多的领地。

这样在彼得继位的时候，他已是一位虽然简单、原始，但却可称得上是17世纪人们所理解的“现代化”国家的核心政权的统治者了。一方面，这个政权可以拥有足够的子民奉献出大量的钱财来建立一支陆军和一支可以与其他欧洲强国竞争的海军，同时也具备了足够数量的农奴（比奴隶一词听起来好听一些，但实际意义一样）来保证其陆海军达到一定的水准。其余所需的仅仅是一位具有无尽的精力，可以为了俄国成为欧洲政治上的支配力量而进行各种必要的组织活动而又能不因良心的谴责而却步的人物。让我来试着描述一下我是怎样看待这个能使自己的儿子窒息而死却又为拯救一位战友而牺牲了生命的狂人的。我一直追寻着他在整个欧洲具全部分俄国土地上的足迹，这是了解历史的唯一方式。例如，我在这里可以讲一下我是如何发现它的价值的。尽管我们听到关于列宁与斯大林的许多材料，我们还是不应把他们及其信徒和助手们都看作“真正的可怕的”共产主义者。他们的过去、现在都不是穿着现代市民服装、带着布帽子的彼得大帝的

---

[1] 意为非常艰巨的任务。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主神宙斯与阿尔克墨涅女神之子，力大无比，以完成几项英雄业绩闻名。

化身。他们过去、现在都不是左翼沙皇。虽然，他们统治的人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共产主义者，但他们与那些生活在所有这一切开始的17世纪的农民和农奴们完全不一样。而且，今天他们是在工厂里干活，而不再是在犁铧后流汗。

这就是我眼中的年轻彼得。如果他生活在今天，他会成为心理学家们的宠儿——他无疑是研究各种不协调症状的理想目标。他小的时候不受重视，刚刚步入青年时期时又生活在一种不断为生命担忧的恐惧之中。他所成长的克里姆林宫与其说像一座受尊敬的基督教宫殿，还不如说更像土耳其宫廷。但他从他的母亲那里继承了一定的“现代主义”倾向。虽然这个女人的婚后生活一直在妻妾成群的后宫的隔离状态中度过（就正式妻子而言，过去俄国人还是严格遵循一夫一妻制的）。在还是个小女孩时她就得到过有关外界的第一手信息。她也一定把她对西方生活方式的热情传染给了她的儿子。否则的话似乎无从理解——一位年轻的莫斯科王子，在一种彻头彻尾拜占庭式的环境中长大的王子竟然成了一名欧洲人．彼得在克里姆林宫天天直接接触的另一位人物便是他同父异母的姐姐索菲娅。而她则更愿一直做个俄国人，不是出于爱好而是出于明智的策略。因为她已处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也愿继续留在那里。同时，对于彼得，只要他远离各行政机构，只要他不以任何方式干涉她和她的顾问们对这片土地进行他们认为合适的统治，那么随便他在业余时间里怎么自得其乐，她都没有意见。

而对彼得来说，这是令人满意的安排。既然在宫廷里没有什么规定的责任，他就可以整天呆在他觉得放松的地方，而这些地方恰恰是莫斯科保留给已逐渐将触角伸向俄罗斯首都的外来因素的地方。像所有外国人聚居地一样，不论在莫斯科还是在马德拉斯，这种地方充满着稀奇古怪名声不佳的人。曾写过《克珀尼克上尉》和《充满笑声的葡萄园》的卡尔楚克迈尔应写一部关于他

们的剧本，想像一下，他可以在这部热闹的喜剧里描写那些偷了主人资金潜逃的怪人，莫斯科外国人聚居区的无赖和骗子、瑞士火柴商、德国药剂师（在家乡曾背地里毒死过人）、大酒量的荷兰机械师（只需在船舶的地方建造船只，其它时候也造一些风车、水车）、其科学履历受人怀疑的法国医生、匈牙利裁缝（在布达佩斯下层社会出尽了风头）和巴黎理发师——他们保证给那些肥胖的俄罗斯顾客（在那片乐土上低于200磅恐怕就算不得真正的女士了）理出与漂亮的德拉包帕罗侯爵夫人最后一次出现在凡尔赛剧院时留的发式一模一样的发型。

此外还有来自白海边阿尔汉格尔建立了多年的英国贸易公司的表情严肃的代表们，来自布鲁塞尔的面色苍白的厨师，丹麦的剑术师，阿姆斯特丹的烟草商（尽管俄国教堂谴责吸烟，认为吸烟是主要罪行之一，这一习惯却已根深蒂固了）。土耳其人无明显的谋生方式，却知道如何适时地帮一位感兴趣的小伙子找到他要寻找的那类女孩，有着夸张名字的法国女士和仆人（她们借用了从前女主人的名字），她们从事与土耳其人同样的行当；教授体操的普鲁士教练，被撤职的奥地利军官——他们所做的事是让自己有匹马，又有一位出得起钱的父亲让人传授骑马的微妙要领，还有出售据说是所罗门国王① 献给舍巴女王的长生不老药配方的埃塞俄比亚王子。

此外（社会专栏必不可少的内容），必不可少的法国成衣商（两种都有）和一些耶稣会的用心深远的成员，他们以畅通无阻的方式四处寻觅，也许看是否能捉到一两个异教徒，为自己的信仰而拯救其灵魂，并且还有许多地中海人，设法以唯有地中海人知道的方式生存着。来自遥远的中国的小市民，他们的运茶马车

① 所罗门（？—公元前932年），以色列国王，加强国防，发展贸易，以武力维持其统治，使犹太人国家达到了鼎盛时期，以智慧著称。

过去常常穿过亚洲的沙漠地带，现在还努力培养莫斯科人的饮茶意识，结果出乎意料地获得了巨大成功。

来自遥远的非洲的黑人迎合了当地老一代贵族绅士们某种不良的兴趣。我甚至曾读到过一位美国印第安人也曾加入了那里的外国人聚居区的事，但究竟他在那里干些什么，为何要离开自己那快乐的狩猎天地，我却无从知晓。约翰·保罗·琼斯[1] 是俄国人将见到的新世界的第一位真正代表，但他是在很久以后才来的。我们这位伟大的海军将领的探险经历向我们展示了这些移居国外的市民一旦踏上斯拉夫人的土地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如果（如我们从琼斯的信中得知的那样）在18世纪圣彼得堡的生活相当糟糕，混乱不堪，17世纪的莫斯科人又会如何呢？

然而彼得·阿列克西耶维奇就读的就是这样的学校，并从那里读得了文学学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他从那里学会了喝杜松子酒，抽烟斗。喝酒在莫斯科良民眼中还算不上大逆不道，根据传说，他们决定皈依基督教而不是更实际的穆罕默德主义，仅是因为穆罕默德先知是绝对戒酒主义的严格倡导者。但烟在莫斯科的教士眼中是该诅咒的东西。嘴里叼着烟斗的人会使他们的灵魂充满恐怖，这好比见到一位没有胡须的男人的脸一样可怕，因为魔王都是将胡须剃得干干净净的，而忠诚的基督教徒则留着长达膝盖的胡须。如果这位年轻的王子敢在公共场所“吸大烟”——人们当时这样称呼抽烟，一旦这样的人完全控制政府，他就很可能有胆量去倡导一个不留胡须的俄国。

俄国人根本不知等待他们的是什么！这位抽大烟的王子果真登基称帝了，而且不久他的士兵便穿梭于首都的街道，拦住每一位留着胡须的权贵，随着他们手持的锐利的剪刀飞快转动，那胡

---

① 约翰·保罗·琼斯（1747—1792年），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海军将领，多次战胜英舰，俘获战船。

子便一命呜呼了。抱怨无济于事，如果谁抗议的声音稍微大了点儿，下一次剪掉的就该是他的脑袋了。

如我刚才所告诉你的，与彼得通向王位之途相伴的是一场近卫兵的叛乱。这场叛乱以确认的沙俄方式被镇压下去了——叛变的士兵被宰牛般地屠杀了。之后大约7年时光里，索菲娅成了国家的首脑，沙俄克里姆林宫的彼得，则变成了欧洲人聚居区的彼得。但这7年对彼得来说并非是浪费光阴，在他的乡村庄园里(只要见不到她的弟弟，索菲娅是乐得这样的)，彼得忙于操练着庄园农奴的儿子们。在一个小湖面上，他指挥由几个小划艇改造成的微型战舰扮演"海军"。

这一天——不可避免的一天——终于来到了。旧沙俄的狂热信徒们决定铲除那个永远不停地叫嚷着建立"新俄国"的话的威胁。他们策划着另一次阴谋。但像通常那样，他们把计划搞糟了。彼得却抓住了这次机会，他现已17岁，能妥善照顾自己了。他赶走了摄政者，同父异母的姐姐索菲娅，被软禁在了尼姑庵里，从此，在克里姆林宫就再没人见到过她。他没有杀死半痴的同父异母兄长伊凡，而是允许他继续这样半呆半傻地活下去，只是完全是"退职休养"。在一位名叫弗朗索瓦·雷佛托的瑞士籍专业士兵——一位聪明的探险者——的帮助和怂恿下，彼得开始了自命的将蛮荒状态的俄国变成所谓的西方文明之邦的艰巨任务。

年轻的沙皇带领他重新组织的军队向南方的土耳其人发起了进攻，由此拉开了他的新的职业生涯的序幕。他很快被迫意识到他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独自解决这群异教徒，他需要同盟来对付他们。为何不试着说服其他的欧洲国家与他们的俄国同胞开辟共同的事业，开始一次新的征讨呢？

不幸的是，当时的欧洲更担心的是野心勃勃的法国路易十四国王，而不是他们不甚了解的相距遥远的土耳其人。不管怎样彼

得觉得他应当试一下。所以西欧各国的首都历史上第一次有机会注视着真正的大批俄国人——真正的沙俄贵族；他们耳上带着钻石，头发里生着虱子——穿着沉重难受的各式貂皮大衣，为此而汗流浃背，西方人奇怪于这些不可救药的野人究竟生活在什么样的国度里。

但他们往往没注意到一位身着简单的上尉制服的绅士——他在这群耳上坠着钻石、身上穿着上等皮袄的使者团中根本不显眼，如果他们观察得足够仔细的话，他们可能会注意到，就是他在走访几乎每一座工厂、每一个船坞和印刷所，是他在暗地里向那些工程师、建筑师、军火制造商、造船工、勘察员、医师、药剂师、木匠们提供待遇优厚的合同，许诺只要他们愿意离开家乡一些年去遥远的莫斯科帮他改造他的国家，使之现代化，他就会付给他们丰厚的薪水。这位简朴的上尉就是伟大的沙皇本人。他在欧洲之行中的所见所闻比任何时候都更坚定了他革新俄国的信念，并且要马上着手这项工作。

是的，他也谈了许多讨伐土耳其人的事，可是欧洲人对此都不感兴趣，这毕竟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无多大关系。所以单从政治角度来讲，这次西欧之行是一次可悲的失败。但是彼得返回俄国的时候，他带回了至少500人的西方专家团。尽管这数字比起等待他们的庞大任务来说小得可怜，可至少是个很好的开端。

彼得很快就返回了俄国，比他预想的还要快，他也不得不如此。国内的保守派已看清了方向，他们害怕风暴很快就要升级成一场飓风，因此在那些老宫廷卫士们中间再一次爆发了一场叛乱。听说这次新的叛乱爆发后，彼得不顾生命危险火速赶回了莫斯科。就在他返回首都的那一刻，另一场清洗运动便开始了。

这一次彼得干得很彻底，他自己帮着屠杀他以前的士兵。在将他们的尸体扔入河中之后，一场改革运动郑重地拉开了序幕。

彼得亲手剪掉大臣们的胡子，对于那些过分爱惜胡须的人，

彼得给他们一次保留胡须的机会，条件是他们要交纳一大笔罚金——每一寸胡须要交几千卢布，之后再脱掉东方式的长袍，让那些匈牙利裁缝们整天忙于为他们赶制第一批欧洲套服，包括实用的短上衣和最佳的维也纳式裤子，同时，这对于所有基督教信徒可能都是个可怕的打击——从那时起，新年将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从1月1日开始，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从9月1日开始。按俄国的年历，9月1日是上帝创造我们这个星球的时刻。

所有这一切让我们听起来很愚蠢可笑，但请记住，就是这同一批愚昧的俄国人在不久前曾亲手捣毁了立在克里姆林宫的一座大钟，理由是报时的钟声让他们听起来想起了魔鬼。他们也曾焚毁了莫斯科的第一家印刷厂，因为书籍被怀疑是引起危险思想的传播源泉。

做好这些最初的安排之后，在北方争得一个立足点的斗争便开始了。没有欧洲的援助，俄国就没有足够的力量对付掌握欧洲大平原南部的土耳其人，那么就只剩下另一个出海口——波罗的海。于是沙俄与瑞典一如现在这个掌握着开启波罗的海之门钥匙的国家展开了长达20年的战争。

第一场战争——纳尔瓦之战以沙俄战败的不光彩结局而告终。但一如查理一样固执的彼得坚持战斗下去。他很快重组了军队，以几乎使他倾家荡产的钱财购买了当时欧洲市场上最新式的大炮，结果在波尔塔瓦战役中俄军一举打败了瑞典人。

在以后的20年中，俄国人几乎随时都可能失去他们的一切，也只有如此才能获得更多，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一个新的俄国逐渐产生了，因为人们认识到现在别无选择，只有继续一博了。他要么成功，要么灭亡，所以最初的莫斯科公国最终成了俄罗斯帝国。

1702 年彼得重新征服了现在称为芬兰湾的南部海岸。瑞典人于 1617 年占领了这片荒凉的土地。1703 年 6 月 29 日，彼得为彼得与保罗要塞奠定了第一块基石。此后这里成为了他新都的城堡和核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那里便建成足够向彼得城堡移民的房子。尽管今天这个城市被叫做列宁格勒而不是圣彼得堡，不过列宁认识到了彼得的伟大和他的俄罗斯本质，从来没有打算让这个城市以自己的名字命名。

之后沙皇开始大刀阔斧地实施他的建筑计划。千万农奴从俄罗斯各地调到涅瓦河岸的沼泽地带为实现这一宏伟工程而奋斗。这些可怜的人像苍蝇一样死去。疟疾、霍乱、伤寒盛行，这些可怜的奴隶只有一半的人能健康地从事工作，但工作必须完成。1712 年沙皇彼得得以入住他的第一座官邸，所谓的“夏宫”。几年后他又在今天的赫米戴奇博物馆所在地拥有了一所冬宫。1724 年，俄罗斯抗击鞑靼人的战争英雄，圣徒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的遗骸从莫斯科隆重迁往了新都。在彼得去世的 1725 年，这座城市的居民已超过了 7.5 万人。

沙皇的继承者们尽最大努力试图改变潮流的方向，以重建莫斯科为首都，但他们无法做得到。大潮始终向相反的方向奔流着。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凭着其对真正的俄罗斯品格的深人理解，最终销毁了罗曼诺夫王朝所做的一切，返回了莫斯科。从那时起，彼得的“西部窗口”便失去了其昔日帝都的风采，尽管人口依然众多，却变成了一座普通的城市，街道上已然杂草丛生，已无人居住的宫殿空荡荡的窗口下是曾经构成彼得帝国梦想一部分的荒凉、绝望的马路。

彼得 1725 年 2 月 7 日（按我们的日历应为 11 月 28 日）去世。当时几乎每年都要泛滥的涅瓦河水又一次决堤，洪水袭击了整个城市。沙皇乘坐着一条船努力援救着那些逃到屋顶避难的人们。之后他的一名船员落水了，沙皇跳下去救了他，自己却患上

了感冒。感冒很快发展成了肺炎，国王那已被酒精侵蚀的身体抵抗力极弱，于是10天后他死了，在他的子民充满感激的祷告声中离去了。

彼得将俄国从一个落后的、处于中世纪时代的国家变成了现代化强国。经常听见有人问这样的问题：如果他自己保持足够的健康，如果他不将巨大的能量浪费在这样一个无望的任务上，情况是不是会好些呢？可是在他去世时，任务已经完成了，而且完全归功于他一个人的努力，因此我想我现在应当把他放到我的历史显微镜下观察一下，借助于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过去几个世纪的反射亮光，透过这一奇妙的显微镜来仔细研究他究竟是怎样一个生灵。

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便是他彻头彻尾——百分之百的——俄罗斯主义。他可能会装作喜爱西方文明，可仅仅是在它能使他自己的人们受益的意义上才喜欢的。因此他坚持尽可能让斯拉夫血统的人来完成那项工作。当然他最初不得不雇佣外国人，不过他非常不情愿这么做而且在他们允许自己被尽快俄罗斯化前提下才这样做的。

当我进一步研究他时，我发现了另一个让我吃惊的特征，即他对真正的俄罗斯人灵魂的深知与理解（因没有更好的词汇，就让我再次搬用一下这陈词滥调），这曾是（至今仍是）一种很奇妙的进展。这位比任何曾占据过莫斯科显位的统治者做了更多让俄罗斯人的灵魂感到不安之事的国王也更了解他的子民，比在他之前或之后的所谓典型俄国沙皇们要理解得透彻多了。

彼得的神秘宗教思想品德更是完全斯拉夫式的。这一切并不妨碍他在一些场合成为过去500年中最残酷的暴君。每当他的计划遭到那怕是最轻微的反对，他决不会滋生任何怜悯之心，就连他的儿子——他唯一的儿子——也成了他一意孤行地实施他的计划的牺牲品。这个孩子叫亚列克修斯，是那种多情的人，在他年

纪还小时，就被迫与母亲分离了。彼得对亚列克修斯的母亲感到厌倦，先是迫使她成了修女，然后便送她入了修道院。自行其是的亚列克修斯与他父亲的敌人——维护旧王朝的人——成了同盟。当沙皇听到这一点时便宣判了他的死刑。直到今天我们仍无法确认死刑是否真正执行了，或者那位王位继承人究竟是怎样离开人世的。但根据最可靠的证据进行的最后猜测是他死于他父亲的杖击。彼得从未表现出任何后悔。他可能觉得他的儿子没有权利如此愚蠢。

他的真正斯拉夫品格就谈到此为止。另一方面，他身上的非俄罗斯品质在于他对科学技术的强烈好奇心和他的持续艰苦工作的能力。但他将他的责任和权力理解为神授的独裁者的权力与责任。从这一点上看他的思维是完全斯拉夫式的，他坚信是上帝自己将这一职位赐予了他，并不是为了让他自己得到好处，而是要他因此而更好地服务于臣民。因此他极为讨厌他的下属滥用职权。如有哪一位子民觉得自己受到了某位朝廷官员、任何下士或政府部长的不公正待遇，他总是可以向国王提交证据，国王的门无论白天或是夜晚总是向任何愿在这种严肃问题上进谏的人敞开的。如上诉人所讲的被查明属实，那么触犯戒律的官员就会被处以绞刑。如果起诉者证据不足，那么他也将遭受同样的命运，因为是由救世主来掌握公平的。同时，这位受到感悟的神秘主义者可能会对他犯下的有辱人类尊严的罪行感到内疚，那些罪行让我们觉得他仿佛是成吉思汗第二。像许多俄国人一样，即使今天也如此，他似乎生来就没有神经系统，人类的痛苦从未搅扰他的美梦，不论几百人还是几十万人在建造他的帝都时死去，似乎与这位勾勒蓝图者都毫无关系。

这种道德平衡的缺乏在他对待农民的方式上表现得极为明显。正如我刚才所讲，他可能会对一名对待奴隶过分残酷的地主大加惩罚，但他对地主上缴收入的苛求，又使这些地主们像使唤

骡马一样不断鞭打那些农民，没日没夜地干活——噢，这似乎又在讲别的事情了，一些他从未觉得没有什么不合理的事情。

要让一位荷兰人或美国人去理解一个俄国人而对他保证完全公平的评价总是非常困难的。在构成斯拉夫人的诸多因素中，许多绝对矛盾的东西让我们西欧人无法确切理解。但就彼得来说，有一个特别的品格我们却能在他整个一生中自始至终地找到。他工作起来很极端，他不相信妥协。在他来说不存在虚伪，当他行骗时毫不含糊，当他撒谎时，也从不心跳。当他决定讲出事实时——有几次他曾这样说过，那可以相信他的话。当他祷告时，他相信他所说的每字每句，但这不会妨碍他过一会儿就把整团的造反士兵鞭打致死。当他建设帝国城市、宫殿时，他的帝国城市和宫殿一定要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300 英尺宽的街道，比罗马广场大 10 倍的市场，还有同时可容纳 1000 人的监狱。

在经历过一段短暂的圣洁之后，彼得决定走向另一极端——在污浊晦暗中游历一番。之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放荡得让老亨利八世看上去像卫理公会主持。简而言之，他完全是个人，只是比大多数人更甚。

[彼得一世（1672 年 6 月 9 日—1725 年 2 月 8 日），俄国沙皇（1682—1725 年在位），俄国伟大的政治家、组织家和改革家。任期内实行政治改革，发展工商业和文化教育，建立正规陆军和海军，对外实行扩张，对内实行高压政策，在俄国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译者附注]

苦行僧——

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

Charles XII

（1682—1718年）

彼得大帝在国外有一个宿敌，他就是苦行僧式的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自从他得到第一把剃须刀的礼物后，就再没有温柔或不温柔的女性樱唇接触过他。同样地，在瑞典仍为自己是包括芬兰在内北欧饮酒大国之一而深感自豪的时代里，他也从来滴酒不沾。他曾对他的妹妹显示过类似自然情感的东西，但除了这位年轻的公主之外，就查理来讲，人性似乎根本不存在。

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有必要替查理感到难过。因为如果只有那些能够扮演了在他们自己眼里最满意的角色的人是幸福的，如果这话是正确的，那么查理确实是最幸运的人之一。首先，这个奇怪的独裁者是个演员，如我当他的面说这话，他肯定会朝我开枪的。

一个家庭（不论是皇室还是百姓）只要有一个女演员就足以破坏长期以来不得不忍受她表演的那些成员的好胃口。当伟大的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的妻子分娩出一个孩子时，这个瓦萨家族便有了这样一种表演者。她本应是个男孩。在最初的记载说，她刚降临到这个世上时浑身长满了毛，据说应当属于男性的范畴。

当1682年查理降生时，克里斯蒂娜表姐仍很活跃。但不幸的是她许多年前就离开了她的的故国。像许多受托管理国家的妇女一样，她曾给她的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她后来回去过两次，最后一次是在查理出生前15年。在她1667年最后一次重新夺回她曾厌烦放弃的王位的努力失败之后，就再也没有获准到过斯德哥尔摩。拒绝她重返故乡的官方理由是她放弃了新教而皈依了天主教。真正的原因确非如此，瑞典人已经彻底厌倦了由于她在位时过分追求引人注目的效果而使他们的国家获得的不佳评论。

我曾与几位知识渊博的瑞典历史学家讨论过这个问题，他们一致认为我错了，认为是她性格中的某种其他缺陷使她扮演了影响不良的角色，而人们正是因此而记住她的。也许他们是对的，那么我们这些生活在“新世界”的人就又懂得了一些关于“表现欲望”对那些患有此病的人可能造成的奇妙影响。

在克里斯蒂娜表姐留下的极度混乱不堪的局面下——撇开小事不谈，她竟将半壁河山送给了她的朋友——查理十一世继位了，他当时只有四岁，所以便由那些贵族们组成的委员会进行摄政。那些人曾协助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缔造伟大的瑞典国，现在觉得他们有权为自己谋点利益。他们非常成功，但好景不长，当年轻的国王长到20岁时，他将这些人全部铲除掉了，并作了当时唯一能使国家从彻底毁灭中拯救出来的实事，即他自己实行独裁统治。因此，当查理十二于1682年6月17日出生的时候，瑞典再次走上富强之路，再次建立了高效率的军队，再次被其他国家看作北欧政治中的关键国家。但瑞典却丝毫不存在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民主，对此无人在意。

小查理的母亲乌尔丽卡·莉奥诺拉是丹麦公主。因此她来自在过去的百年中瑞典一直与之进行痛苦争战的国家。但这种王室联姻使得丹麦成为瑞典的一名同盟。结果整个波罗的海如今就在瑞典人的掌握之中了，当然俄罗斯一直在远方存在，但可以不把

它当作严重的威胁——它太贫穷、太无秩序可言，不会有什么特别的结果的。

至于年轻的加冕王子，他拥有一个国家在发生危机时从它的统治者身上所能找到的一切品质。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对马和骑马疾驰的强烈爱好，这项运动使他在日后的生活中受益匪浅——他曾骑马横穿欧洲大陆，从里海一直跑到波罗的海，直到此时才有人发现他已逃跑。从他能坐在马鞍上开始（他在四岁时就取得了这一成绩），他便跟随他的父亲四处巡视。因此他掌握着有关政府的详尽的第一手材料，诸如军队哨卡、船坞、港口、种马农场、工厂、谷仓、火药库等等，他还在大多数孩子仍然只能从邮票上的图画识别外国名称的年纪时就懂得有关这些事情的一切。

但他的爸爸，这位有着强烈的偏见好恶，像任何 17 世纪的普鲁士国王一样对自己肩负的责任认真负责的国王，也传给了他的子孙另外三种副业：即对猎熊的酷爱，对与法国有关的一切极为厌恶，对与外交艺术有关的事情有种深深的不信任感。

因此，查理十一世去世时（仅仅 42 岁），这位 14 岁的男孩应当马上继承父业似乎是很自然的。于是查理立即登基，已经戴上王冠的查理的表现说明他打算成为与他父亲一样的独裁者。他在加冕仪式上并没有像通常那样宣誓自己是国家的第一仆人。他毫不费力地将王冠戴到了自己头上。他的大臣和顾问们并不赞成他这样做，可他们小心地回避了尴尬的问题。在斯德哥尔摩人们对这位年轻人已形成了公认的常识，他生性极为沉默寡言，如没人敦促他从来不愿袒露自己的观点。

在其他国家人们并不能确切理解这些性格特征。他们误以为他很害羞，性格软弱，因此瑞典的可爱邻邦们很快就结成了同盟。他们各自在过去 50 年中都因自己的军队无法与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及继承者们训练有素的军队抗衡而丧失过领土。丹麦、

波兰（现被萨克森人统治）和沙俄现在为了共同的事业站在一起去解决过去的积怨了。

1700年，萨克森首领雷德里克·奥古斯塔斯带兵向里加进军，由此拉开了战争的序幕。当时查理只有18岁，他们都认为他应当还在学校受教育，事实却相反，他强迫那些不情愿的将军们开辟了一条前人从未尝试过的航道，在别人发现他已踏上征程之前，他早已大军压境到了丹麦，在他准备向哥本哈根发起猛攻时，丹麦人被迫请求言和。

这位出人意料的征服者从丹麦东行打算援救里加，这时他也听说纳尔瓦将陷于俄军之手，于是他下令进军该城。每一位将军都反对这个行动，他们劝阻国王说这是蛮干、冒险，结果只可能是一场灾难。当时是11月中旬，道路无法通行，俄军人数又远胜过瑞典人，要打败他们几乎是不可能的。11月19日，查理的军队离纳尔瓦只有9英里了，国王命令点起火来通知驻军救援已到。第二天早晨天下起了雪，中午过后不久暴风雪变成了雪暴。2点钟时能见度几乎为零，查理向彼得发起了进攻，且完全彻底地打败俄军。如果他肯乘胜出击，他甚至有可能直捣莫斯科。

瑞典人非常清楚这样的事实，彼得极大地不受欢迎，整个俄国叛乱盛行，俄国那些格外保守的人士不停地祈祷着，渴望有某位外国的救世主能将他们从假耶稣手中解放出来。对瑞典人来说，不幸的是此刻的查理固执地认为他必须首先惩罚去年背叛他的萨克森奥古斯塔斯。他的政治顾问们和所有的将军都请求他乘胜前进马上向彼得的残余部队发起进攻，可这位固执己见的年轻人不肯听从他的大臣和随从的意见，开始了对奥古斯塔斯的无益追逐。彼得，用他的话讲，可以等待，因为到目前为止那位年轻的国王正遭受着必胜情绪所带来的痛苦——仍然影响着那么多当代国人的不幸的纳尔瓦情结。他坚信不论在何种情况下，不论差距有多大，总能打败俄国人，可他恰恰错了，因为尽管莫斯科人

仍然为野蛮人，每个莫斯科人单拿出来无法与有高度纪律性、训练有素的军官指挥的瑞典军人相比，尽管如此查理完全不了解他的斯拉夫对手的性格，他可悲地低估了他们重新恢复的能力。

结果查理在波兰荒凉的莽原上浪费许多年宝贵的时光，当他最终再次向俄军发动进攻时已经太晚了。彼得已利用7年的时间间歇重组了军队，在波尔塔瓦等着查理。在战争打响前几天，查理在一次侦察中受了伤。可他没有听从医生的劝告卧床休息，却命人在两匹马中间架起一把椅子，这样他就可以参加战斗了。他似乎忘记了一位无法行动的指挥官和一支疲惫饥饿的军队并不是获胜的理想状态，特别是他的对手几乎毁掉了他经过的路上的一切，令他的军队和马匹无以果腹。

查理本想在波尔塔瓦战役中重演他在纳尔瓦智胜俄军的一幕，但这一次运气却相背而行。他寄予极大希望的哥萨克援军没能出现，从南俄罗斯来的哥萨克指挥官梅泽帕根本没像他许诺的那样带来10万骑兵，相反只带了1000援军，他们期望从瑞典派来的增援部队被俄罗斯军队以四倍的力量消灭了。之后温特将军来到了现场。1708至1709年的那一个冬天是北欧曾经过的最糟糕的冬天。老一代史学家这样讲道：鸟类在飞行时竟被冻死，要点火是不可能的，因为木材在露天里是根本点不着的，就连酒在瓶子里都冻结了。可查理在他的军队遭受了极大的损失后仍固执地坚持他最初直接进攻的计划，纳尔瓦战争的记忆已在他心中扎下了根，夏天一到，路可以通行时，他便又匆忙重复起他先前的成功之举。

查理在椅子上坐好，下达了进攻的命令。在前两小时中，靠纯粹的奋战精神略有优势的瑞典军队似乎可以再次席卷沙皇军队。可随之而来，疲惫和困乏开始袭来。接着俄军发动了一场突然袭击——一场令人痛苦的袭击。

在查理将钱财大量浪费在代价昂贵而毫无结果的萨克森奥古

斯塔斯追逐战中时，彼得却把从子民那里征来的税收用于购买了德国和法国制造的现代化最新式枪支，他的大炮射击速度比瑞典的快四倍，很快查理的大部分军队被消灭掉了。剩余的部队面临着在数量上还胜过自己的俄军，也被迫投降了。最后只剩下1500名骑兵随查理逃到土耳其避难。他在那里整整呆了5年。5年时间里他克服了以前不喜欢外交的毛病，屈就在草原地带的帐篷里的他使整个欧洲都在关注他的命运。他曾屡次尝试说服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政府向俄罗斯宣战，可每次都发现比他更富有的俄罗斯人已经向土耳其首相贿赂了更多的钱，督促他采取相反的行动，最后甚至连土耳其人也厌烦了这种荒唐的喜剧游戏，他们扫荡了查理在本德的营地，抓获了查理本人。

查理以他惯有的超冷漠态度对待他新的不幸。他在监狱中又呆了15个月，仍像自由人一样继续他的外交策划。他还幻想着瑞典方面派来新的军队，那样他就最终能够解决他与波兰和俄罗斯的积怨了。

当他意识到游戏结束了——彻底结束了——这位国王骑上战马，在唯一的一名助手伴随下，从达摩提卡（他被土耳其软禁之地）一直跑到波罗的海岸边的施特拉尔松德，至此他又踏上了瑞典的土地（他9月20日开始逃跑，11月11日才到达）。

欧洲人逐渐将查理看成故事书中的人物，对他的敬畏之情使他成了所有灾难性战役的真正英雄。在施特拉尔松德的敌人的炮火围攻下逐渐走向毁灭的情况下，欧洲人都屏住了呼吸。下一步怎么走？在瑞典，长期以来人们就开始议论着他们国家的光辉到此为止吧，是该讨论和平的时候了。进行体面的和平谈判在政治上还是行得通的，可是坚决不服输的查理仍义无反顾。施特拉尔松德陷落后，他穿越波罗的海，在离开14年后又一次踏上了故乡的土地。在斯德哥尔摩小心翼翼地躲了几天以后，他又发动了对挪威的战争，当时的挪威在丹麦的统治之下，这给了他一个进

攻丹麦的机会。

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像瑞典这样疲惫不堪，没有人力，钱也花光了，贸易一团糟，信誉也受到破坏，可这个国家仍保持了忠诚。1718 年 12 月，查理围攻挪威坚固的菲特烈斯坦堡垒。瑞军最前沿的战壕离那座城堡只有 800 英尺之隔，我没有必要再讲了，查理站在战壕的最前沿，他从土墙后面站起身来，准备更清楚地查看一下地形，一颗子弹穿透了他的头部，一分钟后他死了。

我非常怀疑我们是否可以弄清究竟是谁开的那致命的一枪。几乎马上就有难听的流言说他自己的一名士兵开枪打死了国王，为的是能使贫穷、支离破碎的瑞典重返和平。但在现场作战、在国王被抬到帐篷后检查过他的尸体的另一些人发誓说子弹是从前面进入大脑的。因此无疑是敌人射出的。当然，在今天这次事故只有文物学家探讨谜底时还有些价值。重要的事实在于查理不再活着了，瑞典人有了一段短暂的喘息时期，上帝知道他们对此非常需要。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这位年轻人使他的祖先们经过一个世纪的艰苦努力而获得的成果付诸东流。帝国梦想彻底破灭了，瑞典沦为三流国家，而俄国则跃升为北欧起支配作用的国家。

对于查理无数错误造成的实际后果就讲这些

然而我非常理解大多数瑞典人至今仍对这位勇敢的骑士怀有那种引以为荣、崇敬而热爱的感情。他们过着相当无聊、缺乏刺激的生活，而查理为他们单调乏味的生活增添了一份魅力，增加了一点颜色，他们就像需要间或沐浴一下意大利温暖的阳光一样十分需要这一丝色彩，他们也承认查理也许是个十足的笨蛋，可他是多么堂皇、多么荣耀的笨蛋啊！作为一名领袖，他的追随者们对他表现出的忠诚可谓无人能及。他们会忠实地守卫在他的帐篷外直至冻僵；只要知道他们的国王安然无恙，他们可以毫无怨

言地为他而死。那些儿子在西伯利亚战俘营中消失的父母却保佑着他。确实，对国家可悲状态的痛心抱怨——普遍的贫穷，土地的丧失——即便如此该要责备的也是国王的顾问们，而对国王的记忆仍是洁白无瑕的。

查理拥有着世人一直十分敬佩的品质，只要他们心中的英雄具备了这种性格特征，他们就愿意原谅他的各种缺陷和不足。

查理是古老的骑士精神的具体体现。人们会因此而怀念他，会在不如他的英雄人物们已成为一抔黄土，成为小男孩们若想获得 A 分而必须从书本中背诵下来一个时期时更加崇敬他。

[查理十二世（1682 年 6 月 7 日—1718 年 11 月 30 日），瑞典国王（1697—1718 年在位），15 岁即王位，不久卷入北方战争，率瑞典军队迎战丹麦、俄国和萨克森。后与俄国进行多次战争。——译者附注]

音乐世家中的天才——

塞巴斯蒂安·巴赫

Bach, Johann Sebastian

(1685－1750年)

家族就像是国家，倒不如说，更为准确的就是，国家像是一个家族。在某个时刻，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至少没有人们能够理解的原因），它们就会从默默无闻中突然崛起。然后它们又会同样突然而神秘地重新变得平平常常，不是完全消失就是享有一点似有似无的名气，留下的只是一个名字和一段记忆。巴赫家族[①]就是这样。

从来没有人认真地研究过这个课题。但是对我们来说，如果能探寻出巴赫这样赫赫有名的家族所有点点滴滴的变化，诚可谓一件非同一般的事。该家族是16世纪后半叶由法伊特·巴赫建立的。到1800年，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唯一健在的女儿雷吉娜·苏珊娜已经穷得身无分文，不得不靠乞讨为生。通过巴赫家乡保存的档案和他们签署的种种合同，我们可以真实地重塑他们的形

① 德国著名的音乐家族，除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外，其长子威廉·弗里德曼（1710—1784年）、次子卡尔·菲利普·伊曼纽尔（1714—1788年）、另一子约翰·克里斯托夫·弗里德里希（1732—1795年）等在音乐史上均享有崇高地位。——译者附注

象。

先说法伊特·巴赫。他是一位硬汉子，而今被公认为巴赫家族的祖先。他的后人把巴赫家族的美妙音乐和高超作曲技巧传遍了大平原，从威悉河到奥得河，从中部山脉到波罗的海沿岸。

据我们所知，法伊特·巴赫出生于图林根。这是一个火山区，各种有利健康的泉水从土壤中随处涌出。那里的一半土地被开垦成农田，另一半为森林覆盖。到处是高耸入云的山峰，它们往往拔地而起，高达三千英尺。山峰周围的地势则扁低宜人，让你沉溺于欢乐的暇想，耳畔仿佛想起美仑美奂的音乐。自9世纪查理大帝建立图林根堡把它作为抵制狂野的斯拉夫部落东侵的堡垒以来，这里就成了名副其实的音乐家和诗人的摇篮，至今依然。

现在我们回过头继续说法伊特·巴赫。有关他生平的确切资料少得可怜，但他是一位很有自己个性的人。他生于1550年到1560年之间，死于三十年战争开始一年后的1619年。他年纪轻轻就离开故土闯天下了。当时这位雄心勃勃的移民向东进发，到了匈牙利平原，那里是各个王朝争夺不已的地带。法伊特·巴赫足智多谋，他自己修建磨房，自己磨面、烤面包，同时还能弹弹自制的吉他，在当时颇受欢迎。他是马丁·路德教义的信徒，路德是他的图林根老乡。像所有巴赫家族成员一样，一方面基督教信仰使他的内心充满真挚的感激之情和愉悦，另一方面他也认真地维护着自己名誉的尊严。

费迪南一世和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统治时期，新教徒的行为不受干涉。但鲁道夫二世即位后，一群跟屁虫追随这一出奇愚蠢的王朝。反宗教改革派很快红火起来，一小撮耶稣会士竭力想重新夺回在教会中的领地，把异教徒拉回教皇的怀抱。法伊特·巴赫看清了潮流，认定回家的时候到了。他幸运地躲过了对方的迫害，不仅得以卖掉磨房和面包房，甚至还获准带着钱财离开哥塔附近的小村威赫玛。这位敦实的磨房主兼面包师（这只是我的猜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像，宫廷画家埃利亚斯·豪斯曼绘

测，因为他没有一张可靠的肖像存世）和妻儿老小带着全部家当坐上一驾敞篷马车，缓缓穿过波希米亚，最后回到信奉路德教的萨克森公爵领地。这位老图林根人还抽空做了一把吉他，以弹点小曲自娱自乐。后来，巴赫家族总是把老法伊特称作他们所有“音乐大师”的鼻祖。

事实上，巴赫家族在取名时总是遵从《旧约》，如约翰·克里斯蒂安、约翰·麦克、约翰·瓦伦丁、约翰·克里斯托夫等。该家族不乏有音乐天赋的人才，但只是到了 1685 年 3 月 21 日，上帝宣布一位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光荣地降临人世后该家族才以音乐世家为世人铭记。

塞巴斯蒂安一名取自其教父之名，于是他一生都被称为塞巴斯蒂安·巴赫。我们习惯于叫他约翰·塞巴斯蒂安，但其实叫塞巴斯蒂安就行了，因为那个时代的人就是这么称呼他的。但他的孩子似乎（至少在背后）不这么称呼他。他们叫他“老古董”，这个称呼非常亲切，但稍稍有点不敬。那时他们属于另一个全新的世界，精通刚刚发展起来的和声艺术，刻苦钻研复调的老爸让他们厌烦。他们并未认识到他的伟大，只是有些不屑地把他看作一个学究，一位很好的对位作曲家，一位善于弹奏古钢琴和新近完善的“钢琴”的技巧高超的多面手。他心地善良，非常勤奋，从早到晚辛苦操劳，为的是让家人过上体面、舒适的生活，让儿子们在受人尊敬的行业里受到最好的培养，但毕竟太落伍了。儿子们大都比较出息而有所成就，在柏林、汉堡、米兰和伦敦创作了大受欢迎的歌剧，发展了钢琴演奏手法，成为独奏家和指挥家。就连莫扎特和贝多芬都会对卡尔·菲利浦·艾曼努埃尔·巴赫（巴赫的第三个儿子）和约翰·克里斯蒂安·巴赫（巴赫的幼子）这些天才公开表示感激。然而他们可怜的老父亲早已过时，不过是大公的教堂乐长，后来在教会学校训练一群不用功的男孩唱诗。唉！他的儿子们的名声遮住了他的光彩，老巴赫则变得默默无闻

了。

老塞巴斯蒂安并不傻，他肯定很早就注意到朋友和儿子对他那种傲慢态度和恩赐般的友善，但他对自己的伟大深信不疑。世间的俗事妨碍不了他，他仍然埋头以老式的方法作曲，过着他那高贵而平静的生活。巴赫从来没有富有过。他结过两次婚，要养活一大家子人。他从来没有享受过真正的盛名。他爱在前奏曲里加些东西，这令莱比锡循规蹈矩的人很不舒服；他们更喜欢当时其他许多作曲家，因为他们有意识地迎合他们的保守趣味。但这些恼人的小事似乎从未真正影响巴赫按步就班的日常生活。他偶尔会发发脾气，老实不客气地进行回击，因为他对自己的伟大才能深信不疑，而他这种人的脾气可不像他的古钢琴那么平和。事情一过，他就会把种种恼人的干扰忘在脑后，一如既往地教课、演奏、指导、训斥学生，始终不渝地为那个宏大的目标奋斗，使他的铅字能够和他家乡真正伟大的一切相提并论。终其一生，他都在兢兢业业地为自己的理想奋斗。

现在我们谈谈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生活里的一些最重要的事情，再介绍一些其他情况。

塞巴斯蒂安·巴赫1685年3月21日生于艾森纳赫，两天后，也可能是三天以后，他接受了洗礼。关于他的父亲约翰·安布罗休斯·巴赫，我们所知甚少，只知道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人，为那个小城音乐界的重要一员，可惜他英年早逝，没有充分展示他的创作能力。

9岁那年，塞巴斯蒂安失去了母亲，她是1694年5月初去世的。他们的大哥约翰·克里斯托夫担起了照顾他们的责任。他待小弟弟们很不错。约翰·克里斯托夫是奥德托夫布村的管风琴师，为伟大的约翰·帕彻贝尔的得意门生，这位先生是17世纪后半期最有名的管风琴家，创作了无数内容严肃的作品，如《关于死亡

1685年，塞巴斯蒂安·巴赫出生于德国的艾森纳赫

上图为其出生地，现为一博物馆

主题的音乐思考》和《太阳神的旋律》。约翰·克里斯托夫不仅靠叔叔的影响得到了工作（这实在是个古老的习俗），而且慷慨地为他安排了一切，使他（绝不让他忘记他卑微的地位！）能够结婚，给自己安个体面的家。除此之外，他供给弟弟们衣食，送他们上学，空闲时教塞巴斯蒂安弹羽管键琴、管风琴，拉小提琴，学习作曲原理。总之，塞巴斯蒂安在那个年龄只能要求受这样的音乐训练了，因为当时学徒也是住在师父家学艺的。

任何对巴赫生活稍有了解的人就会知道他夜闯哥哥房间的故事。克里斯托夫把很多著名的曲谱锁在铁格栅后面的柜子里，塞巴斯蒂安想进去抄录。每一个月明之夜（蜡烛要花钱买，所以不要去想），塞巴斯蒂安总是溜进哥哥的房间，从格栅后用纤细的手指小心摸出一页手稿，在和雅可布同住的阁楼上整夜地抄写那些美妙的旋律，然后在练琴时学习、弹奏它们。一天晚上他摸进约翰·克里斯托夫的书房时被抓住，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但是，这到底是因为塞巴斯蒂安拿了不属于他的东西（这在所有的路德教信徒眼里是可怕的罪行），还是因为他不允许这个孩子干扰他非常宝贵的睡眠，就不太清楚了。但塞巴斯蒂安显然没有因此怀恨哥哥，因为他把自己早期为羽管键琴创作的一部大作品——他的《E大调随想曲》——献给了约翰·克里斯托夫，两个人一直保持着深厚的感情，直到1721年克里斯托夫去世。

克里斯托夫的妻子生了三个孩子，家里的负担明显加重。塞巴斯蒂安开始寻找自谋生计的机会。他已经15岁了，有一副训练有素的好嗓子，很可以在唱诗班里唱歌挣几个小钱。于是，1700年3月15日，在一个同学的陪伴下，踏上了前往伦伯格的旅途。伦伯格离奥德夫近200英里。在以后的三年里，塞巴斯蒂安都在伦伯格的圣迈学校当晨祷歌手养活自已。后来他倒了嗓子，不过这时他已成为一个聪明伶俐、多才多艺的管风琴伴奏和教堂乐队助理小提琴手。因此他继续从事这些工作，每年可确保

有12个金币的薪水，另外可通过为红白喜丧事演奏挣些小费。修道院供应膳食，阁楼上还有个小房间住，生活很安逸。空闲时他总是愉快地研究昔日大师的作品，老修道院图书馆里这方面的藏书非常丰富。绝大多数复调宗教音乐大师已经完全被人遗忘，当然蒙特威尔地是个例外，但是布里格尔、许茨、绍普、吉普、舍特和舍因在我们的音乐百科全书中都成了鲜为人知的角色。乔治·包姆是唯一得到寥寥几行描述的一位，这还归功于他是塞巴斯蒂安·巴赫最重要的老师之一，塞巴斯蒂安对技巧的一板一眼和他对微妙音色效果的品味可能就是从他身上学到的。

巴赫的另一个灵感源泉是汉堡管风琴师约翰·伊丹·雷因肯，他是一个荷兰人，生于代文特，是荷兰管风琴演奏学派的创始人简·匹特素恩·斯维棱克的学生。斯维被克使管风琴有了神奇的发展，从而改变了世人对管风琴的认识。虔诚的加尔文教派牧师现在可以为他们关于最后审判的布道创造相应的音响效果了，因为斯维棱克能使他的管风琴发出可怕的雷声，足以使壮汉哭泣、弱妇昏厥、孩童蹲在母亲宽大的衣裙下寻求安全感。但在另外的场合，为了使老生常谈的天堂快乐翻出新意，斯维棱克会即兴弹出一段富有迷人魅力的乐曲，让会众们觉得自己已经走在通往福地的大道上了。此外他还有种种绝技，让会众们听得如醉如痴。

现在到了1702年，自视甚高的17岁少年塞巴斯蒂安要开创自己的事业了。他必须决定他究竟想做什么。他想成为一名管风琴师，想去塞勒弄到一个职位，那儿离卢恩伯格大约60英里。这里的摄政大公不仅供养了一支自己的军队，还去听大键琴演奏。对于巴赫来说，看来这是了解凡尔赛宫演奏的最新音乐风格的最佳途径，因为当时凡尔赛宫仍是所有艺术的中心。遗憾的是，另一个人得到了这份工作。巴赫一生总是遇到这样的事情，而他只能顺其自然，到萨克斯—魏玛大公一个侄子的私人乐队里拉小提琴。但巴赫没有在魏玛逗留太久。同年8月他来到安斯塔

特，这里是巴赫家族年年聚会的地方。当地人邀请塞巴斯蒂安担任他们的正式管风琴师。

只是还有一点小麻烦。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管风琴师，叫安德列斯·包纳。但他们保证，如果巴赫愿意接受这个职位，他们就把包纳辞退。这种安排不符合义气的巴赫的处事原则，结果双方达成了妥协：包纳仍旧负责早祷，且领取全薪。付给新管风琴师的钱是通过私人捐助的途径得到，数目不少于 84 个金币和 6 个格罗申，可见这位年轻的天才在安斯塔特人心目中的份量有多重。他们没有要求巴赫尽一个市镇管风琴师所有的职责，其中有些是不太令人愉快的（诸如给学校上课、教唱歌、训练唱诗班、打扫室内外卫生和照管教堂锅炉），这更说明他们对他的尊敬。但这只是暂时的，因为安斯塔特的教会深知他们对这个新手是多么慷慨，希望他能够始终克尽职守，感激涕零，使他们的自尊心得到满足。唉！像所有真正的艺术家一样，塞巴斯蒂安·巴赫意识到自己的伟大，绝对不愿受人随便支使。他一生始终保持着自然的高贵尊严，安斯塔特值得尊敬的教区牧师们是最先领教了和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打交道的滋味，就像后来人们领教和贝多芬、李斯特或帕德列夫斯基打交道的滋味一样，这些伟大的音乐家都认为自己和这个世界的统治者是平等的。

如果换了其他年轻人，或许觉得巴赫现在的职位完全可以满足自己的野心了。它可以变为一个终身职位，甚至可以指望它成家立业，那个时代的大多数音乐家还能再企求什么呢？然而塞巴斯蒂安不同意这种看法，他知道自己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而且在安斯塔特肯定学不到。在这儿他的地位更像一个随从。于是他决定前往吕贝克，因为那里生活和工作着一位名叫戴特里赫·布克斯特胡德的管风琴师，他在 1673 年创办了一种音乐晚会，在 11 月和 12 月间举行，一时名声大震，使吕贝克变成了整个北欧的音乐中心。这位老先生已年近古稀，巴赫感到必须抓紧时间去聆

听他的教导，不然就为时过晚了。

吕贝克离安斯塔特有200英里，对于巴赫这种善于长途跋涉的人来说不过小事一桩。巴赫求得一个月的假期，就收拾好行囊朝着吕贝克的方向出发了。

巴赫被准了30天的假，但他离开岗位却有四个月之久，而且显然没有以任何方式预先通知雇主。于是，他回来时小小的安斯塔特掀起了轩然大波。1706年1月，塞巴斯蒂安·巴赫在宗教会议上正式受到指控，并被告知不仅犯了超期离职的可恶过失，而且对唱诗班的训练非常怠慢，却沉溺于其古怪的前奏曲，在管风琴的赞美诗伴奏中加入不得体的变奏，经常使众人陷入困惑之中。

这帮权威最终意识到证据不足，就使出了狠毒的一招。他们怒气冲冲地责问管风琴师巴赫先生，为什么他不久前让一个陌生少女混进教堂，在唱诗班里唱歌？

巴赫以自己的方式回答了这个问题。1706年12月，他听说穆尔豪森市圣布拉西乌斯教堂有了管风琴手空缺，就毅然前往这个富饶而有地位的文化中心，得到了这个职位，薪水是每年85金币的现金、2考特木材、6担柴火、12蒲式耳粮食、3磅鱼。在1707年，一个年轻人拥有这样的财富完全可以结婚了。同年10月17日，在靠近安斯塔特的简陋而狭小的多恩海姆教堂，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和玛丽亚·芭芭拉·巴赫就结成了夫妻。从那时起塞巴斯蒂安被称为“乐师”了，其学徒生涯宣告结束。按照他这一行的传统，乐师一定得结婚，甚至这条也达到了。塞巴斯蒂安做好了新生活的一切准备。

现在看来一切都将大功告成：快乐而和谐的家庭生活，善解人意又尽职尽责的妻子，丰厚的收入和音乐界同行日益增加的敬意。一个人还能要求什么呢？但就在这时在穆尔豪森出现了一个

邪恶的神学争论。

多年以来，加尔文教派和路德教派的新教徒都是以某些非常明确的原则来划分的。这些教派之争总是无事生非，但往往使成千上百人神经崩溃，然而同样毫无意义的争论却层出不穷。因为对音乐的热爱是直接从异教徒那里继承来的，因此对于这些正直的民众来说，音乐是令人反感的，而其对手、富有的正统派却不仅容忍赞美诗的演唱，而且还允许用管风琴伴奏。但是，如果一位管风琴师受聘以后忘记马丁·路德博士的圣训，沉溺于各种装饰音和不同寻常的声音效果，这些东西非但不能使人接近上帝，反而把他引向所有基督徒都应该努力忘记的世俗快乐，那他绝对是不被宽恕的。

巴赫作为音乐家并不懂神学，对此毫无兴趣，于是决定再寻找其他职位。这非常容易。他名声在外，魏玛也对他非常赏识。魏尔海姆·恩斯特大公对巴赫的归来喜出望外，不仅任命巴赫为宫廷管风琴师，还给了他宫廷独奏乐师和宫廷乐队首席的职位。1708 年 6 月，巴赫获得了穆尔豪森市政会的同意，双方客客气气地分手了。

巴赫一生保持着单纯的个性。他家里有 21 个孩子，收入并不算多，因而家中自然没有什么奢侈品。他那单纯的个性源自一种天然的自尊，因此他和许多才能平平的同行不同，没有在技巧高手的位置上停滞不前。

巴赫之所以能够在 150 年前成为技巧高手，不仅是乐器大大改进的结果，而且与 18 世纪后半期开始修建的公路有着直接关系。这使他们的名声从那不勒斯传到哥本哈根，连穷乡僻壤的百姓都对他们的技巧叹服不已。

塞巴斯蒂安·巴赫有时到其他城市去，展示他演奏羽管键琴或管风琴（多半是后者）的技艺。交通方式大都是步行或者搭便

车，因为德国当时仍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三十年战争和传染病更使德国饱受蹂躏。研究一下巴赫家族的家谱就会不断看到某个约翰或安布罗希乌斯或麦克或尼古拉斯，在1682年的鼠疫或1685年的传染病或1687年的热病或1699年的黑死病中消失在万人公墓里。另外，美洲的发现也在某种程度上损坏了德国南部的繁荣。从此，德国成了小农和小乡绅的国度。

巴赫在新职位上干了9年。正是在魏玛的时候，他大大发展了非凡的管风琴演奏技巧，正是这种技艺使他名声鹊起。这段日子不仅富有成果，而且让人非常快乐。他的薪水不高但足以维持生活，而且能够及时领到，这在当时的音乐界是不多见的。开始他每年只领156个金币，但每过一段时间，他慷慨的雇主就给他加薪。没法告诉你1711年的156金币相当于现在多少钱，反正足够供一个不断添丁进口的家庭吃穿、让男孩和女孩受到教育和按真正基督徒的标准长大成人。

在魏玛，巴赫开始对意大利作曲家的音乐感兴趣，他们的名声正如日中天。这些幸运的大师们所在的国家，还在坐享四个世纪商业繁荣的硕果。商业和贸易的繁荣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但由此积累起来的财富还保留着（至少暂时如此），而艺术自古以来总是追随最丰盛的餐桌，难怪欧洲各地的音乐家都迫不及待地赶往这快乐之地。这里有永远灿烂的阳光、廉价的葡萄酒、举止得体的少女和欧洲其他地区一无所知的优雅的社交生活。也是在魏玛期间，巴赫全面了解了各种新颖的音乐表现形式，它们是从阿尔卑斯山另一侧传来的。然而，他的才气使他必然要改变他所接触到的一切，而且独创出全新的音响色彩组合。

我们就以奏鸣曲为例，看看巴赫对它做了什么改进吧。按词典的说法，奏鸣曲是一种“音响作品”，是用乐器演奏的，与“康塔塔”不同，后者是由人声演唱。意大利人擅长康塔塔，北方的民族则更钟情于乐器，尽管掌握它们需要无限的耐心和专

注。巴赫基本上是“室内型”的人，他沉溺于各种奇异的乐器组合试验，他用它们组成了各种古怪的组合。就在这些试验中，出现了一种我们非常熟悉的新发展。

在约翰·塞巴斯蒂安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奏鸣曲几乎都是为一把或两把小提琴和一把大提琴而写的，外加一个管风琴或羽管键琴简单低音通奏或数字低音。另外，“数字低音”和叫做低音提琴的乐器毫无关系，它只不过是一种音乐速记法。现在巴赫用各式各样的小提琴、自己心爱的羽管键琴和相当可靠的管乐器（它们的栓塞还有待完善），开始了有趣的试验。这样我们就有了著名的《勃兰登堡协奏曲》，配器是弦乐、羽管键琴、圆号、双簧管、低音维奥尔、臂上提琴和小号。巴赫把这组乐曲献给了勃兰登堡侯爵，也许是希望得到几个塔克勒的象征性酬谢。结果他非常失望。其实世间结局总是如此。这位侯爵是个枯燥乏味的人，一生从未让人演奏过这些协奏曲。一个多世纪后，它们重见天日，那欢快的情绪令听众震惊，但演出的组织却让可怜的指挥家们着实头痛了一番，因为他们必须找到技巧高超的乐手，能够掌握第二声部轻快顽皮的F调圆号，但这种F调圆号高手此时已经绝迹，只能找一些有名无实的普通圆号手凑合。巴赫是在哪儿得到他的旋律和灵感的呢？在这方面，伟大的塞巴斯蒂安很像伟大的埃冯河畔斯特拉特福德伟大的威廉姆和他同时代的韩德尔。但巴赫借用别人的作品时比粗鲁的乔治·韩德尔斯文多了。他始终是一位绅士，需要感谢的时候他总是作出应有的表示。

当他对较为复杂的管弦乐作品感到厌倦的时候，巴赫总是善于用其他人的作品练手，为它们做其他乐器的配器，这是一个熟悉各种技巧的最佳方法。18世纪不少作曲家同样对音乐着魔，所以巴赫总是有很多改编的零活可做。这些改编曲中的绝大多数，我们只是听说，因为没有手稿让我们了解大师是如何掌握踏板和音栓的。还有一件事更令人难以想像，他始终没用上一架优

质管风琴。他希望有一天能得到一架，然而这个愿望始终未能实现，于是渐渐地他成了一个管风琴制造师，能把这种乐器拆开、修理，再重新组装。别人也常常请他帮这种忙。但奇怪的是，他作为管风琴演奏之父，却从没拥有过这种乐器，这一定使他非常沮丧。

后来，巴赫与其雇主发生了不快，就请而辞职，却被关进了监狱一个月。此后（1717 年），他被恩准离开魏玛。他再也没有回过这个迷人的小城。

巴赫的新主人是安哈尔特—科藤的利奥波德亲王，他姐姐埃莱诺拉·维海米娜嫁给了巴赫以前的雇主，魏玛的恩斯特·奥古斯特大公，也许利奥波德就是这样与约翰·塞巴斯蒂安联系上的。他似乎更欣赏巴赫的配器能力，而不是管风琴演奏技巧，因为他是个年轻人，属于自己那个时代，对当时一切时髦玩意儿了如指掌。在这里高水平的室内乐是家常便饭。为音乐演奏者考虑，亲王保存一批稀有乐器，下面这个事实可以说明他对教堂乐长巴赫有多么欣赏：他不像一般雇主那样讨价还价，而是保证每年支付巴赫 400 金币。按当时乐师薪水的标准来说，这笔钱非常巨大。

巴赫在科藤只住了五年，但这看来是他一生中最快乐、最心满意足的阶段。他肯定没摸到心爱的管风琴，加尔文宗教堂里对管风琴的演奏水平毫无要求，会众们演唱的沉闷的赞美诗曲调，任何江湖骗子都能应付，当然也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唱诗班。但城堡大钟一敲过星期日午夜 12 点，城堡里就充满音乐。

有了 400 金币的年薪，即使家里不断增添人口，巴赫也不用为生计发愁了。他和其雇主之间一直保持着真诚热情的关系。1718 年，巴赫第七个孩子出世时，不仅利奥波德亲王，甚至他的哥哥和姐姐都在洗礼仪式上担当了孩子的教父母，这个亲切的行为象征着教堂乐长在整个宫廷的崇高地位，后者对此也深怀感激。

1720年夏天，巴赫心爱的妻子玛丽亚·芭芭拉突然逝世了，年仅36岁。他们完美的婚姻只持续了13年。我们对这位安静的夫人了解甚少，但在昔日艰苦岁月里，她是家庭可靠的坚强支柱，她给了骄傲的丈夫所需要的支持，她小心地用微薄的收入应付一切开销，保持收支平衡。她为塞巴斯蒂安生了七个孩子，有四个活下来，其中两个在后来取得了很大成就，长子威尔海姆·弗雷德曼·巴赫无疑是塞巴斯蒂安的孩子中最有天才的一个，如果他不好酒贪杯，一定可以成为当时最伟大的管风琴师。想起来令人伤心，他骄傲的父亲的《古钢琴曲集》本是为他写的，但他却落得个乞丐的下场。这个醉醺醺的可怜家伙有时在郊区啤酒花园里弹舞曲，有时在乡村小教堂替换固定的管风琴师，靠这些办法挣几个酒钱。早年的天分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仍然隐约可见，因为继承了巴赫家族结实的体魄（他们家每个人经受住18世纪艰苦的童年生活后都很健壮），到74岁他才结束自己不光彩的一生。晚年时如不是其父的传记作者约翰·尼古拉斯·佛克尔接济，他早就死在贫民窟里了。芭芭拉另一个活下来的儿子卡尔·菲利普·埃曼努艾尔生于1714年，尽管天资不如兄长，却是个完全不同的人。他同样享年74岁，去世时是一位鼎鼎大名的管风琴师和作曲家，创作了52首有乐队伴奏的协奏曲、210首钢琴作品、22首受难乐和无数小曲，其作品常常被误认为是他杰出的父亲所作。

失去心爱的妻子看来对塞巴斯蒂安打击很大，他再次脱离轻松的管弦乐和器乐形式，转向戒律森严的管风琴和宗教音乐。

1720年9月，我们已经看到巴赫来到汉堡，他是圣雅各教堂空缺的管风琴师职位七个候选人之一。尽管这个职位本来给了他（其他候选人听说他们的竞争对手后，都悄悄撤销了申请，于是选拔考试变得没有意义了），但在最后时刻，因为某种原因，汉堡人把这份工作给了一个外来的无名之辈。

巴赫在汉堡没有实现他的抱负，于是又回到科藤。他现在是个鳏夫，要养大四个年幼的孩子，又得忙于尽他在宫廷的职责，因而他只有再婚一条路可走，而且越快越好。1721 年 12 月 3 日，他娶了第二个妻子安娜·玛格达莲娜·魏尔肯（或乌烈肯），她是维森菲尔斯宫廷号手约翰·卡斯帕·魏尔肯的小女儿，她温柔贤惠极了。

安娜·玛格达莲娜嫁给约翰·塞巴斯蒂安时 21 岁，巴赫当时 36 岁。尽管他两人在年龄上有差异，婚姻不容易美满，但他们的婚姻却非常幸福。这是因为，首先，安娜·玛格达莲娜是一位歌手，但不是头牌女角，因此不会产生那种要命的嫉妒和竞争心理，而这对于所有男女演艺高手的联姻，几乎都是不可避免的。但自从结婚以后，她只是偶尔在愿意试唱丈夫的新作时，才在自己家里唱歌。其次，她对音乐有良好的理解力，所以立刻学会了弹奏羽管键琴，巴赫著名的《平均律钢琴曲集》就是为她写的。这两卷钢琴曲集每卷包含 24 首前奏曲和 24 首赋格曲。巴赫肯定把他心爱的安娜·玛格达莲娜算作年轻音乐家中的一员了，因为两卷之中的第一卷是 1722 年在科藤出版的，而第 2 卷 20 年后才出版，此时他已是莱比锡音乐生活的主角。《平均律钢琴曲集》在两百年后的今天，仍为所有钢琴学生所知。

另外两本小册子比《平均律钢琴曲集》更能表现巴赫对年轻妻子深切的理解和爱心，就是所谓的《古钢琴曲集》，包括 1722 年的一本小的和 1725 年的一本大的。

1722 年的《古钢琴曲集》生动地说明了安娜·玛格达莲娜和约翰·塞巴斯蒂安之间深厚的情意。科藤这个城市是加尔文教派的大本营，过分的清教徒主义使外人觉得它非常沉闷，巴赫把他年轻的新娘带到这个苦行神殿来的时候，一定像 18 世纪一位英国殖民军官被迫请求其出自英国宫廷的新娘陪他去波士顿一样。巴赫从痛苦的经历中深知加尔文的教义对艺术、音乐和生活乐趣

能起到什么影响。这本曲集是他在婚礼之后立刻为新娘选编的，似乎是在以略带歉意的口吻解释：“现在，我亲爱的，事情并不像别人说的那么可怕。”因为在安娜·玛格达莲娜的曲集中，绝大多数乐曲都充满法国式的快乐情绪，而没有受到加尔文沉闷偏见的影响。

第2本《古钢琴曲集》是1725年编成的，这时一家人已经搬到了莱比锡。封面上有安娜·玛格达莲娜名字缩写字母A.M.B和时间（1725年）。它其实是一本小品曲集，收录了巴赫认为他心爱的妻子可能感兴趣的各种小曲。不少作品是由安娜·玛格达莲娜亲手抄写的。她抄谱的功夫达到了一流。她为丈夫生了一大堆孩子，同时还挤出时间抄写了他的很多作品，实在是不容易的。

1721年，巴赫的雇主利奥波德亲王与其表妹安哈尔特波恩伯格的弗雷德雷卡·海安丽塔公主联姻。据巴赫本人在给但泽的朋友乔治·艾德曼的信中说，这位年轻妇女“蔑视他的艺术”，他很快就对她非常反感，总是把她称为阿穆莎或缪斯神的敌人。这个女子出嫁时才19岁，为了弥补单调童年的损失，她要享尽所有时髦的快乐。她两年以后就将告别人世，对此巴赫并不知道，而是以为在小宫廷里，音乐活动在相当一段时期里不会受到重视，因而决定离开。就这样，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从科藤宫廷来到莱比锡，担任圣托马斯教堂乐师的职务。在这里他回到作为他终生事业的音乐表现方式，即管风琴演奏和为歌颂全能的上帝而创作。

在正式的音乐学院建立以前，在18世纪下半叶，莱比锡是整个基督教德国的音乐学院，所有天才青年都汇集到这里，学习管风琴演奏和作曲的基本知识。这座学院的校长就像我们现代音乐学院院长一样重要。

巴赫一直向往这个职位，现在他才38岁，是莱比锡圣托马

斯学校的乐师，是整个德国宗教音乐领域为人公认的领袖。除了德累斯顿圣十字学校的乐师，他没有任何真正的竞争对手。

在莱比锡，教堂乐师有两位同样级别的同事，他们是宗教学校校长和副校长，当时这些权威人士被称为“上级”，有很多“下级”协助工作。除负责星期日礼拜音乐外，教堂乐师还应该每周花几个小时教唱歌，向手下人传授拉丁语知识。巴赫自承对拉丁语没有兴趣，总是想尽快摆脱这一烦人的职责。

当时师生们的生活条件极为简朴，男孩和老师一起住在宿舍里，夏天5点就要起床，冬天为6点。他们在早晨10点吃早餐，下午5点吃晚饭，为了节省蜡烛，晚上8点祈祷后立刻上床睡觉。作为对所享受的食宿和教育的回报，圣托马斯学校的年轻学子要为莱比锡无数教堂中的四所担任唱诗班。在圣托马斯和圣尼古拉斯这两所最大的教堂里，每星期日都要演唱一部固定的康塔塔或经文歌，由管风琴和完整乐队伴奏。遇到重大节日，两所教堂都有一些特别的音乐活动。这时巴赫就负责圣托马斯教堂，他的助手唱诗班指挥负责圣尼古拉斯教堂。

唱诗班、管风琴和乐队的排练安排在星期日下午，一般是从2点到4点，如果有婚礼或葬礼，还额外作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教堂乐师和唱诗班就得干到深夜。

巴赫不仅负责大部分指挥工作，还要挑选演出曲目。此外，他还得带领唱诗班，为每年四次重大游行作准备。这四次游行分别在米迦勒节、圣马丁日、圣格里高利日和新年举行。每年游行的日子，常常下起瓢泼大雨，可怜的孩子们有一半回家时就要感冒。

学生们每周两次走遍莱比锡的大街小巷，收集给学校的赠礼。其实这也没什么，只不过沿袭了中世纪某种乞讨僧的传统，他们就是靠化缘维持生活的。但在这样收集来的财物中，每个学生应该上缴6个便士，由他的四位主任老师分享，想像一下，伟

大的约翰·塞巴斯蒂安从每个学生手中接受一个半便士的小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耻辱啊！

然而，这只是巴赫所经历磨难的一部分，而且是一小部分。使他不快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所管教的那群孩子。每当送葬队伍在莱比锡的大街小巷行进时，这些年轻人都得被雨淋上几个小时。他们差不多都没有换洗的衣服，因此就容易染上肺病。加上人们从来不考虑传染的危险，于是疾病常常在宿舍里四处蔓延，死亡率往往高得令人痛心。当时还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派这些孩子为婚礼和私人聚会演唱。他们吃不饱，还要爬四、五层楼梯才能到达客户的公寓。这对演唱男童女高音的孩子特别困难，那时他们被称为最高音声部。找到能唱男童女高音的男孩本就不易，难得的几个最高音声部歌手往往很快就因营养不良和饥饿而被毁了，最后不得不退学。

教堂乐师巴赫负责照管的孩子是出身卑微的小鬼，不过非常聪明，歌剧院合唱队让他们干几个小时给的报酬，比在教堂唱诗班辛苦几个礼拜能挣到的多好几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做出正确的选择。于是他们快活地爬出“集中营”（正式名称是圣托马斯教堂学校）的窗户，立志要成为前途远大的歌剧明星。老师们本可以派警察把这些小逃犯捉拿归案，但这会引起公开的丑闻，任何人都最不希望这么做，因为在这个城市，公众意见必定是赞成这些孩子和他们的歌剧理想的。现在歌剧咏叹调已经非常流行，即使是在当地咖啡馆里，受欢迎的歌手一露面，只要他乐于大家为他伴唱，其他客人就会和着他唱起来。可怜的学校老师还能怎么样呢？他们孤立无援，到了重大的宗教节日，他们能应付复杂的康塔塔的，只能是几十个训练糟糕以及因为条件不够才没被歌剧院经理招去的小孩。

宗教权威人士和雇员所签的合同，再一次清楚地提示出音乐王国的现实。有一个条款是关于巴赫先生戒酒问题的。酗酒当时

在老师和教士中仍是一个普遍的罪孽。莱比锡宗教会议坚持要教堂乐师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这个最清醒的人!）以书面形式保证，他要过一种体面节制的生活；然后，他要忠诚而勤奋地履行自己的所有职责，包括教拉丁文，始终尊重宗教委员会，教授学生声乐和器乐，创作的音乐间奏既不过长又不过于歌剧化，不以粗暴不当的方式对待学生，不在唱诗班里使用不称职的歌手，没有市长的允许决不离职，没有委员会的允许不接受大学的任何职位。这份协议正式签订以后，经一个当地牧师团考核确定，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于1723年5月13日接受任命，同年6月1日正式上任。

巴赫在莱比锡的生活很难用几句话概括。如果他没有遇到这么多令人失意愤懑的事情，他是否能活得更长一些，是否会更幸福呢?

我们只知道，巴赫的的确确去了莱比锡，他在那里创作了一些最伟大的作品，过着心满意足的家庭生活，作为管风琴家和作曲家获得了巨大声望，但他顶头上司的短视和狭隘常常使他痛苦不堪，几乎随便什么职位都能把他请走。但是作为大家庭的主人巴赫身不由己，只能维持现状。作为艺术家，他总能在工作中找到解脱，下面就是他在莱比锡时创作的一系列作品。

最著名的是他的受难乐。受难乐一词作为音乐术语，准确地说明了作品的内容，它是为耶稣受难记所谱的曲，出现年代较晚，和康塔塔一样来源于中世纪的神秘剧。巴赫开阔的视野常常让人想起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建筑师，他必然会选取这种古老单纯的受难乐，以前所未闻的规模加以重建，就像布拉曼特和米开朗琪罗以狭小的方形教堂作为重建圣彼得教堂的基础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建造圣彼得教堂整整花了两个世纪，巴赫庄严的受难乐，新教坚强的精神堡垒，仅仅花费两年时间就完成了。同时代的韩德尔使用了完整的《圣经》词句，巴赫前进了一步，不仅向

我们展现了《圣经》经文，还有戏剧合唱，其中又穿插了许多抒情咏叹调。而且，他不满足于管风琴伴奏的演唱，还增加了完整的乐队。这样受难乐就变成了无比美妙高贵的戏剧表演。他总共为我们留下了三部受难乐，完整保留下来的有两部：1723 年的《约翰受难乐》（1727 年改编）和 1729 年的《马太受难乐》。1731 年的《马克受难乐》只留下五个乐章。

除这些受难乐之外，他还写过三部清唱剧：1737 年的《圣诞清唱剧》、大约作于 1736 年的《复活节清唱剧》以及同样作于 1736 年的《耶稣升天日清唱剧》。

他的弥撒曲也属于同类作品，共有五首：作于 1733 年到 1738 年之间的《B 小调弥撒》、作于 1737 年到 1740 年之间的《F 大调弥撒》、《A 大调弥撒》、《G 小调弥撒》和《G 大调弥撒》。最后还有 1723 年的《圣母颂歌》。

除此以外，巴赫在莱比锡生活期间还为我们留下了所谓的《意大利协奏曲》、《戈德堡协奏曲》、6 首经文歌和 265 首康塔塔。巴赫很少费心给自己的作品标注日期，（干吗浪费宝贵的时间呢?）因而为他的作品建立编年目录是件十分困难的事。在某个偏僻地方的一栋阁楼里，可能还藏着他的许多作品。比如说，他好像是写了 265 首基督教康塔塔，但其中只有 202 首得到确认。其他作品的下落还是一个谜。我列举他的创作目录是为了让你看到这个人的灵感多么丰富，工作态度多么勤奋，因为在他浩翰的作品中，没有一首是敷衍了事的，也没有哪一首像贝多芬的曲谱那样，被粗心的抄谱员抄得马虎潦草，这也许是因为巴赫一般自己抄谱，或者把这个枯燥的活留给妻子完成；上帝作证，她是一位非常忙碌的主妇，要照顾孩子，为他们做饭，保持收支平衡。巴赫无休无止的辛劳换来的收人，虽然远远不能让家人过上奢侈的生活，但也能维持家用。

巴赫超常的天才至少在一个方面得到了承认，但真正欣赏他

的大人物绝不是莱比锡循规蹈距者的朋友。他是普鲁士国王，是萨克森国王的死敌，一再成功地挫败了后者夺取波兰王冠的企图。他名叫弗里德里希，他看不起德语字母和德国文化，更喜欢用法语说话、写字。更有甚者，他很少保护本国的艺术家，却不顾体面地引进法国作家和音乐家。

在其儿子埃曼努埃尔的牵线下，巴赫在波茨坦露了面，并终于获得了宫廷作曲家这一令人垂涎的头衔。他因故迟迟上路。他这时已有 52 岁，自感一只脚已踏进了坟墓，认为现在是呆在家里的时候，甚至对那些练习也失去了兴趣。尽管他的儿子现在是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的教堂乐长和乐师，能够保证父亲获得最荣耀的礼遇，但塞巴斯蒂安仍在犹豫，因为他的身体有了劳损的迹象，疾病开始侵袭他非常脆弱的部位：眼睛早就严重使用过度，现在更不中用了。显然，他患上了白内障。

最终是什么促使他下决心踏上旅途，我们不得而知，反正 1747 年 5 月初，他在儿子弗雷德曼的陪同下向普鲁士首都出发了。5 月 7 日，他到达了波茨坦。

当一位皇家仆从敲开宫廷作曲家巴赫的门请他放下一切事情前往宫廷的时候，他感到有些不安。他觉得自己至少应该用点时间洗洗手，给假发撒点粉，穿上他最好的英国黑呢西装，但宫廷传令官坚持让他应该不加修饰地前往。他就这么来了。他来到城堡的时候，受到了最真诚、友好和崇敬的接待，这个晚上补偿了他多年经历的失望和误解，那是他和低贱的市民打交道的时候必须忍受的。

弗里德里希尽管是个蹩脚的长笛手，对音乐却很有欣赏力，最近刚刚花钱买了几架新钢琴。巴赫坐下来，请求国王给他一个创作赋格的主题。国王欣然命题，巴赫开始弹起来，现在很难想像，曾经有那样一个德国，它的国王和乐师能在一起消磨整整一个晚上，陶醉得忘乎所以，只记得他们是两个文化人，被最伟大

的艺术连在一起，这种艺术就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音乐。

这位莱比锡教堂乐师作为国王尊贵的客人，在波茨坦和柏林逗留了几天，就回到德累斯顿的家中去了。返回后他创作了被称为《音乐的奉献》的作品，这可以说是为他更精致宏伟的作品《赋格的艺术》作准备的。在《音乐的奉献》中，巴赫使用了即兴演奏时国王点给他的主题，将它们变幻成各种组合与变奏——锤子钢琴赋格、不同乐器的三重奏、猜谜卡农（就像《三只瞎老鼠》的滑稽手法），以及他那精妙的羽管键琴技艺的各种花样。

“最尊贵的国王，”他写道：

> 我谨以最谦卑的心情把《音乐的奉献》献给您，其中最高贵的部分是陛下的非凡手笔。我怀着敬意和满足回忆起阁下的恩宠，不久前，当我获准在波茨坦逗留时，您如何屈尊在羽键琴上为我的赋格弹奏主题，优雅地命我当场在王宫将它谱出。服从陛下之命是敝人的职责，但我立刻意识到，由于缺乏必要的准备，演出如此优秀的主题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功。于是我下定决心，立刻开始工作，试图将这个高贵无比的主题处理得更加完美。现在我竭力完成了任务。

“我做任何事都是竭尽全力的”，他的墓志铭也许可以这样写。巴赫现在已经67岁了。他一生都像驾辕的马一样辛苦工作，他拉的货有时候实在令人生畏，也许能累死十几个普通乐师。这个怪人不是涓涓溪流（巴赫的本意为小溪），而是奔腾的大河。这样巨大的能量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达到的，尤其是他的作品不仅量多，而且水平高超。18世纪许多其他作曲家不过是产量稳定的音乐工厂，一部部歌剧、交响曲、奏鸣曲和康塔塔从削尖的鹅毛笔下滚滚流出，速度令人难以置信。但是今天，这些浩瀚的作品被我们遗忘在图书馆地下室的阁楼上，静等书虫用它们满足自己贪婪的胃口，化为尘土，谁也不会为此遗憾。

就巴赫来说，他所写的任何作品都非同寻常。无论他试作的是轻松明快的歌剧（他的《咖啡康塔塔》和《佛布斯与潘神》中有一些极为快乐迷人的流行歌曲），还是葬礼弥撒，都保持着巴赫特有的独创性。任何庄严的旋律都包含着快乐的成分，那是出于对生命的深切感激。他认为拥有生命实在是一个无法估量的特权；同样，所有的幽默歌曲都力避庸俗的倾向，而我们自己所谓的“轻音乐”领域却往往不能免俗。

但是这个宝贵的生命就要走到尽头了。这个正直、诚实、坦率的人没有任何虚伪和自负，他就要在这个满目疮痍的星球上完成他安静的朝觐了。前辈遗传给他易患白内障的倾向，又因他终生在昏暗烛光下抄谱的习惯，几乎完全夺去了他的视力。

来到莱比锡的时候，巴赫决定接受眼科手术。在麻醉剂开始使用之前，这是一种痛苦的折磨，但正如当时一位作家所描述的：“乐师巴赫接受手术的目的，纯粹是想为上帝和他的邻人服务，当时他的心智和身体完成处于清醒状态。”

和韩德尔的情况同样不幸的是，治疗来得太晚了。手术台上可怕的经历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只能持续几周，最多几个月。

这位病入膏肓的巨人躺在床上，眼前一片漆黑，但他不可战胜的精神仍在工作。一位名叫约翰·克里斯托弗·阿特内科的学生前来帮助他。在他的协助下，巴赫开始改编几首他最伟大的众赞歌幻想曲。有一天他惊奇地发现，他能够充分辨认熟悉的《我来自高高的天上》的字迹，为此大大松了一口气，但不久黑暗再次来临，这一次是永久性的。

在临终的日子里，巴赫口述了一首康塔塔的音乐，恰如其分地命名为《主啊，我们是多么需要你》。然而，临终的痛苦并没有毁灭他坚定的信念，既然世上一切都是万能的上帝创造的，因而就是最完美的。现在是老乐师到上帝身边报到的时候了。他——

向和上帝保持着精神的和谐，对以往发生的一切总是口念“阿门”，在他最后一首赞美诗中也是如此。他用颤抖的手把请求式的标题“主啊，我们是多么需要你”换成了完全恭顺的“上帝啊，我这样来到你的宝座前”。

1750年7月28日晚上8点3刻，65岁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突然中风，平静地失去知觉，停止了呼吸。三天以后，1750年7月31日，星期五，萨克森国王宫廷作曲家、安哈尔特—科滕亲王教堂乐师、莱比锡城圣托马斯学校乐师、尊贵的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先生的遗体按照基督教习俗安葬。他的墓地邻近一座教堂。因为有幸和卑贱的唱诗班指挥连在一起，它获得了不朽的名声。19世纪初期，他的遗骨被埋进一座公墓。他的墓到底在哪里，我们永远也无法知道真相，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拥有他不朽的音乐遗产，肯定已经足够了。

同事和同时代人对他们辞世的朋友如何评价呢？他们盛赞他是德国最伟大的管风琴家，但对他的作品仍然存有疑问。在米兹勒音乐图书馆发表的德国受人欢迎的作曲家名录中，巴赫排在第七位。也许你有兴趣知道，哪些人排在他前面，他们是：哈斯、韩德尔、泰莱曼、约翰·戈特里普·格劳恩和一个叫斯托尔泽的人。下面这件小事再一次有趣地说明，人们普遍对巴赫的伟大缺乏理解。他去世一周年后，莱比锡市政委员会必须为圣托马斯教堂寻找一名新乐师。他们花了整整两天讨论这个问题，唯恐重犯27年前的错误。他们认为他们的学校需要一个乐师而不是唱诗班指挥，尽管巴赫先生无疑是一位伟大的音乐家，作为校长却实在难以令人满意。他们宽厚为怀地给了巴赫的遗孀半年薪水，从此以后再也不关心她了。说真的，谁也没关心过她，因为不久以后安娜·玛格达莲娜就不得不申请救济，十年以后，1760年2月27日，死在一家济贫院里。

谁也弄不清何以会有这种结局。巴赫的儿子们冷漠地对待父

亲的后事，且没有谁认真考虑过母亲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为什么他们当中没人想供养母亲和同父异母的姐妹，这是个谜。家里还有一个15岁的男孩，叫约翰·克里斯汀，由哥哥埃曼努埃尔照顾，哥哥把他接到柏林，照管他的学业。三个妹妹却留在家里和母亲一起过着悲惨的生活。小妹丽吉娜·苏姗娜1809年去世，最后几年靠《音乐报》为她募集的捐赠生活。30年后，她的兄弟约翰·克里斯汀在伦敦去世。至于巴赫其他的孩子，尽管没有一个能达到父亲的地位，但每个人都尽其所能，在18世纪后半叶的音乐界留下了一定影响。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及所有的后辈不是和他们有过交往，就是从他们的作品中学到过一些东西。但在巴赫的九儿子约翰·克里斯托夫·弗雷德里奇1795年去世后，巴赫这个名字就成了一段记忆，而不再是活生生的现实。约翰·塞巴斯蒂安最后一位男性后代，他的孙子维尔海姆·弗雷德里奇·恩斯特（约翰·克里斯托夫·弗雷德里奇的儿子）1845年死于柏林，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为普鲁士路易斯王后当钢琴师，教过无法推脱的课程，写过几首康塔塔，指挥过合唱队，一生过着平庸单调的生活。

巴赫之后的两代人为何如此轻视、怠慢德国作曲家中最博大、最有灵感的一位呢？也许我们不必为此痛苦，因为我们自己就在做同样的事，也许我们昨天把一位未知的伟人送进了坟墓，而对其天才一无所知。

在巴赫生活的那个时代，乐谱的印刷出版刚刚出现，铜板刻谱虽然能够实现，但非常昂贵，只有几个城市的刻板师有能力完成这项工作。因此巴赫在世时，他浩翰的作品中只有极少部分呈现给公众。人要鉴赏一位作曲家，首先要熟悉他的作品，因此责怪巴赫同时代人的冷淡就不太公平了，因为这种冷淡是来自他们对大师的无知。

但是，巴赫很快被人完全遗忘，还有其他原因。首先，人们

总是把他和乔治·弗雷德里奇·韩德尔相比，这使他深受其害。韩德尔这个放弃了国籍的德国人虽然有点粗鲁，但不仅是一流的音乐家，也很有表现才能。他定居伦敦后，摇身一变成了韩德尔老爷，可以对王公贵族发号施令，而巴赫先生一直是卑微的外省唱诗班指挥。平心而论，韩德尔作为作曲家比巴赫更引人注目，更容易被人理解，也比巴赫更能吸引大众的注意，他的家总是敞开的，就是说，他的房门从来不上锁。女士们，先生们，进来吧，不要拘束，给自己冲一杯香甜的牛奶。音乐爱好者总是喜欢在他家中聚会。

巴赫的房间里则空空荡荡，可怜的几件家具式样十分简单。客人很少，举止高贵而尊严。大师本人过会会走进来，穿着他最好的黑呢西装，假发收拾得非常整齐。他礼貌地向客人们鞠躬，然后在室内管风琴前坐下。然而当音乐响起的时候，它就像来自一座孤独雪山的小溪，然后扩展成湍急的激流，最后变成一条浩瀚的大河，平静地流向它最终的目的地，表达出一种对上帝及其功绩的完成彻底的信心。这正是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信仰的起点和终点。

［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1685 年 3 月 21 日—1750 年 7 月 28 日），音乐史上最伟大的德国作曲家之一，以创作《勃兰登堡协奏曲》、《平均律钢琴曲集》、《B 小调弥撒曲》及大量教堂音乐和器乐曲著称。他把前人发展起来的主要风格、形式和民族传统融汇贯通，使之更加丰富多采。在他生前及死后 50 年间，他的音乐为人们所忽视，直到 1800 年以后，尤其是经门德尔松的推广，才逐渐受到重视。——译者附注］

美国国父——

乔治·华盛顿

Washington, George

（1732－1799年）

现在我们谈谈乔治·华盛顿将军。关于他人们著述甚多，此处仅作极简单的介绍。

在地质学领域，有时会出现一层岩石穿过另一层岩石的情况，那时要确切断定所发生的事，需要专家来进行。同种情况完全适用于历史。一种并非不常发生的事是，一种特定的文化或经济或社会层面由世界的一个部分移到另一部分，但作为一种通则，它发生得极其平静缓慢，任何人都难以注意到变化。随后本土裸露的土壤发展成为一种与旧文明完全不同的文明，但这同样发生得极其缓慢，引不起人们的注意。等到那一关键性时刻到来时，人们才突然认识到虽然他们表面上仍讲同样的语言，依然忠于同样的旗帜，仍然被认为崇拜同样的神祇，但他们彼此之间已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此后他们越想向邻居辩白自己，说明自己的动机，他们就越难做到这一点。

就以我们自己为例吧，只是到了17世纪我们才开始怀疑旧英格兰和新英格兰之间出了什么事。最终结束了路德宗与天主教

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像

之间大争论的和约规定，每一位诸侯有权决定信奉什么样的其臣民必须顺从的宗教信仰。当然，那只是在不宽容情况下出现的那些“迫不得已的妥协”之一，如果欧洲人基于其宗教信念继续互相残杀，欧洲就不可能存在下去。任何种类的安排都比持续不断的战争要好，因为它至少能够使人们从旷日持久的杀戮状态中获得暂时的喘息。灾难性的“我接受他的统治，也就接受他信奉的神祇”的原则被视为一个十分明智的解决办法受到欢迎，认为它值得所有良民的支持，不应再表示疑问或进行争论。

但事实上，该妥协方案只是另一匹特洛伊木马，里面满是奉行极权主义学说的党徒，当他们由其不舒适的隐身地费力地爬出来，伸展开手脚，他们就爬到欧洲所有城镇村落中爱好和平的居民头上，向他们提出两种选择：要么接受其新主子的独裁专制，要么在自己的门厅中被吊死。

当时旧的欧洲大陆被交由十几个互相争夺的王朝任意支配，中世纪自治政府的最后残余则面临完全毁灭的危险。在少数几个瑞士州和几个荷兰省份，人们不时继续实行自治（在某种程度上，因为金钱一直在政治中起很大作用），正在那时英格兰进行高贵而光荣的尝试，以建立议会相对于王室权利要求的优势地位。

我在此陈述的观点可能有些过于现代。中世纪人对全能的上帝和同样全能的世俗权威之源的信仰仍构成多数人精神和知识构成的一部分。国王仍被尊崇为上帝指定的所有尘世权威的体现，因而是不能受到任何指责的。就连宣称如果不接受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为低地国家统治者的《誓绝法》（不接受他的原因是他不是一位忠诚的牧民），在许多人眼中依然是过于大胆地干预宇宙的正常进程的法令，他们认为，在这一宇宙中，天意注定一些人要负统帅之责，其余人则必须服从。

然而，此时在这一主题上有了一些持不同看法的先辈，英格

兰人则最早利用了他们。因而，在王室及其臣民之间出现了长期的斗争。好女王贝丝[①] 在内心深处与她亲爱的堂姐苏格兰的玛丽一样是位专制君主，但她非常聪明，没有表露出自己的真实情感。她知道如何用令人愉快的温和行为冲淡其专权本能；倘若她偶或严厉叱责其子民，他们也极为温顺地接受。如果她不能不时地向其子民发发火并打他们几个耳光，那么要这样一位甜美、充满深情的母亲有什么用呢？

但是，在这位老妇人与世长辞、王位由其堂姐玛丽的儿子继承之后，快活的英格兰出现了重大变化。斯图亚特王朝由爱丁堡移至伦敦，但作为苏格兰人他们从未完全了解其英格兰臣民，同时，随着他们来到英格兰首都，在那里出现了一种导致半个世纪持续不断的摩擦的变化，它反过来为自由、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奠定了基础。因为英格兰生活中那些预见到事态发展的派别对维持他们适当而幸福地发挥作用所需的自由和特权感到失望，同时看到自己没有机会躲开外来的苏格兰君王，他们开始寻找另一个隐居地，希望在那里继续按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而不会遇到地方行政司法长官不断光临和客客气气地邀请他们去伦敦塔[②]，在那里静候国王陛下的兴致和（最可能是）他的刽子手的情况。

当一个精疲力竭的国家对自己的统治者感到厌倦并派人去请荷兰人威廉进行必要的改革时，看来有了全面好转的良机。但很不幸，患头痛症的威廉在世时间甚至不如奥利弗·克伦威尔长。他去世十来年后，英国王权落入一个次要的德意志王朝手中，后者在其寄养地用了200年时间才最终忘掉了其粗声粗气的条顿口

---

① 指英国伊丽莎白女王，贝丝是她的昵称。

② 伦敦塔，是英国王家要塞和伦敦的标志，位于泰晤士河北岸、伦敦市东侧，建于1066年圣诞节后，此后有所扩建。它长期被用作国家监狱。此处被请去伦敦塔意为被逮捕入狱。

音，能够用威廉·莎士比亚的言语多多少少表达清楚自己的想法。因而，仅仅从政治观点看，汉诺威王室取代斯图亚特王室并没有什么收获，逐渐在旧世界的英格兰和新世界的英格兰间产生了难以弥合的裂缝，只有一场战争才能解决问题，这场战争被称为美国革命（独立战争），它孕育出我们自己的共和国。

乔治·华盛顿的祖先自北汉普顿郡来到美洲。1658 年他们移居新世界，该年乔治的曾祖父告别了英格兰的白色岩崖，在弗吉尼亚的布里奇斯克里克定居下来。我们对他所知甚少，只知道他继续按他在旧世界采取的方式生活，并成为弗吉尼亚议会的一员。他死于 1676 年，微薄的地产由其子劳伦斯继承。

劳伦斯的次子奥古斯汀是在大洋的这一侧出生的，与父亲相比，他在其新的环境中更感到像在家里一样。他领会了这一新国家的精神，看到开一座铁矿和一家炼铁铺比家族所有成员过去所做的事更能获利。到那时为止他们一直满足于为伦敦市场供应烟草，这是风险很大的行当，因为它使他们完全处在英国代理人的支配之下。

当然，由土中开采铁这一职业远不像监督懒惰而不情愿的黑人奴隶那么彬彬有礼，但所能获得的利润要多得多。在英格兰受训结束后，奥古斯汀在弗雷德里克堡附近定居下来，后来娶了两个妻子（当然是一个接一个），第二个妻子玛丽·鲍尔给他生了六个孩子，长子教名叫乔治。

该男孩以那一时期通常的方式长大。当地教堂司事教给他写字，后来一位男校长受聘教给这位年轻绅士一点拉丁文。乔治对数学很感兴趣，但数学并不算 18 世纪中叶（乔治生于 1732 年）弗吉尼亚教育体系中正常的课程，他不得不自己想办法。他后来把其科学研究扩大到实用勘探领域，这一了解如何绘制和使用地图的知识对他后来应召率领反叛的殖民地军队时极为重要。

在那一时代，男孩到了14岁就被认为可以自立。结果，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奥古斯汀让他在现代年轻人甚至未想到选择一个职业时的年龄主管一些种植园。前者自其父亲去世后一直是家长，他认识到乔治具有一个出色管理人员的天分。乔治喜欢他的新生活，因为它意味着行动。他一直处在动的状态，考察账目记录，雇佣和解雇监工，购买和销售作物与奴隶，学习有关烟草的一切知识，试验新型耕牛，总的说来使自己有用，一直到了17岁成熟的年纪，他被认定适于出任公职，被任命为费尔法克斯县的助理公共勘测员。这一好处是友善的托马斯（费尔法克斯领主）授予他的，他在谢南多厄谷地得到了500万亩没有多少价值的土地，终于决定越洋前来亲自察看他的财产。他此时住在波托马克河沿岸优质地产上，这里离第一位赴美的华盛顿家族成员即约翰开始在美冒险生涯的种植园不远。

正是在出任公共勘测员的这一时期，乔治·华盛顿对莽原生活有了彻底了解，对这一新世界面积之广袤有了某些认识，当时殖民者仍急切地固着于沿海一窄条土地上。但这些无忧无虑的岁月于1752年突然中断，该年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劳伦斯去世。虽然他可能像对其生涯中的其他职司一样喜爱现有角色，但仍不得不舍弃它。

就一个家族而言，华盛顿氏易于心脏不好。劳伦斯从未能从他参加攻打西班牙人城市卡塔赫纳的战役的困苦中恢复过来。卡塔赫纳位于南美洲，今天属于哥伦比亚共和国。他在那里的舰队里服役，舰队由爱德华·弗农将军统领，他作为“老格罗格”①命令水手不得直接饮用朗姆酒，而应在酒中掺水后才能饮用，这样他们就不至于像过去直接往喉中灌原汁酒时那样严重丧失战斗

① 格罗格，是一种酒，用朗姆酒或威士忌酒兑水而成。爱德华·弗农之所以获得这一浑号，是因为他于1740年在海军发放掺水朗姆酒。

力，此举使弗农在英国海军中获得了永久性恶名。

这一远征卡塔赫纳行动未能实现使英格兰成为加勒比海主人的目标（这不是弗农的错，而是由于他的多数同事不称职），但劳伦斯·华盛顿与其指挥官在战斗中结下了友谊，以致劳伦斯把小亨廷克里克种植园更名为芒特弗农。

前面我刚刚讲过，劳伦斯死于1752年。他把芒特弗农留给了其遗孀安妮·费尔法克斯，但她在同年再嫁给李姓。安妮把地产出售给了其小叔子乔治，乔治当时23岁，开始了其牢靠的婚姻和精明的投资生活，最终将成为弗吉尼亚最富有的年轻人之一。

但在同时乔治还做了其他一些事，它们进一步为他不久之后应召扮演的角色打下了基础。

1753年，丁威迪总督任命他为少校，派他带着命令到蛮荒的西部寻找法国军队统帅，后者出加拿大陆地行军，占领了俄亥俄谷地的大半地区。华盛顿少校的任务是提醒其法国同行，他正在骚扰英国所属地区，应当尽快离去。

华盛顿在这一场合是靠自己的森林生活熟巧技术，还是靠天意，或者他的翻译雅各布·范布拉姆来引路，我说不清楚，但他确实不辱使命，找到了要找的人，递交了照会。法国人有风度地请他在一堡垒（现为沃特福德镇，属于宾夕法尼亚州）中就餐，但说至少在目前，他及其所率法国部队打算呆在原地不动。

法国人拒绝撤出其力量导致他们与英方发生摩擦，这些摩擦反过来导致战争。在这一冲突中，华盛顿未能得到缺乏纪律的殖民地军队的有效支持，被法军俘虏，直到签署承诺称英国人至少在一年内不在俄亥俄谷地试图建立任何设防工事后才被释放。

在其非正规部队失败后，伦敦当局派出了正规部队，希望这次能交好运。1755年2月，爱德华·布雷多克将军抵达弗吉尼亚。与其他多数当地军官一样，华盛顿已从军队中退役。他为何

采取这一措施呢？原因在于这些在美洲出生的战士不满于被视为“殖民分子”。“殖民地”军官无法获得与旧英格兰出生的军官同等的报酬，不论他身居何职，殖民地军官都被认为低于一位得到国王直接委任的小年轻。

上天知道，这些殖民分子没有理由感到比其伦敦上司低人一等，布雷多克将军虽作战勇敢，身先士卒，但作为骑兵卫兵统帅对荒原作战不清楚。一百年后，他们将对巴拉克拉瓦周围地区的地形不熟知，如果不是由于华盛顿的功劳，英格兰远征军几乎无一人能够生还。可能预料到会发生什么事，华盛顿在最后又一次被编入部队参加战斗。

结果华盛顿上校被任命为统帅之职，负责弗吉尼亚所有部队。这一切是否让英国正规军接受教训了？没有。因为，当获得殖民地任命的职位的乔治·华盛顿让一位国王任命的仅仅是上尉的军官按他的吩咐行事时，那位上尉告诉他跳到湖里算了。为了纠正这一凌辱性举止，华盛顿不得不一路兼程到了英军总司令所在地波士顿。

这一次他获得了胜利，但正是那种难以谅解的蠢笨无知使殖民地居民一直处在恼怒状态。因而，这位在参加荒原战役中身体严重受损的弗吉尼亚人一找到机会即退出现役，并拒绝再在英国官场做任何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那时起他打算去过种植园主的平静生活，世界无论好坏，均与他无关——他对世上发生的事不予关心。林间的军事帐篷至多是一相当可怜的权宜之计，而他位于他钟爱的弗吉尼亚的家园会让他忘掉他早年戎马岁月的艰辛和不快。

当然，没有一位妻子是不能把种植园治理得井井有条的。但合适的妻子难觅，此外，华盛顿在男欢女爱方面从来就不是很成功的。虽然他身高6英尺，非常乐于完全适应他碰巧出生在那里的社会的风俗习惯，并分享当时所有时兴的乐事，诸如跳舞、打

猎、饮酒和到最近的美国新教圣公会教堂做礼拜。

但是，正如我们这些6英尺高的人极为了解的那样，女人，不论什么样的女人，都更喜欢小个子，她们在他们跌倒并伤到自己时能让他们站起来，能把他们用手抱走，进行爱抚，直到他们再次露出笑容，说："我感到好多了，现在我要去给你找一个男子同性恋者（采雏菊）。"

乔治·华盛顿不是一位同性恋者。一位在其前24年岁月里参加过两次荒原战役、参加过半打战斗、身受过种种疾病折磨的人易于成为一位相当严肃的人，这当然在他试图赢得某位弗吉尼亚美女时不会有太大裨益。最后，在完全失败后，他决定现实一些而不再浪漫，娶了一位同为种植园主的丹尼尔·帕克·科斯提斯上校的遗孀。玛莎·丹德里奇·科斯提斯是位两个孩子的母亲，在威廉斯堡附近拥有1.5万英亩土地，银行里有6.5万美元的存款，还有150名奴隶。玛莎·科斯提斯还是一位热心肠、非常善解人意的伴侣（在未来岁月里她要更充分展示出这一点），也是位出色的家庭主管，对一位身居最高位的人来说是位慎重、忠诚的妻子。最有利的是（在这类事中唯一真正的考虑）她给了她丈夫最关心的一切。她提供给他一个井然有条的家，他可以在那里随时招待他想带来的所有朋友；她使他免于为那些需要谨慎处理的琐事操心，对一位真正有事可做的人来说，这些琐事令人疲惫不堪。

在结婚15年后，华盛顿终于得到了属于自己的东西。他被赋予一项任务，把大洋彼岸的新英格兰重组为一个国家，该国在旧有的英格兰海上势力一旦衰落时能够取而代之。

其余的就是历史了。在这方面人们讲得既多又彻底，我就不再浪费时间复述大家都知道的事了。在英格兰，与政府相关的人看来都没有抓住这一事实，即国王面对的人是那些英格兰人的精

神后裔，他们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就已让自己摆脱了一位头戴王冠的人。在新英格兰许多地区流传着一个故事，说在面临遭印第安人大屠杀之际，如何突然出现一位白发老者，他不知从何处来，但身着过时的克伦威尔式制服，疲惫但有力地挥舞一把克伦威尔式旧剑，当即用它杀死了不计其数的野蛮人，其他野蛮人惊骇之下四散逃走，再也没有露面。在突然现身拯救拓殖者之后，这位白发、白须的英雄静静地消失在附近黑暗的森林里，从此再也未在凡人眼前出现。

这一传说比多数人怀疑的要具有更多的真实性。弑君法官和逃离查理·斯图亚特的报复、实际上消隐在美洲荒原求得安全的其他逃亡者可能人数很少。但他们的精神无处不在，隐藏在许许多多人的心灵之中，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国王陛下善良、效忠的臣民。在美国革命爆发之前，倘若统治英格兰的是位更聪明的人，甚或说仅仅是位平庸之辈，但至少能让自己身边有一些聪明的顾问，一切可能都会得到拯救，革命可能不会爆发。但到那时英格兰真正的统治者已僵化成一种贵族制——变成一个苛严的等级——同时乡村贵族与日常生活现实脱节，以致除每年500英镑外对他们来说世界实际上并不存在。那些褊狭的港口酗酒者和猎狐者到海外去只是为了在回归时比启程时更能满足自我的要求。人们能够理解，奥利弗·克伦威尔的旧思想在那些乖戾的不顺从国教者的精神后裔中仍具有激动人心的影响。这些不顺从国教者竟胆敢举起其亵渎上帝的手反对他们承天命的陛下这一神圣人物，获得应有的惩罚！——被教训了一顿；其可恶的领袖的遗体被从坟墓中挖掘出来喂给狗吃。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伟大的奥利弗的遗骸不再能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亨利七世小教堂中安歇，但他的灵魂仍在行进。它继续行进了6个漫长而危急的年头，直至1781年10月19日这一永远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美利坚合众国军队总司令、来自弗吉尼

亚的芒特弗农的乔治·华盛顿将军谨恭有礼地向英王陛下在南卡罗来纳驻军司令查尔斯·康华里少将点头致意，让这位情绪低落的败军之将保留他的佩剑，因为他曾是一位勇败的对手，而他们共同承袭的荣誉准则要求一个人对一位在战斗中正直勇敢、尽力而为、在胜利和失败时都表现得正派得体的败军之将宽厚为怀。

讲完这个不长的轶事后，我想我可以与将军再见了，因为你们现在明白他是什么样的人。同时既然一应证据齐全，我们可以用几句话概述他，因为在这一最伟大的美国人身上确实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地方。

乔治·华盛顿不是一位伟大的军事统帅，他谨小慎微，办事有条不紊，但缺乏亚历山大[1] 或拿破仑那样的军事天才。他不是一位像杰斐逊那样的有创造性的政治家，同时在进行外交协商时年高的本·富兰克林[2] 是他无可争议的老师，在那一方面需要精明、耐心和讨价还价的本领。作为一名演说家，他令人遗憾地缺乏有经验的演说家吸引听众的所有那些技巧。他也从未有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有独到见解的、创造性的思想。他天性是位保守分子，极不信任那些向他兜售法国大革命理想的聪明伶俐的年轻人。事实上，如果他能随意行事，他会把所有激进分子送回到他们原来的住地。他们搅乱他的建立一个井然有序、按部就班的共和制的看法，其中每一位男子、妇女、孩子，每一匹马、一条狗都应知道他、她或它在社会中的位置。他想要自由

① 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前323年），古代马其顿国王，他继承父业，在完成征服希腊事业后，挥戈东向，征服了埃及和波斯帝国，一直扩展到印度河流域，建立了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该帝国在他去世后即分裂。

② 指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年），美国政治家和科学家，大陆会议代表，参与起草独立宣言，曾出使法国，缔结法美盟约，参加制宪会议，研究了大气放电现象，发明避雷针。

(FREEDOM)，但这是在先祖的英格兰盛行的自由。此后不久在未来共和国被剥夺了特权的大众中产生的自由（LIBERTY）观念，他根本不理解，它是否很合他的胃口，也值得怀疑。

不过正是他建立起了我们的共和国；正是这位弗吉尼亚种植园主把我们由外国统治下解救出来；正是这位南方贵族开始领导我们进行自治的高贵实验，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在那一特别的方面远比同代人先进；它更多地以神的尺度而不是所有其他把荣誉和成功合在一起的限定因素为根据。

乔治·华盛顿是性格的体现。

韦伯斯特[①] 这样界定性格（CHARACTER）一词："极其高超和具有强有力特征的道德品质；个性，尤其是因品德出众而为人注意的个性；道德活力或坚毅，尤其是通过自律而获得；对自己的本能动机加以遏止……"

我想我可以就此打住了，因为我对奥兰治的威廉和乔治·华盛顿的最终评论只需用一个词：CHARACTER。

[乔治·华盛顿（1732年2月22日—1799年12月14日），美国将军、政治家，首任总统。少年时代在弗吉尼亚农场度过，受过不正规的教育。11岁丧父。1749年任库佩帕县测量员，1751—1752年掌管弗农山庄，1753年任弗吉尼亚军团中校，次年因军功晋升上校。1755年，年仅23岁即任弗吉尼亚军总司令。1758年当选为州议员，以名誉准将衔辞去军职，并与寡妇玛莎·丹德里奇结婚。参加了大陆会议，1775年6月被选为大陆军总司令，主张彻底与英国分离。美国独立战争结束后，他出席了制

① 诺阿·韦伯斯特（1758—1843年），美国词典编纂家，作家，以其《蓝背拼音课本》（《英语语法原理》第一部分）和《美国英语词典》著称。

宪会议，并于1789年初当选美国第一任总统，1792年连选连任。1799年12月12日骑马外出时染病，14日晚10时逝世。——译者附注]

命运多舛的音乐神童——

莫 扎 特

Mozart, Wolfgang Amadeus

（1756—1791年）

乔安尼·克里索斯托穆斯·沃尔夫冈古斯·西奥菲勒斯是莫扎特的父亲、乐队指挥先生利奥波德·莫扎特给他登记的教名。作为他父亲唯一的儿子，莫扎特从来没有用过乔安尼或者克里索斯托穆斯这个名字。他把西奥菲勒斯翻译成阿马德奥（而不是冗长的日耳曼语的戈特利布，后来，为了演出方便，他经常把名字意大利化，写马沃尔夫冈·阿马多）。他把他的四重奏贡献给他热爱的朱塞佩·海顿，尽管他的邻居都知道这位伟大的心地善良的人叫约瑟夫或者佩皮，但是在18世纪末，没有这种装腔作势的姿态，这是完全必要的事。

18世纪下半叶的维也纳，与前几年的纽约，或者上世纪70年代的伦敦，没有什么不同。"国产"的天才都被怀疑缺乏某种鉴赏的品质，而这些品质又都是那些阿尔卑斯山脉的人与生俱有的。即使是"国产"的天才碰巧比那些从意大利进口的艺术家聪明1000倍。海因里希·施密特以恩里科·曼内斯库勒之名唱过歌，诚实的胡安·穆勒以乔瓦尼·穆·尼亚奥之名演过节目，这是多么荒唐的事啊！但是在这个洛可可式的装假的世界中，没有任何有

真正意义的事。

令老莫扎特惊喜的是他亲爱的妻子（玛利亚·安娜·珀特尔，来自附近的湖区）替他生了个儿子。他的儿子小莫扎特早在他会走路之前就会演奏拨弦古钢琴。当他还在用尿布时（在那时，小男孩都要用尿布，直到3岁），就能创作几分钟优美的曲子。他认定幸运之神已敲开了莫扎特的家门。现在是他充分利用这一机遇的时候了。于是，小沃尔夫冈（莫扎特）6岁时，那时他的姐姐11岁，他们的父亲开始带着他们到处演出。玛利亚·安娜和沃尔夫冈·阿马德奥在德国被从一个小剧场拖到另一个剧场。他们又累又困，还要到别的城镇去演出。有时他们病倒了，才被允许在租来的房子里休息几个星期。老莫扎特对贫穷体验了很长时间，不希望错过这能挣来数千元的机会。但是，从内心里，他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他深深地爱他的孩子。即使他缺乏应有的父爱，也不致傻到折磨他幼小的小天鹅，那两个会下金蛋的小天鹅。

南内尔是一个年轻又吸引人的奥地利女孩，她十分淘气，也很可爱，但是沃尔夫冈才是莫扎特剧团中最具有吸引力的古钢琴家。他完全保持着孩子那未被宠坏的幼稚，在他这个年纪的其他孩子，还在流着口水呀呀学语呢。尽管莫扎特可能成为世界上最令人讨厌的乡巴佬，但在剧场或者剧院演出的几年后，从维也纳到几乎荒凉的布赫斯维克，人们都在谈论着这位可爱的男孩。他坐在玛丽亚·特蕾莎[①]的腿上，对孩子来说，那是最安全的地方，大胆地向她说："我喜欢你，你真好！"

最特别的故事情节是莫扎特摔倒在宫殿的地板上。他正要哭

① 玛丽亚·特蕾莎（1717—1780年），奥地利女大公，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女王（1740—1780年在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兰西斯一世的皇后，扩充军备，实行内政教育等改革，参加七年战争并瓜分波兰。

的时候，一位公主，也是在里斯本灾难性的大地震时出生的，把他扶起来，安慰他。小沃尔夫，这位天真幼稚的小男孩，吻了她，说："我爱你，等我长大了，我一定要娶你。"相当多的人都活到了这一天，见到这位公主在狂笑和嘘声中被推上断头台。他们都奇怪，假如这位可怜的女孩不做法国王后玛丽·安托瓦特，而做玛丽亚·安托瓦特·莫扎特夫人是否过得更好呢？那时她是路易十六的遗孀，正要被砍头。

关于莫扎特成名和英年早逝的故事，我们经常听到。在叙述他的艺术生涯时我们最好借用一下他妻子的第二个丈夫路德维希·科切尔缜密的记载。他耗尽了一生中的最后几年来搜集所能得到的有关他妻子的前夫的故事，并提供给世界的人们，为的是得到没有预料到的、最令人振奋的公平对待。

这里有一些必要的有关莫扎特的统计：出生于1756年1月27日，在6岁至7岁之间，两次到过欧洲大陆，唱歌，演奏钢琴、小提琴（他的父亲利奥波德撰写了一本很好的有关小提琴的教科书，直到现在还很有用），扮演小丑。这个小男孩的生活中充满了欢乐。我们不要责备他的父亲只对金钱感兴趣——也不要说沃尔夫冈喜欢演奏，就像熊一样为的是得到蜂蜜，或者像受过训练的海豹一样用鼻子顶住一个盘子，只为了几条鱼的赏赐。

我们不应该这样评论他，他热爱音乐，而且远不止如此。比如，他8岁时到了海牙。尽管当时的奥兰治家族是众所周知的音乐盲，他在这位执政者的家中仍然受到了宠爱。他被告知在附近的哈勒姆城有一架风琴，是著名的彼得·斯韦林克的杰作。它有许多音柱和音区，与众不同。不论怎么样，他必须听一听，并在上面演奏他7岁时创作的圣乐的旋律。

沃尔夫冈生活在公共马车上，而不是舒适的酒吧中，他一次又一次地感冒，而且还要照顾南内尔，同时还要尽力创作多声部音乐和大型乐曲。常人需要在德彪西紫色的华而不实的音乐暖房

中用功数十年才能完成这些创作。

莫扎特只在世上活了35年。多数人在35岁时才开始寻找自我，但那时莫扎拓已经去世了。他过度疲劳的大脑创作了626部独立的乐曲（不包括他创作的无论怎么赞扬也不为过的歌剧），包括49部交响乐，29首弦乐四重奏，20首弥撒曲和数不尽的钢琴、小提琴、双簧管、长笛奏鸣曲和协奏曲，更不用说各种各样的小曲子。他写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是美好的。许多作品是在极为匆忙的情况下完成的。莫扎特工作起来就像一位采访重要新闻的记者。笔墨未干，他谱写的曲子就被剧院老板拿去让人誊抄。但他总是和许多优秀音乐家一样，哪怕仅有十几分钟的时间，他也能从容的写出两三页华丽的乐章。善良的老大师海顿曾经说过，仅仅是年轻的沃尔夫冈的弦乐四重奏，就足以给他带来永不泯灭的名誉。那只是他创作的一小部分。让我们记住，所有的东西，只要他一接触，就具有了生命力。只需弹奏三四个琴键，所发出的优美的声音，就像是在呼喊“莫扎特”的名字。这声音一直到音乐结束。

这是多么辉煌的生活——从付出的角度看，是最有价值的。从获取的角度看，自始至终是最悲惨的悲剧之一。这是对人类的恩赐，他的音乐伴随着你度过事业中最艰难的时期，而他自己却生活在死亡的边缘。那足以耗尽6个平常人生命的劳累摧垮了他的身体。那时，如果说他的年薪是800美元，那就可以使他多活25年，再多给我们创作一些有价值的作品。

莫扎特一天18个小时地工作，谱曲、演奏、练习，而又营养不良。1791年12月15日，在被催逼下交出《安魂曲》的第二天，莫扎特的灵魂也被召走了。他辛劳一生的代价是乱葬岗。下葬那天，瓢泼大雨下个不停，陪伴他到墓地，在泥泞和风雨奔跑的，唯有他的小杂种狗。

现在产生了一个问题，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命运不济，还是

由于他自己性格太孤癖，还是两者都有？这个问题不能用简单的“是”或者“不是”来回答。

让我们首先来讨论那些消极的方面，这可能对他不利。这也无疑是他活着的时候，他的同代人攻击他的原因。他最大的不幸是被迫生活在异常无聊和异常目光短浅的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玛丽亚·特蕾莎是维多利亚女王胸襟狭窄的原型。你们可以想像，像这样一个性格复杂的人，音乐对于她来说就像是皇冠和祭坛上的装饰物。整个世界就像是为哈布斯堡的荣誉创造的。所有的男孩和女孩（上帝，他们的女人真能生！）都被分给一块小花园和几个忠诚的花匠，每日向他们的主人提供新鲜蔬菜和鲜花。

至于玛丽亚·特蕾莎的儿子约瑟夫二世，他聪明，但没有走上正路。他有一个足够聪明的大脑，但没有真正的智慧——一点也不了解用一般人的粘土捏成的同伴。他在他们的帮助下做得很好。他对他们的奢侈和快乐的生活有极大的兴趣。但是，在他的宫殿里没有一个人能说：“对不起，陛下，您的改革路子走错了。在您向臣民解释清楚之前，您会把所有一切都弄得一团糟。在那些忠诚的臣民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您一样聪明。他们只知道当他们的父亲、祖父活着的时候，事情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不能想像这个世界能以与现在不同的方式运转。给他们时间！首先向他们解释您的计划，然后再执行，但是，进度一定要很慢、很慢。”

那不是约瑟夫做事的方式。最终，他像处理个人事务一样开始了他的改革计划。改革计划涉及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从而激怒了每一个人，社会秩序一片混乱，而且国家还卷入了一系列的对外战争中。这些战争注定都是灾难性的。没有人相信他的领导才能，最终在他死时，新政被迫中止。国家处在愤怒和怨恨之中，人民的积怨如此之深，在奥地利以外的任何国家都会引发叛

乱和内战。

这位被误导的陛下对音乐的感觉比他死去的母亲要强得多，但是，不知为什么，莫扎特从来不归依在他的光环之下，年轻的莫扎特无疑拥有天才，陛下也是认可的，但他作为作曲家的能力被他们个人的缺点所抵消。这位最不自由的自由人曾经给帝国的皇冠增添了光彩，陛下不能忽视他的这位臣民。

记住，那时的维也纳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小村庄，被王朝和贵族统治着；请记住在那时每10位居民中就有一位秘密探听者，甚至皇家和帝国的客人都是警察监控的对象。这里有一个有趣的说法：“尽管戈特希尔夫·施特拉斯741号的何洛伊斯·胡伯尔每月只能挣到五元钱，昨天却有人看见他的几个女儿都穿着长筒丝袜。”或者“今天早上，维滕贝格大公阁下看望他的女儿利希滕施泰因公主时，带了一双紫色的舞鞋。”

尽管在莫扎特死后得到了天使般的荣誉，但他决不是哈布斯堡所期望的美德典型。他也不是一个酒鬼，或者一个生活放荡的人。他总是生活高雅，或者是在作曲，或者是带着几个年轻漂亮的女朋友到镇中最昂贵的糖果店买一个他喜爱的冰淇淋——这是他上次访问法国时尝到的最好的食品。他年轻漂亮，姿态宜人，当赚到没有预料到的50元钱时，他总是在想为什么不在落入执行官的口袋之前花掉它呢？

不幸的是，他从不知道在花完这50元后如何不再花钱。当他只有50元时，他却要花掉51元。即使是一个经济学的新生，那怕他只有1－A的水平，也会告诉你，这必定使你走上破产的道路。经过短暂的忏悔后，他会赶快到一些乐于助人的朋友那里借一小笔钱。上面提到的新生会告诉你，这是到达贫困的捷径。

但是年轻的莫扎特几乎和威尔金斯·米考伯[①]一样是一位乐观主义者，他会很容易地恢复勇气，向自己保证一定能得到某个固定的职位（不论是什么——教堂的风琴师，唱诗班的教师——什么都可以，只要有固定的收入）。所有这一切都会变好的。为了给他将来的资助人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他可以再借100元，还给他的朋友50元（他从朋友那里借了75元），用剩下的钱换来一件鲜红的大衣（买的，当然是赊账的）。这件大衣给他带来了特别的气氛，使他感到又一次站在了世界的顶峰。

就这些事情来说，莫扎特无疑是极端愚蠢的。这不是一个有理智的人的做事方式，但是，有理智的人是创作不出《费加罗的婚礼》或者《魔笛》等名著的。它完全取决于我们认为是我们的文明中最重要的部分——对物质获取的看法。他把每一次冒险都转变成一次幸运的赌博，他是一位用音符和旋律讲故事的人。他没有一点存款——在他死去的时候，他为他的继承人留下的所有财富只有一件衬衫。

当然，我讲的是一个极端，他们都是例外。他们中也有数千万的平民，在尽最大的努力使自己过得更好，甚至从他们的冒险中获得一定的满足。那么，在当时，尽管奥地利，特别是维也纳拥有大量的财富，但募集到800或者是1000元来延长莫扎特的有用的生命却是不可能的，只有一个人一直在帮助他，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二世（老腓特烈的侄子）邀请他到柏林，并在他的宫庭中为他提供一个职位，年薪是3000元，而约瑟夫答应给他的全部也只有800元，但莫扎特拒绝了。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他忠诚他的国王和他热爱的维也纳。他的国王和他热爱的维也纳又是怎样回报他的热情呢？意大利人垄断音乐和戏剧已有200年的

---

① 米考伯，是英国作家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人物，是一无远虑却老想着走运的乐天派。

历史，他们有计划地用唱错调子或其它方法诋毁他的《费加罗的婚礼》，以至于把这个名著演奏得注定要失败。讲到这里，您可能要打断我，问我为什么 18、19 世纪的维也纳能成为全世界的音乐中心呢？维也纳生活在音乐之中，以音乐为生。维也纳无疑有一些贵族家庭，他们不仅热爱音乐，而且能够理解音乐。他们为所有杰出的人敞开大门，甚至有时对待才能一般的人也一样，但他们不能做所有的事情。一般的公众仍然是，而且一直保持着与他们截然不同的做法。他们会花上一笔钱去听一些著名的可以唱到 C 高调的被阉的男歌手的歌。他们会排队买票欣赏一些意大利的花腔女高音的新作。但是，他们从不给自己的同胞一点支持。莫扎特坚持歌手必须用本国语言唱歌。即便是莫扎特用熟练的意大利语写出来的作品，他们也听不懂。约瑟夫也曾经抱怨莫扎特的作品"充满了音符，无法欣赏"。最后的结果是，当剧场中有空位时，最好的选择是看外国人的演出，而不是奥地利帝国臣民的演出。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萨尔兹堡作为众所周知的音乐圣地，情况又怎么样呢？在莫扎特一生的相当长的时间里，当他的父亲还受雇于宫庭的时候，萨尔兹堡一直由一位擅长羞辱为他工作的艺术家为乐的人所控制。他像对待佣人一样对待他们，让他们在他的住所的通风走廊里等几个小时，而他却正要忙着处理"国家大事"。

当萨尔兹堡的大主教听说莫扎特在维也纳演出时挣了一小笔额外收入时，他把莫扎特的年收入由 500 元减少到 400 元，禁止他演出或者教学生以挣回失去的收入。当他想到他被皇帝侮辱时，尽管皇帝有一些缺点，但仍是一位有品德修养的人。他不愿返回萨尔兹堡，再受萨尔兹堡主教的羞辱，但是皇帝命令他收拾行李，离开维也纳，用自己的钱返回萨尔兹堡，再也不许返回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当莫扎特受到这最后一次侮辱后，他产生了

反叛情绪，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位由教皇亲封的音乐骑士和波伦亚大学的名誉作曲家，不能让人像对待偷了鼻烟的男仆那样对待他。主教在信中如此卑鄙地谩骂他，解雇他。在莫扎特的官方传记中，没有人敢全文引用这封信。

莫扎特在落入利奥波德二世（他在1790年从他哥哥那儿继承了王位）的妻子（当时的女皇）手中以后，受到了什么样的待遇呢？这位西班牙国王的女儿曾经听过莫扎特为她和她的丈夫写的歌剧。这位西班牙的女性，她甚至不能拼写出自己的名字，勃然大怒，结结巴巴地说："简直又是一个德国猪！"

时光飞逝，也有一些人意识到了莫扎特的天才，但是更多的人认为他的音乐有点太时髦，太特殊，听起来不舒服。尽管他们模糊地认识到，他们听到的是一位具有非凡天才的音乐家的作品，所以，如果说在他的一生中，没有得到承认，也是不公平的。他被认可，同样被欣赏。他的许多老朋友和有经验的朋友都站在他的一边，尽他们的最大努力帮助他，并呼吁社会应该重视这位最伟大的音乐家。

但是事态的发展同样走向邪路。为什么莫扎特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呢？为什么他有许多富裕的而且有权势的主顾，却还要为糊口而赶写一些作品，直到他精疲力尽而死去呢？

我最准确的猜想（就我的能力而言）在我前面已提到过多次的暗示中，在每一个行业中，不管他是多么聪明的天才，多么勤劳，艺术性多么完整，他仍需要运气。一些音乐界的莫扎特的同代人证实了我的观点。例如，海顿就有幸认识了一位犹太演出经纪人（最早的一位国际演出经纪人，从那时起，他们就扮演这个角色），他劝说海顿离开了他的家，并把他带到伦敦。在那里老海顿沉浸在巨大的成功之中，60岁又开始了他的新音乐生涯，在他忙碌的一生中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

幸运女神从来没有光顾过可怜的沃尔夫冈，即使是她去了，

他可能正在忙着教钢琴，或者其它奇思异想（这位看似没用的妻子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知道如何为她所嫁的人去做家务的人）；也有可能他正在没有尽头的旅途中；也有可能是去一个奥地利的小城镇，在那里，他被保证至少有一打小提琴家和长笛演奏者为他的下一出戏伴奏；也有可能正在忙着创作一部新的歌剧，剧本“把他们都装进去了”。他的剧本作者洛伦佐·蓬特把他们都写进剧本中。这位好奇的威尼斯人为莫扎特写了《费加罗的婚礼》剧本，也有同样的悲惨遭遇。他在纽约开了一个杂货店以养家糊口，后来在美国开始了他的戏剧冒险生涯，最终卒于1838年，那时他是现在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意大利语教授。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愈来愈崇拜莫扎特。在我小的时候，除了贝多芬以外，没有我崇拜的音乐家，后来我又听说了瓦格纳。他们都很伟大，但是，巴赫最后把他们都从第一的位置上赶了下来，巴赫自然在我心中占有第一的位置。但是，莫扎特，当我第一次听说他时，就成为我最喜爱的音乐家。在我的《人类的艺术》一书中，我是这样描写他的：

在蒂罗尔州、萨尔兹卡默古特和克恩滕州的小镇和小村庄中，北方和南方的精神已经融合了近几千年，在这里居住着一个人，他既不属于意大利，也不属于德国，而是两个国家的混血儿。他们的语言、秉性、人生观与邻国是不同的。他们拥有自己的艺术。他们的教堂，不管是什么时候建成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也是这些小村庄的典型特点。只要你看过一次，就永远不会忘记。当地的画家找到装饰房屋和家具的最好方法，这种方法在世界的其它地方是没有的。每个村庄都拥有自己的小市场，市场的周围是一些商店、药店和老式的酒吧。在市场的中央有一个喷泉，为人们提供饮用水。这纯净的水来自附近山边的一条小河。

公共喷泉凝聚了石匠和铁匠的心血，上面有圣母玛利亚

和耶稣的石像。两尊石像都不像哥特风格早期典型的石像那么严峻。从早到晚，这个喷泉是商业活动的中心，赶车人过来饮马，小姑娘和小男孩聚集在一起往家用的水罐中灌水，即使是无人的时候，清澈的流水发出欢快的声音，向前流去，使市场沉浸在和平和自由之中。没有匆忙的人群，没有喧嚣的声音。被白雪覆盖的大山把世界的其它部分都挡在安全距离之外，和睦、和平、宁静和接受上帝恩赐的喜悦心情是共同的感受。

莫扎特的音乐就像喷泉中涌出的水，它发源于周围孤寂的崇山峻岭中，经过山边的森林和草地，然后流到人们的手中。它温顺，有形有状，给人类带来了祝福，是永久的欢乐和鼓舞的源泉，使人们不会忘记孩提时代那单纯的笑声和幸福的生活。

对此我不必多写，喷泉仍在水花四溅。当生活对我们有太多意义时，就像这几天发生的事一样，我们这时可以在石头上静静地坐下来，闭上眼睛，侧耳细听，低头沉思，会再一次体会到生活对我们是多么幸福和美好！

［莫扎特（1756年1月27日—1791年12月5日），奥地利伟大的天才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的核心人物。生于萨尔茨堡，卒于维也纳。幼年时即显示出音乐天才。晚年生活贫困，但他创作了大量的不朽之作。主要作品有：《庄严弥撒》、《D大调小夜曲》、《费加罗的婚礼》、《唐·乔瓦尼》、《魔笛》、《哈夫纳交响曲》、《布拉格交响曲》等，最后一部作品《安魂弥撒》系受人委托而作。莫扎特的音乐使西方文化达到了一个顶峰。——译者附注］

制造恐怖、自尝恶果——

罗伯斯庇尔

Robespierre，Maximilien

（1758－1794年）

一个小男孩坐在小木墩上，等着公共马车拉他到巴黎，他的名字叫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他的父亲更喜欢他叫马克西米连·德·罗伯斯庇尔。他的父亲是个非常古怪的人，如果他一生中能忍让别人一点的话，他的小儿子就不会在30年后把整个法兰西引向无休止的苦难。

罗伯斯庇尔家庭据说是爱尔兰血统。我是相信的，他们的狂热太像爱尔兰人，而不像法兰西人。在他们的身上没有一点幽默诙谐的影子。他们都特别严肃，生活好像对他们来说只有严肃，生活不严肃的人就没有权力活着。

阿拉斯是法国一个很糟的地方，它让人想起稍南一点的努瓦永。皮卡第大区枯燥乏味，起伏的大地没有一点生机，被凸凹不平的道路分解成不规则的版块，在这里雨总下个不停。罗伯斯庇尔和约翰·加尔文都来自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确实太糟糕。

马克西米连的父亲是一位律师，母亲是一位酿酒商的女儿，他母亲嫁给他父亲后身份相应提高了。但是他母亲去世后，父亲也不见了。酿酒商家族不得不照顾罗伯斯庇尔家的孩子，一些人

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

说他妻子的死对他打击太大，他一看见孩子的目光，就心痛得受不了，另一些人却说他躲债去了，不知道哪个说法对。突然有一天，他父亲从德国往阿拉斯寄信来了，时间不长，小马克西米连得到消息，他父亲去世了。

孩子的父母都去世了，酿酒商家族只得尽全力照顾好幼小的孤儿，这意味着要有一大笔额外的开销。那个时候的法国家庭并不喜欢额外多花钱。

马克西米连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姐姐，他们都关心爱护他。随后他的一个姐姐去世了，哥哥也去世了，他的另一个又高又瘦的姐姐活了下来。她哪儿也不去，也不见任何人，整天躲在屋子里苦捱时光，直至她弟弟成为法国的独裁者。

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有许多这种不幸的女人，她们是那种为建立人民统治献身的男人的妻子、姐妹或女朋友。人民转过来反对这些男人并推翻了他们，这些男人的少部分女性亲人侥幸活了下来。他们躲在昏暗的监狱里或忠实朋友的阁楼里惨淡度日。当危险过去，她们再过那种毫无意义和乐趣的生活。她们变得像幽灵一样。我曾碰到一些年长的人谈到这些事。

他们告诉我："她们变得非常可怕，大部分人把对她们兄妹、丈夫、情人的思念之情转为信仰宗教。她们无休止地讲述着成为圣教徒的马克西米连和她们神圣的乔治·雅克并祈祷有一天能随他们而去。一旦她们鼓足勇气花可怜的几便士买点面包、菊苣之类的东西（她们的财产已被没收，也不可能有退休金），保姆们就赶紧抢过零钱，怕钱被这些怪物似的女人触摸一下给污染了。有时晚上会有人敲门，一位上年纪的老头会站在紧锁着的大门前。他会解释说他是原先公共安全委员会成员的朋友或合作者，他逃到美国或印度去了。他有许多冒险的经历，一些还很有趣。现在他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不行了，他必须再一次跟那些有贵族血统的人讲讲话，这样他才能安静地离去。他一直讲到天快

凳，然后朝着他心中英雄的画像跪拜后离去。几个小时后，宪兵队会在一所破旧的旅馆里发现他已悬梁自尽，那样的日子才是可怖的岁月，好像上帝正在赌博狂欢一样，而人类的生命却是他们的赌注。”

小马克西米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有点学究气，其他孩子都不愿意跟他玩。他功课相当好，并喜欢让其他人知道。他是被他十分信神的姨母们带大的，所以他变成了虔诚的基督徒。但她们对神圣美德的概念只是那些已近中年的法国老处女们的幻想而已。在阿拉斯，生活在拥挤住房里的人，生活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值得感到快乐的东西。为了救自己，马克西米连躲到了一所他梦中的建在小山上的城堡里，在那里他自我感觉比其他人要优越些。他知道镇子里的人怎么样说他，说他不是一个合法婚姻所生的孩子，是私生子，这就是为什么他做律师的父亲迫于压力不得不娶他那平民母亲。在他小小的私人城堡围墙内，低声谈论这类事情的当即被投进一个地牢中，慢慢地消亡。庄园主不时地走到他家里，透过门上的小孔，看着他们的痛苦，将来有一天，小城堡会变为现实，变成一个很大而真实的城堡，堡主会成为一位大人物。因而我们应保住心中的秘密，为事业作准备。

考试对罗伯斯庇尔来说相当容易，他好像一生下来就是为通过考试来的。政府需要有才能的律师，教堂也需要坚定可靠的支持者，因为那时所谓的“邪教”很多，“邪教”代替上帝占领了人们的思想，它甚至鼓吹男人的神性。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混乱。因为“邪教”认为上帝不是宇宙的统治者，那么教皇的权力是什么，主教的权力是什么，神父的权力又是什么？

马克西米连从来不会为上面这些事烦恼，他只知道学习，偶尔去做弥撒，去参加圣餐礼。小马克西米连努力抓住一切机会向前走。巴黎伟人路易大学给了他奖学金。他把破旧的衣服放到

木箱里，姨母们为他祝福，他满怀信心地来到首都。

他并不喜欢这所新学校，他人长得有些苍瘦，而且不太漂亮。他的风度举止古板，缺乏魅力。但只要用拉丁文写作，他所有的同学都赶不上他。有一天，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托瓦特准备视察这所学校，罗伯斯庇尔作为全校最优秀的学生被选出唱欢迎颂歌，他穿上一套漂亮的新衣服，他一生中第一次穿丝绸衣服。他将是欢迎场合的主角，当他背咏圣歌时，其他人只得跪在他旁边，而他还会以其背诗时的典雅吸引住国王夫妇。

那天下午正巧下雨，欢迎仪式推迟了。当王后来到时，她已没有兴趣听一个小男孩唱难懂的六韵步诗，她告诉她丈夫，他们一天已做得够多的了，国王就告诉随从走吧。穿得漂漂亮亮的小罗伯斯庇尔依然孤零地跪在泥里，手里拿着诗稿，他还没有得到一天的喜悦，就成了大家的笑料。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并不是那种被人嘲笑而无动于衷的人，他永远忘不了他的耻辱。13年后，他强烈要求将路易十六和他的妻子推上断头台，认为只有这样法国才会存在下去。

马克西米连顺利地毕业了，姨母们都来看他，而他却去看主教了。主教看到这么一个又有知识又对上帝忠诚的人，很满意，就让他在阿拉斯主教管区当了一名法官。马克西米连终于作为有身份的人，有固定职业和收入的人，回到了阿拉斯。

他把自己完全溶入了这个小镇，花更多的钱买衣服，加入地方文学、音乐社，在公共集会上朗诵自创的诗歌。

但就职不久，他就辞职了。作为法官他要判处罪犯死刑，这对他来说太残酷了，因为他热爱人类，他想让所有的人都生活幸福。而要使生活幸福，首先就必须使生活完美。这意味着他必须按自己的想像重新塑造人类。

在前10年中，罗伯斯庇尔尽一切努力用和平的方式使他的信念成为现实。然后他发觉人本身所固有的缺点很难根除，这一

点他不能容忍。如果这些人不改变劣性，他就会毁了他们，他一直到死都坚持这种信念。在他自己完结之前，他相继签名处死的人比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统治时期都要多。

对一位来自边鄙小镇、没有背景的律师而言，这实在是项大成就。令我感兴趣的是那样一种背景的人奇异的精神和情感的发展，他虽然有种种先天不足，却不仅在法国历史，而且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我想正是上个世纪上半叶德国著名悲剧演员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黑贝尔[①]给我们提出了这样极其稀奇的理论，即每一位伟大的艺术家都是潜在的大罪犯，反过来亦然。我对这些思想还研究不深，还不能给人们一个确切的答案。

就像施本格勒[②]那样，黑贝尔是大家喜爱的作家，因为读他的书时，大部分时间你会感动愤怒不止，并因此进行一些思考，偶尔你对自己说："他们看来至少讲了一些东西！"并抛开自己习惯性的思维轨迹，循着他们的思想得出一些新的结论，有时你会被不快地孤零零地抛弃在一个纯粹的无知的高不可攀的墙前。但偶尔你会发现一个窄巷，由此你能到达一个出人意料的新的思想领域；每一位具有创造力的艺术家都是未实现其真正天职的罪犯，而每一位罪犯都是接近其令人不快的天职的艺术家——这一思想如何，让我们瞧瞧吧！

按照黑贝尔的说法，莎士比亚如果不是在描写谋杀方面找到一个发泄口的话，自己就会变成拦路抢劫的强盗，并被送上绞刑架。但是，当他向我们谈论世界最伟大的恋人时，这个罪犯试图

① 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黑贝尔（1813—1863年），德国戏剧家、诗人，出身于泥瓦工家庭，受黑格尔历史影响，主要创作有《玛丽亚·玛格达莱娜》、《尼伯龙根三部曲》等。

② 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1880—1936年），德国哲学家，认为任何文化都要经历成长和衰亡的生命周期，著有《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远景》等。

证明什么呢?

坡[①]、斯特林堡[②]、陀斯妥也夫斯基[③]和尼采[④]无疑都热衷于描述那些现今称为“不正常心理发展”受害者的普通人。他使用街上常人的语言，他们是“怪人”，虽然这是一个无比高贵的术语。“不正常的心理发展”，不好听的诊断结论，但我不敢肯定这能完全证实黑贝尔的论断。

同时，必须承认，许多伟大的有创造能力的艺术家们，如果没有“艺术灵感”，使他们免于被绞死或被流放囚禁在什吕塞尔堡或巴士底狱，其结局也是很悲惨的，这种不太正常的情况无疑是存在的。

被许许多多人指斥为世界上最危险罪犯之一的希特勒，最初企图成为艺术家、画家以及建筑师，但因能力低下而被所有的艺术学校拒之门外，正是由于这种被压抑的欲望，导致了一系列疯狂、愚蠢的行为。因此，在孩童时期的挫折很可能对人的一生产生可怕的影响，而如果这种挫折是基于对他品德的认可之上，将愈加危险，因为这将使得他拒绝接受真实的生活，而以他自己的想像来重塑世界。

---

① 爱伦·坡（1809—1849年），美国诗人、小说家、文艺评论家，现代侦探小说创始人，主要作品有诗歌《乌鸦》、恐怖小说《莉盖亚》、侦探小说《莫格街凶杀案》等。

② 约翰·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年），瑞典戏剧家、小说家，开创现代瑞典文学，对欧美戏剧艺术有很大影响，主要作品有剧本《父亲》、《朱丽小姐》、《鬼魂奏鸣曲》及长篇小说《红房间》、《黑旗》等。

③ 陀斯妥也夫斯基（1821—1881年），俄国作家，曾因参加革命团体被判流放，作品反映“小人物”的痛苦，描写社会上的不平，对人物异化心理刻划入微，主要作品有《白痴》、《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等。

④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年），德国哲学家、诗人，唯意志论的主要代表，创立“权力意志论”和“超人哲学”，主要著作有《悲剧的诞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权力意志》等。

在我看来，罗伯斯庇尔便是这样一个人，从他被派往凡尔赛代表家乡的人们支持国王以使国家濒于破产和陷入无秩序之时，他认识到机会终于来了，他将塑造追随者们的思想、如同工匠赋予泥巴以形体一样，法兰西将战胜逆境，光荣地崛起，而来自阿拉斯的一位无钱无势但拥有不可摧毁意志和坚强性格的普通律师将是它的救星。

当我最后一次在德国时，听到了有关他们的新领袖——阿道尔夫·希特勒的铁一般的意志和坚强品格的描述，人们告诉我："他从不喝酒，从不吃肉，从不吸烟，从不吻女孩子，他将全部精力都投入伟大的理想中。"

"难道他真是这样吗?"有一次我故意问道。

天哪！革命决不容戏谑，朋友们立刻把我拉走，并劝我乘下班火车到荷兰，否则我肯定会吃苦头，甚至送命。

同样，一个半世纪之前，任何一句关于无敌的法国大革命的不敬的话都可能导致同样的后果，因为正直的人们从来都是极严肃地对待自我。

罗伯斯庇尔的对头米拉波①，出生贵族，喜食新鲜水果，他十分了解和熟悉他所有属下，听过罗伯斯庇尔的一次讲演后，表述了对罗伯斯庇尔的看法，他说："那个有着肮脏嘴脸、来自皮卡第小城的短见的律师，将不可估量，因为，他狂热地确信他所讲的一切。"

事实上的确如此。下面是罗伯斯庇尔最后10年的一个概述——这些客观的事例，将使您明白这样一个才能平庸的人是怎样做到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

① 奥诺雷·加布里埃尔·里凯蒂·米拉波伯爵（1749—1791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派领袖之一，演说家，曾出席三级会议，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

这个未来的独裁者起初就像大多数大革命前的法国人一样，是一个中产阶级，执着的王权主义者，直到国王和王后犯下了无数愚蠢的错误，败坏了在臣民心目中的形象为止，从此，“共和国”这个字眼作为被摆脱无法容忍现状的唯一出路，而流传开来。

即使这样，王权仍然具有绝对的威严。当饥饿的暴徒们冲入凡尔赛王宫，并派出由屠夫、女工、渔妇和刽子手组成的谈判团，去建议国王陛下“王室成员必须到巴黎和他们的臣民们一起生活”时，有三人慑于国王陛下的龙威而昏倒。

在起初的几年中，罗伯斯庇尔也加入了立宪会议，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法国必须革命，信仰必须重塑，大众的权利应当被确定，也就是说，人民应当被尊重，但是他们也认为，有谁胆敢碰法律的象征、伟大的国王一个手指头，将被严惩！

这是第一阶段，在此期间，我们的主人公常讲，在此阶段并不是以理服人，而是要用你的形象和感染力去引起人民的瞩目，而且在数千个像他一样来到凡尔赛，期待建立一种更合乎国情的制度而拯救祖国的人们中，只能有一个获得成功。

紧接着便是第二阶段，事实证明，那位大腹便便、懒惰却又好脾气的法兰西统治者，是无法做到令上下都满意的，而同时，王室成员和贵族们纷纷阴谋背叛祖国，企图让法兰西向那些扬言“不铲除世界上所有反叛、革命的隐患决不罢休”的外国屈服，慢慢地，整个欧洲都意识到，“革命”这个可怕的魔鬼最终将露面。

正如埃贡·弗里德尔恰如其分地指出的，“只有当军队不再中立，革命才成为可能，”而只有当人民（士兵们的父母姐妹兄弟）在挨饿之时，军队才不再中立。

为什么这种情形会在当时欧洲最富饶的法国发生这是个谜，即使是在今天我们掌握了所有材料之后，仍很难做出回答，但我

将进行一些大胆的猜想。

国王仅是一种象征，事实上仅存在于创造这一概念的人们的想像之中，而这一点往往是动荡的根源。因为，国王必须使每一个人都满意，400 年，500 年，甚至 600 年都要如此，只有那样才没人会寻求一种新的政体，如果某一天，某人认为他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更符合国情的政体，他可能会告诉他的邻居，也可能写成小册子，问周围的人："我的建议怎么样呢?"

如果他远远超前于时代，士兵们将拘捕他，法庭将给予严惩——甚至他可能被处死，但如果他的建议比较温和，或者说有一定的道理，将得到人们的响应，如果被王宫的密探们得知，王室将迅速扑灭这些苗头——当然这一切要建立在王室对它的"演员"们绝对的控制上的，知情者告诉我，一个笨拙的演员是分不清他和他的角色的，为了表演，他只能尽可能地贴近角色，也就是说一戴上哈姆莱特的头盔，他就成了真正的哈姆莱特，而这将导致可怕的后果。

出色的国王、君主、首领和美国总统都是优秀的演员，他们知道演戏是一回事，而现实生活是另一回事，生活和舞台有很大的差别，明白了这一点，他们会很乐意地听从舞台导演们的建议，表演将获得成功。

英国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它的领袖意识到他只是一位演员，是国宴上一种象征，表演中是不能有任何个人的看法，不能任意删减，而这无疑是英国王室在欧洲各国王室经历了毁灭性的大翻地覆之后得以生存的原因。

18 世纪的法国像 12 世纪的俄国一样，可怜的小丑们披着政府的制服招摇过市，他们误以为自己是在表演，误以为只要头戴王冠，手持法杖，身着银色坎肩，就会让贫苦百姓们卑微下跪，最终，当一些勇敢的人们——很明智很策略地——告之这一错误，并暗示他们应当仅是一种象征，而繁重的表演任务应交给总

理和国务大臣们时，他们说："不！"也决不允许这样。他们的名字醒目地出现在节目单中，他们坚持继续充当明星。

随后廊台上开始传来尖叫声，臭菜开始被扔到舞台上；当演员离开剧场回家时，王家通道外出现了令人意外的景象。

为什么这些呼声在法兰西仍不为人注意呢？不得而知。人们开始努力思考，积极地想办法，图书馆里到处都是有关"如何使令人不满的条件可以改善"之类的书籍，所有文明世界能得到的知识——包括"新"观点——笛卡尔所强调的"眼见为实"——都被收集到著名的狄德罗①、达朗贝尔②、伏尔泰、卢梭③以及18世纪上半叶其他哲学家和伪哲学家的百科全书之中。

就连牧师们也对此产生兴趣，加入了关于改革的大辩论中。

上个世纪中叶，指责王室幕僚们导致王权的衰落成为一种时尚，幕僚们被指责太专注自己的事而不理睬人们的合理建议，有的人只注意那些可能侵犯他们利益的事，但有的人很清楚地注意到墙上的口号，意识到如果人民忍耐到某个程度，终于被激怒时，一系列的恶果将随之而来——最终王权将被摧毁。所以，我认为如果大臣们此时一起来建议国王实施变革，必定会避免这种结局，即便到了最后时刻他们仍可以这样。不幸的是，国王有一位自认为是伟大无双的女明星——实际上，只是一只自负的母鸡——的妻子，当这位奥地利公主成为密谋阻挠和破坏变革的中心时，一切都晚了。

---

① 丹尼·狄德罗（1713—1784年），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文学家，主编《百科全书》，著有哲学著作《对自然的解释》等。

② 让·勒隆·达朗贝尔（1717？—1783年），法国数学家、哲学家，提出力学中的达朗贝尔原理，对编微方程作出贡献，著有《哲学原理》、《力学原理》等。

③ 让·雅克·卢梭（1712—1778年），法国思想家、文学家，其思想和著作对法国大革命和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产生巨大影响，著有《社会契约论》、《爱弥尔》和《忏悔录》等。

经历了天翻地覆后，古老的波旁大剧院荒废了，里面的一切被捣毁，成千的无辜者连同一些罪犯被践踏致死。政府的标志被暴徒们在市场上当众烧毁，观众中传来一片疯狂的欢呼声。

但是当这一切结束后，新的徽章、新的标志又被设计出来，又有新的演员来登台，新的舞台导演来指导他们，不可避免地，各个小省份的官员们纷纷跑到巴黎，推举他们的朋友担负某某职务，用他们的话说，比那些大省份的竞争者们更可信，此外，新政府还会新建剧院，展示自己的权力。

正是在这个时候，罗伯斯庇尔掌握了大权，并从此被载入史册，而与他一起演出的人大多数将被遗忘。

他开始非常仔细地实施他的计划，那时他只是制宪会议的一员，该组织在法国确立一种崭新的集权统治。罗伯斯庇尔缓慢而仔细地行动着，他已经非常突出（在处理细节方面他是一个强有力的优秀的人才），但是，为达到目的，他必须找到一个工具，帮他凌驾于他人之上，这在保守的凡尔赛是找不到的——那里仍然被宫廷忠实的守卫者所统治，因此，在凡尔赛他无法统治法国，那时的法国因政治主张的不同而四分五裂，省和省之间是仇敌，只有拥有一支坚强的、随时听令的军队，计划才能实现。

这个组织便是住在巴黎贫民窟的一无所有的人们，他们长年以恶劣的住宿、糟糕的食物度日。他们衣衫褴褛，被践踏了数百年，现在开始意识到自身的力量，这些男人、女人们期待着有人带领他们，报复数百年来所遭受的压迫和虐待。

罗伯斯庇尔早已充分意识到，如果对这些杂乱无章的人们加以正确的指引，完全可以实现革命——至少是他的那种革命。

作为精心策划的第一步，罗伯斯庇尔成为巴黎公社的一员。最初他对自己的背景严格保密，因为他的时机还未成熟，还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而且只有他这种品格的人才能如此耐心、缓慢地行事，才能知道如何等待时机，而莽夫们很可能早已冲到前

面，白白浪费宝贵的机会，甚至身陷囹圄。

出于长远考虑，他还加入了一个激进政治组织——类似于18世纪美国坦幕尼协会[①]——叫做雅各宾俱乐部，因为该组织常在一个从前属于雅各宾家的多明我会隐修院开会，雅各宾这个字眼使许多巴黎人联想到多明我会[②]。起初，这个组织很不起眼，仅由一些制宪主义中的布列塔尼人组成的，他们害怕（事实上的确如此）政府会通过让国会不停地开会、讨论，讨论、开会，直到人民厌倦了无穷的争论，那样政府便可以出面说，这样下去，什么协议都不可能达成的。然后他们会派出代言人来处理一切，最终，必然会恢复强权统治。

这些明智的布列塔尼人认识到，除非全法国的人们都被唤醒，认识到这一事实，议会才会真正有权力，而这些必须要等长期以来被剥夺发言权的法国人民彻底接受了教育后，人们才能真正对议会产生兴趣。

于是雅各宾派首先要对法国人进行政治启蒙，很快每一个城镇都成立了一个雅各宾派俱乐部，在那里具有左翼倾向的人们一周会面两三次，交谈、讨论、辩论，参加满是美味佳肴、雄辩讲演的晚宴，此时，群情激昂，只要加以煽动，对现实的沮丧、对形势不满将汹涌而出。

严格地说，尽管雅各宾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但是距真正意义上的消灭王权，代之以共和相距甚远。就连米拉波和西耶士教

① 坦幕尼协会，成立于1789年，纽约市一民主党实力派组织，由原先的慈善团体发展而成，因其在19世纪犯下种种劣迹而成为腐败政治的同义词。

② 多明我会，是由法国天主教修士圣多明我（1170—1221年）1215年在法国图卢兹创立的一个修会，又称布道兄弟会，1220年起称托钵修会，1216年获教皇批准在罗马设总会。

士[1] 之类温和派也以侧身其中为荣，因此，有人提议为加强组织的力量，应在各分散俱乐部的基础上建立固定的联络体系，以便将来认清谁是他们真正的朋友。

此时，制宪会议的其他议员也成立了很多组织，原属雅各宾派的斐扬俱乐部[2] 成员感到他们的俱乐部正朝着不能容忍的方向发展，所以他们建立了中间派组织，总部设在西多会一个旧修道院中。

还有吉伦特派，它实际由来自吉伦特区为数不多的人组成——该地区毗邻波尔多——那里是杰出的米歇尔·蒙田先生的故乡——他们预感到由于王后的欺诈和国王的软弱和短见，有必要建立共和国，但他们希望自己做博学的绅士公民——罗马人称为"优秀公民"的——他们不想重复古希腊民主的错误，因为，那种民主最终褪化为纯粹的暴民统治。

优秀的议员逐渐都加入了吉伦特派，这意味着他们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和斐扬俱乐部，而斐扬俱乐部成员到最终也都保留着绅士风度，雅各宾派则迅速滑向极端，他们是法国大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正如吉伦特派和斐扬俱乐部是"孟什维克"一样，本杰明·富兰克林可以划分为吉伦特派，而波士顿的塞缪尔·亚当斯[3] 肯定是疯狂的雅各宾派成员，他们不断地鼓吹，将努力消灭全部独裁者。

---

① 伊马纽埃尔·约瑟夫·西耶士（1748—1836年），法国大革命时期活动家、大主教士，参加起草《人权宣言》，雾月政变后为临时执政官之一，波旁王朝复辟后流亡法国，著有《什么是第三等级?》等，影响一时。

② 斐扬俱乐部，是法国大革命时期保守的政治俱乐部，以在巴黎杜伊勒里宫附近的前斐扬隐修院集会而得名，该派反对民主政治，主张君主立宪，坐在议会的右面，以示保守态度。雅各宾派得势后，1792年8月10日，它逐渐消亡。

③ 塞缪尔·亚当斯（1722—1803年），美国政治家，北美13州殖民地反英独立运动的先驱者之一，组织群众进行反印花税条例斗争，第一、二届大陆会议的代表，《独立宣言》签署人之一。

在这个法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时期中，国王和王后却在凡尔赛宫玩马球。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罗伯斯庇尔是怎样逐步成为上宰的。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必须先扮演一个角色——很简单，就是要让所有法国人随时都看得到他的形象，听得到他的演讲，要让所有人都热烈地鼓掌，狂热地追随他，为此，他努力使自己成为公民道德的典范，以驳斥那些说他缺乏道德的指责。

也许黑贝尔是对的，每位伟人或领导者在内心深处都是艺术家，罗伯斯庇尔的表演天才在舞台上发挥得淋漓尽致，随着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成为主角，大革命从此演变为一场悲剧。

当法国开展对外政策大辩论时，罗伯斯庇尔的机会来了，此时议会被解散，让位于更实际的立法会议，将由它组建新政权。吉伦特派及温和派主张对外战争，他们认为只有那样，才能使四分五裂的法国团结起来，真正成为一个同仇敌忾的团结的法国，所以，应对所有欧洲独裁者宣战，让法兰西的军队给全世界带去自由、平等、团结。

雅各宾派强烈反对这一计划，他们知道王室也希望战争，因为如果取胜，奥地利和德国军队至少会让这些老是站在王宫窗下疯狂呐喊，吵得王子们不能入睡的家伙们收敛一些。事实上玛丽·安托瓦特正在利用每一个机会怂恿她的奥地利亲戚们摧毁大革命。

在立法会议中，激进派几乎都是雅各宾派，他们喜欢坐在靠墙的高高的座位上，因此他们被称为山岳派，斐扬俱乐部逐渐从舞台上消失。整个争论是在激进派（山岳派）和坐在大厅中间座位上的温和派（平原派）之间进行的。已等待多年的罗伯斯庇尔，往日的羞涩不见了，他明白，此刻不仅巴黎人民，而且全法国的人民都在倾听，而他有很多话要讲。

那时，王室已经从凡尔赛搬到了巴黎，因为，“处于忠诚可

爱的巴黎人中间，更安全一些”（雅各宾派曾公开这样宣扬）。事实上，他们强迫国王和王后从凡尔赛回到冰冷的杜伊勒里宫，那里已七十五年没有人住过，所有的家具都被拿走了，陛下仅能勉以生活。

紧接着，陛下和王后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从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玛丽亚·安托瓦特王后有一个年轻有为、英俊的朋友，是一个忠实的瑞典人费森伯爵，美国独立战争中他曾作为罗尚博[①]的副官立下了卓著的功绩，在瑞典住了几年后作为瑞典国王的亲信回到巴黎。

应当肯定费森忠诚的动机，他对可怜的国王和王后完全受制于巴黎暴徒的生活甚至不如犯人的情形非常难过，并为他们的逃亡做了充分的准备。一天晚上，他秘密把国王一家接出王宫，上了一辆马车，飞快地驶往边境，当似乎万无一失的时候，费森下了车，让国王一家接着赶路——他本应一直护送国王一家，直到他们处于瓦雷纳镇那边的奥地利骑兵保护之下，但事实他却过早地放心地下了车。

如果上帝注定了一个人的死，是没有人能挽救他的。早在逃亡前，美丽的王后已决定，一旦到了斯特拉斯堡，她就要让她最宠爱的理发师来做头发。于是逃亡前几天她就派费加罗启程，为那一伟大的时刻做好准备。

回想起来，在西班牙维多利亚女王逃离她动荡的国家到达巴黎的那天早上，我正和法国著名的时装师杰克·沃斯聊天——他的祖父曾被第二帝国多次表彰——电话响了，接完电话，杰克绝望地对着天空，“他们没救了。”他说，“他们怎么永远都这样呢？

① 罗尚博伯爵（1725—1807年），法国陆军元帅，曾率法军支援美国独立战争，在约克敦战役中击败英军，法国大革命期间成为法国陆军元帅。

刚才在默里斯的西班牙王后，要我尽快把一件新款时装送到旅馆去，她说她将需要一些时装。上帝，昨天她才丢掉了她的国家，平安到达巴黎后第一件事便是时装，他们难道从来不记得?”

我说：“也许吧。”“不，他们永远不会记住的！”他斩钉截铁地说。

从血缘讲，玛丽是最后一个西班牙王后的姐姐，在逃亡中——也许是她最后的生机——她想到的只是要让某个著名的理发师为她做头发，那个多嘴家伙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炫耀的机会，他暗示不久某位重要人物将来临，“老天，如果你们知道他是谁，你们肯定会大吃一惊！”

他的听众们的好奇心胜过了惊讶，现在看来，流传了几个星期的王室人员要逃亡的谣言，确有其事了，雅各宾派开始到处搜寻一架拉着国王全家逃往边境的马车。

费森周密计划的另一半是被国王断送的，他食量大得惊人（却没有半点美食家的灵感），他必须在固定的钟点进餐，所以，他坚持要停车休息，因为天就要黑了，而且谁也不能保证他是否有机会再吃到美味的法国鸡腿，马车停下来了，不久全镇的人都被惊醒了，这个外来的家庭大声地寻找食物，一些聪明的人们三三两两地起来，而且很诧异，这位自称是奥地利爵士的人怎么和他们的口袋里金币上的人这么像呢？他们问这问那，还敲响了教堂钟，四邻的人们以为奥地利人来了，马上武装起来。第二天早上，国王仍在吃着他的鸡腿，人却已在押往首都的路上了，王后、王子们也一样。

经过这次风波，每一位法国人都会问，我们怎能再相信这不自重的奥地利女人和她愚蠢的丈夫呢？人们对密谋几乎得逞而感到后怕，对加佩一家（现在人们不再称他陛下，而叫他加佩公民）愤愤不平，而国王和王后的命运也就注定了。

随后法国向奥地利宣战，杜伊勒里宫被巴黎暴徒们攻破，瑞

典卫士们战斗到最后一个人，身着红色盔甲的国王被关到市中心圣殿骑士团的旧城堡，在那里度过了他的余生。暴徒们还冲入巴黎市政府，开始了铁腕统治，拉法耶特将军被宣判为法国的敌人，不得不逃亡，并向众所周知有着奥地利式愚蠢的哈布斯堡王朝投降，后者视他为罪犯，把他一连几年关进很不舒适的监狱中，而他在那里一再向美国求援，但徒劳无益。

作为最后的一根稻草，不伦瑞克公爵这位现在指挥所有反革命军队的旧式军官发表了著名的宣言，威胁要绞死所有不立刻向他投降的法国人。这难以说是使他自己讨得监禁国王的人喜欢的方式。假如此刻法国群龙无首，人们也许会在公爵阁下冗长的文字面前发抖，同时对普鲁士老兵的担心可能会使他们迅速西进，但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在这方面都犯了错误。大革命最终找到了自己的领袖，雅各宾派已将吉伦特派赶出了政府，并开始熟练地管理国家——想想看，他们大部分只是些30出头的年轻人，对政权管理并无经验可谈。

上面是有关法国大革命的相当详细的描述，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应当了解这些，我们应当熟知这些历史，因为它们曾经不止一次地发生过，而且这一次就在我们鼻子底下，尽管我们装作不知道，我知道其中的原因——怕什么！历史从不会倒退。有些人拼命想爬到最高处把握别人的命运，而最终这些“革命派”们必定要自相残杀的。

纳粹是今日之雅各宾派，每一位纳粹首领中我都可以找出一位同样的雅各宾派成员，希特勒就是罗伯斯庇尔的样板，如果他生在法国，他一定会干罗伯斯庇尔所干的一切，他也将会站在幕后，而让他人去做一些“肮脏的活儿”，那是每一场革命前不可避免的准备。

罗伯斯庇尔很明智地把他和暴力刚开始时的任何事情分开，

但在背后，他煽动并助长因国王企图逃跑而席卷法国的混乱，谣传在莱茵区的逃难的贵族中存在第五纵队[①]运动，于是人民开始搜遍每一个角落，到处逮捕间谍和叛国者。

在此同时，反偷袭、反恐怖、反暗杀的任务落在一位没有名气的年轻律师肩上，他叫乔治·雅克·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一样，他早已认识到，革命如果没有一支武装的支持，便不可能胜利。而现在这支武装正在巴黎的贫民窟随时待命，除此之处，两位领导人便毫无共同之处。丹东好色，喜好美食、美酒以及生活给予健康男子的一切。他贪得无厌，他认为最终通过自己独有的"煽动家"天赋，将可以控制法国。

丹东看不起体弱多病的罗伯斯庇尔——每天都花几个小时用纱布包扎受伤的腿，并且直到他时髦的假发做好了才来俱乐部，而且从来不酗酒，(多么可爱的字眼!)他连续数小时钻研于他滔滔不绝的演讲稿的每一页，只有一件事可以把他和异性联系起来，那就是无论去哪里，都要把自己装入自律的套子中——丹东从不自律，他唯一与美德联系的便是，常常惦记着远在香巴尼的故乡的姑姑们的健康。对丹东来说，生活便是享乐。

然而那时，他们彼此需要对方，于是他俩都小心地把刀子藏起来，预备着哪一天从背后刺入对方，罗伯斯庇尔则更仔细，只是在幕后操纵，丹东则冲在前面，通过一系列大胆而成功的冒险，阻止了失败情绪的蔓延，这些大胆的行为使得他的名字和世界上最成功的刺客并驾齐驱，除了看到被处决的受害者时，没有丝毫的高兴外，他沉迷于自我而扼杀了他人同样的权利，这是很不人道的。应该说明的是，丹东也是一位执着的爱国者——和所有优秀的法国人一样——他痛恨那些不动脑筋的人，而几乎所有

① 第五纵队，原指二战爆发前夕西班牙内战中佛朗哥部下进攻马德里时在市里作内应的人，现泛指敌方的间谍或通敌的内奸。

的法国人都拒绝用上帝赋予他们推理的能力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在丹东看来，如果任何事都被想到和做到，那么任何困难又和简单的数学题有什么区别呢？（多么精辟！）他个人对国王没有仇恨——他一直认为，这个可怜的家伙本应是一个出色的锁匠，一位模范的父亲，如今却错误地扮演了一个不相称的角色，话又说回来，这位诚实的加佩公民是否被他美丽而野心勃勃的妻子牵着鼻子走，则完全取决于他自己，丹东将告诉这个可怜虫，像这样的女人应该怎么处置。

对那些富有而又新潮的年轻贵族来讲，他们仍梦想凡尔赛被朴实的奥地利军队占领，这样他们可以获得重生，可以摆脱奴役——但现在他们却不得不离开，越快越好！

1792 年 9 月 2 日凌晨，巴黎的警钟敲响了，对首都的强盗和罪犯们来说那是一个信号，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出来了，气氛很紧张，禁止询问任何事情，五天后，谣言蜂拥而起，所有的敢死队员都回到家中，他们彻底解决了一件事情：王室的大多数成员和君主立宪制的支持者们都被消灭了，死亡的数量永远是个谜，估计在 1200 到 1500 人左右。随后，街道被冲洗，大革命继续进行，雅各宾宽松的工作服（而以前是紧身衣），肮脏的头发（除了罗伯斯庇尔，他的衣服洗净后很仔细地收起来），红色的自由军帽和滴血的军刀，令人不寒而栗。

法兰西就在他们脚下，但究竟是谁的脚下呢？立法院被消灭了，国民公会取而代之，并宣布自己是政权的代表，但在这个由有一半以上从未涉足政坛的人组成的政府中，谁是核心呢？

起初丹东控制了国民公会，他认为现在高枕无忧了，他娴熟地行使着权力。几个月前进攻法国的奥地利、普鲁士人被全面击退，随后，法国希望重划国界——比如东部的莱茵区和北方的默兹区。

9 月大屠杀后的两个星期，消灭了王权，法国成立了共和

国，基督教历法被视为无用的、过时的遗迹而抛弃，1792年9月22日成为新纪元的第一天。12月，国王被判死刑，将于1793年1月处决，这是一个半世纪以来此类事情第一次发生——受洗的国王上了断头台。欧洲为之震惊，奥地利、英国、普鲁士、荷兰、西班牙忘记了他们的利益冲突，组织联合战线，向那些衣衫褴褛、胆敢对圣路易的后代动手并残酷地把他们送上断头台的歹徒宣战。

法国再一次成为人类的敌人，教会的密使们纷纷逃往布列塔尼和旺代，在那里，一些朴实的农民仍信奉上帝以及其主人借权威之名掠夺他们的神圣权力。这些贫穷的旺代人发动叛乱，杜穆瑞兹将军被拥为首领——如果他当时勇敢地向巴黎进军，也许早已将雅各宾派赶走（因为大多数法国人对处死国王仍震惊万分），但他没有胆量那样做，反而投靠了奥地利人。恐慌再次在巴黎的大街小巷游荡，又到了消除恐怖的时候了。

1793年3月9日，革命法庭在巴黎成立，法庭不需要任何证人或律师——公正不能向怜悯低头——或者无罪、或者被处死，而通常是后者。一个月后，法兰西开始强权统治，一个由9人并随后迅速地增加到了12人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国家行政事务。

丹东、罗伯斯庇尔都在其中，从那时起，处于从属地位的趋炎附势者本末倒置地执掌了政权，巴黎统治着法国，坏蛋们控制了巴黎。他们中有不切事实的夸夸其谈者，有仅从书本中了解社会的书呆子，有拉皮条的和妓女，有王室的叛徒、被开除的教徒，有被社会抛弃却自认为是伟大的、埋没多年而不得不与裁缝们为伍的，以及所有因这个世界没有按他设想的方式运转而满怀仇恨的人们，这些肉体上、道义上、精神上的弃儿们发现他们正处于权力的中心。

“前进，祖国的孩子们！”复仇的日子终于来临！此时，罗伯

斯庇尔独自坐在房中，不让任何事打扰，他的健康再一次到了很糟糕的地步，这位来自阿拉斯的律师、伟大的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公民，他颤抖的手中掌握着法兰西的命运。

从几幅当时的画中，我看到马克西米连在人们眼中的形象，那是一张令人发怵的脸，在现在的德国有一位正成为希特勒左右手的人，纳粹秘密警察头子希姆莱，他曾是教师，也有着一张邪恶、冷酷的脸，他是罗伯斯庇尔第二，同样紧闭着的嘴，自以为是的冷笑，满不在乎的耸肩，似乎将带走一个个秘密。但他的作用是毫无疑问的，他被自私自利迷了心窍——如同所有同类的人一样，除了自己，甚至不知道上帝——当这怪物出现后，我们只能祈求一件事——另一个夏洛特·科黛出现了，用餐刀刺穿他们的心脏，就像那个外省的女孩子勇敢地刺杀马拉[1]一样。但拥有科黛的胆量和决断力的人几乎没有，也没人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所以当他们失败后，比如那个可怜的疯子行刺罗伯斯庇尔反而借此机会，宣称自己的视死如归和高尚。上帝，拯救我们吧！

下面，看看罗伯斯庇尔是怎样扫除他和最高权力之间的障碍的。1793 年 6 月 2 日，在国民公会（它仍然存在，但早已失去了所有的效率）安排了一场审判，那些战战兢兢的执法官们，被迫下令逮捕了 31 个吉伦特派人，从此这些中间派便消失了，同年 7 月夏洛特·科黛暗杀了马拉——一个杀人魔鬼，甚至为他的属下痛恨和不齿。

诚实的爱国者同密谋与外国勾结的人一样不安全，现在到了国家委员会挽起袖子，证明什么是大革命的时候了！

---

[1] 让·保罗·马拉（1743—1793 年），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导人之一，国民公会代表，创办《人民之友》报，参与领导合理推翻吉伦特派的起义，建立雅各宾专政，1793 年 7 月被夏洛特·科黛暗杀

8月，全国一片混乱，一位名叫卡诺的数学天才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组建军队，阻止法郎贬值，为商品定价，恢复秩序，重建法国。而此刻，每个省份、每个城市甚至每个镇都拥有自己独立的税收、语言、管理体系和风俗习惯，他就是要在这样一个国家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中央集权统治。

当不知疲倦的卡诺在寻找救国大计之时，罗伯斯庇尔终于可以专心给大革命树立一个新的思想，这个理想将证明大革命是在本世纪最伟大的实践，它将使基督教和犹太教徒们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首先，必须教训那些扛着国王的画像反抗法军的旺代省农民，10月到12月，农民们几乎全军覆没，随后，在南特设立了革命法庭，判处一万五千人死刑。这一数目过大了，共和国没有那么多子弹和绞架来把他们全部杀死。所以犯人们被装到船上，推入河中淹死，他们的家人必须跑到很远的下游才能把尸体捞起来安葬，而共和国是没有精力去顾及这些的。

10月，王后玛丽·安托瓦特接受审判。这是历史上最不光彩的审判，其中经过严肃的努力迫使她的小儿子指控她与自己孩子乱伦，最后把她判处死刑。行刑的细节以及她在这世上最后的几个小时中难忘的恐怖，无疑是都普雷家饭桌上最乐意的话题，马克西米连曾在他们家所在的镇上住过，并和他们的大女儿爱伦诺瑞结成事实婚姻，她像《费德利奥》中贝多芬的女主人公一样崇拜她的丈夫。

不管怎样，事情发生了。王后死后不到两年，她的小儿子也失踪了——可能是在和醉熏熏的修鞋匠出海后发生的，因疏忽而致。

1793年10月的最后一天，雅各宾派的死对头，21名吉伦特分子被砍头，处决的人数以可怕的速度递增。

罗伯斯庇尔是一个很仔细的人，一生中从不听天由命。他的

每一件事都非常有条理地在一个本子上记下来，本子上全都是那些被怀疑“有反动倾向”的密密麻麻的名字——没有必要去寻找反叛的事实，被怀疑本身就足可以把一个人列上黑名单，送上断头台。在法国，砍头已经不是什么令人惊奇的事，而且人们也不再被砍头，而是被一架由古鲁蒂恩大夫发明的新机器所粉碎。这个令人恐怖的、来自波尔多的耶稣会学院的老师希望囚徒们能够免除他们的头被刽子手放在槛上的最后一刻恐怖和痛苦，他在中世纪的一些笨拙的、奇形怪状砍头机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现在新机器可以用三种方法来操作。从犯人被押到机器前到处死，不到一分钟。

顺便说一下，在当时，这项发明引发了严重的就业问题，在法国，刽子手一直被视为一种很光荣的职业，可以代代相传，常常有不少古老的刽子手家族夸口三个多世纪以来他们家族从没有任何差错和抱怨。而现在他们发现，如同数年前蒸汽机威胁手工织布机旁的织布工们一样，他们陷入了困境，使用新机器不再需要数年的学习，不再需要掌握控制斧头、系死结的技巧，任何傻子都可以操作。数百年积累的经验没用了，很多很好的配件——20英尺长的绳子和锋利的斧头没用了。逆来顺受的诚实的法国人很欢迎这一发明，因为可以很轻松地把它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而当地的经济却因此遭受损失，因为现在一个人可以干以前一打人的活儿。

信不信由你，这架仁慈的机器被推荐到很多城镇之时，甚至引起了骚乱，里昂471号大街那些以杰克·凯奇为首的衣衫褴褛的人们，高举着“政府对刽子手不公平”的标语，在断头台前游行示威。

确实，这都是往事，因为现在美德国家终于建立了，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将成为它的先知和高级祭司。同时遍布法国的

革命法庭举行了神圣的庆典，他们发誓要让那些顽固地维护君主立宪制和国家中“明智部分”至高权威的梦想家们付出代价。

一旦新的理想之国的基础打好，主所选定的人被抛到一边之后，便轮到主本人了。他也被禁止，同时遭禁的还有他的教会，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型的、奇怪的“理性崇拜”。

“理性崇拜”并不真正是笛卡尔的原来的意义，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些著名的革命首领的特殊爱好，这一新教义的先知之一便是自称安纳卡思·克洛斯[①] 的假德国子爵（他的教名实际上是让·巴蒂斯特），他宣称自己是全人类的宣道人——当那些别有企图的人赶赴巴黎，期望能赶上理性上帝降临之时，克洛斯早已在巴黎——即使展示在人们面前的新上帝是一个女孩子时，他的热情也毫不减退（顺便说一句，那个扮演“理性女神”角色的可怜的孩子，第一次接受人们膜拜时便几乎送了命。因为那天她在祭坛上跳舞时狂风大作，举行仪式的巴黎圣母院就像坟墓一样冷，她穿着薄薄的衣服，不得不站了很长时间，最后得了肺炎，差一点进了坟墓）。

这场闹剧却让所有坚信自己将统治世界的白痴们愉悦不已，他们兴高采烈地采取一系列非常粗野的行动，搅得鸡犬不宁，令人奇怪的是托马斯·潘恩[②] 那样明智的人，竟对此看得很重，著名的德国戏剧家席勒博士[③]，甚至接受了这个疯狂国家授予他的

---

① 安纳卡思·克洛斯（1755—1794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激进民主派和雅各宾派俱乐部成员，曾被选入国民公会，后罗伯斯庇尔指控他为间谍，把他送上断头台。称号克洛斯子爵。

② 托马斯·潘恩（1737—1809年），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政治活动家，由英国迁居到美国，发表名作《常识》，号召北美殖民地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参加北美独立战争，支持法国大革命，鼓吹资产阶级民主，著有《人的权利》、《理性的时代》等。

③ 约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冯·席勒（1759—1805年），德国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文艺理论家，著有《华伦斯坦》、《阴谋与爱情》等。

"荣誉公民"称号。

但我们应记住，所有这些荒唐的行为与当时的"把法国人同他们过去分开"的政策是相符的，因而就连丹东这样坚定而理智的领导人（疯狂时代一位冷静的人），在那些疯狂的人们尽力忘掉和以往加佩公民统治有关的一切的时候，也开始思考别的问题。

这种令人可笑的漠然罗伯斯庇尔并不具备——卡莱尔称他是"清廉的绿海"，因为罗伯斯庇尔深受慢性便秘之苦，病痛令他脸色像纸一样苍白，尽管如我们迄今所知，脸色永远不会由白变绿。

尽管他对人类所遭受的灾难漠不关心，但内心中罗伯斯庇尔仍是一个虔诚的人，即使是处于病痛的煎熬中，他仍无法理解为什么克洛斯和他的弟子们能如此令丹东他们开心，他非常厌恶这种对理想的篡改，并决定结束一切，形成真正的美德。所以虽然表面上他仍然诚挚地对待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同事，暗中却加快了在他的小册子上的记录。

此时，罗伯斯庇尔已经体会到出其不意的好处，所以他耐心地布下陷阱，直到第二年，1794年春天，他才收网。

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委员会中的激进分子们，克洛斯和他的朋友们，甚至包括丹东就已被关人大牢，接着被匆匆送上断头台，大部分人临死还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丹东是个例外，他是一个天才的演员，他把对他的审判和处决变成一场壮观、宏伟的表演，即使罗伯斯庇尔必定也感到了一种压力，但这并没有持续多久。丹东被控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很快和他的同事、朋友、伙伴们一起，被送上天堂。

此外还有很多事要做，不能因一个人的感情冲动而浪费时间，法国人必须回到公正上，不久，一项宣布"国家视人类为至高无上"的提案在议会这个曾令人敬畏的机构上，提出并通过，

上帝重新回到了人间。

为了让全体人民都知晓这一喜讯，5月8日，以“至高无上的人类”的名义举行了盛大宴会，这一天是马克西米连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同其他在许许多多方面类似他的历史名人（如阿道尔夫·希特勒）一样，马克西米连喜欢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以展示他艺术家的天赋。我们收集到许多关于那一伟大的史剧的报道，看得出这些都不是罗伯斯庇尔的朋友们写的，而是那些希望他早死的人们写的，因为只有那样他们才可能活得更长。

在所有的关于那一场戏剧的报道中，有一个完全相同的令人吃惊的事实，那就是如此理智的人竟会自欺欺人——罗伯斯庇尔自我感觉是最优秀的。他很仔细地设计了这场戏剧的每一细节，因为它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戏剧”——大型的露天演出，穿着洁白的长裙，秀发上满是美丽的鲜花的圣洁的少女们唱着赞美诗。所有议会成员被要求穿着正式服装参加，最后，当人们精疲力尽地准备回家时，伟大的马克西米连发表了洋洋长论，并且为代表正义战胜邪恶的巨大的雕像揭幕。

演出并不成功，出了一些小漏洞，在罗伯斯庇尔高举着火炬冲上前时，代表邪恶的外壳应当化为碎片，露出代表正义的内核，但是那天，外壳并没有化成碎片，而关键时刻火炬也没有燃着，使得“正义”被浓烟熏得黑炭一般，整个表演最终堕落为一场闹剧，人们只是出于对他口袋里小册子的害怕才没有哄堂大笑。

即便是盲目自信的罗伯斯庇尔也看出来了，这使他更坚信法国人民比想像的还要堕落，必须采取更激烈的方法让他们回归到理性中来。

达到这一恐怖目标的好办法便是直接把人们关进牢狱，不给他们一个辩白的机会，这也节省时间，再用“传输带”的方法把他们送上断头台——一天10个，快一些，可以达到一天20个，

30、40、50、60个。好的话，一个月可以有四五百人。

人们都知道，即使是"传输带"也不能这样长时间正确地工作呀！一次，罗伯斯庇尔处死了一个可怜而迟钝的女孩，她被发现手持餐刀在罗家前街道上徘徊；又有一次，一个扮演小丑的男子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那里殷勤地询问涉嫌"圣母"事件处理到了什么程度。

当然，这个问题很机密，是禁止询问的。"圣母"事件是关于一个疯疯颠颠的老厨娘的故事，她住在一个阁楼上，一群虔诚的崇拜者们相信她有神圣的使命，称她为圣母，祈祷第二个人子的降生。通常，不管警方如何杜撰此事以及"圣母"的关系，人们都认为罗伯斯庇尔最终肯定会为这位老太婆以及她的同伙们签发"确认卡"，这种卡是用来确认一个人是否是爱国者。在白色恐怖的法国，人们每天都需要被确认，就像行车执照一样。但罗伯斯庇尔关心的是这些无关的事件是怎样到了令人讨厌的加斯科涅酒鬼们的耳朵里，而他们以此在议会中质问他有关圣母教的事。他知道这事肯定是想让他丢脸，然而谁是幕后操纵者呢？

事情迅速明朗化了，罗伯斯庇尔首先决定了"圣母"的命运，她和她的信徒，包括厨房女佣、洗碗女工、可怜的因目睹了绞刑而丧失推理能力的退休牧师等等，被迅速判决和处死，若是在几个月前，这种大规模的屠杀肯定会引发谣言，但这次一点传闻都没有。

因为现在，不管这位圣洁之人走到哪里，他都会听到半压制的低语和幸福的傻笑，"瞧，来的那个便是'圣母'的朋友！"

在这种情形下，最好还是消失上几个星期。巴黎人是健忘的，当回来之后，所有一切将被完全遗忘。

另一个好主意是每天和迷人的埃莱奥诺尔·迪普莱散散步，以平息那些说他对异性的态度像是同性恋的谣言，另外，度假回来，一定要有绅士风度，即使你拒绝一位为挽救丈夫生命而泪流

满面的女士之时，也要文雅地回绝她。因为，真正的贵族已不再存在，他们优雅的风度也随之消失，这便是为什么人们喜欢同那些让他们想起国王在位时文雅礼仪的人交往的缘故，因为那时国王甚至向每位在王宫走廊上遇到的女仆们行礼。

另外，要在那个小本子上好好记录，还要注意仪表，近年来，人们都穿着旧衣服，不修理头发和指甲，因为他们不想让邻居们说他们“每天刷两次牙，剪两次指甲，假贵族!”经过了这么多年松松垮垮的日子，人们走上了极端，似乎开始喜欢这样了。

为了巩固民主制度，使多年来辛勤奋斗的成果不至于付之东流，议会必须首先被禁止，国家安全委员会应拥有更大的权力。这当然必须做得机巧，不能有失败；决不能再让强盗冲入议会大厦，威胁要杀死所有代表们的事情发生。你暗示“如果这些实现，而且我被通知到了，某某人根据新法律的某某条款，我宣布……”，你的声音拉长了，然后你的右手伸入上衣口袋——所有人都知道，你拿出带有一些“名字”的小册子。“如果你不能对敌人动手，可以通过他所爱的女人，先把她拘留，如果……”不要说完这句话，下面你的听众将开始琢磨你将要说的，直到紧张使他们神经崩溃，开始承认任何蠢事，就像盲人赤手空拳对付一群狼一样地开始坦白。这是个伟大的行动计划，是吧？最精彩的在于它是正确、易行的。

国民公会中你的一位同事，你因他“良好”的表现而把他的情妇关人监狱——他恐惧绝望，以致叫嚷着要杀死你，早上起来，在他申辩前，庄严地宣布他“违法”。接着用你近视的目光扫着小本子，用一种不祥的口气暗示，当你心情好的时候将把另一些人送上审判台——你经常这样做，效果十分好，而且从未失误过。但这次似乎不对劲，突然人们开始骚乱，各种样式的刀子一起挥舞着，人们叫喊着，“打倒暴君”，而你只能无力地扬着那

小本子，毫无办法。

接着——没人看清一切是怎样发生的——突然你自己被宣布为“非法”，国会的士兵已将大厅里的乌合之众解除了武装，你和你忠诚的兄弟奥古斯特及所有的公众安全委员会的亲信们都成为囚徒，在议会那些人的怜悯之下——那些人的情妇在牢狱之中给他们递条子，称他们为“懦夫”——至少有时不是懦夫，但一想到胆大妄为的后果以及那个伟大的名字的恐怖，勇气一下子便消失了。

贫民窟中的外地人听说他们的英雄、圣人遭受的一切后，敲响了警钟，抓起了长矛和斧头，摧毁了关押他们的敬爱的首领的楼房，把他解救出来，护送回市政厅。

现在，国民公会的阴谋家们终于意识到一切都到了紧要关头，要么罗伯斯庇尔活，要么他们活。他们马上召集部队。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命令将军们统率议会的所有部队前来增援。勇敢的将军抽出佩剑，召集下属。而此刻，那位阴谋家，现在被称为“泛伯格斯”国王（他把路易国王送上了断头台，甚至没让那个可怜的国王留下遗言），正在一家酒楼上咧着嘴睡觉呢！

在那一可怕的热月9日（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来说是7月27日）之夜之前或之后，天开始下雨，而且是倾盆大雨，而往年在这个时候都不会下雨的，法国人一向不喜欢淋雨，而委员会的士兵们是法国人，所以他们决定留在家中等第二天早上再救他们敬爱的领导人，但是第二天早上，国民卫队的士兵已提前在那里了，他们摧毁了市政厅，俘虏了一切，罗伯斯庇尔的一些追随者企图从窗户跳下去逃生，结果摔断了脖子，还有一个坐在轮椅中的瘸子，给刽子手们出了个难题，怎么把这个驼背的脖子放在铡刀下呢？很简单，用铡刀把他的肩也砍下来就行了。而那个优秀的人——他从来没有宣判过任何人的死刑，他只是想根据自己的设想在重塑着法国人——他躺在一张桌子上，头搭在一个军火箱

上，下巴已被一个议会士兵在近处开枪击碎了。

他震惊于那一刻的鲜血和四处乱飞的牙齿，在那里一直呆到第二天早上，他懊悔没能完成那个拘捕所有敌人的决定，那个文件仍然放在角落的桌子上，它要求所有的巴黎人“鼓起勇气，振作精神”，要求所有“爱国者们，为自由而迅速行动起来，等待命令”，签名：罗伯……正在此时，枪响了，这个签名永远不会完成了，他头底下那叠带血的纸是那可怕的夜晚唯一无声的见证人。

我们希望忘却这一悲剧的后半部分，一个受到身体极度折磨的人，被恨他入骨的人们围着，被殴打，他们以他的痛苦为乐，“啊，好极了！这可不是你送我父母上断头台的时候了！”“你不觉得应该像你对待我妻子那样砍掉你的头吗？”还有一些卫兵们的戏谑，这个趴在桌前的人在追求个人理想的同时，摧毁了他们的合法存在。

但是，罗伯斯庇尔已记不得更多了，也许他还模糊地看到在法庭上一些熟悉的脸：“你是罗伯斯庇尔吗？”“是。”

“拉出去，处死！”

接着，又是模糊一片，每个窗子满是男人、女人和小孩，他们在疯狂地喊啊，唱啊，他们知道从此他们和所有关在数百座监狱中的亲朋好友一样安全了，法国得救了，那个魔鬼终于要走了，这个躺在一个木架子上的魔鬼，据说他还企图自杀，看一看，他是不是还能听到我们？

“罗伯斯庇尔——魔鬼——王八蛋——我们永远诅咒你！看，他的眼珠还在动呢！他可能还活着——再来，起来，罗伯斯庇尔——你这个——”我们这个星球所有最粗野的话又响起来。

夜幕降临了，一双粗鲁的手把你从那辆熟悉的小车上拖起来，这辆车曾把你的老朋友们送上了天堂，这是你最后一次坐车，很多面孔在张大嘴盯着你，喊叫着你分辨不出的话，但他们

的意思你懂，又有一双手抓住你的肩头，把你拖到了滴血的支架下，接着一声非人类能忍受的痛苦号叫，从你的嘴里发出——或者是它所留下的，刽子手已经把你的脖子切开了，你再也看不到那些面孔，你只听到当刽子手开动机器时，那残忍的快意的吼声。

人群骚动了，“他死了！”终于你死了，眼睛还在无意识地转动着，头掉进了下面的袋子里。

“下一个！”

在那里已经有很多伙伴，你的头不再孤单。

“下一个！”还会有更多的头。

“下一个！”

当第 19 个人头掉进袋子里时，有些满了，“拿走！”老桑松先生对小桑松先生说，“再给我一个空袋子，明天早上会有更多的。”共和国忠实的奴仆说得很对，第二天有 50 多个，后天 30 个，直到最后一个和美德之人有关系的人被处死为止。

然后，法兰西坐下来，松了口气，“哦——”然后像其他人一样去野营一番，森林像往常一样可爱，小孩和女人们又可微笑了。草像以往一样绿，美味烤鸡也一样美味可口，酒的味道比以前还要好。上帝又重新回到天堂。罗伯斯庇尔躺在一张铺满石灰的床上，他的头被仔细地放在两腿之间——这是公众安全委员会规定的：“所有反抗国家的罪犯的头必须放在两腿之间，直到埋葬。”

［罗伯斯庇尔（1758 年 5 月 6 日—1794 年 7 月 28 日），法国革命家，在法国大革命中，特别是在 1793—1794 年雅各宾派共和国时期起过重要作用。他是一位富有责任感和献身精神的爱国者，至今仍具有很大影响。——译者附注］

军事奇才、政坛枭雄——

拿破仑一世

Napoleon I

(1769 – 1821 年)

对尊敬的拿破仑皇帝陛下的介绍应当简短。他一直坚持呈送给他的报告必须简明扼要。这很自然，因为他整天都在收到报告——来自马德里、罗马、阿姆斯特丹、汉堡、华沙、柏林以及世界各个角落的报告，在他以几百万美元的价格将他在美国的财产卖给我们以前甚至包括来自那个新世界的报告。但在 1815 年以前他几乎看不到任何来自伦敦的报告，那一年以后情况才发生了变化。"贝勒沃芬"指挥官在 1815 年接到了一个简短的命令，要他将波拿巴将军转移到英舰"诺森伯兰"号上并带他到圣赫勒拿岛进行监管。拿破仑一定知道那个岛屿，在保存下来的他的一个笔记本中（我想是在热那亚），他曾这样写道："圣赫勒拿是大西洋南部中的一个荒凉的小岛。"他在那里的漫长的 6 年时光中仔细地体会到了这是多么的真实——在他度过了比其他任何人更活跃、更荣耀的 26 年后，这 6 年无异于被活埋。我不喜欢他，但我承认这是一种相当严酷的惩罚。从另一方面来讲，假如我是当时的英国政府，我又能做些别的什么呢？对于这样一位似火山一般，能量比上亿名普通人的能量还要大、比拦路抢劫的强盗顾虑

拿破仑像。大卫作。卢宫藏

还要少一点的人，这样一位比有记载的任何其他人对其同类都产生了更大影响、比几十个普通的政客在更短的时间里做出了更多的事的人，一位个人主义如此膨胀以至于其雄心和自负需要整个星球为其充当陪衬的人，要剥夺这样一个人的世界，任何政府还能做些什么呢？

但我必须简明扼要，首先必须准确，这样才是真正的拿破仑风格。很好，我现在开始了！

拿破仑·波拿巴生于1769年，恰好是在他的家乡科西嘉并人法国版图一年以后。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影响到他的整个青年时代。一直到他20岁出头，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法国人，而是一个狂热的科西嘉爱国主义者，始终梦想着建立自由、独立、可能（谁又能说得上呢?）有自己的国王——拿破仑一世陛下——的科西嘉国。

他这些爱国主义感情是从他的父母——多半从他的母亲那里继承的。因为他的父亲卡洛·波拿巴只是一个老意大利家族中没多大能耐的子孙，这个家族二个世纪以前从大陆移民到这个当时属于热那亚共和国的荒凉、落后的小岛，一直为他们的托斯卡纳贵族世家感到自豪。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生活在首都阿雅克肖。他们的光景从来不是太好，不过他们都没有完全脱离他们自己的阶层。卡洛·波拿巴是一名律师，拥有一小块地产，是一位在当地很重要的爱国主义者。

他的母亲却完全不同！她是罗莫里诺族人，她的第一个名字是利蒂希亚。我们将在有关她大名鼎鼎的儿子的每一页历史上读到她的名字——外面世界中的影子人物，因为这位母亲大人，一位有着虔诚宗教信仰的旧式意大利妇女，更喜欢呆在幕后。但对她的小拿破仑来说，一直到死她都是他的力量支柱。因为她是世界上他唯一害怕的人。她言辞犀利，在每取得一次新的胜利时，他总是听见她那些残酷的话在重复着，也促使他成为另一个国家

的主人：Pourvou que ca doure（只要坚持下去）！

利蒂希亚·罗莫里诺一直没学会正确地讲法语，她一直到死都没摆脱掉她的意大利口音。但在这一点上她与国王本人并没多大区别，他写下的法语永远带有严重的语法错误，这一点成了拿破仑家的特征。拿破仑的侄子——拿破仑第三，一生讲话都带着他在海尔维第联邦流亡时染上的口音。

科西嘉人与一直对自己究竟想成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而犹豫不决的阿尔萨斯人很相像。当他们是热那亚人时，他们想当法国人；而当他们成了法国人时，他们又想当热那亚人。为解决这一问题，他们中的一个人，一位帕斯奎尔·保利发起了一场“科西嘉人的科西嘉”的运动，拿破仑正是诞生在这场叛乱中。当时他的母亲腹中怀着他（那个时代比我们现在的用词要含蓄得多），仍陪伴她的丈夫在荒原上作战。革命最终失败了。保利被打败后于1769年5月逃到了英格兰。

同年8月，拿破仑诞生了。这时候他的家人已返回了阿雅克肖，并尽最大努力重操旧业。卡洛·波拿巴思考着他的将来。既然现在为科西嘉争取自由的事业永远地失败了，再坚持反抗恐怕没有多大意义了，不如与新主人站在一边。他有一大群孩子，儿子们自然可以走自己的路，可是他得养活他的女儿们。所以他努力使自己对法国总督有用。1779年，总督觉得有必要派一个信得过的使节去凡尔赛做家乡政府的参赞，卡洛·波拿巴被选为担任这一使命的人。他请假去接他的二儿子拿破仑——当时10岁并且是一个危险的反叛者，一个彻头彻尾的科西嘉爱国者。

这是作为一个法国人的拿破仑的事业的开始。

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吸引人的孩子，他的脸色苍白如纸，身体瘦得像根竹竿，并且极为笨拙。他穿着不合体的衣服，所说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显示着他是个乡下人。但他有一双让人难忘的眼睛。他常常会大发雷霆，有时其愤怒的程度让人怀疑他是否得了

癫痫病。但事实不是这样的。俾斯麦[1] 在遭受挫折的时候也每每控制不住地痛苦失声，却没有人指责他患有癫痫病，恺撒、圣徒保罗、穆罕默德似乎都有这毛病。

在以后的时间里，无论是做学生还是作为一名年轻军官，他都没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除了他对与他本人和家庭有关的一切事情抱有的那种可怕的严肃态度。在拿破仑 16 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卡洛去世了，于是拿破仑成了一家之长。他的哥哥约瑟夫没有多大出息，所以由小拿破仑挑起了照顾母亲、供养姐妹的重担。

他在这方面显示出了他是一个完美的意大利人。他照顾所有的亲戚，并且只要他还有恩惠可施便慷慨地给予他们。他们以通常的方式回报了他。他们从未感到过满足，总是在叫嚷着希望得到再多一点。当他时运不济的时候，他们就都突然忙于自己的事情去了，只有老利蒂希亚除外，她依旧坚信他，即使在事实证明她是正确的——这并不会持续多久——后也一如既往。

拿破仑·波拿巴在布里埃纳军事院校学到了他未来从事行业的基本知识之后，又在巴黎的军事学院进行了一年的研究生学习。因此他受到了老法兰西王国所能给予他作为未来军官的最好训练。1785 年他成为一名中尉——如果这样翻译 souslieutenant 这一法国军衔正确的话。

之后法国大革命爆发了，拿破仑也找到了他的第二位父亲，因为正是法国革命造就了这位法国国王。

前进，祖国的儿女们！法国人民开始前进了，波拿巴上尉也

[1] 奥托·爱德华·利奥波德·冯·俾斯麦（1815—1898 年），普鲁士王国首相（1862—1890 年在位），德意志帝国宰相（1871—1890 年在位），通过王朝战争打败法国、奥地利，统一德意志，手段残酷，有“铁血宰相”之称。

行动起来了。他开始考虑放弃他的科西嘉帝国梦想和改变他名字的意大利语拼法。简而言之，拿破仑·波拿巴上尉准备开始他的事业了。而世界正在提供给他一个充分发挥他无限能力的广阔舞台。

如果我再这样枯燥地赘述细节，恐怕还得再写上600页来描述他的冒险经历，但我允诺要简明扼要地介绍。

因此，我们从1785年拿破仑第一次得到任命开始，好国王路易在位已有11年，他与可爱的奥地利的玛丽·安托瓦特结婚也已有15载。这位最初受到她的子民崇拜的美丽王后所做的每件事却都在毁掉她自己的名望。她并不邪恶，即使在一个近150年中“道德”一词已经消失的朝廷上也谈不上她有什么不道德。我们只能说她不“理解”她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她总是不合时宜地惹人注意。她认为自己离普通的人性如此遥远，以致她不在意人们说些什么。但正如她很快发现的那样，她在这一点上大错特错了。

地球的伟大之处在于它像高高放置在教堂屋顶之下的小小蜡烛，是高度让它们放射出似乎比实际上更多的光亮。它们高高在上，而且它们如此引人注意——时时如此，几乎让人觉得不合适。一旦它们在风中闪烁，所有的人都会说：“看，我们的小蜡烛有些不大对头了！”

急需修缮的古老法兰西王国让所有的蜡烛在其古老的宫殿围墙内燃烧。蜡烛泪滴满了至圣之所，每一个人都觉得不舒服。事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如果殿堂着火，定会烧成一片废墟。法兰西的命运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国王路易十六是个好人，他的主要缺点在于他脾气太温和，对每一个人都太好了。他美丽的王后玛丽·安托瓦特是奥地利人，

哈布斯堡家族成员。她成长的环境远离普通的公众人性，她不理解她所生活的世界。因此她总是受到各种聪明的无赖的欺骗。几个臭名昭著的厨师刚刚利用她的名义从里昂红衣主教那里骗取了价值几百万法郎的钻石。他们用她的名义操纵着红衣主教，使他相信王后会接受他为情人。如今他们安全逃到伦敦，正努力处理他们的赃物。当这一阴谋被发现时，王后被明确认定与此毫无干系，根本不知道所发生的一切。但市井的议论使她高高燃烧在凡尔赛宫的小蜡烛摇曳不定、劈啪作响、几近熄灭。法国的王室已经受不起这样的事了。国家破产了，其实国家已破产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了，人们正在挨饿，军队开始动荡不安。一位又一位金融奇才被推上前台一试运气，看能否从空洞洞的国库里变出上亿的钱财。当他们没能马上成功时，王后便轻蔑地噘起她可爱的小嘴。作为一名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成员，她可从来不用关心像钱和信用这样愚蠢的细节问题，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得有钱能随时供给她，信用对她应是无限的。所以她频繁更换着那些很明显并不知道如何使用点金石的最新奇才，或者根本不请任何人，就让事件按自己的轨道运行罢了。

但那是在 1785 年，法国人仍然对上天选定的王权极为忠实。他们必须等到满四年后才能召集人们的代表（以最谦卑的方式）向他们的主人建议怎样将国家从财政、政治灾难中解救出来。在这四年时间里，波拿巴上尉从一个驻地转移到另一个驻地，在他的老家度假，帮助料理家务事，并且险些又一次涉足科西嘉政治。但因最终想到更好的前途，便又返回了他的团部在欧克索讷和瓦朗斯的驻地。他还有一些文学方面的计划，并曾在一次资金紧张的时候，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贩卖过书籍。后来他又回到科西嘉，解放者帕斯奎尔·保利又一次出现，这一次有英国战舰和英国资金的大力支持。

进行一次明确选择的时刻终于来临了。一方面，法国正以全

新的概念朝着当代伟大的哲学家们在书中解释的那种新秩序大步前进；另一方面，一场由相信政府由少数人领导，谴责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教义为魔鬼发明的英格兰封建宗权支持的、代表着反叛的准独立运动正在掀起。

波拿巴上尉仍然热爱他的家乡，同时也成了一名法国良民。如果保利追随这样一种政策，他很难过，但这永远不会成为他的选择。那么就只剩一种选择了——永远地离开科西嘉，他和他的家人——他的母亲、兄弟、姐妹、费舍叔叔都一起离开。

朱塞佩·费舍叔叔并不是他真正的叔叔。他父亲的第二位妻子是拿破仑自己母亲的寡母，这是他的来历——这种关系你自己可以弄明白。但按照这些半野蛮状态的科西嘉人的部落本能，这种关系足以使朱塞佩成为波拿巴家族的一名成员。在全家人乘船前往土伦时，约瑟夫叔叔也离开他的主教宅邸加入他们当中。他将出任里昂的大主教，他还婉言谢绝了提供给他的巴黎大主教职位，最终则被提升为枢机主教。

当然，一切实物都必须留下来，所以当全家人最终踏上法国的土壤时，除了孝顺的二儿子拿破仑挣得的一点军饷和那些漂亮的姐妹靠她们姣好的容貌攀上富有的丈夫（但这只是猜想）之外，没有任何其它收入来源。

如今法国已全面处于恐怖时期。波拿巴上尉（波拿巴现在在寻求出路了，几位无心的记者的这种用词很快引起了不满）并不积极参与政治，但人人都知道他是雅各宾党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一个赤色分子。他甚至写过一份传单，为激进共和派观点辩护。罗伯斯庇尔的哥哥作为革命专政的一位委员访问军队时曾遇见到他，很欣赏他的道德风范。

当时，土伦城对共和国的安全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因为土伦位于海岸，而海岸属于英国人，只要他们掌握着通向土伦港的通道，巴黎就面临着从南部被突袭的可能。军方一致认为应当由炮

兵来完成这一工作，因为由步兵（更不用说骑兵了）沿着陡峭的岩石来包围土伦是不可能的。波拿巴上尉很用心地暗示说他认为他可以做这项工作，说他有个主意，如果被允许他愿意试一试。

他是个面色苍白、祖先不甚明了的年轻科西嘉人，据说性格有点古怪。不过这是个怪人的黄金时代。越快活的人越疯狂，自从所谓的知识分子将这个世界搞得一团糟以后，就一直让其他人在做尝试——屠夫升为了将军，理发师成了上校，仆从当上了外交部长或特命大使、全权公使，前女主人的婢女如今支配了巴黎的沙龙聚会。就让那位科西嘉小瘦子试试也无妨。他不会比现在当指挥官的前艺术家表现更糟。如果他确实做到了他所说的一切，我们就晋升他为上校或将军。如果他失败了，就把他送上军事法庭杀头。

这位科西嘉小瘦子进行了尝试并获得了成功，土伦又回到了法国人手中。英国人的船开走了，那些无法在船上找到一席之地的市民被枪决了。拿破仑没有被砍头，他升为陆军准将，而就在这时，又一次几乎轻取其性命的事故发生了。在巴黎，恐怖时期已进入尾声。罗伯斯庇尔被斩首，于是人们开始问问题了。罗伯斯庇尔不是很偏爱那位据说攻取了土伦的年轻陆军军官吗？拿破仑给罗伯斯庇尔的信很快从他们的信件中找到，这位新上任的陆军准将被监禁起来，等待审讯。在审讯进行之前，为使军队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卡诺觉得迫切需要有能力的军官，因此坚持要求释放拿破仑，但其他人宣称作为那位暴君的前密友，这样让他逃脱太便宜他了。拿破仑于是被免职释放了。

之后拿破仑在痛苦和贫穷中度过了一年。他被迫当掉了手表，卖掉了他的书籍。摄政期间的咖啡馆里再也见不到他每天下棋的身影，他已付不起一杯咖啡的钱了。他开始严肃地考虑服务于某外国政权。据说土耳其皇帝正在重建军队，为什么不去土耳其试试，看看在那儿能干些什么，现在既然在巴黎落到了身无分

文，而又必须维持饥肠辘辘的兄弟姐妹填饱肚子的境地，去任何地方都比呆在巴黎要强。

政治呢？如果你事先知道谁会最终掌权，那么政治就很好驾驭，否则，政治太危险。所以只有耐心等待了。命星上载明着这样的预言：这位特别的青年将获得超出他最大胆想像的成功，命星是不会搞错的。这一点很快就得到了证明：一位由国民公会的首脑人物——公民巴拉斯派来的信使给他带来了一张条子。

公民巴拉斯的真名叫保罗·弗朗索瓦·尼古拉斯·德·巴拉斯伯爵。在辨清了风向后，他几乎从一开始就加入革命派，通过蓄意出卖每一个人，设法保住了自己的性命。没有人喜欢他，没有人信任他，但至少他继承了一种发布命令的习惯。他现在建议由波拿巴指挥忠于国民公会的军队。没有比这更适合波拿巴将军的了。他马上接受了，因为他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不愿意看到巴黎被一群乌合之众控制，不论他来自左翼还是右翼。

1795 年 10 月 5 日——新历葡月 13 日——这群暴徒要看一看究竟谁是真正的主人，谁将统治整个首都和国家。国民公会禁止公开示威游行。一大早示威人群就开始向国民公会进军了，他们来到圣罗歇教堂前时突然发现几台大炮正对着他们。那位腊黄面孔的指挥者（是意大利的疟疾使他变黄的）让他们撤回去，否则他就开火。这些人以前也听说过这种事，但最后什么也没发生。于是他们大声嘲笑这位黄脸年轻人，一边嚷着请他尽管开他的玩具炮，一边继续前行。他的确开炮了，许多人丧了命，更多的人受了伤，其余的人没命似地逃之夭夭。当晚，这场法国革命便结束了。

1795 年至 1799 年，法兰西处在督政府的统治下。在这四年中，共和国的平民军队打败、摧毁、兼并了所有旧王朝的附属军队。奥地利受害最严重，因为它不得不与这位在意大利演习起来如同在自家花园玩槌球游戏的波拿巴将军作战。当炮火结束时，

奥地利已失去了比利时和意大利的大片领土。莱茵河西岸也割让给了法国。许多新成立的共和政体开始了鼓舞人心、然而非常困难的自治试验。

一切进展顺利。在外面的世界看来，法国在除了国内事务以外的每一前沿阵地都取得了胜利。一个民主政权，从它取得胜利的那一刻起就冒着自我毁灭的风险，这是历史上有据可查的为数不多的几条公理之一。

但在这篇报告中不宜采用哲理探讨问题。拿破仑不喜欢哲学，上帝也不喜欢。他将很快需要上帝作为一种超国王的力量来帮他主宰事物，因此他会偶尔对上帝显示出厚爱。作为回报，他觉得他有权获得公平的、如果可能的话优惠的待遇。如果没能如约得到该得的礼遇，后者一方有权表现出他的不满。但由于前者存在于他力量所及的范围之外，唯一显示其愤怒的可能方式就是向前者的世俗代表们发泄，正像罗马教皇、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奥地利）的高级教士们很快就极为震惊，极为沮丧地发现的那样。

普通的哲学家们这些对《人权宣言》和类似无稽之谈负有责任的人——他们对他毫无用处，就像音乐家和男演员一样没用。女演员则另当别论。她们可以（如果她们是那种人的话）在他成为自己而不必要再扮演伟人的角色时，伴他度过几个愉快的夜晚。之后他送她们一枚带钻石的胸针（没必要太贵，因为能与他同床共枕这本身就是极大的荣耀），忘掉她们。至于那些哲学家们，让他们饿死好了，除非他们碰巧还是出色的数学家。数学家可以在研究有关弹道学和航空学时派上用场，他们研制的系留气球在一些比利时战役中被证明很有用，但要剥夺他们一切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因为那样会导致另一场革命，而世界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和平、安宁和从合法的商业企业赚钱的机会。因此，让那些真正“有用的”哲学家组成一个科学院，但要像军营一样按

受官方的监督，在接到通知时马上行动，不需要时则静静呆在营帐里。至于其他人，让警察监视着他们，之后就不用再去想他们了。

我又开始离题了，但这个人不是一个常人，他像山脉一般复杂。在一个人到达最高点之前有无数的山谷需要跋涉，至少需要征服40多座小山峰。

让我们看看——我现在讲到哪了？是1799年，波拿巴将军已彻底挫败了欧洲其余各部。既然事实证明他是法国（暂不说全世界）最有能力的人，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统治整个法国并迫使尽可能多的欧洲大陆其余部分也屈从于自己的统治呢？不是所有的大哲学家们，从孔夫子、柏拉图到卢梭，都宣称最佳的政府形式是由最有能力的人来主持事务的吗？"每位哲学家都是国王，每位国王也都是哲学家。"这是谁说的没关系。在纸上这看起来很对，但在实际生活中对此不要太认真，同时，我的朋友们，让我们实际一点，首先让我们"发挥作用"，因为"有效地发挥作用"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事。

一个人一天不能工作24小时这太糟糕了。更糟糕的是还有来自其它方面的干扰。激情能极大地愚弄普通人，当他们被它所控制时，最普通的士兵与他们神圣的指挥官毫无二致。如果他从没遇到这个克里奥耳[1]女人，如果她不是那么熟知如何迷惑男人的加勒比人的技巧，那该多好！是那位命中注定的巴拉斯使他们走到一起的。她当时是个寡妇，她的丈夫德博阿努瓦子爵死在了绞刑架上。并不是因为他缺乏"市民品质"，而是因为他让奥地利人给打败了——在那次紧急事故中一位未能成功的革命将领丢掉了部属和头颅。

---

① 克里奥耳人，常指出身美洲或欧洲人及其后裔，也指这些人与黑人的混血儿。此处指约瑟芬。

现在的拿破仑时刻离不开那个女人，她已融入了他的血液，他是一个意大利人，意大利人总是想要什么就要什么——只要是关于女人的事。太糟糕的是她比他年长6岁，且有两个已成年的孩子，但与热带地区的女人打交道就是这样。同样糟糕的是无论给她多少钱，她总是能花出三倍以上的数目。她的牙齿也很可怕。但当他看见她时，他就会忘记是她使他花掉他那微薄的军饷为她买了几百双袜子。他也忘记了那些她喜欢的、终日围在她身边的、让人可鄙的舞男们。他忘记了根据大量的信息表明她有许多情人（那位没用的巴拉斯本人怎么样？他对他欠了许多情）。他只知道他必须得到这个女人，否则他就要疯了。这个女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她比这个可怜的科西嘉小男孩大许多（他刚结束最近的意大利战役回来，由于在营地染上了一种皮肤病，致使他的头发都脱光了），而她根本就不爱他，她甚至可以让他像手摇风琴师驯猴一样走来走去。

之后约瑟芬认为要放弃这样一个致富和抚养两个孩子的大好时机太傻了。于是她当时就与这个男人结了婚，而他则在与她共度一夜良宵之后，飞奔到意大利去，送她关于他取得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无数胜利的光荣记录。他告诉她他是多么爱她、崇拜她、渴望她、需要她，他活着就是为了等到她的消息。消息，顺便说一下，是以非常随便的小便条形式存在的，因为玛丽·罗斯·约瑟芬从小就懒得注意将单词拼写正确这样的小事。此外，她这位年轻的丈夫让她感到厌烦，他总是讲他的王国，他的军队，从意大利掠夺来的上亿法郎，用这些战利品去修缮法国的公路和法国的港口，把法国的海军建设成为能挫败仍敢藐视它的英国强敌。

与一位穿起衣服来不是像一阵飓风给刮到身上，而是十分整洁优雅的年轻骑士共同外出进餐不是更惬意的事吗！他会非常礼貌地将客人引向他事先预定的餐馆中当时最时髦的桌子，令其他

女人都对她另眼相看。之后，他会陪她回寓所，因为她的小狗需要最后一次的晚间散步。在那个被宠坏的小东西被安置在她的床上以后，（她的丈夫从米兰给她送来最最漂亮的丝绸床单，她是多么喜爱丝绸啊！）如果在那之后他将她揽在怀里，低声向她诉说着他是多么嫉妒那个小东西，那么，女人毕竟是女人，如果她的丈夫不是留下来陪着她，而是坚持（在他们婚礼的当天上午！）匆忙返回到那些能帮他征服可以放在她令人崇拜的小脚下的新世界的、浑身散发着臭气的战士中间，毕竟，那是他的前途，那该多好！并且，他是这样一个傻瓜——如此缺乏社会经验（约瑟芬的世界，巴拉斯的世界）——他永远不会知道他妻子在干些什么。

这是她所想像的，可她大错特错了。她的丈夫知道发生的一切。他给她写来愤怒的信件，然后他又将它们撕掉，像害相思病的小男孩一样趴在她面前，乞求她，哀求她赐予至少几滴恩惠。他不知所措，无法再控制自己。

现在约瑟芬听说拿破仑计划进攻英格兰会使他离开法国——甚至欧洲——的更为愚蠢的冒险行动，只有上帝会知道那会有多久。如果说这个女人已融入了他的血液的话，英格兰则占据着他的神经系统。从海上进攻这个岛国已经没用了，根本无法取胜。他只有一次机会，当一位叫罗伯特·富尔顿① 的美国人请他到塞纳河观看他一直在研制的蒸汽轮船，他最终使这种船完全摆脱了风和水流的影响，如果恰当地操作，可以使整个英国海军葬身大海。

可是当机会出现时，他的完全以非机械方式运行的大脑却没

① 罗伯特·富尔顿（1765—1815年），美国工程师、发明家和画家，1807年制造著名的“克莱蒙脱”号汽船，在哈得孙河上航行成功后，1812年又制造世界上第一艘蒸汽驱动军舰。

能理会到这种冒着烟的驳船在军事上应用的可能性。他很草率地就撇开了这一美国北方佬的发明，又回到他自己固有的进攻英格兰的计划上去了。

将军很爱地图，他在地图上面勾划着那些他建议在最后的进攻来临时应采取的路线。首先从法国南部到埃及，再从埃及通过亚洲到达印度河，然后突然插入印度的心脏。这样就可以剥夺英国政府的财源，使它无法再继续支持那些胆敢藐视法国革命军的其他欧洲强国。那样欧洲大陆的反动军队很快就会自动瓦解，英格兰也会屈膝求和，乞求宽恕。

在理论上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计划，一个完全可行的计划——从理论上看如此。

1798 年 5 月，将军带领三万五千人在一片浪花中从土伦消失了。几星期后，有消息送到巴黎说他已攻克马耳他。7 月 1 日，他在亚历山大港登陆，三个星期后便在金字塔脚下的一次战役中摧毁了土耳其军队。通向东方之路已经开辟出来了。

从这时起，有关他连连取胜的神话故事不断传来，直到 8 月 1 日，纳尔逊大败在尼罗河口待命的法国海军。在此之后，除了许多恼人的流言蜚语外只有黑暗——毕竟，世界比地图上看起来大得多——土耳其人如何（在背信弃义的英国人援助和怂恿下）在战斗中比预想的要好得多——法军如何被困入了死胡同——将军如何被迫帮助受伤的战士结束他们的痛苦，以免他们落入异教徒的手中；那些野蛮的穆斯林会因为他杀害了他曾许诺放生的一千二百名战俘而不会饶恕他。

之后的一年几乎没有任何消息，而此时在家中却一个灾难接着一个灾难，法国人经受着极大的耻辱：法国最古老的法规——外交代表的神圣不可侵犯——遭到了冒犯，他们派往拉施塔德媾和的代表们被一队匈牙利骑兵剁成了肉酱。

直到 1799 年 10 月，巴黎人惊讶地得到消息说：“他已经回

来了，五天之内即可到达巴黎。”

可怜的约瑟芬！这个男人就不能像普通的正常人一样做事吗？难道她就注定要在期待惊喜中度过时日吗？最近的传言很让人不安，得赶紧将情人们打发走，并告诉债主们再等几天，因为她的丈夫一回来他们就能得到自己的那一份。

这位伟人在比任何人猜想的都更短的时间里返回了巴黎。然后在他的几个朋友家里进行过多次秘密的子夜会议。执政内阁猜到他们一定在策划着威胁自己安全的行动，可是内阁中分歧极大，以致于无法采取行动。

1799年11月9日——雾月18日——波拿巴将军的士兵包围了圣克卢内的议会大厦。怒骂声不绝于耳，与五年前罗伯斯庇尔被剥夺了权力时是同样的情形。可是这次，拿破仑的刺刀很快就解决了纠纷。内阁不复存在了，由执政府代替了它的位置，共三名成员：第一执政官，选举产生后任职10年，他代表法国行动，他的名字就是拿破仑·波拿巴；另外两名成员只有一般的建议权。他们也有名字，但还提他们干吗！他们会像根本不曾存在过一样被人们彻底忘掉——也许他们从来就不曾存在过！

有关这个故事的一切我就讲这些了。如果想了解更多的细节，我建议你去问柏拉图，他在这种事情发生前2000多年就能准确地做出预言。他并没称之为“永恒的循环”，但事实就是如此。

首先，某位国王得到了太多的权力，于是开始滥用它，结果人民群众起来将他赶下台，这些群众因此而获得了太多的权力并开始滥用它，结果使得所有其它社会阶层因为害怕可能会落到头上的后果而联合起来反抗他们。然后历史重演，我们会发现国家这次被一位骑在马背上的壮汉所统治，他又因为得到了太多的权力而滥用它，于是再次被不满的群众推翻，群众又滥用他们得到的权力，直到最终他们也落得同样的下场——等等，等等，世界

拿破仑与约瑟芬加冕仪式。大卫作。拿破仑加冕为帝，号称法兰西皇帝拿破仑一世，其妻加冕为皇后

没有尽头，阿门。

在拿破仑成为法国第一执政官后，法国的第一需要是在国外求得和平，在国内保持秩序。他们的新首脑把两者都给了他们，甚至还同英国签订了一项和平协议。然后他又向教皇妥协，与之签订了和平条约，由此向上帝表现了尊重，这次妥协使得基督教堂恢复了昔日的大多数权力和特权。之后，又出台了一项全球性的法律制度，适用于整个法兰西和直到今天仍奉行此法的路易斯安那。

1802 年 8 月，拿破仑成为法国终身执政官。两年以后，他撕掉所有伪装，加冕自己为法国皇帝，当教皇庇护七世站在他身旁时，却不能再行使他的祖先在公元 800 年为查理大帝加冕时的那种权力，因为当时是教皇为国王加冕的。这次皇帝本人手持王冠稳稳地将它放在了自己的额头上。在那次公开的污辱之后，教皇被允许返回罗马等候进一步指示。

有关故事的剩余部分每一位学童都知道。这位倡导革命的法兰西进步思想和理想（到处都在因此而大受欢迎）的推销员突然去追逐一种完全不同种类的商品，结果只将自己给出卖掉了。因为到目前为止，他开始受到伟人这一字眼的迷惑，他与那位让他丢脸的女人离了婚，因为她没能给他生育一个王位继承人，后又与一位奥地利公主结了婚，这能为他的王朝赢得一丝尊敬和合法性。

这是结局的开端，因为渐渐地皇帝开始失去了与现实的联系，而日益变得信奉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好像这是上帝任命的，而不是天才和运气相结合带来的幸运结果。我不是轻视他的天才，没有哪一个明智的历史学家会否认他的超人能力（就像没有

人能否认林德伯格[1]确实飞越了大西洋一样)，可是几乎一个半世纪的洞察使我们得以明白拿破仑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良好的时机。

在所有由革命起家的短线职业中，正确的时机往往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就拿破仑而言，时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上帝的旨意。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承认不讳。

可是运气却只会到此为止，不会再来，从拿破仑一停止扮演使其真正伟大的那一角色——革命思想的预言家和倡导者——时起，他的命运便注定了。从那时起，时机便与他相悖而行。最终，就连大自然也背叛了他。他的军队在俄罗斯被活活冻死。从厄尔巴岛返回后，他下了最后一次大胆的赌注，本想在这最后一搏中夺回一切，可是他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他在这次战役中没能正确把握好时机。滑铁卢之战的当天上午，他一直坐在一把椅子上，无所事事，只是在小纸片上不停地划着大写的 N，就这样白白浪费了几个小时。而这一耽搁却恰恰给了布吕歇尔一个喘息的机会，使得他得以能够在威灵顿统辖的中心即将崩溃之时出现。这场战争在下午 3 时以前法军仍然胜券在握，可是到了 5 时"滑铁卢"一词却成了所有文明之邦词典中表示最终失败意义的名词。疲惫不堪、沮丧异常的拿破仑开始了逃亡生涯，带着几千名散兵和千百万母亲的诅咒四处逃窜。

在那之后，出现的是圣赫勒拿岛的活坟墓和死亡。现代科学足以证明拿破仑死亡的真正原因。这位能叫出他所有属下军官的姓名、随时能说出任何一军团拥有的战马和弹药箱数字、能记得所有细节的活字典式人物却忽略了一点，而这一忽略使他在遭受

① 查尔斯·奥古斯特·林德伯格（1902—1974 年），美国飞行员，因单独完成横渡大西洋的不着陆飞行（1927 年 5 月 20 日）而闻名世界，著有《圣路易斯精神号》，记述其飞行经历。

多年的非人痛苦之后，最终在仅仅52岁的年纪便过早地走向了死亡。他从未重视过自己的饮食，结果得了胃溃疡。而痔疮使他在滑铁卢战役时疼得无法稳坐马鞍，于是他被迫推迟了战斗的打响，结果已经太迟了。

很抱歉我好像医生在给病人诊病了，可是胃痛、头痛、肠道不适等疾病在历史上起到的作用比一般人想像的要大得多。我建议所有未来历史学科的学子们在研究我们的历史时采取这种态度。帕斯卡尔[①]留下了这样的名言：克娄巴特拉的鼻子当时若再短一些或长一些的话，整个人类历史的面貌将会改观。这一名言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有其正确性。但是这位学识渊博的法国人本可以再挖掘得深一些。他可以再加上一句——我现在替他完成这件事——如果约翰·加尔文或阿道尔夫·希特勒，不曾受便秘干扰的话……还是请你自己来把句子接完整吧。不要以为我仅仅是在开玩笑，可以说我一生中没有比这次更严肃的了。

[拿破仑（1769年8月15日—1821年5月5日），生于科西嘉岛阿雅克肖，军校毕业。1793年12月，因在攻克英军盘踞的土伦中发挥关键性作用而晋升准将，并获得罗伯斯庇尔的赏识。雅各宾派倒台后，他曾短暂失势，但不久东山再起，在与外敌作斗争中多次建功。1799年出任执政府第一执政，1804年5月成立帝国。任内实行多项改革，颁布《拿破仑法典》，该法典体现了法国大革命的伟大成果。1814年6月在反法联军威逼下退位，被放逐到厄尔巴岛。后实行百日复辟，但在1815年6月再次战败，被放逐到圣赫勒拿岛，后在该岛病逝。——译者附注]

① 布莱斯·帕斯卡尔（1623—1662年），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概率论创立者之一，提出密闭流体能传递压力变化的帕斯卡尔定律，著有哲学著作《思想录》、《致外省人书》。

乐圣——

贝多芬

Beethoven, Ludwig van

（1770－1827年）

现在，让我给你讲讲另一位受自己的才气所累、成为其不正当习惯牺牲品的人物——贝多芬。为了奉献给世人他们从未领略过的美好音乐，贝多芬消耗、浪费着自我。今天，贝多芬成为我们人世间的圣人之一。

贝多芬的父亲是一位由科隆大主教选举人雇佣的爱喝酒的男高音歌唱家。他的母亲玛丽亚·马格达莱娜·莱姆也为该贵人干活，在他的厨房里涮盘子。贝多芬家住在波恩，他们的主人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孩子的全名叫路德维希·冯·贝多芬——而不是像德国出版商在他的许多著作上所拼成的冯·贝多芬。贝多芬一家原是荷兰佛兰芒人。他们血管中流淌的血液很少有德意志的成分——今天，这一细节会让老路德维希感到极大的满足，因为他是一个坚定的人权主义者。确实，在对待有关社会不平等这类问题的态度上，我们可以称他为不折不扣的激进分子。

究竟贝多芬是如何从哈布斯堡王朝的陈旧氛围中存活下来，这将永远成为历史尘封的秘密。可是经历了千百万年暴风骤雨的直布罗陀海峡依然耸立，而就品格的力量而论，贝多芬要相当于

十好几个直布罗陀。

路德维希从五岁起就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这并非是因为他特别想每天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拉他的小提琴，而是因为他那总是需要钱付酒馆帐单的父亲想让他这么做，因为他的父亲不知怎么听说了利奥波德·莫扎特曾利用他的孩子们发了大财。那么既然利奥波德能做到的，他——路德维希·冯·贝多芬的父亲也能做到。这只不过是一个正确训练的问题。可这似乎也是一个个性的问题。小路德维希不是小沃尔夫冈，他是一个毫无吸引力的丑孩子，非常倔强、固执。小沃尔夫冈非常崇拜他的爸爸，视他为仅次于上帝的人，而小路德维希的的确确讨厌他那嗜酒如命的父亲，视他为魔鬼，并且，利奥波德称得上是一位人物、一位出色的导演，对于该如何设置他的两个孩子表演的舞台有很高的品味。可是想像一下让老贝多芬演这一角色会出现的可能局面足以让人打个冷颤。因此，他的计划一无所成，但是想到已经在儿子的音乐教育方面花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和金钱，这位父亲决定还是尽最大努力地继续下去，将来让小路德维希步他的后尘，成为一名宫廷歌手或风琴手。

小路德维希 13 岁时被安排在选举团管弦乐队中演奏洋琴，他从此开始严肃地把音乐当成他终生的职业。他在乐队中的位置待遇不是很高，可是一分一文对他的家庭来说都是好的。在他 17 岁的时候，他得以有机会去维也纳，究竟是谁为此付的款我们无从知道，但是这次旅行却是历史事实，书中还记载说他被介绍给莫扎特，他请贝多芬为他即兴演奏，并且一如平时仁慈的他免费为他上了几课。现在路德维希的职业似乎开始顺利发展着，可就在这时他接到了他母亲病重的消息。他于是返回波恩，正好赶上见她母亲临终最后一面，从此他开始担负起养家糊口的责任。他的父亲现在已经彻底不负责任了，他的习惯让人无法确定，因此他的薪水也是直接付给他的儿子的。否则，每一个波恩

貝多芬像.

人都知道，那钱会立即被浪费在附近的酒店里。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像波恩这样小城市的男孩会有什么前途呢？事实却比我们最初想像的要好得多。18世纪是一个文化兴趣广泛盛行的时代。人们仍然过着闲适的生活，音乐构成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相当数量的——数字大得让人吃惊——男人和女人都是很不错的业余音乐家和画家。在每座城镇——几乎每一座村庄总会有几家的父母和孩子喜欢弹几曲三重奏或四重奏，目的仅仅是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做他们喜欢做的事，而根本不奢望成为音乐天才。

他们有时间对他们不幸的邻居发生兴趣，他们的善良不仅仅表示在施舍上——为某位刚分娩她第17个孩子的劳工妻子送去几碗汤，为其他的娃娃织几件毛衫穿。不，他们做的是更难做到的事。每当他们发现有哪位孩子在某方面表现出特别的才能（无论何种行业），他们就会把他或她找出来，邀请到他们家里，教给他足够的社会修养，使他今后的职业变得相对容易一些。

18世纪的人们对人才极为尊重，对天才更是如此，如果他们碰巧发现一位的话——当然那是很难的事情了。但他们也相信修养，这是所有艺术的基础——包括生存的艺术。他们坚信好的礼仪是不会妨碍一个人成为伟大的音乐家、画家或作家。因此，他们提供礼仪，让那个孩子只管在他们的翼琴或黑板上做好每天的练习。总之，他们主张这是教育年轻人的最佳方式，结果却让他们感到厌烦。

今天，小贝多芬会被认为处于极为不利的条件。他害羞而且傲慢。他不善交际，接受礼物时从不会表示礼貌。戴尔·卡内基如果为这位如此看轻交朋友和影响他人的必要性的人预测未来的话，那预言肯定是很可悲的。可是尽管如此，尽管他会时常无节制地大发雷霆，尽管他在女人面前的木讷尴尬，尽管他在坚持让人们承认其天才时的那种让人不愉快的方式——150年前波恩小

城善良的人们对这位具有不寻常才能的男孩还是相当仁慈的。

所以，尽管他有这些显而易见的缺陷，这位嗜酒宫廷歌唱家的儿子还是设法拼凑完成了他的教育。他从未成为受人瞩目的时尚人物。一生中他从未关心过自己的外表，在饭桌上他常常表现得像个饥饿的流浪汉。他那无法克服的害羞心理使得他常常举止粗鲁无礼，就像那一著名的事件所讲的他拒绝向那位不过是个国王的人举帽致敬，让那位不过是位国王的人先向他敬礼。难道他不是音乐的朱庇特吗？可是尽管如此，他在波恩这些年中学到的修养足以让他在任何一种社会中立足。当他偶尔表现不雅时，这一星球上芸芸众生和他们的朋友由于折服于其天才而忽略了这些非常痛苦的非礼行为。毕竟，他是一个几乎没有享受过什么好处的可怜家伙，所以，为什么不这样接受他呢？在维也纳有足够的人懂得如何以恰当的鞠躬、适时的恭维向一位威严的公爵夫人献上一块巧克力。可是他们能像这位来自莱茵河另一边的粗人乡巴佬那样写出奏鸣曲、交响乐和协奏曲吗？他们不能！因此维也纳（只要它还感兴趣）只付诸一笑，便忘掉那无可挽救的事实了。

在过去3000年时间里，世人已接受约伯[①]为勇于面对逆境的市民的杰出楷模。如果有必要为此殊荣再推荐一名候选人的话，我愿意建议路德维希·冯·贝多芬。

我并非仅仅想到那些让他30年中生活得如此艰难的可憎亲人们。我也愿意忽略那位毫无价值可言的侄子，那位可怜的人在他身上倾注了所有的感情，可这位平庸而不负责任的家伙丝毫不理解他叔父的伟大，认为他的厚爱是理所当然的，从未给以任何回报，我也不是指次次让贝多芬心碎、从未带给他任何满足感的几个女人，贝多芬对她们感情是如此的炽热。这样不幸的经历也

---

① 约伯，《旧约全书》中人物，虽备历危难，仍笃信上帝，书中有一卷《约伯记》。

会发生在许多其他人身上，然而他们设法从活着本身汲取少量的安慰。

然而贝多芬所经历的事让人如此愤怒，它已冒犯了我们的正义感。上帝知道，这种正义感在我们这样一个残酷和不同寻常的惩罚已成为公开事件的时代已经受了足够痛楚的检验。还有什么比让一位作曲家变成聋子更可怕更残酷的事情呢！并不仅仅是有点听力障碍——那对一位音乐家而言并非是一件好事，而是彻底变成了聋子——聋得在钢琴上试奏一些曲调时他都听不见。

1798 年，在他仅仅 28 岁的时候，贝多芬第一次发现了这一病的最初症状。他以为这只是感冒造成的，那非常有可能。他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毫不在意，他常忘记生炉火，他租用的大多数房间（他是一个呆不住的人，在维也纳度过的那些年里他搬家达 30 次之多）通风极差。因此，耳疾在一个肺结核导致一半人死亡的城镇里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病症。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贝多芬的耳聋越来越严重，他开始非常恐慌。因此他做了大多数处于恐慌状态下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会去做的事。他首先拜访了听说过的所有耳科医生，当他们无法减轻他的痛苦时他便开始向当地的江湖医生求救。可他的耳聋，根据事后的分析，并非由地方因素造成的，而完全归咎于他的基本健康状况。现在似乎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他的耳聋是由一种 100 多年后才有可能治愈的疾病引起。这位可怜的人如今完全任由那些宣称自己可以彻底治愈耳聋的江湖医生摆布了。

贝多芬本人是否怀疑过真正的原因呢？我觉得应该说是的。否则他不可能在他所谓的“遗嘱”——一份在他死后发现的留给弟弟的信件——中写下那些令人心碎的话语。他在信中表达了他热烈的愿望，希望子孙后代不会像那么多同代人那样把他看成一个脾气糟糕、厌恶邻里并逃避他们社会的隐士。他绝望地大声发问，他们怎么会那样看待他，路德维希·冯·贝多芬，这位对同胞

的爱不仅包括人类还包括整个宇宙的人（“拥抱万千，亲吻世界！”）呢？他们怎么可能怀疑他有那种感情呢？他比任何人都更渴望走进人类灵魂的深处并通过他自己创造的音乐使之更接近万能的上帝。

他的性格还有另外奇怪的一面，我曾提到过，可这一面常常被忽视——即他深深的虔诚感，由于他对法国大革命的崇高原则（如在《人权法案》中载明的那样）的兴趣，他常常被怀疑成是雅各宾主义者、布尔什维主义者——而他对拿破仑天才的崇拜又使一些人认为他从心底里是一位独裁者、一位暴君崇拜者。

这两种指责都缺乏真实性。对影响人类种族的一切都有着极深兴趣的贝多芬经历了自从上次那场伟大的战争结束以来所有敏感的人士都会经历的那种精神领域的发展。“恐怖时期”那种无情的残酷让他惊呆了，他从《第三交响曲》中删掉了献给“英雄”的那一部（在他写那一部分时只有一个单数的英雄，并且首字母 H 大写），这表明在拿破仑背叛了自己的过去变成最糟糕的独裁者后贝多芬对他的感觉。对于有关他激进主义的指控我却找不出什么证据，除了那些把所有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都称作激进分子的人说过一些未经过考虑的话之外，那些人认为在他们出生时这个世界就应已达到了它最终的完美状态，因此现在就让他保持目前的状态，无需任何改变。

有关贝多芬生平的资料非常简单。他从来没有富有过，但也没有他惯常伪装的那么穷。他的哥哥、嫂子，后来还有他心爱而无用的侄儿浪费了他不少钱财。由于不善理财，他的生活经常发生困难，以致他常常发牢骚说自己经常几天几夜饥肠辘辘而吃不上一块面包。

他的言谈举止和生活方式与其酗酒成性的父亲一样散漫。他的房间，总是乱七八糟的。钢琴上放着污秽的盘子以及第九交响

曲的手稿。他的床几天或几个星期不收拾一次。洗脸盆放在三条腿的支架上，摇摇欲坠。上衣和衬衫（没有一件是干净的）堆在几把椅子上和唯一的一张沙发上。地板上散落更多的乐曲手稿，柜橱上别人的曲谱（送给他审阅的）已积满厚厚一层尘土。窗子很少打开换换新鲜空气，因为屋主认为，新鲜空气对他的气管炎不利。一个很邋遢的仆妇时不时地进来，企图把屋子收拾得从外表上看上去好看一些。老路德维希认为，她在他的泡菜上浪费了钱，就和她争吵起来，于是她便在一片辱骂声中消失了。贝多芬和他那个阶级所有成员一样（因为过去好几代生活都很困难，所以对令人难堪的吝啬已习以为常），只要一想到他雇用的人浪费了他得来不易的钱，他就会勃然大怒。而他自己用起钱来，又显得他很阔绰——但这仅限于花在他亲戚的身上，在他的这种可敬的中产阶级的世界里，贝多芬一家始终是老样子。

在他生前的最后 12 年，已完全失聪，这件事已为大家所熟知。因此，他最后的几部作品，他已听不到了。早在 1800 年，他发现他已开始重听。他耳聋的原因不明，贝多芬的病情从未被正确诊断出来。自从他 30 岁以后，他的身体什么时候也没好过，重听不过是他的许多病中的一种临床症状。他英勇地和这种最可怕的灾难作斗争。1822 年以后，自从发生他在指挥他的《菲岱里奥》彩排时，不能掌握舞台上发生的变化那件事后，他就不愿意再在他的作品上演时公开露面了。也有很多听觉完好的音乐家，参加音乐演奏会，不是出自自愿。但对路德维希·冯·贝多芬那样敏感的人来说，是他的重听迫使他不和他的伙伴在一起。就他的天性而论，他原本是个很爱交游的人，他很愿意和朋友们在一起，很愿意参加各种宴会、招待会、联欢会，去与亲朋会晤，而且他还特别爱（老天爷怜悯他吧！）乱开玩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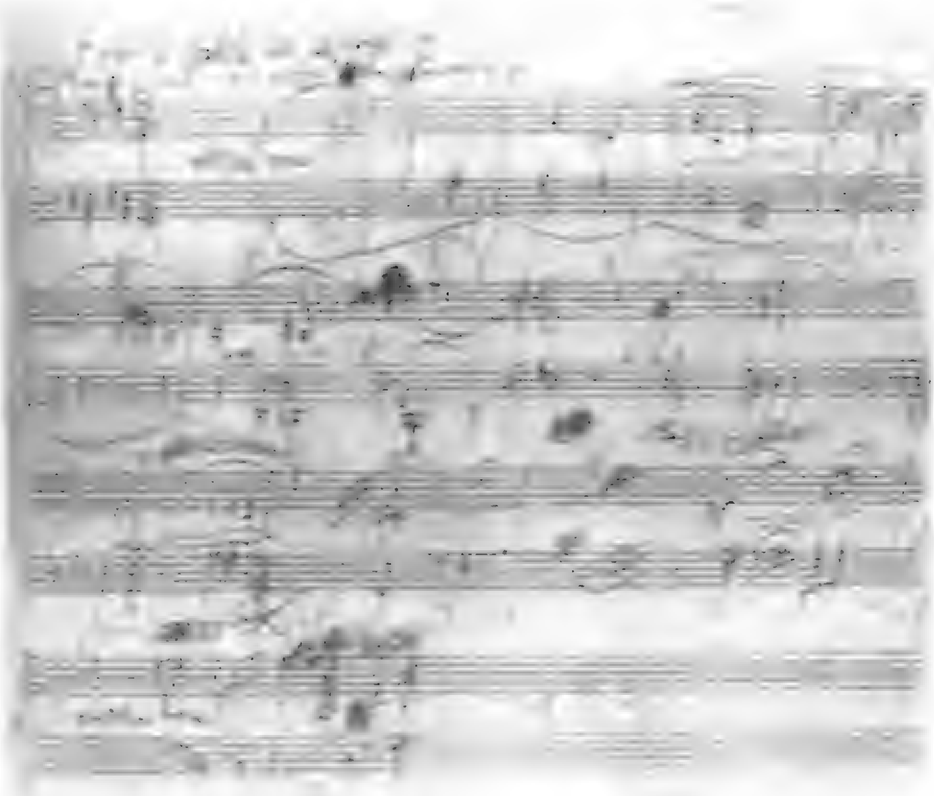
设想一下伦勃朗双目失明的情形，那么你就可以相似地想像出贝多芬发现自己所处的状况情境。让我们暂且借用一下电影的

镜头，把时光倒退至125年前。情景是在维也纳的咖啡屋里，一个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为那位伟人保留着，首都所有的人，从清道夫到国王，都逐渐认识到他是他们当中最主要的成员之一。三四位善解人意的朋友在他的旁边，努力谈一些令人高兴的话题以分散他的注意力，他们讲述一些知名人士的小插曲，可是他们的努力是徒然的。其实他们也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同伴如今只生活在自己内在的世界当中，生命对于他除了存在于他那不同寻常的大脑中外已然完结。

贝多芬到1827年才去世。因此，在他的晚年，他完全处于失聪状态。就是在他什么东西也听不到的情况下，他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优美音乐。

也许这是上苍对于他的失聪的补偿罢了。贝多芬一生的挫折，是令人不堪忍受的。他屡次恋爱，屡次遭到无情地拒绝。这倒不是他倾心的女人的残忍。这些女人，倒是还喜欢他，但和他结婚是不行的。奥地利的贵族可以与社会上公认的天才交朋友。他们的大门对作曲家和钢琴演奏家贝多芬是敞开的。贝多芬的才能，足以使国王或皇帝俯首贴耳，唯命是从。但是一说要让这样的人做他们的女婿，那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贝多芬的中产阶级成份，他的酗酒的父亲，他的不可救药的哥哥，他和他的一个嫂子永远不能结案的诉讼，他和他的恩人们的争吵，更糟糕的是，他经常怀疑有人轻视他，他对一切他自认为是向他的伟大挑战的东西所采取的高傲、愤恨态度——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使他成为一个可敬而不可亲的人。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贝多芬结识的维也纳豪门贵族中也许有很多想把他们的女儿许配给他们的家仆，或是许配给他这样的人，他可以在一次最痛苦的爱情的迸发中，把他的作品献给他热恋的对象，随后又会因这样做失礼而感到内疚，这使在座的人恼怒，或由怜悯而哭泣。不行，绝对不能这样干。贝多芬失聪之



贝多芬的手稿：《E大调钢琴奏鸣曲》的一页。

后，他明白，这事是没有希望了，但他仍然在爱恋着。他已学会谨慎从事。从那时起，他的音乐说出了他嘴巴不敢说出的话。

概括起来，贝多芬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起于 1783 年，止于 1803 年。这个时期，是他学习音乐的时期，完全是在海顿和莫扎特的影响之下。他进行了一些革新，他用恢谐曲来取代海顿和莫扎特认为交响曲中非有不可的小步舞曲。但乐曲的其余部分，还没有出现贝多芬风格的迹象，这在他生活的第二个时期，非常突出。第二个时期，止于 1815 年。然后他进入了人们认为他已完成他的使命，他已完成他为自己提出的任务的时期。但是，在这一时期，在这个充满了忧伤的人的心灵中，出现了新奇的东西。

像他同时代所有的人一样，他对周围的人和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从意气消沉的深渊中爬出来，一直爬到希望之巅，而后又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发生的瞬息万变的政治局势，掷入更深、更黑的绝望的深渊。如果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他会玩世不恭的。他会让他的同胞，按他们自己愿意的方式，毁掉他们自己。但在他惊魂甫定之后，又重新披挂上阵。他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赢得最后胜利起过重大作用的那位伟大的法国将军[①]一样，他的左翼崩溃，他的右翼受挫，他的中锋也败下阵来，他仍要进击。贝多芬周围的所有的人，都因失败不可避免而屈服，只有他一个人，拒绝投降。他非常熟悉他的先辈中最伟大的音乐家的作品，巴赫和莫扎特的百折不挠的精神给了他力量。他发出重新集结队伍的号角，他用明确无误的语言重新宣布，他对人类一定要取得

---

① 即贝当（1856—1951 年），法国将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凡尔登战役的英雄。1940 年 6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84 岁高龄的贝当奉命组阁，因败局已定，向德军求和，在维希成立政府，担任“元首”。1945 年被法国法庭以通敌罪判处死刑，后改判终生监禁。——译者

最后胜利的信心。他写《第九交响曲》，正是为了说明这一点。

不再是命运来敲门，像《第五交响曲》那样。大师不再关注他的乐曲的主人公的生死荣辱，像他在《英雄交响曲》那样。他不再为他在《田园交响曲》描绘的大自然的美分心，他也不愿再写什么去礼赞舞蹈，这个任务，已经在《第七交响曲》中完成了。这是一般人关注的事，他把这些都放下了。在他的《第九交响曲》中，被认为操纵交响效果最有办法的人回到了比一切器乐都老的古老的音乐形式，他恢复了人声的使用，借以表达对精神上的自由的不可动摇的信念。这种精神上的自由，是他一生最宝贵、最自豪的财产。

1827 年 3 月 27 日，在他那个混乱不堪的、无任何欢乐可言的斗室中，路德维希·冯·贝多芬离开了人间。那是在他那从前的英雄拿破仑在世界另一端孤岛上最终连幻觉也完全不复存在以后的第 6 年。

人们有理由记住那一天。因为就在那位音乐大师陷入长眠之际，天空电闪雷鸣，暴风骤雨随之而来，维也纳人还从未经历过那样的情景。在眩目的闪电光和隆隆的雷声中，上帝为这篇他完全有理由为之自豪的杰作划上了句号。

当老路德维希被抬向坟墓时，送葬队伍经过的街道两旁站满了士兵。即使是哈布斯堡宫殿也觉得有必要向这位音乐奇才致敬。他以自己的方式比任何其他双头鹰旗下的战士更加反传统，也更危险。

［贝多芬（1770 年 12 月 17 日—1827 年 3 月 27 日），德国作曲家，被公认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曲家。其作品集古典音乐之大成，开浪漫主义音乐之先声。他受海顿、莫扎特、哥德、席勒等影响颇深，崇尚法国大革命理想，关注个人自由和尊严。在音乐形式上勇于创新，开扩了奏鸣曲、交响曲、协奏曲和四重奏的

范围，并把声乐和器乐结合起来。一生创作极为丰富，如《升E小调钢琴奏鸣曲》、《月光奏鸣曲》、《第3（英雄）交响曲》、《第6（田园）交响曲》等，但以《第5（命运）交响曲》和《第9（合唱）交响曲》对后代影响最为深远。——译者附注］

用心而不仅是用脑子写作的人——

爱默生

Emerson, Ralph Waldo
(1803－1882年)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有关那个友善的、单纯的、可爱的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故事，与上面讲的笛卡尔的故事迥然不同。据我所知，他只有一个缺点——嗜烟成性。伏尔泰也是一个大烟鬼，但他抽哥本哈根的大鼻烟抽得非常优雅，非常有风度，而康科德的这位智人却连他的长袍都穿不整齐，他的家人也觉得要他在年度旅行布道时穿得整洁一点、优雅一点都是十分困难的。而在他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是靠布道谋生的。

这位高贵的市民，就像所有刚出生的婴儿一样，于1803年5月25日不带任何心机地来到世上。出生地为波士顿，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城市，它在被赠予新阿姆斯特丹206年后获得了城市权。

爱默生的父亲是牧师，他的七位直系先祖都是牧师。在爱默生家庭不成为牧师就像生在罗斯福家庭而没有政治抱负一样不可思议，所以年轻的拉尔夫·沃尔多去了哈佛（1821年）。在试着教了几年书后，他讨厌教书，就回到坎布里奇学习神学，并在1826年取得了牧师资格。

同时，就像他在一本书里指出的，许多耶和华（正像英格里斯·马瑟和科顿·马瑟[1]向信徒展示的那样）的追随者已陷入了18世纪哲学的自由思潮之中，并走向唯一神派，之所以这么称呼他们，是因为他们只相信圣父，而忽略了三位一体中的圣子、圣灵。

没有其它任何团体曾如此刻苦、如此虔诚地跟随过耶稣的足迹。用他们的敌人的话说，他们唯一的麻烦是做过头了，并且变得如此像基督，以致于不再适合做一个普通的基督教会的成员。

唯一神派以《圣经》为其信仰基础，而且只相信《圣经》。他们坚持他们有权按他们乐意的方式去读、去理解《圣经》。但他们兴奋的同时也负责任地要把这一思想适用于其他每一个人，并且自从他们作为一个合作团体存在以来，他们就一直属于最勇敢、最无畏的人类自由的战士。

要对此追根溯源是十分困难的。我试着在我的名为《宽容》的书中做到这一点，但未能深入下去。在中世纪的一些较模糊的异端中有一些唯一神派哲学的模糊踪迹。匈牙利的新教徒曾发起过唯一神运动，还有波兰各地，但在17世纪都被及时地压制下去了。那个时期，荷兰也出现过唯一神论。在英国，1662年的《宗教划一法案》致使2000多名有唯一神派倾向的教士被剥夺教职。但这种粗暴的、不公平的待遇就成了其存在的原因。因为，这次大清洗的牺牲者现在被迫联合起来，虽然三位一体的思想在当时仍占据着绝大部分人的头脑，但他们要让世人知道他们的存在。

[1] 英格里斯·马瑟（1639—1723年），新英格兰清教徒牧师、教育家，曾任哈佛大学校长，因坚持宗教信仰自由被英国政府撤销垦殖权。科顿·马瑟（1663—1728年）为英格里斯之子，也是牧师。他在美洲推广天花疫苗接种，发表著作400多种，主要有《美洲志异》等。

唯一神派完全反对旧的加尔文派和路德宗的救世、天生有罪、永久惩罚的教条，同时他们否认发生奇迹的可能性。最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开始对《圣经》是唯一给人类指明如何去过上高贵和像样的生活的书这一观点失去信心。他们开始建议其它的书，或其它作品的一部分（如《双城记》的最后一章）同《旧约全书》中的许多故事一样正确地体现了人类灵魂的永恒的神性。

我可以自豪地讲，我们古老的哈佛很早很早就开始坚信唯一神论，并把其校训 Verieas 译为“证实所有的东西，对证明是对的就要坚决地坚持下去”。而且哈佛始终坚持这一条，就这点，整个共和国应该感激哈佛。

新英格兰的偏僻落后的教区当然十分反对这一新的学说，他们指责唯一神派为自由主义。1794 年当约瑟夫·普利斯特莱[1] 从英国来到这新世界创建第一个唯一神派教区时，他没有受到热诚的欢迎。优秀的牧师根本就不用愁，唯一神派从未成为一种大众化的宗教。纯从数字的角度来看，唯一神派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即使是今天，全美国还不到 15 万名唯一神的信仰者。

幸运的是，宗教不像生铁和花生，它可以肯定地用数学术语来表达，但这种术语就精神而言没有丝毫的意义。尽管这样，如果你还是想知道唯一神论对人类文明产生了什么影响，你只要打开《美国名人录》这类书，看看信仰唯一神者的数量，你就会发现我们军队的许多职员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和唯一神论运动有联系感到骄傲。

---

① 约瑟夫·普利斯特莱（1733—1804 年），英国神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曾发现氧等 10 种气体和植物的光合作用。因同情和声援法国革命而被迫移居美国。在宗教上也反对三位一体等基督教教义，在美国创建第一个唯一神派教区。

现在，我们再回来谈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对于他，我只能非常简单地讲一下，因为他的生活就像那条他在岸边度过了他绝大部分时间的河流一样平静，他的经历缺乏壮观的场面。

26岁那年，爱默生结了婚，29岁就成了鳏夫。那时起，他对他的全体教徒们变得非常礼貌，但又十分不和谐。他愿意去参加圣餐礼，但只是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回忆。他的教徒抱怨他有点太不像话。牧师们也看不惯他。他们坚持他们的意见，而爱默生只好退却。这意味着他不再是牧师，而只能作为布道士。但从那时起，整个世界变成了他的教区。

爱默生是一个对规范有独特感觉的人。他生活的第一幕已降下帷幕，在第二幕开始之前，还有一段短短的间隔，因而他乘船来到了英国，在那儿，他和坏脾气的托马斯·卡莱尔[①] 成了忠实的朋友。这真是非常奇特的关系。这个苛刻的苏格兰人有严重的胃病，而爱默生在战胜了年轻时得的肺结核后一直过着宁静的生活，好像没有什么能打破他身体和灵魂的平衡。

尽管这样，这两个人，又有完全的互补性，他们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保持着诚实的通信。他们具有一个必定令他们很满足的共同的纽带。他们都相信人类的进步取决于领袖人物。由于臭名昭著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有关纳粹和法西斯主义的谬论，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对任何领袖都变得极端地怀疑。我们甚至开始否认（自古以来人们就清楚）没有头领的军队（或军舰、或工厂、或医院，甚至一个日常家庭）会变成一群流氓。但爱默生和卡莱尔——两人都不是蠢蛋——知道他们的历史，有服理的勇气。

我经常碰到这样的人，当他们听我这样谈论的时候，告诉我

---

①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年），苏格兰散文作家和历史学家，著有《论英雄和英雄崇拜》等。

也受到纳粹病毒的影响。上帝啊！我憎恨所有和统治民族（Herrenvolk）这一荒谬的理论相联系的东西。那些送货的男孩和理发店的助手似乎一穿上棕色的皮靴就成了绅士，而且还希望他们来重建一个新世界！不管怎样，他们将对人类造成巨大的灾害，除非我们依旧信仰自由，停止有关谁来当我们的领袖和我们应该注意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意见还是听为他打扫房间的勤杂女工的意见这两个问题的争吵。

因为我喜欢爱默生，因为他就代表性人物（这真是一个旧的新英格兰的好的不动声色的陈述！）主题讲述了那些话，同时我希望他在晤面时能就其关于该主题的思想多作阐述。他在一本书中给伟人下了个定义（引文仅凭个人记忆）：伟人就是不让我们想起其他任何人的人。我不知道他是否还坚持这一观点，因为那会把希特勒也包括进来。但愿此事没有发生。

爱默生回到美国后，和母亲一起住在康科德的旧家庭住宅里。为了维持极为简单的生存，他继续布道，在两年后的1835年，他再次结婚，在老宅第附近建造了自己的房屋，并成了康科德十分显赫的居民。他不再同意他朋友梭罗的观点——哲学家应通过额头的汗维持生计。他在自己的农场以很温和的方式试过这种方法，并得出结论：当人干了一整天的活，晚上回到书房，用因挖洞而满是水泡的手来握鹅毛笔向笔记本吐露思想是很不合适的。

当爱默生选择布道士这条路的时候，布道还不是十分复杂的事情。布道士还没有被宣传为高明的演说家，只须从芝加哥到迈阿密，又从迈阿密到西雅图，来回穿梭，全然不顾身体的承受能力，两眼只盯着票箱。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爱默生几乎活到80岁），这位布道士从容地在这片土地上南北来回游说，用其三寸不烂之舌宣扬物质和精神的独立，催促听众亲身试验，一旦通过试验证明是正确的，就坚信不疑。

有一次爱默生讲得比平常更加直接了当了一点，加尔文宗信徒就试图激起听众来反对他。例如1838年，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他指出的基督教徒的一些不足之处，并请求听众不要跟随他们，直接同上帝接触，他的话引起了新英格兰教堂的牧师、管理者和信仰者的强烈抗议。

爱默生被要求对他的观点作进一步的解释，但他聪明地拒绝了。他觉得他有资格受到一个由与他同等的人组成的陪审团来审判他，而那些贬低他的人是很难胜任的。教区的牧师们发现爱默生十分高傲，高傲得他们不可及。于是他们就像一群无法激怒大狗同它们斗的小狗一样，向他狂吠。这位康科德的哲人终生遭受指责，要求他放下架子，到人群中去，让人们看看他到底是否真是用不同的泥土做成的。

就这样，再次引发了著名的有关所有的人都是由同一种泥土做成的这一事实的古老的争论。当然我们是的，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在米开朗琪罗或罗丹① 的手中，那块泥土可能就和海边孩子们手中的泥巴不一样了。

另一个指责是爱默生喜欢他自己活动圈内的人，我想这完全是对的。在一屋子与他没有共同点的人群和他的几个好朋友两者中选择，毫无疑问，他会选择后者。尽管他不太爱他的教徒，但他十分尊重他们的观点。虽然他不可能不停地催促他们，但他始终在努力为他们指明一条生活和思想的更好的、更愉快的、更合理的道路。如果只有“孤独漫游”倾向这一点是反对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理由的话，那么我倒想把这作为他是我们共和国到目前为止出生的最高贵的市民之一和真正“有代表性”的美国

① 弗朗索瓦·罗丹（1840—1917年），法国雕塑家，善用多种绘画性手法塑造生动的艺术形象，主要作品有《青铜时代》、《加莱义民》、《思想者》、《雨果》等，著有《艺术论》。

人之一的理由。

正如我刚说的，爱默生几乎活到了80岁。他是个勤奋而有规律的人，与卡莱尔全然不同。他的作品很多，但他不能与伏尔泰和其他一些致力于让人们为自己着想这一困难职司的作家相比。

他从他的劳动中获得完全满足了吗？这很难说，但我偏向于他从未对他所取得的满意过这一观点，无论是在散文方面，还是在诗歌方面。他起初把自己当作诗人，但他非常清楚地明白他作为诗人的先决条件不存在。他缺一个耳朵。诗歌是一种语言型的音乐，而音乐实际上在新英格兰早期殖民者中并非广为人享受的艺术。爱默生写诗就像某些有自知之明的波士顿人学弹钢琴一样，只是他爱弹，而他们也知道能学好，但他们忽视了那些从俄国或波兰来的钢琴家，他们在开始学的时候早已具备了连他们自己也从未希望获得的天赋。

爱默生意识到了他的障碍。他知道帕纳瑟斯山坐落在哪儿。他还不时地有机会从远处欣赏山的雄姿。但缪斯从未邀请他喝上一杯醇酒，然后到草地上跳上一曲。而他也刚巧是想得开的人，他从未因错过这么多的好时光而有丝毫的遗憾。他是新英格兰的一位绅士，而他的妻子说不定还不同意这一点。还有他的邻居也一样。艺术是一种危险的娱乐，因为它可能会使人想入非非，如果一个人能从感觉的角度接近艺术的话，那该是多么美妙的生活啊！康科德并不是演奏小夜曲的合适之地。假如身着薄纱服的路易莎·梅伊·奥尔科特① 自愿领俄国芭蕾舞团通过某些最复杂的阶梯，也不会合乎新英格兰的处事方针。

① 奥尔科特（1832—1888年），美国女作家，以从事儿童文学创作闻名，代表作为自传体小说《小妇人》。

但康科德是过日子的非常好的地方，它能为人们提供在萨尔茨堡和维也纳无法找到的某种优势。例如：如果你的房子被火烧了（爱默生就遇到过这种情况），你的邻居们会为你重建；当你年老了，变得糊涂了，甚至不知道你是谁，你住在哪里了，陌生人会友好地拉着你的手，并安全地把你送回家。这一现代雅典即波士顿善良的人们也因此而得福。他们不可能都十分清楚他们的这位圣人在试图向他们传播什么，但至少他们不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

康科德还在那里，而且比有名的欧洲圣地保留着更多的古老魅力与风味。在康科德河的岸边，人们可以找到一块可坐的地方，静静地思考美国的奇特命运。

那里有爱默生笔下的早期图画——柯利尔与艾夫斯① 版画下的一个美国——宽广无垠的大地、草原和森林，似乎拥有足够的食物来喂饱地球上所有的饥饿的动物。那里有一群自我奋斗者居住的小村庄，其中每个人都被用一种激情激励着，他希望给他的孩子提供一切可能去接受更好的教育，以便使他们像普通美国人那样走过一生，发挥他们的最佳能力，并对生活中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感兴趣。这些不慌不忙的人们依然渴望友好相处，难道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朋友吗？他们依然竭尽所有的可能和力量去充分利用他们的机会，因为这是他们作为一个民族中一员的责任，这一责任受到了上帝与自然的赏赐，而这正是这个星球上所有其他国家人民的羡慕之处。

---

① 纳·柯利尔（1813—1888 年）和詹·梅·艾夫斯（1824—1895 年），是美国两位石版画家，他们描绘的 19 世纪美国生活的版画成为当时习俗和历史事件的印证。1857 年两人成为合伙人，创设柯利尔—艾夫斯商号，经营版画零售和批发，印刷了不下 7000 种版画。

接着爆发了内战，柯利尔和艾夫斯的图画不再是我们的象征，许多函购商行里的画还在老地方挂着，而古老的有明确命运的理想逐步被新的理想所取代，这一新的理想使得敛取物质财富成了所有人从头到尾的一生追求——同时使命却无法知晓。

这一指责（我肯定不是第一位作出这一指责的人）一直在欧洲知识分子中间非常流行，这些欧洲人（除非他们去好莱坞或者去纽约大都会演唱）总是一边指责美国的"拜金主义"，一边喝白兰地酒。作为一名移民，在无休止地诋毁我们的国家志向时，我要比我们土生土长的美国作家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更好的观察能力。我发现，我们现存的文明被求富的欲望，不计任何代价的求富欲望主宰着。不过，一说起这个话题，我倒喜欢用"欧洲人"这个词来代替"美国人"，因为很明显，如今新的移民浪潮正向我们这边海岸涌来。

为了追求所谓的"生命中的美好事物"（天知道为何！）而发生的最糟糕、最不应该的抢劫可在最近的移民中找到，却不是在过去的开拓者中找到，这倒不是说早期的新英格兰人和弗吉尼亚人不想去获得一枚纯洁的或者不纯洁的硬币。他们长久地生活在贫穷之中，不会赞同阿比·马丁所说的"如果贫穷不是丢脸的事的话，它跟富裕一个样"。不过，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来到美洲是为找到一种在精神上比旧世界更快乐自由的生活。在他们后面跟来了一帮饥饿的农民和居住在贫民窟里的人，这些人来到新世界仅仅是为了生活过得好些，而对那种快乐、舒适的生活方式并不感兴趣。他们就像一群饥饿的牛，终于找到了一块茂盛的草原，在它们那种可以理解但不很诱人的获得他们该得的份额（也许就一点点）的欲望驱使下，它们会吃掉正好在它们脚下的草。

在这场掠杀中的第一批受害者就有我们可怜的国鸟。古老的美国鹰及时发出了不平常的鸣叫。不过，这是一种有勇气的动物，那些懂得其语言的人知道，当其拍打着翅膀、自豪地宣布自

己为世上所有受压迫者的保护人和首领时，意味着这是真的。

新来者尽管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已没了根基，也会立即不停地积极谋求成为这块土地上整体中的一员（正如新英格兰人做的那样），他们对美国要旨并不感兴趣。一旦在他们那间说着多种语言的屋子里比在旧世界里吃得好，他们便不会提出什么问题，也不去麻烦地去等待答案。他们或许模糊地听到过，在其独立进程中，这个国家（至少从外表上看，他们有了自己的国家），有着荣耀的命运。但是，命运并不能立即转变为有形的好处，似乎比手中拿着的现实东西要次要得多，这一现实的东西就是掠夺这块土地（不要与真正的开拓相混淆）——然后欢闹。

爱默生是否注意到了他那可爱的共和国面临的这些变化，很难从他的书中得出结论。他的信件显示，他无疑对于美利坚合众国出卖了其长子继承权以换取几桶浓汤这样一个事实毫无察觉。但是，他已经太老、也太疲乏了，不能加入一小部分勇敢的人中，走上战场，与那些这块普通土地上的真正敌人、那些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抢劫这个国家的人进行斗争。接下来，我们可能不得不寻找他在这方面的明显无知而且漠不关心的原因，一位伟大的现代哲学家称他为“宿命的乐观主义”。

每一件事在所有的可能中最终会是最佳的，在这一感觉上，爱默生并不孤立，绝大多数他的同时代人持这一观点。这是他们在遗传方面的一部分。从美国这个词还只是象征着“希望”与“富裕”的时候就开始传下来了。

我要说，爱默生去世的那年，我正好出生，所以我享受到了与他在同一个星球上共存三个月的特权。想起来，我就很高兴，至少在短时间里，我有幸与这位用心、而不是仅用脑子来写作的人擦肩而过。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803 年 5 月 25 日—1882 年 4 月

27日)，美国散文作家、思想家、诗人、演说家和美国19世纪超验主义文学运动领袖。他毕业于哈佛神学院，曾任基督教唯一神派牧师。第一任妻子去世后对其宗教信仰和职业产生怀疑，在困惑中游历欧洲，认为人与自然存在着一种精神上的对应关系，形成其超验主义理论。1836年发表《论自然》，此为其浪漫主义信条的概括，也是其理想主义的最高体现。其他重要作品有汇集其讲演稿而成的《论文集》(1841年)、《论文集：第二辑》(1844年)、两册《诗集》和《五月节》等。他最成熟的作品是《人生的行为》(1860年)，主要反映其全面的人文主义思想。爱默生对梭罗、惠特曼、霍桑、狄更生等美国作家和尼采、梅特林克、柏格森等19、20世纪文化名人产生了很大影响。——译者附注]

举世无双的童话大师——

“丑小鸭”安徒生

Anderson, Hans Christien

(1805－1875年)

据说基督出生在一个牲口棚里。当我还是个小孩子时，我曾经羡慕过他。那是一个多么美好、多么理想的出生地！有刚刚收割的干草和温驯的母牛作伴。好奇的山羊走来走去，嘴啃着铁锹或者草耙的木把。柔弱的光从房顶下的小窗子里洒进来。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到有阳光的房间。房间里放满了死气沉沉的家具和一点也不浪漫、表情呆滞的祖先的画像。我经常把它和祖母曾经给我讲过的伯利恒的婴儿出生的牲口棚相比。我的叔叔也曾经给我买过一本关于他的有许多图画的书。我总是为没有出生在牲口棚中而感到十分遗憾，因为我一出世闻到的不是土地的芳香，而是过期的茶叶和每周至少擦两次的荷兰地板的气味。

在菲英岛欧登塞安静的丹麦小镇中破旧的小房子里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在那里汉斯·克里斯蒂·安徒生发出他第一声啼哭。在那一间房子里住着他的父亲——一个鞋匠——他的妈妈和一群孩子。家里穷得徒有四壁，没有床单，就捡一块刚刚盖过某位达官贵人棺材的布当作床单。

这不平凡的事件（对我们来说不平凡）发生在1805年4月2

安徒生在为孩子们讲故事

日。11年后，鞋匠的肺病终于使他放弃了绝望而徒劳的挣扎。克里斯蒂的妈妈一直守寡，承担着家庭的重担。她寻找并且找到了解脱的办法，她用好心邻居经常接济她的养家糊口的钱，换成了一瓶瓶荷兰杜松子酒，渐渐地被人遗忘了。

但是神的火花孕育在这个小男孩的心灵之中，不可抗拒。凡是上帝触摸过的人，不管他遭到什么样的障碍和多么无礼的对待，他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在他十分贫穷的时候，他仍然到小剧场中看戏。在那里他可以再扮演莎士比亚及其丹麦同行、著名的路德维希·霍尔堡[①]戏剧中的角色，后者有“斯堪的纳维亚的莫里哀”之称，这一称呼并非不当。

在他幼年的时候，安徒生就被迫自己谋生。他一开始被安排到裁缝店里当学徒，因为社会永远需要裁缝。无论好坏，这总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但他拒绝了。他要做一名歌剧演员——只能是这样，别无选择！——一名歌剧演员。欧登塞的人都嘲笑他，丹麦人也笑他，他们不仅笑他们的邻居，而且也在笑这个世界。他们是一个小国，那是他们抵御敌人，保护自己的方法。在欧洲，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发展的方法，以和平的方式推行自己的事务，却容易招来许多敌人。

当这个孩子真的走到首都推销自己的时候，当他雄心勃勃地站在皇家歌剧院的门阶前的时候，他不再是人取笑的对象。他被看成疯子，一个伤害人的傻瓜，但他是一个不可等闲视之的人物。他住在阁楼中，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但他继续唱歌，直到声音变了调。直到这时，他才认识到作为歌唱家的梦想对他来说

① 路德维希·霍尔堡（1684—1754年），启蒙运动时期斯堪的纳维亚的文学巨匠，挪威和丹麦都把他说成是本国文学的创始人。早年住在卑尔根，曾进入哥本哈根大学学习。其亦庄亦谐的史诗《彼得·鲍斯》是用丹麦语写的最早经典作品。创作过一大批至今仍在上演的喜剧，如《政治工匠》、《山上的耶柏》等

上：安徒生的坐椅，现存于欧登塞的安徒生博物馆

下：安徒生少年时代的住宅

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了。

他随后决定利用他奇异身体的另一端——他的双脚——来完成他的嗓子拒绝完成的事业。

作为一个舞蹈者，汉斯·克里斯蒂·安徒生像做歌手一样遇到了失败，似乎除了裁缝桌以外再也没有其它出路。哥本哈根，特别是那时的歌本哈根仍是一个十分保守的城市。像安徒生这样有着奇异外表和志向的男孩是很容易引起公众的好奇的。国王腓特烈六世，可能认识哥本哈根臣民中的一半，对他产生了兴趣，把他送进学校接受教育。

安徒生是不是从那时开始就勤奋学习了呢？绝对没有！他使他的老师感到绝望。他对功课毫不用心，反而浪费大量的时间写一本很糟的小说，并给它起了一个十分离奇的名字《帕尔娜托克墓地的幽灵》。

1829年，安徒生又回到哥本哈根，仍然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但是他能经常在大富商乔纳斯·科林（人类中像这样杰出的资助人的名字，我们都应该铭记在心）的家里吃上十分丰富的饭菜。自安徒生第一次在首都哥本哈根出现时，科林就感到“这个男孩与众不同”。尽管汉斯·克里斯蒂·安徒生有着令人厌恶的习惯和易怒的性格，但科林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朋友。他希望世人能坦白地说，他是对的。安徒生，这位死于肺结核的欧登塞鞋匠之酗酒的妻子所生的儿子，拥有的能力比任何人想像的都要强。在写了一二本毫无意义的小说和做了一些蠢事之后，安徒生把自己变成了小丑。他最后成功地从一个富有的资助人那里搞到了一小笔钱，以继续周游世界。

这笔资助金是微不足道的。与它相比，现代的古根海姆基金是相当可观的。但是无论如何，这有限的几百元却带来了相当巨大的收益。现在我们投资数百万美元捐助给那些没有天才却野心勃勃的人，除了给我们带来一些“民主”的副产品外，一无所

有。安徒生周游世界返回后不久（他最远到达了罗马），就写出了一系列的童话故事。最初，这些故事没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所有的人见面后都问：“你读过《牧鹅女》、《丑小鸭》和《皇帝的新衣》吗?”这本书很快传到每个人手中。一时间所有的欧洲人都知道了丹麦这个国家，都知道丹麦出了一位杰出的文学大才——一位能够讲述“真实的童话”的人。

安徒生后来的惊人成就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他的同胞继续取笑他们“著名的”诗人，小国家从不友好的对待他们的伟人。安徒生又成为咖啡厅的笑料，幸运的是，安徒生天真自满的性格使他没有认识到他所处的真实的社会地位。他对公众的嘲笑不以为然，对他的天才相当自负。所有的荣誉都开始落到他身上，例如，1847年他出访英国，受欢迎的程度并不比查尔斯·狄更斯[①]差——从个人的角度讲——比他更幸运。他很高兴，也很满足，感到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他参加了众多德国小王子们的聚会，听他们并不漂亮的妻子的颂词，接受他们的邀请和奖章，但是他对所有这些并不感到奇怪。在他的一生中，他深信圣诞老人的确存在。如果这位圣徒晚一些到达这个世界上，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安徒生安逸地度过了他的后半生，满足地抽着他精制的烟斗，担心每一项新的发明都能打破他像孩子一样热爱的这个世界的和平。他翻出他的小说，自我感觉到比童话里的主人公更高贵。他在许多文明的城市中受到所有人的热忱欢迎。按照我的看法，他会一直这样做下去，直到100岁。但是，很遗憾，在67岁的时候，他从床上摔下来，伤得很重，再也没能恢复健康，于

---

① 查尔斯·狄更斯（1812—1870年），英国作家，所写小说反映并鞭挞英国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现实，重要作品有《匹克威克外传》、《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等。

3年后死去。

世界上有两种所谓“简单”的人：一种人是那些因为缺乏复杂的内心世界而简单的人。他们生来简单，过着简单的生活，直到生命的结束。如果他们还诚实，头脑还清醒，而还愿意工作的话，他们会以某种简单的方法，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得到同事的尊重和和经常性的影响，因为他们都是出色的仆人或者渔翁，或者是办公室里的生机勃勃的活家具；但是也有另外一种人，他们“简单”是因为他们复杂得不可救药。我们对他们的唯一解释是：这些人（包括男人和女人）最适合于打破世界单调而平常的存在，以达到无限广泛和深远的目的，甚至超过那些废黜皇帝的伟大拯救者。

方济各和汉斯·克里斯蒂·安徒生属于后一类人。他们生活的方式和目的截然不同，但是，幸运的是在上帝创造的奇迹中需要所有类型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他创造了两种极端不同的人来追求同一个目标。一种人用他们的行为，另外一种人用他们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了一个虚幻的世界。他们用精神反映了所有存在的事物。他们深信欲望能使他们获得真正的幸福。

方济各向田野中的小鸟和动物布教，因为除他自己之外，没有任何人对他的理论感兴趣。有听众总比没有听众好。直到人们对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感到一点羞愧时，才决定最好是来听听，抓住一点这位奇怪的预言家所看见的真理的光芒。

安徒生出生在19世纪早期的写实主义时代，在年轻时饱受痛苦的折磨。他创立了幻想的王国，在这个王国中，大自然中所有的动物，曾经是方济各的朋友，都扮演着人的角色，像真正的人类一样，拥有贪婪、狡猾、魅力和同情，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这个动物王国中。

[安徒生（1805年4月2日—1875年8月4日），丹麦举世无

双的童话大师，其童话故事是世界文学史上最经常被译成各国文字的作品之一。他出生在贫民区，经自己艰苦奋斗而崭露头角。在别人资助下上了中学，1828年进入哥本哈根大学。翌年创作幻想故事《1828和1829年自霍尔门运河至阿迈厄岛东角步行记》，引起人们关注。他的第一本童话集《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集》(内有《卖火柴的小女孩》、《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豌豆上的公主》、《小意达的花儿》等篇）于1835年出版，但约八年后才真正受到赞扬。1843、1847、1852年他又有新的童话集出版。安徒生终生未娶，但曾几度热恋。——译者附注]

波兰文明的化身——

肖　邦

Chopin，Frederic Francois

（1810－1849 年）

弗雷德里克·肖邦由其父亲尼古拉·肖邦那里得到其法文名字。尼古拉这位来自南锡城的野心勃勃的年轻人感到自己在故土无法过上适宜的生活，就于 1788 年东行，在波兰找到了一个车轮制造工差事。此后不久，塔代乌斯·科希狄什科[①]（他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将军手下作战时掌握了军事技能）试图为自己不幸的国民带来自由。尼古拉·肖邦加入了他的行列，与他并肩作战，并作为波兰革命军的一名上尉结束了其军事生涯。

反叛被平息后，可以肯定，很长一段时间里俄国征服者不会再兴修道路了，车轮制造行当因而穷途末路，尼古拉·肖邦上尉不得不另找其它谋生的途径。

对一位有着上流社会风度、谈吐风趣的法国年轻人而言，这证明是件相当容易的事。因为每一个波兰贵族家庭都需要一位私

① 塔·科希狄什科（1746—1817 年），波兰民族解放运动领导人之一，曾参加北美独立战争，屡立战功。1794 年领导反对俄普瓜分波兰的民族起义，在克拉科夫建立革命政权，兵败被俘，后流亡美、法，死于瑞士。

人教师，教给他们孩子用相当于当时西方文明世界开门咒的法语进行交谈，因而不久我们就发现尼古拉向斯卡尔贝克伯爵和伯爵夫人的子女教法语，并娶了伯爵夫人的女仆为妻。这位年轻女士胡斯蒂娜·克日扎诺夫斯卡是波兰一破落贵族的女儿，可能正是从她身上肖邦继承了那一从不放弃为一失败的事业进行勇敢斗争的闯劲、力量和魅力。

在教会年轻的斯卡尔贝克子女们他们所有应知的构成彬彬有礼的华沙社会的外表的东西之后，尼古拉·肖邦迁到了华沙，成为一名法文教授，因而直到1844年去世之日一直能让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过上略为舒适的生活。

由于他只比其儿子早五年辞世，因而尼古拉也心满志得地知道他有了一位天才后代。因为肖邦的一生，虽然有许多巨大困难，但总的说来是非常成功的。这可能是出于两个原因。

弗雷德里克·肖邦无疑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钢琴作曲家。世界上也有在其各自的领域内同样出类拔萃的其他艺术家、画家、作曲家和建筑家，不过他们死于他们降生于其中的同样的贫困状态中。他们失败的原因不难猜出，他们不具备肖邦的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使肖邦与其同行们有别。首先，他是正在为建立一个独立国家而奋斗的波兰民族造就的唯一天才；其次，他遇到了成为一个失败的事业活的象征的非同寻常的机会。

其他不像他这样好运的音乐家有其他奥地利人中的奥地利人，其他意大利人中的意大利人以及普通荷兰人中的荷兰人，他们永不可能成为一个流亡中的民族中所有令人向往的英勇人士的象征。我这样说并不是要从这一无人可以匹敌的音乐传奇讲述人的所有作品中减损单一F大调的价值。我和其他任何在绝望之际从聆听弗雷德里克·肖邦的某一梦幻曲中获得安慰的人一样对他感激不尽。但假如没有他们民族事业的失败，假如他们没有机会成为一个得到所有文明人类的同情和羡慕的民族所有希望和抱负

的体现，无论弗雷德里克·肖邦还是我们亲爱的朋友伊格纳齐·帕岱莱夫斯基[①]都不可能获得他们最近达到的如此高的声誉。和平成为他们的骨灰，愿他们不久就能找到一位称职的后继者，激起我们对一个像波兰人这样即使在完全令人绝望气恼时期仍极其值得崇拜的民族的爱。

在此重复肖邦音乐生涯中广为人知的重要事实没有多大意义。你在每一部百科全书中都可找到这些事实，它们非常简单。这个男孩在能读书写字之前就会弹钢琴了。顺便说一下，那架钢琴被1863年征服波兰起义的哥萨克士兵用作了引火木，因为那是俄国侵略者常用的表示关心他们所征服民族的文化成就的方式。6岁时，小弗雷德里克开始作曲。他的父亲不仅认识到儿子超人的才能，而且没有像其他许多做父亲的人在类似的情况下那样行事。他没有把自己的孩子作为音乐奇迹加以利用，没有以打断他的骨头为威胁要他放弃成为一位钢琴大师的念头，勒令他从事一种较现实的职业，诸如簿记员或可望在60岁时获得退休金的政府官员（我在这里不假思索地引用了舒伯特的父亲致其子弗朗茨的一封信）。他平静而卓有成效地鼓励儿子追求自己的理想，并终其一生一直尽其微薄的力量帮助他。

确实，这个男孩在8岁时首次举办公开音乐会，但这并非出于商业目的。这样安排的目的是让他处在让华沙漂亮的夫人小姐们称羡的环境中感到舒适。肖邦终其一生都愿意做那种令人愉快的事。当需要进行严格认真的基础训练（我指的是音乐而不是晒太阳）时，他被送到波兰首都本地最好的教师那里学习，后又被送到维也纳。其中一些音乐教师不像理应的那样优秀，正是由于

① 伊·帕岱莱夫斯基（1860—1941年），波兰钢琴家、作曲家，曾任总理兼外交部长（1919年），主要作品有歌剧《曼鲁》、钢琴曲《小步舞曲》等，擅长解释肖邦作品，曾主编《肖邦全集》。

他们错误的教学方法，肖邦在其整个令人称奇的一生中一直未能克服技术的欠缺，最终痛下决心完全退出音乐会舞台，专心致志地从事音乐创作。

在维也纳求学时他听到了当时一些最伟大的演奏家的演奏，尤其是洪梅尔① 和帕格尼尼。② 与其他所有年轻艺术家一样，他在听完那种演奏后，深信自己也能做得同样好，一度看来也确实如此。他的演奏很吸引观众，尤其是那些女听众。但除了弹奏技巧未能达到李斯特和同时代其他许多伟大的演奏家的水平外，他还缺乏对一位卓绝的乐器演奏名手或歌剧女主角来说必不可少的耐久体力。肖邦就像一位在第七局时显示出体力衰竭迹象的卓越棒球手，而决定胜负的正是第七局。

随后出现一连串灾难，对此他无法控制，但它们对他后来的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1830 年时肖邦恰巧在维也纳，当年又一场时运不济的革命在波兰爆发。他与华沙的家人的联系被切断了。他再也没有与他们相见的希望，他决定去英国，由那里去美国开始一种新生活。1831 年 9 月他在斯图加特听到了华沙陷落和开始进行全面屠杀的消息，俄国的旧制度惯于用这种方式“安抚”其新近征服的地区。

肖邦沮丧至极，乘坐慢速公共马车到了巴黎，但在那里他受到了开疆拓土的英雄般的欢迎。仍为 1812 年拿破仑侵俄失败感到痛苦的法国人憎恶俄国人，另外，巴黎正大踏步地“变得浪

---

① 约翰·内波穆克·洪梅尔（1778—1837 年），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过渡时期的作曲家和杰出的钢琴家，曾师从莫扎特、海顿等人，最主要的作品是钢琴曲，创作过歌剧、弥撒曲等，著有《钢琴教学》一书。其作品对舒曼与肖邦的早期钢琴作品有一定影响。

② 尼科拉·帕格尼尼（1782—1840 年），意大利小提琴家与作曲家，其创作和高超的演奏技巧影响深远，主要作品有 24 首《随想曲》、《女巫舞曲》及小提琴协奏曲、吉他曲等。

漫"，肖邦的音乐完全满足了爱听音乐会的听众的需要，而他的波兰护照打开了首都所有略有资财的家庭的大门。

在波兰，事态按正常途径发展。俄国人在每个十字路口都支上绞刑架。波兰煽动革命的人四处逃遁，不久巴黎就挤满了波兰难民。他们大都像教堂里的老鼠一样贫穷，居住在贫民窟里。但一些大封建家族预见到了事态的发展，早就小心翼翼地为自己不再生活在祖业上作准备。现在他们把巴黎作为准备进行反击的中心。他们充分认识到了公众宣传的价值。打算利用一切机会向世人证明波兰人作为一个种族比压迫他们的俄国人要文明、有教养得多了。

一夜之间肖邦成为波兰文明第一号展品。能够如此高贵，如此令人满意地——或极其容易和自然地——与人们期望于他的东西相合的艺术家或作家（而没有这两者你就不能进行成功的反革命事业）少而又少。因为肖邦在那一时刻具有成为大众偶像的所有必要条件。他年轻、相貌不凡，但属于那种娇弱之美，因而人们本能地对这位双肩业已被不幸的祖国命运的忧患压弯的可怜青年感到难过。当他演奏他自己的一个作品、深深被音乐感动以致不得不请人帮他把作品演奏完时，波兰的悲剧不再仅仅是人们在报章上读到的东西了，那时它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以致听众感觉自己好像拿起了枪，奔赴那里去保卫其亲爱的波兰朋友。但即使他们不能这样做，欢欣的马祖卡或华尔兹乐曲也打破了凝结在音乐厅上空的阴郁气氛，每一位听众在回家时都感到波兰自由事业尚未失败，它决不会失败，波兰会再次重现其古时的种种荣耀的。

这发生在现代意义上的宣传产生之前很久。但肖邦及其音乐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宣传，激发起人们大无畏的爱国主义精神。我祈求上帝让他马上重回人间！

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世人开始忘却

罗曼诺夫王朝在波兰和他们立足的所有其他地方的兽行，以及奥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犯下的兽行，乃至及最近200年来构成欧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习惯上被称为“外交政策”的所有其它兽行(人们竟如此健忘)，波兰也开始令人们厌烦，随后完全从他们的心灵中消失。这对肖邦的艺术事业并没有产生影响，因为他依然是巴黎最受欢迎的钢琴教师，他的作品甫一完成即被出版发行。但他周围的气氛逐渐在发生变化，虽然他无疑仍是当时最杰出的波兰人，但当他，一位仅仅是钢琴师的人，企望娶一位男友的妹妹玛丽·沃德津斯基女伯爵时，她尊贵的父亲老沃德津斯基伯爵却横加阻挠，直言认为这种结合是根本不能考虑的。由于这一件事及其他一些烦心事，肖邦再度考虑1831年他计划采取的移民美国的计划。

他的家人、朋友及巴黎的波兰群体、公众以及他的债权人，他们都恳求他不要采取这种可怕的行动，认为这无异于社会和音乐自杀。这种恳求当然很让人喜欢，肖邦轻而易举地就接受了劝告，继续留在巴黎。再没有比这更让人遗憾的事了！因为正是在巴黎弗雷德里克·肖邦现在面临一种比落入大西国可怕的后人或东方总督之手还要恶劣得多的命运。

我这样说，对一位写过不少于100册书的著名同事可能有些苛刻，但她确实很坏。她很坏，是因为她像昆虫类的某些成员，一当男性被她的魅力所吸引，她一无例外地把他们吞噬。

关于杜德旺男爵的夫人阿芒汀·卢丝尔·奥罗尔，人们写过多本著作。她在英国一女修院度过三年后，经历与杜德旺男爵婚姻关系后继续活下去，怀孕生子，不得不为自己和两个安琪儿寻求某些生存手段，尝试去作职业记者和通俗小说家。作为一名欢快的人，在未怎么受到竞争的情况下（那时女子尚没有靠写作维持生活)，她有大量闲暇从事她喜爱的情爱活动。有一天她遇到了肖邦，小他六岁的肖邦拜在了她的石榴裙下。

那时他身体羸弱，得了重病，结核病的最早的迹象刚刚开始显露出来。他挚爱的波兰独立事业失败了。他自己作为演奏家的生涯，自感也到了终点。他极需要一位母亲，乔治·桑[①]答应充当母亲的角色。

我将对肖邦那次令人难以置信的马略卡岛之行略作叙述。阿芒汀·卢丝尔·奥罗尔携带肖邦和他生病的儿子到了马略卡这一地中海岛屿，希望这里温和的气候能治愈二人所患的烦人的肺病。当人们仍在比伽拉道谈论马略卡时，它听起来非常罗曼谛克。但当肖邦在拉帕尔马登陆后，他发现那是西班牙，是处于最糟糕的状态下的西班牙，他又重新回到了中世纪。马略卡首府没有旅馆，没有公寓，没有适合人吃的食物，尤其是适于那些习惯法国烹饪术的人的食物。无论走到何处，他都会受到满是疑心的官员的追逐。当他派人去巴黎取他的钢琴时（因为她亲爱的弗雷德里克必须继续从事他的工作，必须写出更美妙的作品来），海关人员拖延了六个月才允许钢琴进关。马略卡的一个人为什么需要一架钢琴呢？太奇怪了。这带有革命的迹象。当肖邦染上病、咳嗽得要死时，岛上没有一位大夫，官员们却怀疑他染上了某种恶性传染病，勒令你离开城市，躲到乡村中一个离各地都有几英里远、又老又潮湿的修道院里，结果他又添了支气管炎，差点死在那里。

然而，肖邦必定比外表显得更强壮一些。他不仅未死在马略卡，而且细心照顾他的卢克丽霞，安然回到巴黎，又在世上度过了许多年。

总的说来，肖邦暮年这些岁月不太幸福。巴黎接连不断地发

① 乔治·桑是阿芒汀·卢丝尔·奥罗尔（1840—1876年）的笔名。奥罗尔为法国女小说家，以与梅里美、缪塞和肖邦间的风流韵事及捍卫妇女解放的权利著称。主要作品有《安蒂亚娜》、《康素埃洛》和《魔沼》等。

生革命，来自波兰的消息越来越糟。在那些情况下，教钢琴——即使每课 20 法朗（在那些日子里这是为人所未闻的高价）——也易于变成一件难以忍受的事。此外，在马略卡染上的支气管炎看来难以治愈。肖邦开始大量失血，往往虚弱得难以动弹。但他需要钱，就像迟暮之年的帕岱莱夫斯基那样，他强拖着病体走到琴凳前，以便再挣几个便士来支付其他人的债务和帮助他可怜的祖国，但收入的主要部分继续用来撑持他作为真正的贵族的脸面，从不回绝波兰爱国者提出的任何要求，他本人却饿死也不愿承认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天里没有任何东西可食。

肖邦死于 1849 年 10 月 17 日，在他的葬礼上，演奏了莫扎特的《安魂曲》，另加肖邦本人的《葬礼进行曲》，出自降 B 小调奏鸣曲，随后是他的两个序曲，E 小调序曲和 B 小调序曲。他朋友在他 1830 年永远离开他亲爱的波兰时送给他的一个盛满祖国泥土的银高脚杯随之下葬，一同入土的还有玛丽·沃德津斯卡送给他的凋谢的玫瑰，她仍希望她父亲回心转意，允许他娶她为妻。

现在这出戏中的所有演员都已辞世。压迫者或受压迫者都没有留下什么，迫使肖邦过着流亡生活的罗曼诺夫王朝灭亡了，但他们并没有这种激动人心的葬礼，而波兰土壤比布尔什维克的生石灰更受欢迎。作为一位写过降 E 大调梦幻曲和 A 小调马祖卡舞曲的作者为后人铭记，其命运远比作为使用绞刑架和皮鞭的暴君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要幸福。我年事渐高，得以目睹兴高采烈的哥萨克的按其犯下了罄竹难书罪行的主子的吩咐行事，得以经受那些对我的波兰朋友仍构成希望的那些令人痛苦的日子。我在此衷心为那些毁掉了波兰美丽大地上一切可爱、有魅力的已故独裁者的灵魂祈祷："愿他们的名字永远受到诅咒！"我也同样祈祷世界各个角落、各个时期他们的继承人，愿上帝显灵，阿门。

[肖邦（1810年3月1日—1849年10月17日）为波兰作曲家和钢琴家。其创作以钢琴作品为主，且多为小型乐曲，但卓越的想像力及精湛的技巧使他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诗人之一。他的音乐灵感源于自己和波兰的悲剧性经历，旋律独具个性，表达了内心深处不仅仅是伤感的情感。作品虽有浪漫主义本质，但丝毫没有浪漫主义的表现癖好。作为天才儿童，他7岁时即正式出版作曲作品。主要作品有《B小调谐谑曲》、《G小调叙事曲》、《F小调幻想曲》、《船歌》等。死后周年祭典，人们在其坟上洒了一盒其祖国波兰的泥土。——译者附注]

身后扬名的孤独才女——

埃米莉·迪更生

Dickinson, Emily Elizabeth

（1830－1886年）

那样一只小小的——小小的船儿
蹒跚着驶出了港口！
那样一片壮阔的——壮阔的大海
就这样把它唤走！

那样一个贪婪的——贪婪的巨浪
把它从岸边吞没；
华美的巨轮一点也不知道
我已失去了我的小舟[1]

关于埃米莉·迪更生，没有多少可谈的，区区10行、12行的文字就能包容她的外在生活经历。但她在居住在其阿默赫斯特故居时的所思所想，却是另一回事，决非那么容易叙述。不过后一工作必须去做，也有人去做了——虽然勉为其难。

---

① 本章中四首诗的译文摘自孙亮译《水草与珍珠——埃米莉·狄金森诗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月版。

埃米莉·迪更生的祖父塞缪尔·福勒·迪更生是1630年移居美洲的清教徒后裔。他笃信上帝，在20岁稍过时迁移到新英格兰这一遥远的地区，通过一所培训年轻人从事“皈化整个人类”的学院使世人信奉公理宗信仰。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修会——“皈化整个人类”——但完全与一个世纪前美国的精神理想相合拍。

经过一段时间，早在世人得到救赎之前，迪更生祖父就有了一个儿子，名叫爱德华。又经过一段时间，这个儿子也成为三个孩子——一个男孩、两个女孩——的父亲。他们中的一位随其母埃米莉·诺克罗斯取名埃米莉，她就是我们的主人公。

这个女孩受到了她那时代正常的教育。当她长大可以离开家时，她被送到了设在南哈德勒的“女子学院”。该校被认为是上一世纪40年代最好的学校之一，但埃米莉对它的感觉只有厌烦。据埃米莉致友人信中的记述，女校监以压制、束缚学生所有正常的冲动和愿望为己任。但在埃米莉那里这位老女士严重受挫。当她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那位来自阿默斯特的腼腆、貌似天真无邪的学生之上时，她完全未能如愿。埃米莉实际上我行我素，而当玛丽·里翁反对时，她卷起铺盖回到了老家。

这种行为不合那一时期新英格兰年轻女子据认为应当信守的习惯。但埃米莉是个例外，她是父亲的掌上明珠，知道自己能把他支使得团团转。现在他开始陪伴她穿行邻近乡村地区去办各种差事，因为他不仅是位律师，也是其父亲创办的学院的会计。此外，他是一位风趣可爱的人，爱他的同胞，所到之处都受到欢迎。聪慧而——按她存在的唯一一幅画像看——相当有魅力的女儿和高贵的父亲必定构成一种最使人满意的组合。出于这一原因，1853年冬爸爸当选国会议员时，陪伴他去首都的正是埃米莉。

正是在这一场合，灾难降临了，它葬送了埃米莉过正常生活的机会，但对美国文学却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

埃米莉·狄更生像

在自华盛顿返回时，迪更生父女在费城歇脚停了几天。埃米莉在那里遇到了一位教士——一位携妻带子的最受人尊重的绅士。她自出世以来一直受到压制、束缚、扼杀的所有那些情感突然爆发出来。这类灾难过去曾发生过。

在与她的“命数”（当时人习惯于这样说）相会后返回阿默斯特，就埃米莉而言，她的生命结束了，24岁时埃米莉退出现世，她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她突然面临一个选择，要么毁掉一位姊妹的幸福机缘，要么放弃自己完美结合的希望。至少这是人们普遍接受的对事件的说法，与小说中描述的身着粗布衣的古怪未婚女子完全相合，“在以便以谢离开农场娶了那位城市妞后”，（幸运的以便以谢！）她再也不见其他任何人。

我在这方面掌握的材料不比其他人多，当然也不比其他人可靠。但基于埃米莉自己诗歌中的隐秘证语，我得出了有些不同的结论，我曾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脉一偏远地发现了一个奇特的宗教机构。当然，我从未去过那里，但从一位访问过那里的妇女处获得了一些了解。她告诉我，这一女修道院的所有居住者在发过誓后都会收到一个小玩偶，一个常见的孩提耶稣玩偶，此后她们可以用从维也纳丝绸店里买来的最精美的服装打扮它，给它洗澡。修女们从此再也不为人见到了，因为她们据说对自己的处境完全满意，没有理由回到院外邪恶的世界上去。但她们的一些玩偶保留在邻城一个小博物馆里，这些东西向公众开放。

对埃米莉·迪更生而言，她的诗就是这类孩提耶稣玩偶。她聪慧玲珑，非常了解自己，必然深知自己不适于在她出生的社会上过正常的生活。几代人以来，她班上的姑娘们就被灌输一种她们称为（如果她们敢于谈论的话）“一种纯粹的情感”的东西。她们可能也去寻找“不散热的火焰”。

烟波浩渺
孤帆无言
领航者哟!
可识得那处
海滩?
那里没有巨浪
咆哮——
风暴终于止息?!

确实，火焰可以不散发出热来，但只是在它们熄灭后才可能。埃米莉社会先辈的多数女子卑贱地接受了自己的命数，因为其牧师和《圣经》教导她们，她们据认为应当扮演上帝授以圣职的角色，她们谁会对无所不能的上帝的智慧表示怀疑呢？埃米莉·迪更生与其上帝的关系极为特殊。它们包括她有权去问她想问的任何不论多么令人窘困的问题，如果善良的主未能作合适的、令人满意的答复，她自己设法提出一个来。

就其出身和教养而言，埃米莉是纯粹情感联合会的终身成员，她知道自己不能躲过自己的背景。另外，作为一位非常伟大的艺术家，因而坚持完美，她拒绝从事任何她永不可能出人头地的活动。如果事实如此，那么，作为一位被逗得哈哈大笑的人生观众度过一生，透过精心合上的帘子窥视亲属和邻人的古怪姿势，而不是嫁给一位教授、教士并冒再次被不可能成为现实的幻像诱惑的风险，岂不是更明智，更令人高兴吗?

她与费城那位仪表堂堂的牧师的两次致命会面使她极为清楚地看清了这一切。她具有强烈义务感和洞察同胞尤其是自身滑稽可笑之处的本领，使她避免引人注目或做任何使她看上去古怪可笑的事儿。她逐渐在自己房间里消磨越来越多的时间，直至最终完全遁出人生，再也不在其他任何人面前出现。有时，在夜深人静之时，她会离开闺房，到父亲住宅周围的花园里浇她钟爱的花

儿。但自1862年直至1886年5月15日她告别人世，她费尽心血去编造她喜爱的有关身着白衣、静静的小妇人的神话，有时来客会在小妇人由走廊或厨房匆匆到其楼上修女隐身处找到安全场所时看到她的影子，大感惊恐。在楼上，她会陪伴着其心爱的玩偶度过一个快乐的夜晚，在她而言，玩偶包括写在小纸片的小条小条的诗句，它们由五彩缤纷的彩带整整齐齐地串起来，小心地堆放在她那整洁的小书桌抽屉里。

当玫瑰不再开放，
当紫罗兰已然凋零，
当蜂儿默默展翅
飞到太阳那一侧
当那流连的手
本要采撷夏之芬芳
却在落叶中迷失
迹踪
那么请带走
我的花儿吧，请你！

上面对埃米莉·迪更生的描述可能完全错了，但我倾向于认为她以其独特的古怪方式几乎比同时代所有过着正常生活的人都更强烈地规避生活。作为一位不显山不露水的彻底的自我主义者，她坚称她死后她所有的诗歌和信件都要烧掉，并不是出于自卑感。远非如此！她在撰写它们时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感到没有必要与其他人分享自己的快乐。让其他人好奇，去作各种猜测去吧。这对我们的灵魂不无益处，而埃米莉虽然外表上是位苛严的新英格兰人，但内心深处仍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位玩童，她爱开这些小玩笑。

很幸运，她的亲属们虽是些常人，却认识到，如果他们毁掉

像其辞世的姐妹和姑妈的诗歌那样完美的艺术之作，他们就是对文学犯下了大罪。这等同于在精神错乱的伦勃朗断气几分钟后溜进他的画室，撕毁他的所有油画和蚀刻画。

迪更生家族把埃米莉的私人信件大都付之一炬，但小心地保存了她那些装订得整整齐齐的诗作，后来把它们印刷出来，使之为一般公众所阅读，或者更准确地说，为那些能够读懂它们的公众所喜爱。

昨日是历史
如此遥远——
昨日是诗
是哲学——
到了今日——
昨日是谜——
而我们苦心猜测时—
它们都展翅远去

［埃米莉·迪更生（1830年12月10日——1886年5月15日）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叫阿默赫斯特的小镇。她在本地的学校念了几年书后，退隐到家中服侍父母，不再与人交往。她终生未嫁，邻人只知她四季皆着白衣，性格怪僻。在她悄然辞世后，在整理遗物时，她的亲人发现了她写下的1700多首诗稿，1890年经人整理发表后，引起轰动。而今她被认为是19世纪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之一。其诗作打破了当时对诗的格律和韵脚的束缚，用平凡亲切的诗句描写了爱情、自然和死亡。——译者附注］

雪野中的山峰——

南　森

Nansen，Fridtjof

（1861－1930年）

弗里乔夫·南森，这个名字本身就描绘了他这个人。它像一座挪威的山峰，从雪野上拔地而起，高高矗立。

南森于1861年10月生于奥斯陆附近的一个村子。他在当地上学，小时候滑了许多时间的雪，最后考上奥斯陆大学，攻读动物学。在大学期间他也花了许多时间滑雪。在21岁时，他加入一艘驶向格陵兰的帆船，这样他就获得了一些关于在海洋上生活的第一手资料，而且初次看到了北极地区情况。

在他回到文明世界之后，他继续学习，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并开始着手为进行一次最异想天开的北极航行作准备，至少从上一世纪80年代末的角度来看是如此。他决定穿着雪鞋和滑雪板去旅行，从格陵兰的东海岸直奔西海岸，以便能对这个冰天雪地的内陆地区有个明确的了解。他和奥托·斯韦德鲁普（奥托后来成了“弗拉姆”号的船长）、另两名科学家及两名拉普人一起，于1888年5月扬帆启航，驶往格陵兰。到了8月，这些人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他们登上了冰冻高原的顶部，也就是格陵兰的屋脊。穿过海拔9000英尺的雪荒原，他们跋涉了六个星

期之后，平安地抵达了格陵兰的西海岸。第二年春季，他们从格陵兰西海岸返回挪威。格陵兰之谜解开了，南森作为北极探险的卓越领袖的大名也就此传开了。

1890年，南森打算作另一次步行旅行，这次他的抱负就更大了。首先他要为自己造一艘非常坚固的船，足以抗得住北极冰块的挤压与撞击，因为他知道，以往其他人多次航行的悲惨结局都是由于船只像核桃那样在巨人脚下被粉碎了。只要他有了这样一艘坚固的船，他就可以让这个浮动的堡垒开进北冰洋洋流，正是这个洋流曾经把倒霉的美国"珍妮特"号探险队的残骸从新西伯利亚群岛一直冲到格棱兰海岸。首先他要把他的船开到新西伯利亚群岛（美国的"珍妮特"号就是在那里沉没的，正在勒拿河口的北端），然后听其自然，随波逐流。如果他的估算是正确的话，他的船会漂到离北极极地很近的地方；如果发现船只没有到达预期的深人北部的位置，他就打算在离纬度终端（即纬线为0）最近的地方离船登岸，其余的行程就步行而去。步行、滑雪和爬山一直是他最喜爱的运动，几百英里的路程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

南森把他的计划向挪威同僚们作了陈述，并恭恭敬敬地送到伦敦皇家地理学会。这些守旧的北极探险家们无一例外地告诉他该计划行不通。他们这种怀疑态度反倒大大激励了南森，他回到克里斯蒂安尼亚（奥斯陆的前称），就着手为航行作准备。

他得到了一艘旧的捕鲸船，把它新命名为"弗拉姆"号（"前进"号），并加固了内部结构，达到了抗冰块的强度。那个时候和现在一样，钱是一切科学探险的命脉。但也只有这一次，挪威议会才想着要采取行动来帮他把这正当的事业进行下去（当时挪威议会还没有意识到这个事业对国家声望的宣传价值），其余的基金来自国王和一些私人捐献。

奥托·斯韦德鲁普是南森在横穿格陵兰大陆探险的同伴，这

次被选定为“弗拉姆”号的船长。另外有9人，包括高级船员、水手、轮机师、司炉工人等，归他指挥。这些挪威人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要求他们不仅要有非凡的体力，而且要有坚强的意志力，才能在北极地区合乎情理地生活许多年。南森估计至少要经历三年时间才能回到格陵兰海岸。

1893年6月，“弗拉姆”号缓缓地、咔嚓咔嚓作响地驶离了奥斯陆峡湾。9月下旬，该船在新西伯利亚群岛附近把自己与一大块浮冰绑在一起，于是就开始了著名的漂流行动。1895年3月，即离开挪威近两年之后，“弗拉姆”号抵达了纬度最高的海域。在这整个时期，没有遇见过一平方英寸的陆地。经常的水深测量证明了北冰洋比人们预料的要深得多，有的水域，洋底深达2000 㖊（=3658米）。

南森发现，他的船北进的航程已经到了尽头了，就决定自己向北极极地作最后冲刺。由于船在漂流的浮冰中无法确定位置，他告诉斯韦德鲁普，一旦他测定或未能测定北极极地的位置，他就向斯匹次卑尔根群岛的方向前进。他在船上选出了一名身体最强壮的船员作为他步行冲刺的伙伴，那人有一个很普通的挪威姓名——约翰森。

1895年3月14日，这两名朝圣者带着他们的狗、雪橇、皮衣、单人独木小舟，在北纬84度、东经102度的地点（请查阅你们的世界地图集）离开了“弗拉姆”号船，4月8日抵达了北纬86度14分，这是人类到过的最靠近北极极地的地点，连熊和狐狸都未到过。

南森主要是一名科学家，而且由于他并未与任何人签过什么合同要写一篇可以通过报业辛迪加发表的《我向北极极地冲刺》之类的文章，所以他是一个自由人。他意识到，如果他想在事情不可收拾之前就回到法兰士约瑟夫兰德群岛的话，他必须立即转身回去。于是，在离开北极极地不远轻易用步行就能走到的距离

内，他掉转身子离开了他梦寐以求的目标，这种行动显示了一种比大多数探险家所具有的更伟大的性格的力量。

在北极极地周围没有道路的茫茫冰原上度过了令人心碎的几个月的时光之后，这两人终于到达了法兰士约瑟夫兰德群岛最北端的一个岛上。在那里，他们用雪建造了一所小窝棚，用丝质帐篷当屋顶，准备迎战任何两个人在这么长时期中可能遇到的苦难，来度过冬天。他们的食物包括熊肉和海象肉，放在一盏烧海兽油脂的灯上煮熟。他们总算是活下来了，而且还没有病过一天。1896年的春末，他们背起了所剩无几的行李物品，向南方进发。

现在，你会问，这一切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对这两个游荡者的冒险经历那么感兴趣？

1896年，我14岁，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对我第一个崇拜的英雄，荷兰儿童杂志的著名诗人（他能做各种各样的事，而且都做得很好），逐渐淡薄了爱慕。这时我非常需要有另外一个崇拜对象——另外的杰出人物，他要能使我寂寞的心灵充满崇敬和仰慕，并要使我感觉到，一个死气沉沉的荷兰小镇，它的单调乏味的生活，不是我们生命的全部。就在这时冒出了这位仪表堂堂的挪威人（那时我是个可怜虫，由于多年生病，人像瘦猴，什么体育运动都不行，学校功课也很糟），他和他的伙伴们正在北方某个地方，消失在北极地区茫茫无际的雪野中。也许他们还活着吧，很可能他们早已死于饥饿和寒冷了，因为从上次听到有关他们的消息以来，这已经是第三年了。从那冰封的广袤大地上没有传来一个字、一句话可以提供给我们有关他们最后命运的极细微的暗示。我生来就有一定的想像力，而且从小时候起，只要我能搞到的有关北极探险的书，我每本都看。因此，我对于这些坚韧不拔的探险家的最后时日的情形，能够勾画出一幅相当准确的画

面。关于倒霉的富兰克林远征的真相（除了轻步兵旅的冲锋之外，也许这是英国最笨拙的杰作）是在我父亲的年代里才披露的。他仍然记得，当人们得知约翰·富兰克林爵士[①]所率领的129名官兵在到达加拿大北部海岸很久之后个个被活活饿死的情景时，在整个文明世界引起了多么强烈的震惊啊。我很熟悉当时刊登的关于石冢（隐藏了有关黑暗与恐怖的最新消息）和盛有残余人骨的蒸锅、煎锅的照片（因为最后演变成水手吃水手的惨剧），所以我现在也能想像"弗拉姆"号的船员一面挣扎着往南走，去寻求平安，一面把最后一条狗杀了吃掉，最后导致相互攻击和残杀。

后来，在1896年8月上旬，从瓦尔多（我永远不会忘记摩尔曼斯克半岛附近的那个小村）发来一份简短的电报，说南森很安全，他与约翰森是在法兰士约瑟夫兰德群岛附近被一名叫杰克逊的英国人发现的（杰克逊是在诺思克利夫伯爵的资助下，到那个遥远的小岛去进行科学探险的）。这一消息引起了全世界的欢欣鼓舞。他被发现时，正濒临饿死的紧要关头，但他们得救了。他们搭乘杰克逊的吉祥船"向风"号正在开往挪威首都的途中，但他们却担心在"弗拉姆"号船上的同伴们，因为这三年来没有听到任何一点关于"弗拉姆"号的消息。

他们当然不会知道，但就在那一天——1896年8月13日——"弗拉姆"号终于摆脱了北极浮冰的困扰，现正带着船上所有船员（身体都很健康）平平安安地向南驶去。几天后在特罗姆瑟，老船员们再次团聚，并向克里斯蒂安尼亚前进。他们得到的荣耀，是以前对于早就被认为失踪而忘怀的人所未得到过的。

---

① 约翰·富兰克林爵士（1786—1847年），英国海军少将和探险家，1845年率官员138人，乘船两艘从英国出发探寻西北航道，在威廉岛外水域被冰块包围，全体人员先后遇难。

我看到了这一切事件的发生，好像我也成了这些动人的冒险事业的真正参与者。当南森的著作《最极北之地》译成荷兰文出版时，我就搞到了它。虽然我不懂这两册书里塞满的科学数据，但我对其中一些戏剧性的事件都读过了，一个也没漏掉，包括直到那天早上南森以为末日快要来临了，却突然听到了枪声，他爬到了一个小型冰圆丘的顶上，结果与一个白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碰了个照面，杰克逊当时正在寻找每天的食物——海豹肉。

从那以后，我已经有好几年没有看到南森的消息了。我知道他继续从事他的科学事业，他参加了许多别的很重要的探险活动，研究海洋深度、洋流和诸如此类的内容，这些研究结果以后就发表在枯燥的科学出版物上，让它们永久保存下来。但在1905年他的名字再次与一个人类利益有关的故事相连在一起。那是关于挪威从瑞典分离出来的事。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瑞典国王、著名的法国将军贝纳多特，由于背叛了他原来的朋友波拿巴将军，而被赐予挪威的王冠作为报答。挪威在最近四个世纪以来一直受丹麦管辖。然而，丹麦由于效忠于拿破仑而要受到惩罚。这样，瑞典国王同时也成了挪威国王。贝纳多特王族（应该永远归功于他们）一直奉行着一条温和的明智的路线，而且在同时治理两个王国这样一件困难的工作上他们做得很成功。然而，渐渐地挪威人变得成熟起来（不仅在经济上也在政治上），终于他们提出了要成为自己家园的主人，并大声疾呼要求独立。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出现这种纠纷早就会导致流血。但这些高度文明的国家都已发展成熟，超出了它们古老的本能，而深知在两国之间进行一场战争乃是最糟糕的做法——愚蠢之极。所以两个国家就分手告别，也许有相当数量的人对此感到忿恨，但不存在相互之间长久的敌意。

在这场危机中，南森这位前探险家扮演了调停人和容忍之顾问这一最值得称道的角色。他用非常正确的常理来总结这个形势

说：在任何类似的两个国家的联盟中，如果其中一国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就会导致经常的摩擦，这种局面为什么还要维持下去呢？为什么不能和平地分手，各走各的路呢？

当挪威与瑞典的联盟正式解体时，南森被指定为挪威驻伦敦首任公使来代表新的王国。三年之后，事态已经平静下来，他又回到他的科学工作上，全神贯注地进行写作，偶尔也到北方海域进行一些探险活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战争期间，他再次作为挪威人民的无任所代表，被派往其余的文明世界。他曾经到美国去，设法促成挪威能收到那些对挪威的生存至关重要的供应物资。等到战争双方一宣布停火，他就接受了国联委派他的一项任务，把老沙皇政府积聚在西伯利亚的50万战俘遣送回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沙皇俄国就垮台了。南森仿照胡佛的方式建立了一个救济委员会去给上百万挨饿的俄国人提供食物。同时，他还领导着国联的一个照看难民（现在世界上到处都有难民）的机构。当墨索里尼早期的自大狂症发作并炮轰了希腊的科孚岛时，正是南森有勇气在国联的各种会议上对这种野蛮行径提出了抗议。真的，要是在日内瓦有一打甚至只有半打像南森这样人物的话，名声不好的国联也许就能做出一些成绩来。但日内瓦很快堕落成为办事拖拉、骄傲自满的堡垒，直到有一天由于它自身的固有弱点的原因，而不是它的敌人作出任何努力，堡垒崩溃了。

即使在那时，南森也没有放弃他对人类的坚定信念。一回到奥斯陆，他就继续为他的同胞们办事，从不考虑自己。

弗里乔夫·南森死于1930年5月。他死得很泰然，他入睡后没有醒来。那台结实的发动机如此尽职地为他服务了这许多年，终于停止转动了。69年前从大自然无穷无尽的能源宝库中借来的那颗小火花重又交回了原处。但是它的成就大家依然能感觉到。在这小人时代（像今天这样缺乏真正的伟大领袖的情况，过

去有过吗?)，我们痛心地、清醒地注意到，当这位世界上热心公益的公民不再能给战后那些愚蠢的政客树立一种纯真无私的领导作风的榜样时，我们的损失有多大啊。弗里乔夫·南森不仅是最理想地适合于担任北极探险队的队长，而且是适合于担任比到冰冻的北极探险更困难、更复杂和更危险的事业的领导。我是指那些深入应用政治领域的实地考察活动，这些活动迄今很少带来积极的成果而往往搞得一团糟，因为人们让那些错误的领导人去做这件事。

[弗里乔夫·南森（1861—1930年），挪威的北极探险家、海洋学家、政治活动家，曾乘船往北极探险，到达北纬86°14′，后任国际联盟难民救济高级专员，因领导遣返战俘、国际赈济难民等工作，获1922年诺贝尔和平奖。—译者附注]